·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丛书·

刘建明 著

当代中国舆论形态

目　录

序　言

舆论现象本身，正象这一概念一样，常常被人们挂在嘴皮儿上，无休止地谈论它。一旦我们深究一下：舆论是什么，它能否作为一门科学让人们把握它的全部范畴和整个知识体系，许多人将为自己的无知感到惊讶，发现自己所熟知的舆论并没有超出"街谈巷议"之类的一般含义。那些如痴如狂崇拜舆论的人，原来不过是感时愤世、初知皮毛的耿介之士。但问题并不在于人们学识贫乏，因为舆论这一学术园地，在我国2000多年的历史中一直是块荒芜凋零的贫瘠之地。

我向这块贫瘠之地走来，略有盲目的贪新骛奇，也有一知半解的困惑。尽管撰述困难重重，但社会主义在今天的巨大变革赋于我一种无名的动力，我终于完成了这一撰述，以期奉献给当代中国的伟大建设者、社会英明的管理者和意识形态战线的工作者。

无论在哪个领域，研究现实比研究历史要困难千百倍。因为历史已成为过去，静态的材料无私地把它的各个侧面以及众多名家的评论奉送给研究者深思熟虑。现实则变动不居，瓜葛密缚，给研究蒙上层层迷雾，设置道道路障。而舆论的无形、无量、无度、无极，更让人无法捉摸，那么，研究当代中国舆论形态的难度就可想而知了。

当代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神奇壮丽的时代，11亿中国人民走完这段瑰丽的里程将要跨越宽广而又坎坷的征途，并

依赖诸种因素的机运与支撑才能实现宏伟的目标。经济的、政治的、理论的、文艺的、舆论的、风俗的、教育的元素都要对现代化建设的突飞猛进产生影响，而其中，舆论力量是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潜能。历史的重大教训是：搞乱了舆论，也就搞乱了人心，搞乱了经济，搞乱了全国。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命题的成立，正如一般事物的发展必须从初始阶段起步那样明了，因为，任何一种社会形态不可能不经过初级阶段就一跃而上升为中级阶段或完善的高级阶段。这样一个十分简单的道理，在建国后30年中，特别是在“左”倾错误时期被人们忘得一干二净，于是，一切“伟大战略决策”都由于脱离这一国情而驱使数亿人空忙，由此大造出来的气势磅礴的舆论也就变为震落天庭的空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舆论形态，是由该阶段经济、政治、精神活动的根本特点决定的，我们的探索，也是在该阶段基本特征的“沙盘”上勾勒舆论变化的山峦、开阔地、河流和道路，力图给人们摄取一个清晰可辨的舆论动态模型。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落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制度不成熟、不完善，不完全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而整个生产活动只能逐步实现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与此相联系，上层建筑和民主生活也不完备，权力集中现象犹存，以党政分开制约以党代政，使政治体制改革跨出关键的一步。由于西方思想和封建主义残余的影响，法制不健全，人治在某些地方大于法治，使人民的民主权利时常受到侵害。在缺少雄厚物质基础、国家资金不足的情况下，文化、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断遇到障碍，文盲成堆可能多次回潮。同时，旧的习惯势力、各种腐朽没落思想在干部和群众中占有地盘，随时都要出现违法犯罪分子、各种害群之马、伤风败俗的精神堕落者。上述特征必然决定当代中国是个充满艰难的改革的历史时期，只有不断深化改革，才能把社会主义推向前进。不改革或改革得不科学——脱离初级阶段的国

情进行“左”或右的蛮干，都要使社会倒退、人民遭殃，社会主义的建设可能被空洞的口号所淹没。

当代中国的舆论形态受上述特征所支配，无时无刻不体现着上述特征。尤其是，热火潮天的全面改革为舆论的发达提供了条件、对象和动因，换言之，这一时期出现的许多舆论是关于改革的舆论，表现为生气盎然的改革的社会意识。

当代中国，从50年代中期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本世纪末大规模进行四化建设，尤如经历旷世之变，实际上中国正在出现一个大经济时代。我们对舆论的探索，是要对这一历史时期的社会动态意识作出粗浅的论证与说明。在这一历史时期，似乎还有若干发展阶段才能逐步过渡到“现代化的基本实现”，那么我们所探索的舆论形态也是个不断发展、进步、完善的过程。比如舆论的多样化将走向大体的集中化，不稳态将逐步向稳态转化，社会管理尊重舆论的程度不断提高，各种舆论活动方式也越来越科学，越成熟，如此等等。但我们的研究，主要立足于前30年和当前的现实，因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知近而推远，况且，对未来线条描绘得越细致，也就越要发生大的谬误，不如留给后人对下个世纪的舆情进行具体的探索。

在现有社会主义国家中虽然各有各的国情，但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要渡过“初级阶段”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只不过不同国家的这一阶段开始的时间、经历的年限和所起的名称不一样。波兰统一工人党认为当前波兰正处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最后阶段”。民主德国的理论家们把社会主义社会划分为“基础阶段、建设发达社会主义阶段和发达社会主义阶段”。而罗马尼亚共产党则把本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划定为“社会主义革命、巩固社会主义和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三个阶段。显然，凡是尚未建成生产现代化、商品经济高度发展、民主制完备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无疑处于“初级阶段”上。由于生产发展不能满足人民

群众日益增长的需要、民主生活的低水平和国家机关中腐败现象的存在，凡处于初级阶段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面临着极为相似的舆论态势的挑战。正因为如此，我们对当代舆论的研究也在一定意义上超出中国现实社会的范围，随时把目光转向其他尚处于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舆论变化，来支持我们提出的不可辩驳的论点。

由于社会舆论总是和社会运动、权力结构、民主制度紧紧交织在一起，研究我国当代的舆论规律就不能不触及当前的政治命运、人民权利、社会改革这些十分敏感的问题。既然科学无禁区、无偶像、无顶峰，而急骤变革的时代又亟须思想解放和科学探索，那么这本专著不但力求摆脱禁区、偶像的威严和束缚，而且要力求对当代中国的社会舆论运动作出科学的说明，奢望建立一种学说范畴与体系，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全面研究献上一束小花。

无疑，这部拙作，是作者对陌生领域的一次艰辛、浅薄的尝试。

第一章　当代中国社会与舆论形态

从50年代中期起，人们在迷蒙中艰辛地摸索，历经20多年，并没有把握当代中国的时代特质。人们在错误的时间，精神抖擞地以各种政治运动充实生活，用口号、誓言、报告、讨论、新闻报道、大字报、大辩论、表忠心等活动掀起一股股强劲的舆论热潮，不断高喊：向“左”！向“左”！！建设共产主义！！！

幻想，曾一度成为人们坚定不移的追求目标，因为“宏伟的蓝图”已经挂出来了：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将把我国建成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共产主义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1]。这一海市蜃楼般的舆论，顿时成为生活的主旋律，萦绕当时多数中国人的心。人们赞颂、欢庆、雀跃、游行集会、锣鼓齐鸣、呼声震天、祝捷、报喜、庆功、批判、斗争的舆论活动连绵不绝。舆论狂热已经无法收敛，直至爆发了被人们称之为十年浩劫的社会动乱，一场痛苦难耐的剖腹产又使“反修防修”和“穷过渡”两具舆论怪胎呱呱坠地。在那个年代，习惯用精神决定物质，用幻觉代替现实，人们以声势浩大的舆论举动武断地扭曲当代中国的物质世界，把一切都搞乱了套。舆论失去支点，也就失去了控制，象脱缰的野马颠狂地无序奔驰。

---

① 引自《中国共产党历次重要会议集》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7页。

古希腊科学家阿基米德以惊人的格言给人类打开一扇创新思维的窗子："只要给我一个支点，我就可以推动地球。"那么，社会重大舆论的支点是什么呢？是经济基础，经济关系。社会重大舆论始终被经济状况所决定。研究当代中国的舆论形态，只有从初级阶段社会经济活动中探索它的导向、冲击和沉浮，才能把握它的全部规律。

第一节　多种经济关系下的舆论形态

作为粗犷意识形式的舆论，始终受一定经济基础的制约，社会主义经济结构及其生活的丰富多采决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舆论形态的复杂性，多向性，使之不断呈现群议骤起、飚举雾集、回旋发散的运动状态。

古代先哲孔子，把舆论的起因完全归咎于政治制度、政治行为，看不到经济的决定因素。他半世栖惶，仆仆风尘，息影家园，在删书修经中发出"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①的长叹。但历史的法则是，不管政治制度如何，人们总是有感而发，有争而议，因为群众大规模的是非公论，归根结底是由经济原因引起的。

一、经济与精神的多样性和舆论的多样态

舆论在国外被称作"公众意见"（Public Opinion），这是一种特殊的观念，即表达一定多数人共同立场的意见与态度。人们的经济活动支配着舆论的产生和发展，"因为观念形态的演进在基本上是由经济的发展决定的，所以两种发展过程时常是互相适应的：'公共意见'适应经济"②。庞大的社会运动的日常面

① 《论语·季氏篇第十六》。

②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192页。

貌，即人们凭直观所目睹的经久不息、纷至沓来的社会活动不外有两大系统，一是经济活动，二是舆论活动。经济活动的核心是经济关系——在一定生产力水平上人们占有生产资料、产品分配方式与利益关系，这是社会的基础。而社会的情绪、心理、思想都围绕这一“恒星”周而复始地旋转、演变，决定人们的日常议论，议论什么，以及为什么议论，构成了经久不息的社会舆论的活动。

报纸披露名噪一时的改革家步鑫生从厂长的座位上跌落下来，这一消息立即成为社会的热门话题。人们热烈评价他的功过，估价他的命运，争辩他失误的原因。几年来，步鑫生由舆论的热点到冰点，再度升到热点。他领导的海盐衬衫厂，由于种种原因搞得一塌糊涂，负债、亏损，天怒人怨，步鑫生一时也就成为社会舆论的众矢之的。

改革九年，业绩辉煌，人民深得实惠。生财有道的个体户、专业户盖起了洋房，居室内装有高级宾馆才能配备的地毯、空调、吸尘器、席梦思床。他们笑逐颜开，对改革赞不绝口，舆论在这些人中总是以豪爽、喜悦、热情的赞叹为基调的。

每日清晨、黄昏，在农贸市场丰盛的农副产品前，臂挎菜篮的翁妪掏出一张张“大团结”，买到的东西没盖上筐底，连连发出啧啧的嘟囔声。但钱毕竟比过去多了，更何况有许多人每隔两、三个月就心花怒放地跨进储蓄所在储蓄本上至少填上两位数，鱼肉蛋常是他们的篮中之物。这些没有滔滔辩才，专门担当家庭采购员的老人既要提高生活，又不肯多掏钱，在两难之中发出的叹息，也无不受着物质的支配。

……

马克思有句名言：“那些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

的人们，在改革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①在当代中国社会，各种经济关系、经济生活决定着多样化的舆论形态。人们处于何种经济地位，有什么样的生产方式，就产生什么样的舆论举动与舆论内容。如果让我们全部再现多样态舆论的具体形体，即使搜索枯肠，也无法如愿以偿。但我们可以对它的总体轮廓给予简单的描述。当代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的宣传优势和各团体、各部门的舆论活动交相呼应；不同地区和不同社会组织由于各自内部事物的引发，都有自己的独特舆论；人们的社会态度既有闪耀着绚烂色彩、颂歌式的意见，也有知足者常乐的陶陶心声，还有艰难挣扎的社会申诉。各种舆论在不同领域以各自的表现形式与活动方式，形成政治舆论、经济舆论、文化科技舆论、商业消费舆论、民事道德舆论。这些舆论的主体与活动范围又揭示出，它的类别还可划分为公共舆论、阶级舆论、团体舆论、群体舆论。其中，每一种舆论都表现为特殊的共同意志，体现着明显不同或略有差异的舆论目标。

人们在不同环境以不同方式从事生产和其它社会活动，由这些不同因素产生的知觉、印象、情感和意见，也就成为人们各自的舆论内容。客观世界不仅在我们外部，同时也在我们内部。自我感受不断对客观世界进行加工，使人的认识不单是作为同客体对立的主体感觉和思想，而且是作为由主体到客体的感觉和思想，正如费尔巴哈所说，客体不只是感觉的对象也是感觉的基础、条件和前提。这样，不同的经济生活就通过主体感受产生不同的见解，形成不同的舆论。毫无疑问，当代中国多种经济成分生长出来的绝不是千篇一律、同声相应的社会舆论图景。

无庸置疑，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现代化大生产的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1页。

成分逐年提高，但占有主导地位的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并不是唯一的经济基础和经济关系。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要求、也不可能做到经济基础的单一性，既要不断强化公有制，又要允许个体经济的存在。根据我国国情，促进生产力迅猛发展的是各种经济关系的相互竞争与协调，那么，经济生活必然孕育并发生一系列的巨大变革：现代化大生产将和传统的小生产长期并存，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要取代自然经济，集约化的大机器工业和分散手工劳动互补，工业经济和占人口绝大部分的农业经济的比例日益缩小，消除经济相对发达与不发达以至极端落后的地区差别，加快改变令人望而却步的巨大经济总量与少得可怜的人均量的悬殊差距，公有制经济和私有制经济不断以各种隐晦的形式进行较量，按劳分配和非按劳分配的相互挑战……如此等等。在11亿人口的大国，这一错综庞大的经济基础正如凌空而起的旋风不时冲击着当代社会，震撼处于不同经济生活中人们的心灵。人们依据各自的经济地位形成多种不同的心理、观念、意见，最终要以纷繁的舆论强烈地表现出来，而利益差别，不断出现的各种利益集团则成为产生舆论多样态的首要因素。

古往今来，社会舆论都是利益的奴隶，利益的浪花，利益的飓风。正如马克思所说，“这种利益是如此强大有力，以至顺利地征服了马拉的笔，恐怖党的断头台，拿破伦的剑，以及教会的十字架和波旁王朝的纯血统……。如果说革命是不成功的，那么，并不因为革命‘唤起了群众的热情’……而是因为对不同于资产阶级的绝大多数群众来说，革命的原则并不代表他们的实际利益，……而仅仅是一种‘观念’，因而也仅仅是暂时热情和表面的热潮之类的东西”①。马克思这些话，深刻揭示出利益形成舆论的普遍原则。各种不同经济关系产生的各种不同利益要求，唤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3页—104页。

起各种热情，造成各种不同舆论。人为地改变这种舆论趋势，不顾群众实际利益，编织花好月圆的辞句，大造“革命舆论”，尽管“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一片欢腾”，不过是“暂时的热情和热潮”。“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①。在当代中国50、60、70年代，有关许多重大决策的舆论宣传总是一浪高过一浪，由于背离人民利益的正当要求，这些舆论不得不多次使自己丢丑。

初级阶段舆论的多样态有时看来不只取决于多种经济关系，还要受精神因素的制约，但精神与物质从来就是相互纠缠、相互作用，共同推动社会的生息演变。恩格斯说：“相互作用是事物真正终极的原因。”“只有从这个普遍的相互作用出发，我们才能了解现实的因果关系。”②历史遗留下来的某些意识总是死死地禁锢一些人的头脑，这些旧意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复活或采取新形式酿成一定的舆论。一位厂长大胆推行改革，使濒临破产的工厂复活，却遭来嫉恨的非议，这是中国历史上“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的病态意识的死灰复燃；一位局长因受贿罪锒铛入狱，许多人为他鸣冤，纷纷到监狱给他送去慰问品，这是中国儒教“感德施报”的特产；农村许多地方新房幢幢，电视天线林立，而迷信舆论却很盛行，求仙拜佛的人络绎不绝，迎神接鬼的花样不断翻新。当代中国社会的精神领域，充斥着旧时代的意识和衰落的古代文明。被陈腐的思想纠缠头脑，许多人恪守旧制的观念，使现代化物质文明的根深叶茂结出了灰色的花朵，苦涩的野果。对落后、偏私、非法贪占钱财、官贵民贱、男尊女卑的赞赏与追求，使与现代化相悖逆的舆论大量存在，构成多样态舆论和弦中的杂音。

恩格斯指出：“无论历史的结局如何，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追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103页—10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52页。

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问题也在于，这许多单个的人所预期的是什么。愿望是由激情和思虑决定的，而直接决定激情或思虑的杠杆是各式各样的。有的可能是外界的事物，有的可能是精神方面的动机，如功名心，'对真理和正义的热忱'、个人的憎恶，或者甚至是各种纯粹个人的怪想。"①所以，由精神动机引起的社会重要舆论也是多种多样的，而归根结底都根植于经济关系。在当代中国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思想和各种非社会主义思想同时并存，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封建主义余烬都有市场；脱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左"或"右"的思潮不时顽强地表现自己；形形色色的新思潮和旧的理念随时集结愿望相同或相似的人形成共同意见。这些意识相互交织，构成扑朔迷离的精神世界，其中，社会主义的先进思想，富于变革的创新意识，无疑在社会的长河中以壮阔的主流奔腾向前，而夹杂其间的传统个人占有欲、因循守旧、害怕变革、居安思危、无政府主义思潮以及小农的"均平富"观念则成为一种逆流或旋涡。这些舆论的出现，既有自己的经济基础，又有本身的意识源头，但它们终究是"在不同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下，耸立着有各种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而"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情感和观点的个人，会以为这些情感和观点就是他的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②。可见舆论的多样态，直接表现为具有不同思想感情的人的行为、动机与追求，而实际是现时代多种经济因素汇合成的繁茂芜杂的社会意识的有机体。

科学的任务在于对丰富的现实生活作出深刻的理论说明，把复杂的事物抽出鲜明的线条让人们洞察本质与真相，我们研究的目的也在于从真实描述当代中国舆论多样态的特征入手，让人们

① 《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选集（哲学部分）》第92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29页。

正确认识、把握社会主义社会动态意识的变化趋势。

二、社会变革和舆论的不稳态

多样态舆论的纵深特征是，不稳定，激荡，时起时伏，有时以激化的形式出现，甚至会发生示威游行这类极端舆论举动。多年来，人们一直误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十分平静、安定的社会，人们生活得十分和谐，相安无事。似乎一切都统一在一个思想的旗帜下，团结一致，步调一致，舆论一律，甚至达到了“无差别境界”。实际上，由于生产力落后，上层建筑滞惰于经济发展，而又很难迅速、科学地进行相应的变革，社会舆论经常表现出不稳态。

早在30多年前，毛泽东同志把这种舆论现象称作“民主人士和大学教授放得怪论”、“干部的右倾言论”、“农民的小农经济思想”、“少数人闹事”。他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各国很不稳定，乱，人心不安。世界各国都不安，中国也在内”。[①]毛泽东同志发表议论的当时，成都的100多名学生要到北京请愿；河南省某地修整机场，事先没有向农民讲清道理，农民愤慨地布下了三道防线，把勘测人员赶走；石家庄一个学校部分毕业生对暂时不能就业不满，在少数人煽动下组织了示威游行，他们高呼“打倒法西斯！”“要战争不要和平！”“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社会舆论的不稳态，在50年代中期就显露出咄咄逼人的势头。

社会主义革命在一系列国家的胜利，引起巨大的经济与政治变革，生产力与人民生活的提高也创造过奇迹，但所有制单一，权力高度集中，政企不分，条块分割，产业结构失调、大搞平均主义，……使经济发展时而停顿，时而缓慢。食品不足，生活拮据，社会腐败因素增长。社会主义在其制度确立初期，虽然摆脱了旧制度的腐朽，但却陷入了设计者的僵化，使社会主义的美妙

① 见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一文，1957年。

理想逐渐在一些人心中失去光辉，舆论开始动荡。

历史提出挑战，不改革就没有出路。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尝试打破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模式，汇成世界社会主义改革的时代洪流。改革虽然充满生机，但多种经济成分的扩大，价格的调整，市场机制的建立，横向联系的打通，致富的先后，西方有害思想的大量涌进，又使社会处于新的颠簸中。社会辩证法是无情的，推进改革就要付出代价，带来某些负效应，出现新的人心不稳。舆论的不稳态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存在。

所谓舆论的不稳态，并不是指社会主义制度受到普遍的非议。社会主义制度应当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优越的制度，人们曾以鲜花、红旗迎接她的诞生，但由于经济体制的僵化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长期不能给人们提供更多的物质产品和更高的民主条件，人们就要以各种方式表示不满情绪。没有遭受过旧制度苦难的年轻人，更无法容忍新制度暴露出来的弊病，便寻找一切机会发泄不平和怨气。从1953年捷克和民主德国发生的第一次工人示威、罢工热潮，到波兹南事件、匈牙利事件、南斯拉夫国内的多次游行，直至80年代的波兰团结工会事件和我国、苏联、罗马尼亚少数学生、工人上街或静坐事件，社会主义国家频频出现的不稳态阶论震撼了世界，社会主义制度一次次经受着各种思潮的冲击和考验。

诚然，不稳态舆论不只是游行示威一种形式。它主要表现为群众对社会问题经常产生强烈的非难；同一个事物往往引起莫名其妙的对立意见，把好事说成坏事，或把坏事说成好事；各种不可能在短期内解决的社会矛盾使许多人“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到处议论风生，时时谑诼不绝。“人海阔，无日不风波”，正是这种舆论的生动写照。

一度被人们称之为“关广梅现象”的争论，就是不稳态舆论的一个侧面。《经济日报》报道了37岁女售货员关广梅租赁了八

家副食商店，原来亏损的扭亏为盈，原来盈利的上交国家的利润明显增加，她个人在几年中法定收入达4.4万多元。关广梅一时成为新闻人物，引起社会的争议。有人对关广梅高出工人多倍的工资愤愤不平，诅咒这是百分之百的资本主义。有人则赞扬她的租赁群体提高了经营效益，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有人则盯住关广梅的高收入，嫉妒心理发作，连叫“不合理！不合理！”“关广梅现象”在不同人身上折射出各种颜色的光环。而关广梅对企业沤心沥血，她的高收入大部分留作风险基金，却被许多人忽视了。鲁迅在《〔绛洞花主〕小引》一文谈到《红楼梦》时说过：“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到《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人们从“关广梅现象”看到的是什么呢？改革者看到的是女强人的无畏创举，保守者看到的是对社会主义的“背离”，均贫富者看到的是两极分化，……。改革活动除旧布新，惊天动地，打破按常规走路的祖传遗训，一再激起人们是非曲直、荣辱升沉的评价。

九年改革引起的经济腾飞把我国引向重大转折。温饱型和小康型交错进军，贫穷与富裕相形见绌，无私奉献和“向钱看”相互对垒，迪斯科、牛仔裤热和“英语角”相映成趣，各种社会群体大有“道不同，不相为谋”的心态。这样，任何重大社会事件和变动都会招至几种观点的对峙，为了求得相互妥协，人们不得不在80年代喊出“理解万岁”的口号。

刚刚摆脱十年文革厄运的人民，面临改革形成的多种不平衡状态，每个人根据切身利害的沉浮，已经形成或正在形成各自的价值观。兴奋议论，热情赞誉和困惑、埋怨情绪的对撞；积极支持改革、期待迈出更大步子的热望，和忧心忡忡、批评改革步子太快的抱怨激烈地争辩；各种观点相互抵牾，不断辩难。初级阶段政

治、经济生活的每一种变动都从不同方面袭扰着每个人的心，人们根据自己的需要判断一切，评说一切。

无疑，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是舆论稳定的重要因素，因为只有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才能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的利益需要。然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早期和中期的生产力是低水平的，它的提高又不断经历着坎坷，这样，人们对产品的需要就长期处于供求紧张状态。舆论的不稳定，正是社会产品不足在观念领域中的反映。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深刻揭示了这一社会历史规律，他们写道：生产力的发展之所以是绝对必须的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只会形成贫穷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就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须品的斗争，也就是说，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① 多年来，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所发生的罢工、罢课、游行示威事件直接来自经济原因，工人和大学生喊出的口号是：要有足够的牛奶、面包、肉食！生活必需品得不到满足，人们不得不为生存疲于奔命，许多腐败因素加倍地增长，不满、怠工伴随着私欲旺盛，使意见冲突变得激烈起来。

贫困不是社会主义，贫困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②。在一个贫困的国家里，不可能有安定的社会情绪。曾经风行的“四大”的舆论热潮和“口诛笔伐”的文革动乱，都来自贫穷这一根源。因为贫穷，激发了一部分人的狂热，想以“左”的冒进消灭它，提出“大跃进”“公社化”的口号，由此引起“共产风”的泛滥使生产力遭到破坏，给人民生活和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严重的困难。彭德怀同志挺身净谏，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和邓小平等同志主持制定了以调整为中心的“八字方针”，提出发还自留地、对农民实行退赔、开放自由市场、压缩高指标的主张，仅仅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9页。

② 参见《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23页。

实行四年，国家就有了转机。而这一切竟然被指责为大搞资本主义，使彭德怀问题和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风马牛不相及地扯在一起，刘少奇、邓小平被扣上推行“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修正主义帽子，在人为炮制的“文革”中被打倒。文革是一场逆向舆论的风暴，口诛笔伐伴随着层出不穷的暴力事件，把不稳态的舆论推向高峰。这一事件虽然被一伙野心家所利用，但从根本上看，这是一场由铲除中国贫穷问题引起的悲剧。

不仅社会处于贫穷状态，不会有稳定的舆论，而且在社会没有走上共同富裕道路之前，舆论的不稳态也不会消声匿迹。富足的悬殊，要产生各种社会意见的磨擦，甚至要酿成巨大的舆论冲突。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的相对贫困与资本家豪华富有的鲜明对照，使工人群众不断申诉不平，控诉不幸，声讨资本占有者的剥削。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现代管理及新技术革命潮流虽然使许多群众享有充裕的物质生活，但只要财富获得的方式不平等，财富多寡存在天壤之别，就要接连不断激起人民的抗议和示威。“吃穿好一些，待遇高一些，特有财产多一些，不会消除奴隶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同样，也不会消除雇佣工人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①。这样，工人群众反对资产阶级统治的声浪就会时起时伏，连续不断。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社会，但穷富的差别在两种社会制度中都可能成为舆论不稳的潜在根源。资本主义制度由于本身的痼疾，始终无法克服舆论的不稳性，而社会主义制度一般则能由党的正确方针不断把不稳定的舆论疏导为稳定的舆论，其中，防止穷富两极分化则是消除舆论动荡的重要因素。邓小平同志多次告诫，我们的改革决不能搞两极分化，“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什么新的资产阶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78页。

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① 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符合革命的辩证法，事物的发展不可能齐头并进，绝对平衡，共同富裕必然是以一部分人先富为起点的。但先富与后富同时又引起人们思想观念的不平衡和社会心态的失调，扩大了舆论不稳态的深度。在当代的改革中，一部分人年收入已达到几千美元，不容否认，数量不多的“超人”在几年内就成了百万富翁。而大部分人仅仅过上温饱生活，年收入略有赢余，还有一小部分人（北京市1987年统计占20%）生活水平下降。改革一方面打破了大锅饭，使劳动报酬拉开挡次，另一方面，人们的能力投入和劳动所得在一些领域出现倒挂。机会不均等，报酬不合理，施展才干与智慧的竞争在很多部门成为掩饰拉关系、走后门的堂而皇之的过场，这些社会不公平引起人们强烈的异议，相当一部分尚未摆脱贫困的农民、工人、干部和知识分子，随时发泄满腹怨气。由于外资的引进，特区的出现，大量个体商贩、乡镇企业以及按资金分配方式的普遍化，使原有的利益格局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不同的发展地区，不同的利益集团，形成不同水平的家庭生活，同时也就刺激了人们的不同心理需要。社会利益的这种不均衡，必然促使不同经济地位的人发生尖锐的心理冲撞，相互对立的意见在许多社会问题上相伴而生，很难统一。

社会变动具有神奇的功力，没有变化也就没有社会进步，当然不是一切变化都能把社会推向前进，而社会变化在各个领域、地区、部门又不可能是均衡的。从建国后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是个全面政治时代，政治压倒一切，占据一切，政治口号成为人们舆论活动的主要内容。每个取得政权的阶级在最初阶段不得不偏好政治，因为他们靠政治斗争取得权力，就要在相当长时期内把政治看得高于一切。1978年以后，中国共产党的精英人物在20年

①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人民出社版1987年版，第99页。

磨难中醒悟：靠吃政治饭不能充饥。于是喊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口号，唤出一个大经济时代。从全面政治时代转向大经济时代在当代中国引起深刻的变革，无疑，这是个进步。但在社会主义进入深化改革时期，各种变化的不同速度和结果将加剧舆论不稳态的演变。美国社会学家威廉·奥格本把不同社会变化速度称作"文化滞差"，当出现各种以悬殊速率向前发展的生活状态，社会变动的不平衡就要打破人们心里的宁静，产生社会动荡。穷变富，但变化的速度迥然不同，有的一年就成为万元户，而有的要经过十年的艰苦劳动才能积攒万元，这两类人对同一事物的态度就大相径庭。南方许多城市商业网点林立，新兴厂矿、乡镇企业、城市建设、外资企业欣欣向荣，远远超过北方的多数城市。于是北方人对南方人的改革发出许多不可思议的弘论，而南方人则轻蔑地评论北方人不懂生财之道。错觉、困惑、误解、不满的情绪在社会各个层次中暗暗滋长。正如阿尔温·托夫勒所说，"事实上，我们可以说生活的节奏在人与人之间划出了一道道界限，把人分成各种不同的集团。在父母子女之间，在大城市和小城市之间，在男人和女人之间，在美国和欧洲人之间，在东方和西方人之间造成了痛苦的分歧与误解。这样说决不是危言耸听。"①

深化改革，却没有在各领域同时深化。如果说经济改革有长足进展，而政治改革却没有重大举动，文化教育改革仅仅停留在观念更新、"小打小闹"阶段，这种判若云泥的变化速度使人们的心理难以承受，人们直观各种差域加剧了意见的对垒。社会的各种不同变化和变化不同的各种领域，在当代中国一齐向人们袭来，使人们眼花缭乱，思绪纷扰。如果社会整体节奏突然加快，各种速度不同的变化一齐闪现，并长时间得不到有效的调整，就会彻底拉断稳定社会的缆绳，使社会生活陷入更大的失调状态。阿尔温·托夫勒发现，人们在极短的时间里承受着更多的变化，

① 《未来的震荡》，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6页。

感到压力重重，晕头转向、不知所措，这就很难保证社会的安定。

初级阶段消灭了剥削阶级，但在局部环境还有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人在活动，他们利用社会舆论的不稳态，暗中传播反对人民的言论，把不稳态的舆论推向极端，甚至策划动乱和暴乱，企图推翻共产党的领导。这往往是由于帝国主义利用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出现的波折，大肆进行和平演变，挑唆持不同政见者煽起舆论狂热，而加剧了舆论的不稳态。

我国在目前还不能彻底消除官僚主义，某些单位的官僚义者誓做公仆而又不关心群众疾苦，缺乏管理才干而又刚愎自用，外貌谦和但内心却听不进半点不同意见。……这些官僚主义作风有时激怒励精图志、投身改革洪流的群众，使他们不断发出揭露的呐喊，直至结队请愿，使舆论不稳态达到沸点。

“利莫大于治，害莫大于乱”①。历尽苦难与动荡的中国人民都渴望中国经济能够迅速起飞，但谁有本事在地震中起飞？初级阶段的“起飞”，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中搏击前进，每走一步，都要冲破不稳态舆论的喧扰，解脱舆论负作用的桎梏。社会管理者只有随时把握社会舆论的发展趋势，把舆论的不稳态引入正确的方向，组织正确的舆论钳制社会病菌的蔓延，方能使现代化建设沿着健康轨道发展。

三、上下层舆论的融合和误差

当代中国社会的舆论，尽管纷繁庞杂，起伏震荡，构成纵横交错的意见流向，但起支配作用的归根结底是两大类别，一是来自广大群众的下层舆论，二是来自各级领导阶层的上层舆论。两种上下对流的舆论互相反射，互相补充，形成人们认识整个社会的主导舆论。

---

① 《管子·正世》。

在封建专制统治的社会中，皇权主宰一切，开明君王虽然有时力主“大权统于朝庭，庶政公诸舆论”，但后者是装点门面。专制与舆论历来水火不相容，只要权归一人，就不会有庶政和舆论可谈。所以，在封建专制政体下必然是万马齐喑，群言窒息，下层舆论不可能发达。所谓“勤恤民隐而除其害”①，“广求民瘼，观纳风谣”②，恰好说明当时的民间舆论处于隐晦曲折状态。

资本主义制度冲破了封建贵族压抑民意的一统天下，实现了议会民主，允许公民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群众的意见有可能得到国家的重视，开始出现并形成真正的社会下层舆论。但是，要郑重地发表引起社会高度重视的言论往往需要资本作后盾，舆论不过是资本的语言形式，因此，以“谈话或辩论”为名称的议会和下层舆论并没有太多的关系，因为议会通常表达的是上层官员和大财团的舆论，对重大社会问题，“议会专门为了愚弄‘老百姓’而从事空谈”③。

社会主义制度的诞生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人民大众已经成为国家的主人。“为了取得胜利，为了保持政权，不仅需要工人阶级的多数，而且需要农村居民中被剥削劳动群众的多数”④，那么，作为人民群众意见的下层舆论，便成为建设新生活的重要财富。“群言千金，妙论兴邦”。人民群众发表意见，不是依据所有财产的多寡，而是以国家主人翁的态度和责任，采取“自我赋于、自我决定”的取向。如果人民群众能够畅所欲言，随时发表各种有益的意见，下层舆论就要形成波澜壮阔的社会观念活动。

---

① 《国语·周上》。

② 《后汉书·循吏传序》。

③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0页。

④ 《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64页。

下层舆论并不是乱七八糟的意见，个人或几个人的意见还不能称作舆论。只有当一定数量的群体对国家事务和公共生活形成统一意志并转化为系统见解时，才能对这种意识赋于下层舆论的概念。某个人确切表达了这种共同意识，他就表达了群众的舆论，而个人意见和广泛的群众意见趋于统一时，个人也就成为下层舆论的代表。我们阐明这一观点不是无谓之举，因为人们把握下层舆论，并不像坐在剧院观看大合唱那样能够听到、看到"万众一辞、异口同声"的壮观景象。感受下层舆论通常是从一个或几个人那里听到的议论，这就很容易造成一种错觉：把个别人的意见误认为下层舆论，或把下层舆论错当个人意见。这两种倾向都有碍于对下层舆论广度和深度的认识，甚而借口"个人意见"或"少数人意见"而无视广大群众的呼声。

下层舆论具有不同的范围与主体。某一社会问题在一定范围内引起多数群众的反响，就构成下层舆论。这种反响如果是关于某个城市的社会问题，那么在这个城市的若干地方就能听到同一种意见；同样，当这种反响涉及到全国性问题时，在全国若干地方也都听到同一种声音。毫无疑问，表达下层舆论的人数和规模是大不相同的。所以，下层舆论只能是一定社会共同体的整体意见，卢梭把它称作"众意"，即"包括人们相同与不同意志"的意见①，即若干意志的总和。

这样看来，下层舆论对社会问题的态度可能有好多种。当代中国存在各种利益集团，存在各个地区、企业、团体的差别，一事当前，就要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每一种意见都有相当数量的舆论主体，使一种意见得到一定多数群众的支持。但每一种意见只能在一定时空幕布上占有特定的位置，形成若干相对、相近和相同的下层舆论。

---

① 《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36页。

同样，下层舆论并不都占有真理，正如黑格尔所说，“在公共舆论中真理和无穷错误直接混杂在一起”①。人们对公共事务的认识都遵循着由现象到本质，由片面到全面的知行轨迹。舆论主体的数量决定舆论的正确程度。在正常情况下，舆论主体人数越多，表明它的功利倾向适于更多人的需要，它就更接近真理。反之，持有某种意见的人数少，它的正确程度也就要降低，但这并不排斥真理可能在少数人手里。少数人是否首先发现真理和舆论的正确程度是两个范畴中的问题。少数人甚至个人的意见一旦握有真理，迟早要被多数人所接受，成为社会的普遍舆论，但有许多错误的意见也可能被一定的多数人所接受，转化为荒诞不经的流言蜚语。有时这可能是被迫“一致同意”，这种虚妄的舆论持续的时间总是暂短的，或占有的人数是“少量”的。希腊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尼科斯·波朗查斯确证了这一点，他说：“在确立‘公共舆论’和‘一致同意’这类政治范畴时，这是很清楚的：它们是和被统治阶级接受这些意识形态的特殊方式有关的。”②在社会主义国家消灭了剥削阶级以后，不存在整个被统治阶级，被迫接受的“一致同意”已经不是真正的舆论，只能是舆论的异化。十年文革中亿万人民的大批判行为不是来自下层舆论，而是被迫或被骗接受了一种意见，形成了舆论的异化。这种舆论异化，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只有在特殊历史条件下才能出现。

社会主义政权的性质决定，社会主义建设活动需要广大群众积极参与国家管理，随着社会进步速度的加快和人民文化素质的提高，下层舆论也就越加发达，它构成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主要舆论。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前夕，列宁预言：“只有从社会主义实现时起，社会生活和私人生活的各个方面才会开始真正地迅

① 《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33页。

② 《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38页。

速向前推进，形成一个大多数居民甚至全体居民参加的真正群众性运动。”[①] 这一运动的特征是，不仅人人动手从事新生活的建设，而且人人动口积极肯定、支持这种建设。列宁把广大群众的意见看作是苏维埃政权下的主要舆论。

与下层舆论并存的是社会上层舆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上层舆论绝不是指以往剥削社会制度中上层社会、上流人士的意见，它具有特殊的内涵。社会主义制度不存在社会地位的等级，人人都是社会公仆，不同的仅仅是每个人的职务及其责任的高低大小。各级党政部门、直接掌握各种权力的领导者构成了一定意义的上层人员，在政治上他们和群众是平等的，但在管理工作中却处于统领、指挥地位，形成一个高于下层群众的管理者的群体。上层管理者在制定政策、发布指令、指导基层工作时必然形成更加集中的和强有力的意见，这就是被我们所称作的上层舆论。

上层舆论不像下层舆论以一般议论的形式出现，它也不像下层舆论那样分散、杂沓、多变。它反映着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整个上层建筑的政治思想观念，表现为整个社会经济观、政治观与思想体系。这样，上层舆论无疑能把国家整个机构、体制、路线、方针、政策和干部队伍的整体精神面貌通过国家各种宣传活动再现出来。一个稍有级别的行政干部发表的谈话，向群众许下的诺言，对经济政治形势的分析，在群众看来是代表上层舆论的；被国家所控制的新闻媒介发表的各项公告、时评、某些新闻，刊载的国家决策和领导人的报告、讲话更是上层舆论的集中体现；甚至一位厂长、乡长、村长在讲话中带有“上头精神”的味道，也通常被基层群众理解为上层舆论。

上层舆论往往是有权威的意见，因为人民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对这一政权主持者的观点通常不加怀疑地“照办”。几乎每

① 《列宁全集》第25卷，第459页。

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创建初期，国内局势都十分稳定，上层舆论很容易被广大群众接受，舆论的不稳态表现得并不明显。

从总体看，社会主义国家的上层舆论和下层舆论中的正确见解基本是融合的，因为社会消灭了阶级压迫，国家上层人员和广大群众具有共同的生活目标，上层舆论应当是下层舆论的集中反映，是由广大干部、新闻记者和各类宣传工作者通过系统的组织工作而产生的。他们深入实际生活，密切注视群众的思想情绪，认真研究绝大多数人民的要求，集中多数人的智慧，形成完整、系统、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意见，这一过程叫作组织舆论。组织舆论是社会上层机构正确反映下层动向、形成社会主导舆论的中心环节。毫无疑问，下层舆论是上层舆论形成的基础，而上层舆论一旦确立，经过广泛的宣传就能逐渐转化为更广泛的下层舆论。组织舆论的关键，在于准确鉴别下层舆论中的真理成分，剔除群众意见中非理性的内容。谁能在下层舆论中寻找到真理，谁就是黑格尔所说的“伟大人物”，他道出时代的意志，把它告诉他那个时代并使之实现①。社会上层管理部门，通过党的宣传机构、大众媒介和领袖人物搜集各种动态、反应，旨在形成动员全社会公众为实现一定目标而统一行动的言论。这种言论有时表现为发表宣言、公告、声明，有时表现为散发文件、指令，更多地通过新闻工具发表各种社论、时评，指导人们形成广泛的一致意见。这些舆论活动一方面反映了全社会的统一意志，另一方面能启发、引导广大群众克服错误的下层意见。

但是，社会现实的错综复杂，上层公职人员个人的偏激、轻浮、自大狂和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教条化以及制定决策的“左”或“右”的倾向，往往使上层舆论违背群众的普遍意志，造成上下层舆论的误差。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布尔什维克党内就有一批幻想家要在三年内把小农经济基础改造过来，他们到处发表谈

① 参见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334页。

话，撰写文章，发出一连串的空话，使苏维埃群众受到这种上层舆论的迷惑，人心慌慌，局势发生动荡。列宁严厉批评道："如果某个共产党人，空想在三年内可以把小农业的经济基础和经济根源改造过来，那他当然是个幻想家。老实说，这样的幻想家在我们中间是不少的。……在我们这样的国家里开始社会主义革命，怎么没有幻想家呢？"①

类似的情况，在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时常发生。50年代，合作化的冒进在全国农村产生普遍的忧虑情绪，农民和中下层干部对"土地入股，土地归公"疑虑重重，议论纷纷，一年内消灭小农经济的超级幻想在广大农村引起风波。上层舆论却恰好相反，把反冒进的人斥责为"小脚女人"、"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大跃进"的风潮席卷而来，掀起一股充满梦幻的上层舆论，号召用土高炉炼出优质钢，鼓吹一亩小麦可产数万斤，群众却以"大话连篇"的讥讽嘲弄狂热的上层舆论。上下层舆论的误差在"反右倾"和十年内乱中日益扩大，广大群众畅所欲言受到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压制和打击，下层舆论便以隐晦的形式对抗上层舆论。1977年以前流行于温州的两种舆论，典型地揭示出上下层舆论的冲突，使人们看到下层舆论的生机、上层舆论的荒诞、人民的灾难和假马克思主义的可悲。

一度被称为"资本主义大本营"的温州，真正的社会主义却以可怖的"幽灵"方式在那里徘徊。搞农业的种瓜菜是资本主义，搞多种经营的只准养两头猪，多养就姓"资"，纺车是复辟的工具，家庭手工业被看作资本主义尾巴，搞副业的农民是新生资产阶级分子。——上层舆论天天这样叫喊。广大群众对基层干部打趣地说：社会主义原则变成了哈哈镜，照人人走样，照物物变形。有位村干部竭力排除"资本主义干扰"；带领群众20年没有偏离过"社会主义轨道"，而他的妻子却拉着孩子要了20年

① 《列宁全集》第32卷，第205页。

饭，乡亲们以诙谐的舆论奚落这位坚定的“革命者”是穷社会主义的铁杆子。

温州是个缩影。广大人民群众在破除“两个凡是”的口号下猛醒，许多骗人的上层舆论被揭穿，被压抑的真理重新在群众心中萌动，下层舆论的愚昧成分也越来越少，人们再不相信那些用马克思主义词句装饰起来的大话、空话和骗人的鬼话。愚昧有一种特征，它“一经消除，就再也恢复不了。……人的头脑发现真理，就像通过眼睛发现物体；一旦看到了任何物体，就不可能使头脑恢复它看到物体之前的那样状态”①。正因为如此，“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一句顶一万句”、“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上层舆论再也无法蒙蔽、支配人们的言行了。

在改革深化的历史条件下，上下层舆论的旧误差已经基本消除，但误差始终不会完全消失。随着旧误差的消除，新误差又会出现，这种不断出现的误差能够给上层机构提供重要的参考价值，使上层领导人物从反向舆论中检查自己的决策是否正确；群众从误差中可以深刻认识群体意识的局限性，接受更大价值的社会意见。不管社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上下层舆论始终要出现误差，同时又必然趋向融合，这是当代中国社会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

四、群言堂的一致方向

1987年末，中国社会吹响解放思想的号角，这是由邓小平同志的一次重要讲话②带来的浓郁的时代气息，全国到处洋溢着群

---

① 《潘恩选集》，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90页。

② 指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所作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

言堂的气氛。因为群言堂有普遍政治意义，民主的政治体制要求有群言堂的社会气候。群言堂的景象，给人们洞察80年代的舆论态势，揭开了一道缝隙。

毫不奇怪，由于初级阶段经济基础的多种成分和政治民主化程度的不断提高，该阶段的舆论形态必然是"群言堂"。前面所概括的舆论多样态、不稳态和上下层舆论的融合与误差都是"群言堂"的具体表现。但"群言堂"始终受占主导地位的公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的制约，具有大体一致的方向，构成当代中国舆论的"群言合璧，一个方向"的整体形貌。

毛泽东同志历来提倡群言堂，而反对一言堂，主张敞开思想，畅所欲言，开创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这是社会舆论兴旺的动力。舆论的群言堂，代表群众多种意志、多种认识在改造社会活动中的各种动力。这些声音绝不是社会主体"无感而发"、"无病呻吟"的纯粹生理机制，而是经济多样化、生活多样化，交互影响的结果。80年代打破"个人迷信"、"两个凡是"的舆论控制模式，人们赢得有史以来思想解放的最好历史时机，群言堂犹如一泻千里的意识巨流，无情扫荡着封建专制思想的残枝败叶、陈规陋习，群众开始按照自己的意志发表见解，多样化的舆论局面正在形成。

人大委员辩论"破产法"的电视报道；老大娘质问市长：市场上的菜为什么少了，而且价格很高；广州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对市级干部的评议活动；北京电视台报道市长侯选人向全市人民述职汇报所引起的广泛议论，等等，再现了全国多种舆论空前活跃的气氛。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群言堂的舆论趋势，是与社会经济基础和政治发展相适应的。我们考察任何意识现象，不应当、也不可能脱离经济与政治因素，意识只能是被人们意识到的物质活动的意识，多种舆论也只能是多种经济利益的团体意识。社会经济

的多样化，物质生活的日益丰富多采，人们对自由的强烈追求，国家大力推行开放政策，对封闭型、大一统政治思想观念的冲击，必然启迪人们对大千世界进行独立思考，引发群众不断对生活提出新的要求，发表各种见解，这就要构成多种意见的社会意识网络。在复杂的社会意识共振中，如果只有一种声音，只允许按一种腔调讲话，只能使采纳正确意见的机遇大大减少，而受错误意见左右的概率就要增大。

子产提倡乡校议政，以求行善弃恶之师，成为千古美谈；汉末清议纷纭，激浊扬清，犹可决而未溃；隋亡唐兴，召贤进谏，群言勃兴，出现贞观盛世；戊戌变法，放言高论，西学渐进，新民论盛极一时；孙中山排满革命，书生风议，各抒己见，燃成辛亥风云；"五四"狂飚，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思想界空前活跃，社会主义思潮开创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纪元。在思想解放、言论开禁的社会里，才能开创新的格局，开拓人类社会的未知领域，奠基新的事业。当代中国的多种舆论是打破思想僵化，实现社会整体观念更新的重要推动力，因为只有让人们充分表达各种意见，才能出现创新性的思维；只有全国绝大多数人勇于发表真知卓见，才能追踪并形成一股巨大的变革思潮。在社会主义改革中，"让各方面的意见、要求、批评和建议充分反映出来，以利于政府集中正确的意见，及时发现和纠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把我们的各项事业推向前进"①。没有多种意见，人们都禁锢在同一个思想框子中，改革就不能欣欣向荣，万马奔腾。只允许一种声音，其他意见被视为异端，人人自危，噤若寒蝉，就要扼杀人们的创造力。马克思曾经讽刺思想专制者："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

---

① 《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73页。

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① 他斥责只允许有“官方色彩”的精神太阳，是一种愚蠢、狂妄与虚伪。

社会主义社会的舆论，不能只有一种唯我独尊的意见，只要求发表闪耀“官方色彩”的言论。对精神的禁锢不仅徒劳无益，而且和社会主义性质背道而驰。社会主义要大力发展生产，必须提倡舆论多样化，只有人民精神的大解放，才能带来生产力的大解放。精神的闪电一旦使中国人民成为真正的人，而不是僵化思想的奴婢，他们的创造力就能无穷无尽地发挥出来。任何庞大物质山脉的隆起，都是解放思想释放出巨大能量的硕果。

多种意见是社会主义舆论形貌的一个侧面，当然是重要侧面。但仅仅有舆论多样化还不能全面概括当代中国舆论的基本形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管有多少种舆论，一般应当有一致的方向。没有统一的方向，亿万人民缺少精神凝聚力，多种舆论就要成为互相分离的杂乱无章的社会意志，最终将导致社会运动的紊乱，十亿人民的强大创造力就可能变成无数微弱、分散的多向力。

社会主义上层舆论和下层舆论只有在根本问题上方向一致，形成上下舆论融合的意识力量，民族振兴、国家富强才有希望。

人类自古就认识到，没有一致方向的意见对人类共同生活的严重威胁，各民族都创造美丽的神话或传说告诉人们形成共同意志的重要性。希伯来史籍中记载的古老的“巴别塔”之说，使人们深受启示。这种称为“奇古拉特”的梯形建筑是巴比伦人在两河流域要建造的直通太空神殿的宏伟工程。巴比伦人说着人类最早的语言希伯来语，整个民族意志统一、协手并进、富于进取。他们靠高度一致的行动，征服了各种艰险，占有了人类的一切。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7页。

巴比伦国王决定建造“巴别塔”直插苍穹，主宰天堂。20万人马在他的一声令下投入艰苦的劳动，在42年间把塔建到27哩高，仰首望去，已扶摇云霄。上帝深感不安，决定采取紧急措施制服这位狂妄自大的国王，便派遣70名天使下凡劫走人们共同使用的希伯来语，然后把他们划成若干个小群，每一群人只能讲他们自己才能懂的语言。巴比伦人互相听不懂对方的话，统一的意志被瓦解，工地乱成一团，工程已无法建造。于是建塔的人各操自己的语言奔向他乡。这一故事是说世界语言的“混杂起因于巴别塔的建造，最多是科学思想的幼稚先驱”①，但它在舆论学上却奠定了一个重要原理：社会中各种舆论针锋相对，分崩离析，没有共同语言，整个社会生活就会陷于混乱。

初级阶段的“群言堂”如果没有一致方向，就要遭受巴比伦的厄运，四个现代化也要像“巴别塔”的建造一样，陷入半途而废。“群言合璧，一个方向”的舆论总体形貌，是初级阶段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主观意志不能改变这种客观性。

但这种一致方向，决不是机械遵从哪个领导人物随心所欲的“英明指示”，也不是盲目追随哪位社会贤达慷慨激昂的社会呼吁。所谓一个方向，是指全体人民遵循“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凡有利于这一方向、符合这一方向的舆论就应当受到鼓励，允许它们充分表现自己，扩大、传播自己的影响。这样，初级阶段舆论发展的总趋势，应当是多样态向同一方向回归，不稳态向有利于四化建设转化，多种声音为两个文明建设提供各种美妙的旋律。国家现代化水平越高，这种舆论趋势也就越鲜明，越在社会动态意识中强烈地表现出来。

当代中国各种舆论的一致方向，是处于社会统治地位思想的

① 《维纳著作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73页。

自然表现。任何社会都有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把各种思想的涡流吸引过来，占据社会意识的主导地位。由于“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①，那么，社会主义消灭了剥削阶级以后，整个社会的统治思想就是人民的思想。共产党及其人民政府表达的声音所以在社会生活中居于支配地位，因为她是全体人民思想的体现者。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的主要思想集中表现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是中国人民世世代代的理想，也是一切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奋斗的目标。早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指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的首要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增加社会生产总量。不断宣传迅速发展经济，提高社会两个文明的程度，使人民富裕并享有民主权利，是社会主义舆论坚如磐石的主旋律。

如果把社会主义和富强、民主、文明相割裂，人民就要缺少民主权利，长期不能摆脱贫困，这就是假社会主义。脱离“富强、民主、文明”这三个要素空谈社会主义，也就抽掉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灵魂，导致对马克思主义声誉的败坏。这种失误，几乎在一切社会主义国家都或大或小地发生过。真正的社会主义一旦被篡改、歪曲，而又长期得不到纠正，人民群众就可能采取极端的舆论手段反对假社会主义，捍卫真正的社会主义方向。1956年波兹南的工人上街抗议政府不能给人们提供更多的生活必需品时，波兰工人党第一书记哥穆尔卡真诚地指出：“当波兹南工人跑到这个城市的大街上去的时候，他们抗议的并不是人民波兰，并不是社会主义。他们抗议的是我们社会制度普遍存在的并且也是他们痛苦地感到的弊病，抗议的是对社会主义——那是他们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2页。

理想——基本原理的歪曲。”①

毫无疑问，只有坚持真正的社会主义道路，上下层舆论才能达到完美和谐。在发展公有制的前提下，不断提高社会的物质和精神文明，使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稳步增长；严格实行按劳分配原则，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各级领导干部要做人民的公仆，而不是当官做老爷；人民群众提出的不同意见，特别是有益的意见能够受到尊重，各种民主权利得到保障。这样，人民随时感受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意见的冲突就要大量减少。人民群众内部也有不少政治思想问题，各级干部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引导群众反对极端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发扬爱国主义和艰苦奋斗精神，提高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自觉维护国家安定团结，并善于用民主与法治的手段处理社会矛盾，这就不会有过激的舆论行动。

社会主义是人民自愿选择的社会制度，当社会出现动荡时，如果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群众共同警惕国外反动势力及其国内代理人的煽动，坚持社会主义思想原则，即使在重大危机中也能真诚合作，把尖锐对立的意见统一起来，并肩驱散四周的阴霾，战胜呼啸狂卷的风暴，不断在荆棘中开辟前进的道路。

第二节 当代中国社会的舆论结构与演变规律

“社会舆论是一种社会意识状态，是指人们对社会现实事件和事实以及不同社会集团和组织活动的态度”②。当代中国的社

---

① 转引自《改革·探索·选择》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2页。

② 《社会学手册》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4页。

会舆论总是和现实问题交织在一起，它的形成、指向与功能时刻影响着各种社会组织的活动方向与效果，认识和谙熟社会舆论在政务活动、经济活动和民事活动中的结构与演变规律，是社会主义每个公职人员不可缺少的素质，更是各级领导者和一切宣传工作者的必修课。

普列汉诺夫说："'公众意见'在它的发展中是服从规律的，这些规律以决定天体运行的同样的必然性规范着'公众意见'。"①他同时又指出："社会制度的性质却影响着人们的心理，同时并决定着人们的智力、道德和一般所谓整个精神的发展。"②社会舆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结构与演变不仅具有一般社会舆论的某些共同点，而且具有社会主义制度所带来的特殊径迹和张力。

一、社会流动意识与表层意识

舆论是一种动态性社会意识。它从形成到发展，总是以流动状态在社会中蔓延。这种动态意识有时象涓涓小溪，蜿蜒流淌，有时则像滔滔洪水席卷而来，产生难以想象的冲击力。法国哲学家柏格森感叹意识是一种不可分割的流变波动，美国哲学家、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用"河流"或"流水"来形容意识的蹶起和风行，这些确实是恰如其分的比喻。其实，不只是舆论时时刻刻在流动，宇宙中一切运动状态都是"流体"式的，风流、云流、物质流、人流、意识流……。

舆论的流量如果超过社会秩序的负荷，就要向四面八方冲撞，行政之"堤"是无法截挡的。真正的洪水，哪怕是急流狂泻可以筑坝引洪，导入大海，而舆论一旦"决堤"，却很难收拾。

---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144页。

② 同上书，第550页。

古人已经意识到舆论流矢的锐不可挡，概括出“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的千古名言。在当代中国，舆论的多样态、不稳态时而造成社会舆论急速流动的状态。一有明显的社会变动，就要议论四起，飞短流长，很可能对社会的行政机构产生冲击。

舆论的流体性不断展现出人类精神活动生机勃勃的场面，使其伴随着社会交往而喁喁蠕动。平时，人们的言谈只要形成一定多数人的行为，每天都把信息带向各个角落，随着人流的涌动而滚滚向前。清晨站在繁忙的街头，看到成千上万人骑着自行车，乘坐各种车辆向他们的目的地进发，同样的活动在傍晚大多数人要重演一次。漫无边际的人流看起来默默无声，行色匆匆，当他们到达自己的“社会组织”（工厂、商店、学校、机关、家庭、院落等等）后，每个人的头脑就开始把储存的意见倾诉出来。舆论就是这样被人流所推动，在每一天、每一小时都在向外扩散，流动状态是舆论运动的重要特征。如果流动一旦形成怒涛，就要构成冲击社会秩序的张力。人们在意见交流中，由于人际互动作用造成社会情绪的波动，使社会意识发生膨胀，社会的正常秩序就被冲破。这种张力往往使人的集体行为发生某些变化以至产生混乱。社会机构只有作出相应调整，为舆论张力开辟更大的空间，才能进一步容纳膨胀了的社会意识。

舆论借助演说、集会、会议、大众传播媒介的多向、快速传播，在极短时间内加倍扩大意识流动的空间，就能使舆论张力急骤增长，达到空前的程度。现代许多社会运动都利用舆论流动意识及其张力的特点，加强自身的影响，同时也就要“积极利用大众关系来求得成功，即宣传媒介、公共邮政、政治游说等等的利用”①。

① 〔美〕《社会学》，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89页。

舆论的流动性借助社会心理的感染与模仿，把一部分人的意见迅速传播给更多的人，变成广泛的舆论，于是传染与模仿便成为舆论流动的重要方式。苏联社会心理学家认为，感染是"个体对某种心理状态的无意识的，不自主的屈从"①。但意见的传播恰恰不是无意识的，接受意见的人也不是无意识的。舆论的传染，是指在多数人共同态度怂恿或影响下，具有相同或相似观点的人，自觉采取同等态度的言语与行为。当人们对公共事务认识一致，一旦有多数人发表意见，听到的人也随之有意地附合。个人接受他人的观点，完全受个人愿望所支配。在众人集结和大型聚议的场合，这种传染的扩展范围与速度又远远超过几个人的交谈效果，因此，苏联学者波尔什涅夫把人群称作心理倾向传播的"加速器"。②实际上，人们由于出自利益追求、共同兴趣或其他各种动机，往往愿意打听或把自己知道的事情和意见告诉所熟悉的人，在彼此交换观点中使意见由少数人向更多的人扩散。无数这样的人相互聚合、相互传告，就使舆论像追波逐流的河水那样在社会中加速流动。

舆论流动的出现，又是人们施展模仿机能的结果。模仿是人类的天性，没有模仿就没有人类文明的延续。对同一种事物，尽管许多人具有相同的观点，但表达的方式却有很大差异。有的只言片语、词不达意，说出的意见不能确切表达人们的共同意志。有的人文化素养高，对公众意见能够作出系统、深刻、准确、简洁的概括，成为舆论流中的核心人物，他们的意见一旦在街谈巷议中出现，就能吸引更多的人接受并纷纷模仿这种意见的表达方法。"当人们面临突然事件时，他们会本能地彼此模仿，力求与

① 〔苏〕安德列也娃：《社会心理学》，南开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36页。

② 〔苏〕波尔什涅夫：《社会心理因素》，载《社会心理学问题》第172页，俄文版，莫斯科。

在场的多数人行为一致，模仿的最终结果会使所有人与集合行为核心人物的行为一致”①。舆论流中核心人物的言语优势，争得人们普遍赞成，也就被许多人效法、扩散。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言之有文，一日千里，这是舆论流动的内在机制。在当代中国的物质活动中，存在一种唯利是图的不良思想，这种现象激起一种舆论，有的指责这是“大把捞钱”，有人则认为这是“一切向钱看”的倾向，显然，后一种表达方式更能准确、形象地表达舆论。于是，批评“一切向钱看”的说法很快被许多人所模仿，在全国流行起来，甚至成为新闻报道和政府文件中的语言。

舆论这种社会意识表现为人们每天经常诉说的思想，不仅有口头表达，而且还有报刊、广播电视及各种时事印刷品构成的日常精神活动。这种流动性，是人们视听器官直接感受到的意识现象，属于社会意识的外层运动，因而它是一种表层意识。

社会意识同其他事物一样，也有自己的结构，是由表层意识和深层意识相互砌合的观念整体。舆论的表层意识性，是指浮动在社会观念外在层次、富有活性的见解，人们每天都能够感受到它的存在。深层意识是指政治法律思想、哲学、科学、文学艺术、神学等体系完整、相对静态的意识形式，是由表层意识长期积累、演化的结果。

迄今对意识的研究，大量集中在对哲学、政治、法律、宗教、文学、艺术等深层意识的探讨，而对流动的、广泛的、每时每刻都在影响社会的表层意识——舆论却缺乏深入的探索。

诺贝尔生理学奖金获得者、澳大利亚著名神经生理学家J.C.艾克尔斯把世界划分三部分，第一是整个客观物质世界，第二是意识状态的主要经验世界，即人们平时获得、并表达的全部感性知觉和认识经验；第三则是人类创造的知识世界、即整个文化

① 郑杭生等主编：《社会学概论新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65页。

和文明[①]。显然“第二个世界”就包括我们所说的舆论活动。另一位心理学家布伦塔诺创造了意动心理学，直接把人类的舆论这一表层意识作为研究对象，他把“感觉、想象、如我见、我听、我想象”，“我承认、我否认、我知觉、我回忆”，“感情、希望、决心、意向、欲望、如我感到、我的愿望、我决定、我意欲、我请求”[②]等视为社会心理的意动现象。而人们的这些“意动”，被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感官所察觉，成为日常的言论行动，具体地表现为各种舆论形态。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没有不具备“意动”的人，大多数人都追随一定的“意动”对社会问题发表见解，诉诸舆论行动，成为社会表层意识的活跃主体。

舆论的表层意识和其它深层意识形态的重要区别在于，舆论的出现是许多个体意识志愿结合、溶汇的结果，它总是活在群体中间，活在普通人的心里。深层意识是由思想家总结大量社会和自然现象规律创造出来的，这种意识的全部结晶并不在多数人的心里，而是在创造者所撰写的科学著作里及其少数精英人物的头脑里。如果要了解它，只有钻心到这些著述中遨游，才能认识它所揭示的内容。舆论的表层意识以简单的表达方式趋向外露化，成为有声的语言或行为，只要运用视觉和听觉就可以获得它的全部内容。舆论主体的多数是普通社会成员，多数人的共同声音呈现出广泛无名的意识现象，使舆论获得无处不在，无处不有的生命力。舆论在反映客观世界时，总是捕捉社会各个角落刚刚出现的利害问题和重要事件，把触角伸向各个领域的最新动态，占据这些领域的表层空间。随着时间的推移，被许多人认为具有永恒意义的意见便逐渐凝固为系统、深层的知识，积淀为深层意识。神学曾一度“不过是一些街谈巷议，一些浮在时代表面上的东

① 引自《大脑——精神问题是科学的前沿》，见《科学的未来》一书，1975年。

② 参见《灰箱：意识的结构与功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6页。

西”，当它“思维独立地出现”时，就要形成和哲学依然统一的深层意识，使流行一时的意见摆脱了自发状态①。各种深层意识都起源于街谈巷议，最后形成稳固的知识体系。从形式上看，舆论这种意识活动是粗糙的、朴素的、零散的，但从内容及社会功能上看，又是现实社会矛盾的直接、广泛的再现，并促进解决社会中最突出的问题。由此看来，表层意识决定深层意识的形成与发展，并赋于它指导现实的生命力。而深层意识则是表层意识的系统化，理论化，是人们长期舆论活动积蓄起来的完整、精华的思想体系，二者的完美结合构成社会意识形态的整体。过去人们没有赋于舆论“表层意识”的概念，只是简单、肤浅地把它称作“社会心理”、“社会态度”，这就无法充分估价舆论这种意识形式的社会地位。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充分把握表层意识和深层意识的特点和相互关系，将有助于人们认识社会意识的结构和规律，从而高度重视舆论的独特社会功能。

舆论也是一种意识形态。表层性是指它在整个社会意识结构中的地位而言，并不是说它不具备意识形态的完整性、彻底性。凡是由人脑产生、反映客观世界的整体性见解都具备意识形态的特性，其中主要表现为一系列观点和意见。马克思指出：“由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引起的社会冲突，以意识形态的形式，即在观点和意见的矛盾中得到解决”②。这里所说的观点和意见就包括舆论在内。尼克斯·波朗查斯在分析资本主义公众舆论时，更明确地提出：“以公众舆论形式表现为政治意识形态是代表一些实际常规的整体，是一种技术认识，是公民对一种特殊

---

① 参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6页。

② 转引自〔德〕亨利希·库诺夫：《马克思的历史、社会和国家学说》，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66页。

实践的‘文明意识’，是这种实践中的‘理性’。”[①]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无视对社会舆论这种意识形态的认识，不了解它的重要作用，也就无法把握这种每日每时影响社会运动的意识力量。

二、民意及其要素

半个多世纪前，亦乐在《舆论》[②]一文中曾建议，舆论虽然可以表达西方的“公众意见”（Public Opinion）说，但是，最好把“Public Opinion”翻译成“公论”比较适当。因为中国的“舆论”一词原是“舆人之论”的意思，而舆人则是普通众人的同义语，那么“舆论”就不如“公论”更接近外国人的原义。

事实上，外国人通常把舆论看作是整个社会流行的意见，公众意见就是全体人民的意见，于是经常用“民意”这一概念来表达舆论。早在公元前300多年前，古希腊杰出政治家亚里士多德就在《政治学》一书中提出“民意”的概念，他写道：

> 嗟此懦诚，奉此鄙夫，
>
> 诅彼愚众，罠尔趋附。
>
> 这些诗句确证毕达库斯的临时统治职位是由人民公推的。这种制度常常显出两方面的性质：即具有专制（独断）的权力，这就类乎僭政；又是根据了民意，经过大众的推戴而受任，这又不能不说是君主政体了[③]。

亚里士多德赞美专制政体，又赞美民意，企图把二者结合起来缔造一种最优良的统治制度。自古以来，民意就被政治学家所关注，被看作一种神圣而纯洁的力量。我国战国时代的思想家、

① 《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第238页。

② 载《新闻学名论集》，上海联合书店1929年版，第254页。

③ 《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60页。

政治家管仲认为“令顺民心，则威令行”，为政不可“怨民心，伤民意”[1]。在俄国民主主义运动初期，出现的一批“民意党人”以代表民意自居，自诩为捍卫民意铤而走险。他们宣布：“只有民意才能够确定社会形态，只有体现在生活中的每一种思想事先通过人民的意识和意志的时候，人民的发展才是可靠的。人民的福利和人民的意志，这是我们的两个最神圣的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原则。”[2]民意这一圣洁的字眼，从古至今使一切政治派别为之倾倒，因为一旦博得代表民意的桂冠，也就能获取人民巨大的支持。

民意是人民意识、精神、愿望和意志的总括，是舆论这一意识现象的主体部分。民意能否在社会中获得意识主体的位置，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成为现实。不言而喻，民意便成为社会主义下层舆论的基础和主干，人们通常所说的舆论，正是指的民意，或叫民心。

在错综复杂的舆论现象中，除了民意，还有上层舆论、下层舆论中的各种团体舆论和群体舆论，这些舆论虽然大都可以融合在民意中，但如果表达的内容局限在狭小范围内，就不可能具备民意那样广泛的主体性。当上层舆论表现为民意，只能是反映或代表了民意，其舆论主体和全体人民便形成统一意志。可见，民意是整个社会的普遍意见。

既然民意是全体人民的共同意志，那么只有社会全体人民积极参与舆论活动，成为舆论主体时，才能形成真正的民意。朱执信曾经给“民意”作过界说，他认为：“有主义之人民意志也，即所谓民意。”[3]显然，人民缺少共同的精神纽带，也就谈不上有统一的意志。人民在共同信仰、共同目标、共同追求支配下，产

① 《管子·牧民篇》、《管子·臣乘马篇》。

② 《俄国民粹派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19页。

③ 《朱执信集》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77页。

生高度统一、无所畏惧的意志力量，显示出“民意所趋，不欲生，不避死”的自恃力。民意这种力量恰是人民精神的象征。马克思在《新莱茵报》创办时，指出：“一种新的精神在德国破土而出了。它将旧制度推翻在地，它注定了旧世界的灭亡。它要求有一个新社会，一种新生活。这就是人民的精神……人民要以自己的意志指导自己的生活，安排自己的工作。创造自己的幸福。”接着，马克思阐明，人民精神从意志到行动，从决定到实行还有一段很大的距离，报刊最适当的使命就是表现人民的意志，“形成舆论、给共同的意志指出一个正确的方向”①。所以，民意通常表现为人民追求生活目标而形成的舆论，并以强烈的意志形式表现出来。任何社会的主宰者，归根结底要受民意的支配，不是全心全意遵从民意的指向，就是采取种种手段欺骗、强奸民意；当以暴力践踏民意时，社会主宰者迟早要陷入民意的声讨而跨台。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群众的意志应当构成国家的意志，国家的意志同样要体现人民的意志，民意上升为社会统治意志。人民是国家主人的重要标志，正是人民的意愿、向往始终受到尊重。社会物质财富、精神财富是人民创造的，人民决定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方式，他们的全部意愿也就体现在这两种生产活动中。人民在各种社会组织中结成坚固的集体，特别是在国家企业、机关和集体企业从事劳动的人民，在频繁、密切的交往中逐渐形成一致的思想态度。人民始终以共同意志选择他们认为最好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选择社会优秀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们赞扬、支持一切符合自己愿望的事物，反对、怨恨违背、践踏他们切身利益的任何企图。民意表达人民的创造力、创造方向，赞美、追求社会主义要有美好的生活，因为生气勃勃的社会主义事业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民意不仅决定社会主义社会的进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3卷，第487—489页。

程，而且决定这一制度的整个命运。民意被淹没，社会主义就被歪曲。民意由于是全体人民意志的结晶，因而它不会发生错误。真正的民意是真理的化身，是实施真理能量的发出者，但是民意也常常被欺骗，被少数人引入歧途，即使在这种时刻，民意并没有改变，只是深深埋藏在全体人民的心里。

历史上某些思想家把人民群众视为"群氓"、一群毫无主见、受偶然意志任意摆布的乌合之众，嘲弄"有许多强有力的人物口头上拼命讨好百姓，——结果是白费力气"①。世界上根本没有这种群氓，民意始终是强大的道义力量。由于人民是以千百万以至数亿的巨量而存在的，洞察千百万或几亿人的共同声音，陈述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只能由少数代表人物承担。精英人物代表民意，不能、也不应贬低群众的作用，他们不过是群众才智的体现者，这是代议制的象征。这种代议制起源于人口的增长。原始先民参加议事会，每个人都可直接表达自己的意见，当人口繁殖到几百万、数亿人的时代，民意必然由少数人来表达。普列汉诺夫指出："公民人口的增殖，使一种代议政治产生出来，因为公民们，再也不能在一个地方集会，来商议公共事务了。"②民意通常由代表来反映，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归宿。

民意不只是语言对意志的外化，而且是多种因素构成的错综复杂、隐现变幻的意识世界，有时，人们对民意的感受也就陷于茫无涯际、捉摸不定的状态。我们从复杂的民意结构中可以提炼出潜意识舆论，显意识舆论和行为舆论三种要素。一般民意表现为其中一两种要素，也可能同时具备这三种要素，这种划分揭示了民意的纵深系统。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曾把意识比作浮现在海洋上缓缓移动的

---

① 见《米哈伊洛夫斯基全集》第2卷，圣彼得堡版，1896年，第465—466页。米哈伊洛夫斯基是俄国自由民粹主义派的首领，社会学家。

②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115页。

冰山，露出水面的部分是显意识，淹没在水下的冰山底部则是潜意识，民意的基本要素是由潜意识与显意识舆论构成的。

潜意识舆论是低水平的民意或处于形成时期的民意，表现为人民群众一致的内心活动。人民群众运用内心冲动、欲望来表现爱憎是非的评价，使舆论完全处于一种社会情绪状态。林肯阐述美国革命胜利的决定因素时，提出："在这里和与此相同的社会里，公共情绪就是一切，有了公共情绪，一切皆可成功，没有公共情绪，一切皆将失败。因此，那些铸造公共情绪的人要比那些制造法律或宣布判决的人要高深得多。""普通所谓舆论——差不多人人都这样叫它——实质上就是公共情绪，因为它既有感情，也含有思想"①。当人民群众对社会问题表示赞同、信奉，他们的共同意志起初是以喜悦、兴奋、快乐、惬意等这些情绪链表达的；同样，当人民群众对社会问题表示不满、反对，则要以愤慨、消沉、不快的情绪来发泄；这些都是质朴的民意倾向。这种潜意识舆论，尚不具备完整的意见形态，因为人们的意志刚刚由客观事件或社会问题激发出来，不可能很快形成系统的见解，便以充满感情的各种简单词句表达共同的内心活动。在公共场合人们时常发出"妙极了！""好极了！""不得好报！""不会好的！"这种长吁短叹，正是潜意识舆论。恩格斯在批判德国庸人的舆论时，用形象的比喻揭示了潜意识舆论的情绪因素，他写道："现在，普遍认为啤酒馆里庸人们的愤怒'风暴'，即所谓舆论，已经重新平息……。"庸人们在啤酒馆里怒火烧胸，发泄对当局的气恼，因为除了革命失败情绪，"捐税的重担已把这些人压倒"②。在恩格斯的笔下，德国庸人的舆论通过情绪链再现出来，是一种潜意识舆论的状态。

---

① 见约斯特：《新闻学原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译，1960年，第8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396页。

在历史处于转折，激荡时刻，民意最初总是以潜意识的曲折方式表达。人们用微笑、欢跃，或者用沉默、痛苦这类无声的语言表现共同意志，构成舆论的潜伏状态。1976年1月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四人帮”一伙对吊唁周总理下了各种禁令，当载有总理遗体的灵车开往八宝山火化时，北京市民自动涌向街头，在阴冷的寒风中肃立，数万人默哀、哭泣、捏紧拳头，以“十里长街走相送”的悲壮场面表达了全国人民的潜意识舆论。

民意的内在要素不断变化，潜意识舆论的进一步发展，必然升格为显意识舆论，演变成具有完整意见形态的舆论。人民只有系统地表达意见，才能形成真正的舆论。当潜意识被一些勇于发表见解的人所打破，就能一下子飞跃为显意识舆论，这和灵感突然升华为明晰的思想有许多相似之处。朱光潜说：“灵感大半是在潜意识中所酝酿成的东西猛然发现于意识。”① 当人们暗中在情绪上酝酿一种意见，如果有人勇敢地站出来完整地阐明共同心愿，立刻就会在人民群众中形成强大的舆论，这时民意就具备了显意识舆论的要素。

十年动乱，早就形成反对“四人帮”的民意，但长时间以潜意识状态在全国流动。到1976年2月至4月间，由于压制悼念周总理，几家报纸在“四人帮”的授意下公然攻击邓小平同志是“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周总理是“大儒”，立刻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许多人提出打倒“四人帮”的口号，或张贴标语，发表演说，或印发传单，形成了显意识舆论的民意。可见，显意识舆论有完整的语言形式，表达完整的思想，通过一系列言语活动表现对社会问题的坚定见解，体现人民的坚定意志。

舆论不仅用语言表现，有时，行为也能表达强烈的意见，构成民意的特殊要素——行为舆论。一位勇于改革的厂长被无端免

① 《文艺心理学》第203页。

职，成千职工被触怒了，他们四处奔走，告状；几十名工人分别在路上拦住记者反应情况，为厂长鸣不平，几路“堵截人群”使记者感到这位厂长确实赢得了民心；厂长终于复职，上千名职工汇聚在工厂门口迎接，燃起噼噼啪啪的鞭炮。这些行为舆论表达了工人对厂长的热烈拥护，显示了全厂的民心所向。

行为舆论是由行为思维转化来的。人的许多思想都可用动作、体态、以致大规模的集体活动来体现。在人类早期，思想渗透行为，行为强有力地表现思想，举手投足都能再现内心的意志与思虑，“手势语言”、“神色语言”、“姿势语言”便成为吐露内心世界的特殊方式。德国哲学家卡西尔对美洲的考察，搜集了丰富的行为语言的材料，他介绍给我们的是这样一些令人信服的例子：“对于一个特殊的动作例如敲打，有着多得令人惊讶的词语，这些词语之间是一种并列关系而不是从属关系。用拳头打与用掌打不能用同样的词来描述，用武器打和用鞭子打必须用不同的词来表达。”① 即使现代人，当认为行为更能有力地表达意见，他们就要诉诸行为，行为舆论就成为表达民意的强硬有力的手段。

人们的行为历来是社会行为，是为改造世界，改变现状而表现出来的意志能动性。人民表达意志，基本要采取两种主要方式，即语言方式和行为方式，有时则把语言和行为交织在一起。不言而喻，行为总是充满意识性并实现着主体意识。这样，在表达民意的舆论活动中，行为舆论则广泛地被人们采用。人民群众在天安门广场游行庆祝共和国的诞辰，行列中突然有人高举“小平您好！”的横幅，兴高采烈地通过庄严的广场，这一行为是民意的象征，是表达舆论的特殊方式。1958年上层舆论曾宣传大办食堂，实行部分供给制，华北千里平原许多农户在几天内就把家中的鸡、鸭、猪、兔杀光、吃光，人们空着双手等着“共产

① 《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173页。

主义”的供给，这些行为深刻而隐晦地表达了当时的民心所向。

民意的行为舆论要素是潜意识舆论和显意识舆论要素的顶端，当民意用前两种要素不能实现愿望、达到目的时，就要采用行为舆论。行为舆论比前两种要素具有更大的冲击力，是社会主义社会中罕见的民意表达方式。当官僚主义压制群众的合理要求时，民意才表现出愤慨的行为舆论形式，而游行庆祝，集会祝捷、举行庆功会则是民意表达兴奋、喜悦的行为舆论形式，二者都处于民意三角构架的尖端，成为舆论行动的制高点。从意见、思想、心理与行为的相互制约关系考察，行为舆论是民意达到激化的标志。

在民意三角构架中，民意大都处于潜意识舆论和显意识舆论状态。其中显意识舆论占有更大的比重，是一种常见形态。但潜意识舆论同样具有恒常性，它一方面是显意识舆论形成的基础，另一方面又和显意识舆论同时存在，相互交错。民意有时以一定的行为舆论出现，因为潜意识和显意识舆论都具有向行为舆论转化的可能性。当社会矛盾无法用“交流、解释”的舆论方式来解决，人们就要诉诸行为舆论的手段。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生抗争性的行为舆论的机遇极少，这是由于社会基本矛盾消除了对抗的结果，从而上下层舆论通过“交流、解释”，具有更大的融合性。

游行庆祝、集会祝捷、举行各种庆功会、表彰会，是扩大社会主义思想的行为舆论。在这种场合，人们不仅用语言表示意见，而且用各种隆重的仪式、行动抒发激情，烘托热烈气氛、表现人民群众对真理的追求、胜利的欢庆和对先进人物的赞颂。每个团体，以至国家领导机关都利用这种行为舆论扩大民意及上层舆论的影响，高度统一人民的意志。美国社会学家戴维·波普诺认为，举行这种“社会主义”的热情洋溢的集会，能使群众中成千上万的人创造一种归属感，他指出：“政府有时也召开大会或群

众集会以求在人民中建立起一种社会团结感”[1]。无疑，这种行为舆论不仅具有表达民意而且具有加强民意的功能。

社会主义国家中的民意，在个别情况下可能发展为抗争性的游行示威、静坐、罢工等激化的行为舆论。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各种冲突，官僚主义在个别单位盛行，社会矛盾解决不好就可能激起人民的愤慨，触怒群众采取过激的行为舆论。

同时，也会有少数人在封建主义腐朽思想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怂恿下，违背人民的利益举行罢工、罢课和示威游行，扰乱社会正常秩序。这决不是民意，而是对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的严重干扰和破坏。因此，区分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舆论，鉴别真假民意，是正确识别舆论方向、把握社会思想动态的前提。

三、舆论的正负向与五级增长律

大自然中的旋风似乎没有方向，但它在大地卷扬飞驰时，总是由一方向另一方扫荡而过，沿着一定曲线向前推进。宇宙中的任何事物都有一定的方向，而且是正负两极的对峙、咬合、反背，构成一切物质的两极运动，社会舆论也不能摆脱宇宙这一普遍规律，对立的舆论总是沿着相反方向发展变化，正如道比法特所说：“作为宣传群众的统一的和同一方向的舆论是不存在的。”[2]不同方向的舆论，主要是正负两种方向——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符合民心的正确舆论和违背社会发展趋势、背离民心的错误舆论。根据二者对社会的正负效应，我们可以把它们称作正向舆论和负向舆论。

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意识剧烈变动的时期，正向舆论与负向

---

① （美）戴维·波普诺：《社会学》下册，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57页。

② 转引自小野秀雄：《新闻学原理》人民大学新闻系译，1960年，第180页。

舆论不断交叉，冲突、转化，划出社会思想变幻的曲线。历史从来没有平分秋色地推进它的各个部分，在社会主义社会，正向舆论只有加重它的砝码，才能使负向舆论处于被支配地位，社会也就会稳步前进。

（一）正向舆论及其五级增长律

社会主义正向舆论适应新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发展，维护社会的整体意志，捍卫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正向舆论体现广大人民群众和各级上层人士对真理的认识和追求，是人们改造主客观世界的正义呼唤和讴歌，舆论的全部内容准确地再现四化建设的实际，把人们引向光明、快乐、幸福的境界。“真理这东西可说是一种无隐无饰的白昼之光”①，正向舆论就把这种光普撒在大地上，使人们在“白昼之光”沐浴下认识真实的世界，建设真实的世界。

每天人们用社会主义的正向舆论指导行动，调整社会关系，构成社会意识斗志昂扬的色彩，它必然是欢乐、向上、进步、健康、勇于奋进的思想热潮。

十分明显，这种舆论的核心，是肯定、促进社会主义在我国的胜利和发展，树立人民群众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强国的信念，鼓励人们在劳动、工作中发挥创造力。在群众中要形成这样一种概念：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建设社会主义国家，集中一切力量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发展生产，需要涌现一批富有创造精神的人，因此，还要有这样一种舆论，谁对社会贡献大，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多，谁就受人们的尊重，受社会舆论的高度称赞。社会对群众和干部的公论是以贡献为标准的，人民付给他们的报酬也是以奉献为依据的。歌颂劳动者，肯定人民的创造力，只有在社会主义时代才能成为社会的普遍意见。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正确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理论

---

① 《培根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4页。

服务于实践、理论适应现实生活的唯物主义观点，使人们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看作认识真理、发展真理的指南，而不是让实际去适应前人的结论。在社会舆论中引导人们认识马克思主义本身是个开放系统，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开拓前进的道路，用今天的现实，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

社会主义的经济政策鼓励个人劳动致富，激励人们勤奋上进，善于理财，从舆论上保护人民走劳动致富的道路。舆论评价各层管理人员制定的方针、政策、计划、措施是否正确，看其能否给人民带来好处，是否有助于社会整体效益和人民群众福利的提高。以广大群众的根本得失评论公共事务的是非好坏，是社会舆论健康发展的标志，因为“任何一种东西，必须能使人民群众得到真实的利益，才是好的东西。”①舆论不保护人民利益，就不是真正的民意，政策不增进人民的幸福，政策就不能吸引群众。人民之所以向往、热爱社会主义，不是因为它有一个大放异彩的名称，而是它要给人民带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制度无法带来的“真实利益”。社会主义舆论无视对人民利益的宣传，人民就要降低对宣传内容的信赖。

社会主义要以共产主义、集体主义精神教育人民群众，在舆论上阐明致富有先后，但反对为富不仁，坑民害国；提倡按劳取酬，多劳多得，同时要大力表彰为社会多作奉献的精神；主张增强竞争意识，但要支持相互协作的无私风格。社会主义正向舆论是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维护国家法律和劳动制度的精神武器。在群众中要形成鲜明的舆论指向，即用人民的普遍呼声反对封建主义，反对自由化，批评损人利己、唯利是图、危害社会治安、不顾长远和整体利益的各种不道德行为。社会要用强大的舆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支持国家的改革开放、搞活经济的方针，坚决制止政治动荡、政策多变、搞乱经济、压制民主的社会行为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66页。

和管理方式。

社会主义这些正向舆论真实地反映了我国的国情，是全国各族人民多年总结经验教训而形成的意见体系。诉诸或维护这些舆论，就是代表民意，符合民心。任何社会活动、新闻报道与国家公务人员的言行，只要坚持这些舆论倾向，就能不断推动社会正向舆论的高涨，使社会思潮健康地发展。而这种高涨是按一定等级增长的，我们把它称作正向舆论的增长律。

社会正向舆论的变化按照五个等级盘旋上升，以不同差阈和速率唤起群众的激情，再现进步的意识形态受到人民欢迎的程度。同时，社会决策和变动，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引起的各种反响，同样以一定的级差表明受到群众拥护的程度。由于每一等级的心态反映着客观事物作用于主观认识的不同差别，正向舆论增长律的等级就成为衡量国家宣传、国家决策与社会变动正确性的"刻度"。

第一等级：宣传、决策、情况变动，没有引起人民群众的反感，看不出任何抵触、不赞成的意向，但人们很少谈论它。——这表明，宣传、决策和情况变动对广大群众无害，但还没有使广大群众感受到明显的利益。

第二等级：群众有所称赞，各地相继出现赞扬的意见，但不普遍。人们在议论时还没有出现情绪上的高度兴奋和喜悦。——这表明，宣传、决策与变动对人民有好处，引起人民群众的关心、注目。

第三等级：人们普遍议论，并怀有兴高采烈的样子；许多人自觉奔走相告，希望更多的人了解他所知道的内容；还有一些一知半解的人到处打听，很想知道决策与变动的详细情况。——议论的普遍化以及人们情绪上的高涨，说明宣传、决策和变动很得人心，人们已经意识到宣传、决策与变动完全符合自身利益，表示衷心的欢迎，社会开始形成良好的秩序。

第四等级：人们自动集结，出现由5—10几个人组成的自由讨论会；在街道、公共汽车上、车间、办公室等场所也常有人凑在一块儿议论。人们热烈喝彩、称道。许多人纷纷写出文章。报纸、广播电视通过报道消息、发表评论形成社会声势。——表明宣传、决策或变动正在深入人心，广大群众希望尽快实现决策，热情欢迎这种变动。实现决策与变动目标成为人心所向，社会秩序日趋稳定。

第五等级：人民群众涌跃参加在上层领导或群众团体组织下举行的示威游行，或祝捷大会、庆功大会、表彰会、及各种形式的欢庆会。报刊、广播电视报道各种反响。人们一致欢呼新决策与新变动取得的进展。——决策或新变动激起人民群众的极大热情，使人民形成统一的意志，用共同语言与行动表达落实决策的决心。有时还表现为以示威游行的方式声讨、抗议非正义的势力。示威游行这种行为舆论谁都可以利用，人民群众有组织地用它显示坚强的意志、胜利的决心和大无畏的战斗精神，就构成正向行为舆论，使人心安定，平稳的社会秩序不断巩固。

（二）负向舆论及其五级增长律

和正向舆论相反，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许多群体经常形成与人民意志——民意相反的共同意见，歪曲地反映客观事物真相，形成负向舆论，这是社会主义两极舆论的另一极。负向舆论内容充满片面、极端、虚妄的成分，以虚张声势、哗众取宠、恫吓威慑的声势制造紧张气氛。在一般情况下，这种负向舆论在社会生活中不占统治地位，但在特殊条件下也可能主宰社会的许多领域，猖狂肆虐，扰乱人心，成为社会最大的公害。我国十年内乱是负向舆论占统治地位的时期，持续时间之长、破坏性之大，在社会主义制度发展史上极其罕见。

负向舆论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它从来都清清楚楚地使错误的上层舆论或下层舆论和民意分开，始终不能玷污民意的光

浩。这样，负向舆论便和民意水火不相容，仅仅是上层或某些下层舆论主体的谬误思想。进一步分析，我们还发现，上层负向舆论和下层负向舆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内容和表现形式有时完全一样，呈现出上下呼应、沆瀣一气的浩大声势，在荒谬绝伦的长啸中，各种杂乱意见殊途同归。

上层负向舆论在我国断断续续延续了近20年，人们耳濡目染，已经习以为常。只是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之后，才开始对它进行系统的反思，集中消除了负向舆论对人们头脑的统治，成为富民兴邦的起点。

只要翻阅一下那个年代的报纸就足够了。对于年轻人，他无法理解版面上的那些语言究竟描述的是个什么样的时代，人格化的版面似乎患了信口开河的特种瘾病。我们随意抄录几个片断：

要敢于插红旗，辨风向。插红旗，拔白旗，你不插红旗，资产阶级就要插白旗，与其资产阶级插，不如无产阶级插……

超英赶美，跃居世界第一。"卫星"接连上天，共产主义光芒万丈……

公社是大跃进的产物，公社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基层机构。这种一大二公的公社有极大的优越性，是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最好形式，这是毫无疑问的，完全肯定了的……

看来各地都有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存在着，增长着，有些地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猖狂进攻……

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还很激烈，从现在起就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主要对象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生产搞上去，出修正主义，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宁要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宁要无产阶级的草，不要修正主义的苗。

整个农村形势大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工业形势大好，国家形势大好，世界形势越来越对我们有利（年年都这样重复，实际国家很乱，农民贫穷，城市食品供应紧张）。

以往20年间我国上层负向舆论的基本线条是，在全国范围内，各级组织通过会议、报纸、广播，"思想交锋"、"天天读"、"表忠心"、"大批判"、"大颂扬"，把荒诞不经的意见、理论强行向人民灌输。这种舆论来势凶猛，顺之则相安无事，逆之则被打成反革命。整个国家意识形态背离实事求是的原则，大搞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在经济建设中夸大人的主观意志，崇尚人海战术，梦想一步登天；在政治领域夸大阶级斗争，颠倒敌我关系，热衷政治运动，乱斗一气；思维方式孤傲封闭，夜郎自大，好大喜功，善于一窝锋，一边倒，一刀切，大轰大嗡……在这种舆论的高压下，人们不得不紧随着摇摆、动荡、胡闹，下层舆论像冲出瓶子的啤酒，急速四溢。历史总是证明：下层部分群众把上层人物的错误口号接过来拼命放大，到处推销，使失言误国酿成祸国殃民。

读一下马克思对资产阶级议会负向舆论和下层舆论关系的精彩描述，人们将一目了然，为什么上层领导的错误意见会使报刊宣传和广大群众的活动陷入更大的舆论荒唐。马克思写道：

发言人在讲坛上的斗争，引起了报界的低级作家的斗争；议会中的辩论会必然要由沙龙和酒馆中的辩论来补充；议员们经常诉诸民意，就使民意有理由在请愿书中表示自己

的真正意见。既然议会制度将一切事情交给大多数决定，那么议会以外的大多数又怎能不想也作决定呢？既然你们站在国家的顶峰上拉提琴，那么你们又怎样因为站在下面的人们跳舞而惊奇呢？①

由上层负向舆论引起的下层负向舆论，总是千百倍地扩大上层意见的荒谬，形成负向舆论的张力，以更大的舆论波冲击社会的正常生活。由此又使更多的群众产生"眩惑症"、"无谬误症"、"偏见癖"三种顽固病态心理，再度使上层负向舆论在整个社会中无休止地扩展。

心理眩惑，是由外界的错误刺激而造成的群众心理上的昏眩和惑乱。如果上层意见错误较多，摇摆不定，群众经常按着多变的意见不断改变接受心理，承受着朝令夕改、茫然无措的心理冲力，内心就要形成捉摸不定的思维方向，久而久之，对任何观点和事物都抱有随便发表意见的轻浮态度。他们的那张嘴失去"尊严"，随时为了应付形势表达各种方向的意见，言不由衷，已经习非成是。我国在十年文革中的"风派"群体，就是这样形成的。说假话既然能够获得"紧跟照办"的政治美名，那么上边拉什么调，下边也就跳什么舞，"分清是非"的引颈高喊反而变成不分是非，这就必然出现：一边吃野菜，喝稀粥，一边高呼人民公社好；明知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功德无量，却跟着狂喊：打倒叛徒、走资派。在拉开改革帷幕的新的历史时期，群众中的"心理眩惑症"并没有完全消失，患有这种心理病态的人很难理解改革的本质意义，发出一些"不问是非"的议论。某些人心理动荡不定，任意歪曲事理，散布狂热或惊慌情绪，这种"心理眩惑症"是下层负向舆论的基本特征。

"无谬误症"是指人们总是以完美无缺作为衡量社会各种事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45页。

物的标准。评价、议论社会问题，往往要求其保持“无谬误”状态。认为好，就一切都好，把一切理想化。一旦工作发生失误，社会出现坏的现象，就要舆论四起，议论不停，把社会主义进程中的挫折加以扩大。在一般情况下，看人论事，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往往产生过激的舆论举动。这种“无谬误症”的心理倾向必然由全盘肯定事物导之全盘否定事物，最后使舆论主体也陷入谬误。在开创新时代的变革中，人们对改革和改革人物总是苛求过高，倘若出现一些问题，患“无谬误症”严重的人就觉得一无是处，横加指责。由“无谬误症”引起的负向舆论表现为思想方法的绝对化，对一切事物的认识总是趋向极端，由此导之把英雄、领袖赞颂为超凡脱俗的至圣，卷起个人崇拜的声浪，而如果舆论要贬低一个有缺陷的英雄，又把他说成历史的万恶罪人，没有一分肯定的地方。

偏见癖是形成负向舆论的基因。普列汉诺夫说：“无知、迷妄和偏见——都不过是错误意见。”① 人们盲目相信各种偏见、传播偏见，就要形成负向舆论，扩散错误的意见。偏见又称偏执，是人们在一定时代、一定环境、一定经济地位形成的固定常识，但随着条件的变化它已失去存在的前提，成为谬见。列宁在《哲学笔记》中对偏见的含义和根源归结为一个十分简单的道理，即常识“是某一种时代的这样一种思想方式，在它里面包含着那个时代的一切偏见”②。有时，对习惯的旧念和信条的坚守，都可能因超越时空环境而形成偏见。抱有偏见的人，一切言论都根据假象的认识陷入幻想，所以，坚持偏见是自信感和妄想症过于顽固的心理冲动。无数持这种冲动心理的人就构成了一个大的愚昧集团，形成负向舆论的主体。他们面对社会问题，眼界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729页。

② 《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76页。

狭小，缺乏新的知识，总是以原来落后的有限的认识看待不断前进的事物，传播各种僵化、过时的观点。在社会舆论中，个人妄想、狐疑、猜测及疑神疑鬼的邪念成为舆论偏见的起点，由此驱动对他人散布流言蜚语，破坏人际关系的和谐和社会安定。偏见发展到狂热地步，就要纠集一些人大肆造谣，毫无顾忌地传播谣言。具有共同偏见的人对一切有利于他们的谣言都颇感兴趣，谈论起来，望风捕影，以讹传讹，兴致勃勃。另一方面，一些阴谋家为了蛊惑人心，煽动混乱，往往借助谣言攻击正义力量，以达到夺权的目的，或使用谣言发泄内心的愤懑。

在改革开放时期，危害最大的负向舆论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中国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一种思潮，叫资产阶级自由化，崇拜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他们搞的这一套无非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出非法刊物，实际上是一种动乱，是'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作风。"① 这种舆论借助部分群众的"无谬误症"、"偏见癖"可能造成大的社会动荡。

负向舆论的增长过程也经历五个等级，或由第一级向第五级升涨，或由第五级向第一级消落，构成观察社会消极思想动向的晴雨表。

第一级：一些人对国家的法令、各种正确制度、方针政策、上级布置的工作态度冷漠，不感兴趣，产生不遵从行为；或者表面应付、服从，内心不满；对待社会号召、社会义务不积极响应。如果这些人也按照社会主导意见行动，只是为了避免惩罚不得不被迫服从，但行为表现为怠惰、不悦、迟缓，一旦缺少监督，就完全停止下来。"在表面服从状态中，内部信念和外部行为不

① 参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98页。

一致①。”这种人的数量如果逐渐增加，标志社会正确的主导意见尚未取得社会广泛的承认，社会在局部孕育着不安定的种子。

第二等级：社会出现牢骚，一些人在各种场合发出埋怨情绪，用简短、粗鲁、嘲弄的口吻指桑骂槐；或直接攻击，把矛头指向正确的主导意见。牢骚出现是人们不满情绪增长的结果。当人们的自我需要长期得不到满足，首先出现的外露情绪就是牢骚。牢骚已经形成低级的负向舆论，即潜意识负向舆论，社会的不安定情绪正在滋长。

第三等级：各地都有些人系统地发表各种错误意见，同时流言盛行，谣言控制着一部分人的言语行为，人心不安表面化。凡是文化素质不高、社会修养较低的人都对流言、谣言发生兴趣，很快作了“俘虏”。流言是一种绝妙的杀人武器，被击中者往往有口难言。因此，谣言飞短流长，涣散人心，破坏人际关系，使各单位的正常工作局面动荡不定。中国有句古话，流言止于智者，“不恐于诽，不诱于誉”。流言袭来，要安之若素，不为所惑。

第四等级：出现积极鼓吹负向舆论的人，他们集结力量，利用传播媒介发表似是而非的谬论，有组织地举行集会、会议、演说，公开发表错误观点，反对社会公认的正确主张和建议，这是一种普遍化的上层负向舆论。群众中的负向舆论在这一“级”表现为到处游说，公开反对正确的社会公论，甚至使用“大字报”煽动群众，毒化空气，以图激起人们的情绪，使社会安定的局面遭到破坏。大字报作为一种舆论形式，具有不可低估的煽动性和鼓动性。它既可以表达正确意见，也可以表达错误意见，大字报这种形式本身并不代表舆论的是非好坏。但大字报是“左”倾政治运动的产物，曾在50年代的“反右斗争”和十年内乱中成为诬

---

① （日）古畑和孝：《人际关系社会心理学》，南开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11页。

陷好人、扰乱人心的利器。当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围观群众就蜂涌而至，各种议论不胫而走，使攻击对象有口难辩，名誉扫地，许多贤能忠良死于非命。大字报惊人的“杀伤力”在负向舆论活动中具有万无一失的特效。

第五等级：蒙蔽或吸引众多的群众举行罢工、罢课、游行示威，出现社会动乱。组织这些活动的人提出错误的口号，在活动中肆意践踏法律，诉诸暴力行为，冲击国家机关，拦截或毁坏车辆、堵塞交通。其中犯罪分子混入其间，抢劫、盗窃、殴打执法人员。这是最高形态的负向舆论。一切行为舆论活动都应当受到法律的约束，负向行为舆论如果违背有关法规，要受到法治机关的干预。

第三节　舆论场对舆论形成的作用

舆论形成需要一定的“场”，我们用“场”的范式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舆论，就能认识舆论形成的途径。“场”不仅是舆论形成的条件，而且是推动舆论发展的契机。

每个人经常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却忽视自己存在的时空环境，由于后者的过失，往往在行动中造成差错。同这个简单的道理一样，不同时空环境决定着舆论的生成与发展，或强或弱地制约着它的正负方向，“场”，便成为舆论形成的共振板和宽敞的容器。

在此，我们仅举一例，就能生动说明人们的共同情绪和意见的波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场”的制导：

在剧场里如果有人惨叫一声“失火了！”就会出现一片混乱，往往同危险的程度极不相适应的混乱。这是由于突然一声的贼叫同任何突然事件一样，在短时间内使人们感到震惊，减弱了意识的活动，结果又是把全部门窗统统关闭，而留下一小通风口

开着，人们则通过恐怖的眼光从这个小通风口看到危险。然而下述情况更加强了效果：每个处于思想单一状态的人都在自己的周围看到惊慌的面孔、绝望的手势，结果每个人的恐慌程度即使不是像准确地看到算术演算按惊慌的人数而增加若干倍，至少也是大大增加了①。

这里，人们的惊慌、混乱取决于环境——剧场门窗关闭，一片漆黑，仅有一处小口射进的光线既加重了危险感，又增加了人们的求生欲望。各个惊慌的面孔相互感应，使空气都要爆炸。舆论的演变过程和上述剧场情绪的波动极其相似，正是在一定"场"的作用下，多种意志的合力才导致舆论的出现。

一、舆论场与意志合力

自然界的生物活动都在一定场中进行，包括他们释放的各种信息也在场的制约下呈现出奇妙的规律。鸟类在茫茫长空中万里迁徙的准确性，令人惊叹不已。青铜杜鹃能连续飞行6000公里定期找到离散的群体，大雁在严冬之后飞跃万里回到温暖的北方老家，这种长途迁移都是在宇宙场的磁力或诸如阳光位置的引导下进行的。没有场或场的因素，一切生物都无法遵循一定规则生存。

德国社会心理学家勒温总是用一个椭圆形封闭的曲线代表"心理场"，把它视作人的"生活空间"；文艺学家们也对场的理论着了迷，提出"审美场"的原理。"这种审美环境是作为'场'的形式存在并起作用，美的信息和审美场共同产生美感效应"②。更为神奇的是，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A.N.魏尼克拿出一个埃及金字塔形状的金属丝模型，让别人握住这个简单的构

---

① 《米哈依洛夫斯基全集》第2卷，1896年彼得堡版，第239页。

② 《艺术魅力的探寻》，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7页。

造物，按顺序作这一动作，逐渐手掌产生轻微的痛感，接着手掌内出现一种热波流动。有趣的是，建成金字塔式的蜂房对某些种类的微生物有强烈的刺激，甚至能抑制它们的生命活动。魏尼克认定，自然界、生物间的关系存在着时间场与物质场。

爱因斯坦最明白不过地解释了场的概念，他认为，场是被看作相互依存的现存事实的整体。社会中的人都是以整体的面貌在一定环境下生存，人们的共同意见必然是在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特殊场合下形成的。所谓舆论场，是指包含若干相互刺激因素，从而能使许多人形成共同意见的时空环境。无数个人要求，只有在一定场的作用下，经过多方面的交错、协调、组合，才能形成一致意见，舆论便成为这种场的产物。马克思指出："意识起初只是对周围的可感知的环境的一种意识，是对处于开始意识到自身的个人以外的其他人和其他物狭隘联系的一种意识。"① 舆论的社会场之所以存在，首先是由人类社会的结构决定的。在社会主义社会，每一个人都在社会阶梯上有他的位置，但处于同一阶梯并不只是他一个人，而是在他周围聚集着一个利害相关、联系较多的小社会。这些活蹦乱跳的人，在特殊时间里突然陷入容易引起思想共鸣的环境，就要产生思想的爆破力。场的刺激、烘托、容纳、怂恿作用，使这种带有爆破力的思想迅速传播，被多数人所接受。

震惊中外、成为中国当代思想转折点的"四五"事件，在特殊环境中——天安门广场上爆发，并促成声讨四人帮的舆论怒涛。因为天安门广场在当时具备舆论场的一切要素。宽阔壮观的广场，能容纳100万人，给数万人的抗议活动提供了视野开阔的空间。人民英雄纪念碑及周围雄伟的建筑物巍峨挺拔，显示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勇于反抗的斗争精神。这里总是红旗招展，金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5页。

碧辉煌，古建筑群层叠拥曜，气象万千。谁来到这里，精神不油然焕发，心潮起伏，为之一振。更为重要的是，当时英雄纪念碑下堆满了花圈，贴满了诗词，苍松翠柏上遍挂白花。睹物思人，读诗忧国，如泣如诉的哀号，渴求新生活的幽怨，使人们越加郁郁寡欢，悲恸难耐，怒气填膺。广场像一个大磁场，各种消息，一会儿把人们引向一方，聚集在一起，忽又被某个讲演者吸引到另一方，团团围在一起，呼着口号。人们渐渐觉醒，打破沉沦、恐怖的长夜，揭穿非驴非马的陈辞滥调，识破华而不实、初知皮毛的"专政理论"，决心推倒暗然失色的假社会主义的庙堂。多年被认为颠扑不破的"真理"消融了，长期遭到"四大"围剿的"无稽之谈"成为毋庸争辩的真理，这一切很快在全国形成了暴风骤雨般的"四五"舆论：

……

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

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

秦皇的封建社会一去不返了，

我们信仰马列主义，

让那些阉割马列主义的秀才们见鬼去吧！

我们要的是真正的马列主义，

为了真正的马列主义，

我们不怕抛头洒血，

四个现代化

我们一定要设酒重祭！

这一舆论推动了70年代末中国政局的重大变化，决定中国的今天与明天的命运，成为振兴中华的第一声号角，也是震撼当代中国社会的最强音。无须多言，天安门广场对这一舆论的形成发生了多么重大的作用！

"场本身具有物理的真实性。……在每一瞬间的相互作用

仅能发生在空间中的紧密相邻的各点间（直接作用）”[1]。这是物理学家们对重力场与引力场的精辟论断。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日趋交叉、融汇的80年代，用这一论断解释舆论场也是恰如其分的。只不过，舆论场各因素相互作用的复杂多变远远超过物质场罢了。构成舆论场的主要因素是同一空间的相邻因素的互相影响与感染。人们相互集结在一起，集结密度越大的地方，也就越能构成引起人们交流意见的条件。自古以来，集市、商场、庙会、团体、邦会、茶馆酒肆总是聚集着人群的场所，在这些地方许多人交流信息，畅谈共论，插科打诨，产生强烈的求知欲、沟通欲和满足欲。当人们经过交换消息和意见，取得相同见解时，面部的喜悦神情简直无法形容。这样，一定社会场合就成为强烈吸引人们形成一致意见的“吸盘”。据本书作者考察，北京的四合院要比高层住宅更容易形成舆论。四合院或处在幽静深巷，或面向繁华大街，青瓦生辉，院院相连，形成一片片心理融洽的居住环境。人们在这样的空间生活，十几户共居一处，每日相逢。夏夜纳凉闲聊，冬日同生火炉，密切交往产生一种凝聚力与合谐气氛。这种过从甚密自幼年开始，延续几代人。人们不分彼此，无话不谈，常常对社会问题形成一致态度。那些被现代化建设扒掉四合院、住进高楼的街房邻居们，在失去破败的秦砖汉瓦寓所的同时，也失去了如胶似漆的来往。人们搬进封闭式的套间，各走自己的门，相互沟通的机会减少了，人际关系松散了，往昔抵掌而谈、舌无留言、谈天说地的舆论环境也被彻底破坏了。

在那些允许随便串车间、串办公室闲聊的单位，人们的谈锋颇盛，口舌生风的人就时时大显身手。周围稍有变故，人们就自动凑在一起谈论起来，兴致勃勃，数日不衰。同样，在这些单位

---

① Л.Д.朗道、E.M.栗弗希兹：《场论》，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50页。

的群体中，流言蜚语也时起时落，杯弓蛇影，不胫而走。因为这样的单位，人们的相邻密度增大，活动空间的共栖状态加强，舆论场使每个人产生了“感染心理”和“趋同心理”。

集中的人群在统一的“场内”互相感应，互相传染，舆论就在同一时空中通过无数个体意志的“合力”而出现。舆论场的广阔与狭小，开放与封闭又决定意志合力的大小，那么，舆论场空间范围、开放程度及意志合力的互动，便成为舆论场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恩格斯以历史发展的结果为例，曾揭示出社会是以人的合力意志不断前进的，“各个人的意志——其中的每一个都希望得到他的体质和外部的、终归是经济的情况（或是他个人的，或是一般社会性的）使他向往的东西——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的。”① 社会环境越开放，和外部世界的信息联系越全面、深刻，人们也就越容易获得对整个社会真实情况的认识。这样，客观世界的真相一旦被人们所把握，就要把更多的人的意志引到同一个方向，形成更大的意志合力，产生广泛的社会舆论。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们个人意志的相互交错、相互影响产生的一致意见，同样是在舆论场内通过意志合力实现的。但从整体上看，社会主义制度基本消除了人们利益间的根本对立，一定舆论场内很容易形成意志合力，促进舆论的快速形成。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指导下，人们的个人意志大都具有同一方向，人际关系基本处于团结相融状态，大多数舆论场中个体意志的相互作用不是以冲突、而是以相互合谐的形式出现。那么，无数个体意志必然能够汇成一个大的合力，不管各种舆论场多么复杂纷繁，产生的社会主导舆论只能是符合绝大多数人意志的舆论。但这并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8页。

排除，也不可能避免在封闭性的舆论场的作用下，出现违反社会总体合力的舆论——少数人合力构成的各种负向舆论。

比如说，在高等学校，学生们每天接受无穷无尽的知识，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对各种社会问题极其敏感。任何一所大学都是人员高度密集的地方，一间宿舍上下两层铺，容纳4—8人，50平方米的教室通常容纳30至50人；食堂、礼堂、校内甬道、操场，总是人头济济，群体聚集，随时有人研讨社会问题，纵论国家大事。大学生们勤学苦读，求知心切，各类观点的学者常常登台谈经论道，任何新思想、新观念都可能使社会经验不足的年轻人趋之若鹜，奉为至宝。大学毕竟是个方圆数平方里的小社会，校墙把它和大社会隔开，舆论场的狭小和信息的单一流向，使学生们缺少了解社会整体动向的机会，这里在大量出现正向舆论的同时，也容易产生负向舆论，一部分学生甚至采取行为舆论的方式涌向街头。研究南斯拉夫的外国学者认为，大学是地震仪，可以测出各种不同的政见，如卢布尔雅那的“新左派”，民族主义者，几代人的冲突，“特别影响学生的是大学生过于拥挤，住房条件差，奖学金额太少，尤其是年轻的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机会有限”。① 大学校园这种舆论场，不仅人口密度大，而且具有一定的封闭性，社会稍有动荡，就容易引起舆论大哗，校园顿时变成一锅沸腾的开水。

再比如，少数思想不轨的人常聚集在偏僻、狭窄的地方妄说时政，发牢骚，周围一切总是乱糟糟的，这种社会场更加刺激他们的不安和烦燥情绪。由于他们的活动处于机密状态，属于封闭型，狭小、闭塞的舆论场使他们对社会的健康因素不屑一顾，态度轻浮放荡，抱有一种虚幻的强大感。于是首领们在每次集会中的讲话总是自鸣得意，口出狂言，制造各种荒诞的舆论。

---

① 《南斯拉夫的实验》第309页，第323页。

舆论场环境的诱惑力，是舆论场不可缺少的要素，它有时决定舆论提前形成或出现快速蔓延的趋势。一定场合悬挂的彩色气球，凌空飘荡的标语，和平鸽一起飞向天空，旌旗蔽日，战歌嘹亮，金鼓齐鸣，人们一齐高呼口号，对演说者的讲话不断报以热烈掌声，组织各界人士连续激昂地发言表态；制造紧张压抑气氛，让受害者声泪俱下地介绍痛苦遭遇，把许多群众带到"事故"现场，举办琳琅满目的展览会……等等。凡属显示强烈、鲜明、显赫情态的实物、地理条件、环境气氛都是构成舆论场内不可忽视的力。场所、渲染物态和人的鼓动行为是舆论场的三大因素，它们耦拢舆论场内相互作用的合力加速形成。而在因素与作用之间并非有明显的界限，它们的交错、互补、互济是同时发生的，人们很难把他们分开，因为"因素是指那些互相作用，形成一个特定的局面的那些要素。作用力是指在一个典型环境中起作用的那些典型因素"①。

人类社会具备舆论场先天条件的，当然是那些人群熙攘的城镇。追溯历史，一切重大舆论都是在城镇中形成的，因为城镇，特别是当代的大城市提供了千千万万个无法计数的舆论场。我国的城市在改革的九年中已增加了原有的三分之一，达到381座，百万人的大城市相继出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舆论在80年代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发达，这和城镇的不断涌现有一定关系。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果实，这里集合着众多的人口，街道、建筑物、各种集会场所、交通工具、通讯工具、经济部门、文化事业单位、社会管理机构，成为思想与情感、个人与公众利益、社会问题与各种社会组织的整体。各种政党与传播工具的相互借助，各类学者名流与抛头露面的舆论领袖的广泛行踪，使任何伟大的见解都首先由城市提出来并迅速扩散四方，形成受到全国普遍支持的

① R.E.帕克：《城市社会学》，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40页。

意见。城市机体内部到处充满舆论场的机制。在古代，社会和各种政治势力都把城镇视作酿成舆论的天然场所。公元前79年被维苏威火山爆发埋在地下的古罗马庞贝城就是一个大舆论场。全城当时人口约有2万，市中心有一个可观的公共会堂，各种集会、交易在这里举行。还有一座体育馆、两座共容纳7 500人的一大一小的剧场。在城的另一端，有一处有2万个座位的角斗圆形技场，人们除了在这里观赏惊心动魄的表演，各政治集团还随时在此交流意见，滋扰生事或发生殴斗。城中设有三个公共浴馆和许多祭祠的庙宇，已发现的街头广告有3 000份，大多是公共通告和商业消息。3 000多年前这个仅有2万人口的小城市竟然有这么多的公共设施，实在令人叹为观止。古罗马所有的城市都如同庞贝城一样建有星罗棋布的集会场所，在这些公共设施中随时进行政治辩论，传达战争消息，议论罗马帝国内征外战的伟绩。正是这种城市公共生活孕育着舆论的繁荣，铸造了伟大的罗马精神。

我国的当代城市注意广场、运动场、各种馆堂厅园的建设，这里往往是社会舆论的集结点或形成的起点。在这些地方，政治力量、文化、环境生态力量的交合与失调构成舆论的机缘。人们借助交通工具和通讯工具经常集中在一起，融合为整体，习惯用“我们”表达整体的共同生活目标，“这种说法中包含有共同的情感和共同的意识，我们就是这种情感和意识的自然表现”①。在这些城市里，人口进出频繁，各种集会不断，信息交流日益聚增。就北京市统计，常住的983万人口平均每天每人出行1.61次，还有来自全国几十万以至近百万人口到这里开会、旅游、传授知识、学习经验、经商。人们在频繁快速流动中不断接受新的信息，许多团体、朋友、亲属或同学、同事聚集会晤，参与各种集会与协商。每个组织、每个人都在城市的大小舆论场内按照一

① 〔美〕查尔斯·霍顿·库利：《社会组织》，纽约1909年，第15页。

定方向，不断引起个人对周围环境中某些事态的反应，相互表达自己的愿望，力求意见一致。新的舆论就在各城市的人口流动与聚会中不断形成。

就全国而言，重大舆论究竟在哪个城市首先产生，是不均衡的，正像海淀区是北京市人际舆论的多发区一样，政治、文化、科学技术、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城市就具有迥然不同的舆论场因素。政治、文化、经济高度集中，交通发达的城市往往成为全国的舆论中心。所谓舆论中心，是指舆论产生、形成的中心地带，共同意见在这里表现得最鲜明、最强烈，并向四处扩散，成为某种舆论的发源地。舆论中心不是绝对的，处于政治中心地位的城市可能成为政治舆论中心，以文化为中心的城市就可能成为文化、民事或政治舆论的中心，经济繁荣的城市就可能成为经济舆论的中心。有时，某一重大事件发生，哪个地方形成的意见最系统、最热烈、最具有吸引力，也就成为舆论中心。舆论中心在全国意见流向中处于领导地位，如果全国民意一旦形成，舆论中心就成为大舆论场的“集散地”。

重大舆论由舆论中心向四处扩展，首先流向周围的小城镇，然后深入广大农村。而流动人口与新闻媒介的广泛宣传是舆论扩散的主要渠道。北京市每天流动人口大约在50万至100万，全国重要的新闻媒介都集中在这里，北京发生的事件、讨论的意见很快就能传播到全国，演变成全国舆论。搞活经济、横向联系的发展，使人口出现空前大流动的状态。仅浙江温州一地每年有40万人单帮结队撒向全国，而江苏省单是奔向西北各省的劳动力就有40余万。八年前铁路客流量并没有告急，如今的客车增开一倍，各次列车仍处于人满为患的紧张状态。南来北往的流动人口随时把各种意见带到全国，使中心城市处于各种舆论的爆发点与交汇点，那么，中心城市对全国思潮形成的战略地位在四化建设中也就越来越显著。这样一来，大城市的动态或局势的稳定或动乱，

很容易在全国引起不同程度的相似反应。努力维护中心城市的舆论平稳，是稳定全国人心、全国政局的支点。

二、作为舆论场主体的人

舆论的形成离不开舆论场，而在舆论场处于核心地位的，却是人。舆论场诸因素只有作用于人的活动，才能形成舆论。但人又总是依赖环境，缺少舆论场，人的主体地位也无法体现出来。

意大利诗人但丁说过，白松的种子掉进英国的石头缝里，它只会长出一棵很矮的小树，但要是被种在南方肥沃的土地里，它就能长成一棵大树。环境的制约对植物和人同样重要。人，只有在舆论场因素的作用下，才能以共同的言语或行为形成社会整体，积极从事舆论活动，实现自己的主体能动性。社会主义制度为人类在自然界、社会历史任务面前发挥主动性创造了条件，人们在任何场合都应当真实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聪明才智，这样，只要具有一定舆论场的作用，形成一致意见的人，就能组合成坚强的社会集体。社会主义制度应当使“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①。在当代中国，经济体制以公有制为主体，兼有其他有利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产权方式，不断增进人民群众的共同利益，加强了劳动者直接占有生产资料的联系。这样，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决定了人民是社会的主人，并具有更大的社会整体性，在同一舆论场中很容易形成统一的意志。

我们研究社会主义社会中舆论场主体的人，既不能离开个体来谈论整体，也不应当离开社会整体来单独研究个体。作为舆论场主体的人除了具有整体性而外，也有部分游离性，即不是所有的人在场的作用下都从事相同的舆论活动。在“四五”运动中，到过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41页。

天安门广场的人并不都参与反对“四人帮”的舆论斗争，“场”对这些人并没产生巨大的影响。

西德哲学家G.科纳普也从整体性来研究人，但他把“人的存在”和“人的生命”作为考察的前提，把领悟性、暂时性和有限性看作人整体性的本质特征，这是一种肤浅的、非本质的探索。但是，他在论述过程中却提出了值得借鉴的分析方法。领悟性使人的思维具有开放和自由的可能，这种可能同生命本身一样，又具有一定局限，这样，个人的一切愿望和追求都是有限的。在舆论场中，多数相聚一起的人正是要通过有限的可能性实现无限的愿望，面临共同问题，自觉地结合成统一的舆论主体，以便能对共同问题作出全面的解释。

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①人们在社会交往中必然建立紧密的联系，这种联系主要体现在具有共同利害的社会活动中，这就使它们在遇到同一类问题时产生相互靠拢、相互吸引的意见。就每个人而论，都在追求实践活动，要求实现自己的激情和冲动，因为“激情和热情是人强烈要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②。人们是否对他的实际活动抱有积极性和主动性，是他看到能否在活动中满足自己的需要和利益的结果。当具有共同利益的人一旦看清这种需要必须通过表达共同意见去争取，就会在一定舆论场的作用下，形成这种意见。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的初级阶段论，早在几年前就被某些理论工作者所提出，因为这不仅反映了中国的国情，更主要地是反映了这几年人们改革所追求的目标和激情。整个中国既是改革的实验场，又是个大舆论场，人们在改革实践中碰到许多问题，发表各种各样的见解，既有胜利的欢乐，也有遭受失误的阵痛。人们逐步认识到，中国既不能倒退，回到半封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9页。

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也不能急于求成、急于求纯，一步登天。制定一切决策，思考一切问题要从我国当前仅仅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国情出发。初级阶段论，从根本上说，是全国人民认识共同利益，有效地谋求这种利益在当代中国这个大舆论场中形成的全国舆论。

马克思说："主体是人"①。但单独一个人却很难成为社会舆论的主体，只有多数人融汇为一个整体，才能成为共同意识的整体。舆论的形成正是在个体与整体相融、个体逐渐汇成集合意识的过程中完成的。

舆论的内在联系，揭示了舆论这种社会整体认识是在舆论场的作用下形成的集合意识，它打破了个人或少数人对社会事件认识的狭窄性，使人们能够用整体的智慧、整体的经验，观察和认识空间广阔的大型事件、民族性问题，社会性问题和全球性问题。由于舆论容纳了无数个人的优秀见解，继承了前人的认识结晶，超越了个人认识的局限、肤浅、荒谬、冲动和轻率，从而对公众事务形成较为完整、全面、深刻、稳妥的裁决。个人在这种集合意识中活动，"不仅意识到自己作为个体的行动，而且也意识到自己作为群体的行动，共同活动，一起争取实现预定的目标"②。所以，个人总是要借助舆论的集合意识表现个体的愿望和力量，这正是某些舆论对人具有巨大吸引力，使之踊跃加入这种舆论活动的伟大动力所在。

人在社会中生活，每时每刻都要和外界发生联系，个体意识一旦介入社会交往，必然要受他人思想倾向的影响。就一般来说，他日常说话的标准总是以多数人的说法为参照物，尽量和大家形成共同的语言，正如苏格拉底所说：在"闹声回声互助声势"的场合下，任何个人的"劝导很难站得住、不被众人的指责或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63页。

赞许的洪流卷走”①。个体始终是社会群体的一分子，隶属于各种社会组织，一切社会集体使个人认识到如何思想、如何发表见解，才能使个人完美地融合在一定社会关系中。人们通过语言、情感交流，直接或间接对社会问题进行相互反射，并根据个人和多数人的需要不断调整自己的态度，形成一个多数人能够接受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集合意识，这就是舆论。很明显，这种集合意识来源于人的“社会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指出：“个人所享有的形式的主观自由在于，对普遍事物具有他特有的判断、意见和建议，并予以表达。这种自由集合地表现为我们称的公共舆论”②

在舆论场的作用下，个人意识渐渐失去独立性，一致的态度一旦形成，个人只是作为发表社会意见的行为主体，而不是发表个人意见的主体。个人意识完全溶化在集合意识中，成为当中一个细小的部分，任何一句话都具有公共意见的性质。这种集合意识是无数个体意识消除了差异、对立、杂质的结晶体，每个从事舆论活动的人都供认这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思想”，同时也是“我”自己的思想。

然而，舆论的集合意识不可能脱离个人主体的活动，没有人的个体意识就不可能有集合意识。在一定环境下，个人意识强烈地制约或推动集合意识发生变化。当某个社会问题引起人们的关注，首先有若干个人产生新的见解，个体意识经过新的传播、交融和互补，逐渐产生新的集合意识、即新的舆论。“观念只是通过传达、通过人与人谈话而产生的。人们获得概念和一般理性并不是单独做到的，而只是靠你我相互做到的。”③我们回顾一下

① 参见《理想国》，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41页。

② 《法哲学原理》，第331页。

③ 康德：《实用人类学》，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186页。

康德关于谈话的一般过程是非常有趣的，当然，康德所说的谈话，是资本主义上流社会的盛宴聚议，但它却能给我们研究舆论主体的活动提供宝贵的启示。他写道：

在一个盛宴上，谈话通常都经历了三个阶段：（1）讲述，（2）嘲骂和（3）戏谑：A、当天新闻，先是本地的，然后也有外地的，通过私人通信和报纸而传来的新闻；B、当这种最初的兴致被满足后，宴会就变得热烈起来，因为对同一个被引上路的话题，各人根据玄想所作的评价不可避免地是有分歧的，但每个人恰好都不认为自己的评价是最不足道的意见，这样就产生出一种争论，……

……（a）选择一个使大家感兴趣、并总引起某人作适当补充的话题，（b）不要出现僵住的沉默，而只能在谈话中有简短的休息，（c）如无必要不要改变话题，也不要从一个内容跳到另一个内容。……在过渡到另一个话题之前，必须差不多穷尽了一个有兴致的话题的底蕴，而在谈话卡壳的时候，则必须懂得试着把另一个与此相关的话题以不易觉察的方式引入交谈，这样，社交中的某个唯一的人就能不被察觉和不遭嫉妒地接到谈话的领导者的角色。（d）不要让自己的社交中的朋友们的固执己见产生和继续下去，因为这样交谈与其说是一种事务，不如说只应当是一种游戏，应当通过一种适当插入的戏谑而将那种仍然无法避免的严肃的争吵中把自己和自己的激情小心地保持在原则范围内，以便总是表现出相互尊重和友爱。在这里重要的与其说是谈话的内容，不如说是谈话的声调（它必须不是大声叫嚷或傲慢自大的），这样，就会没有一个客人带着与另一个客人的不和而回到家里①。

---

① 康德：《实用人类学》，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186页。

康德的“谈话法”，实际上阐明在一定场合（例如宴会上）个人意志如何发表见解，争得他人的赞成而取得一致意见，最后形成“没有一个客人带着与另一个客人的不和而回到家里”的皆大欢喜的局面。这标志，谈话取得了成功。在舆论场内，人们的交谈方式是个人意志转化为集合意识的重要因素。作为舆论主体的人，特别是那些提出高明意见的人，善于寻找话题，从传播新闻或寻问新闻开始，把话题引向深入。态度应当谦和，充满说服的声调，当他人不赞成自己的意见，不要破坏和谐气氛，而要插入轻松、婉转的内容引导人们深入认识自己的“原则”。这种谈话可以适用广泛的社会讨论和几方协商活动，使个人意见顺畅地转化为大家的一致意见。在这种个人意志巧妙的运用中，实现了激情的普遍化，意识的同一化，具有相同集合意识的人也就转化为舆论主体。

个体意志在一定环境中相互作用所遵循的模式，由于有小环境和大环境，即有小舆论场和大舆论场之分，并不完全一样。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这些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众领袖是以当代中国的大环境作为舆论场的，他们时刻把握全国人民的意志和愿望，驾驭历史的潮流。只有当他们的意志和人民的意志结合在一起，不断提出统一人民意见的伟大见解时，他们才能汇入人民群众的强大舆论主体。这时，他们发表意见，辩才无碍，巧发奇中，语惊四座，诲人不倦。他们不仅借助谈话、到各地视察，而且广泛通过新闻媒介使自己的声音传向四方。新闻工具使领导人的正确意见在群众中产生吸引力，延伸着国家观念，使无数个体意志由多向回旋状态逐渐趋向统一。群众领袖把握个体与局部意识动向，是洞悉亿万人民的整体意志、引导人们形成集合意识的基础。

在小舆论环境中，完全呈现出另一种情状。每个满怀激情的人就和康德提出的宴会聚议十分相似，谁说什么，为什么而说，

都明确地显露出来，小群体舆论也就容易通过相互交谈很快形成。小环境下人的整体意志无时无刻不在出现，若干人相互交谈，窃窃私语，就形成了社会的局部舆论。少数顽强表现主体个性的人越是在小舆论场内，也就越容易集结，并促成一致的言语行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小的整体在更大整体意志的制约与影响下，总是服从更大主体的活动，人们不断冲破局部舆论场的界限使少数人溶入多数人的更大整体意志，形成广泛的社会舆论。因此，小群体舆论虽然层出不穷，但它始终受社会整体舆论的支配。

三、舆论形成的诱因——社会问题

《美洲华侨日报》1987年10月3日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披露了一桩发生在国内的事件：

> 成都市14岁女学生张歆黔7月4日在游泳池溺水因无人抢救而终遭溺毙的事件引起了一阵“强烈反响”。
>
> 从较宏观的角度来看，这似乎并非就只是一个“向钱看”的问题，遇到什么事件都推诿成“向钱看”，这本身就反映出一种官僚主义式的作风与习惯。即使在美国如此盛行于“向钱看”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溺水救人之事仍是较为普遍的，可见这并非仅只是一个直接涉及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而是一个有某种社会规律影响的社会问题。

文章说，近来国内“舆论界不断强调到了公元2000年或2030年国民人均收入将达到若干若干元，给一种现代化就只等于是收入增加、生活改善的印象，自然会鼓动‘向钱看’之风。然而靠国民人均收入来判断一个国家的进步，就像用金钱作为判断一个人的标准一样，那时，人的人格、精神面貌，待人的方式与态度以及社会上的人际关系、财富的分配关系等等，就只能以金钱作

为度量的标准了，人们往往忽视了社会上一些不能直接以金钱度量的问题与事物”。这位关心祖国命运的海外游子，回国观光，暂留数日，通过14岁女孩溺水无人搭救的偶然事件，看到了国内的一个社会问题。在他看来，这一引起“强烈反响”的事件表明道德水准的下降是和国内舆论界的宣传有关的。

这一事件后来被证实，而且也确实引起国内舆论的反响。诸如此类“见死不救”的事件并非这一起，几年来，各地屡屡发生，并略有报道，确实成为一种社会问题。这一事件还向人们确证，社会问题是引起舆论的诱因。

当然，引起舆论的根本原因是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冲突，但不能把造成舆论的直接原因归结为人们的利益要求。如果把人的利益追求视作舆论的诱因，那么具有不同利益的人们对任何社会事务都要形成对立的舆论，但实际并非如此。社会舆论往往是由社会重大变动引起的，主要表现为社会事变和社会问题。社会突发事件、行政官员的重大错误言行、某人的不幸遭遇、周围的人——特别是知名人士的不良道德行为、长期解决不好的公众事务，才可能直接引起社会舆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触发舆论的大量诱因不再是社会事变，而是社会问题。

社会问题是舆论的诱因，重大社会舆论是由重大社会问题引起的，这是中国当代社会舆论产生的主要由头。在舆论场中，我们虽然并不能直接观察到社会问题的存在，但由于人们生活在共同社会中，社会问题便成为作用于人们思想意识的巨大引力。

究竟什么是社会问题？不同学者有不同的回答，不同社会科学领域又有不同的含义。一般人则把社会上许多事务都列入社会问题。如果把人们对这一问题的答案列举出来，简直多得不可计数。美国社会学家斯密等人在1956年编的《社会问题》一书中，把社会问题分为16类：1.人口问题；2.人力与劳力问题；3.老年问题；4.残废与病患；5.成人与少年犯罪问题；6.乡村问

题；7.都市问题；8.家庭问题；9.经济问题；10.工业与劳工问题；11.教育问题；12.政府与政治问题；13.卫生与医药服务问题；14.少数民族与种族问题；15.起于文化接触的问题；16.国际关系问题。照这样分法，社会问题还可以列出几十类，可见，没有多少科学性。我国有人把国内目前的社会问题分为七个方面，这种分法的准确性也令人怀疑：

1.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

2.人的分类问题

3.社会关系问题

4.社会生活问题

5.社会风尚问题

6.社会病态问题

7.区域性的社会问题。①

社会问题是社会矛盾运动发生障碍，引起人们普遍关心的事件、冲突和异变，而不是社会客观存在的各种事务。如果把社会各种现状、事实、关系通称为社会问题，社会问题就要成千上万，都成了社会问题，也就不存在社会问题。可见，社会问题应当是一种特殊社会现象。

社会问题是社会矛盾，但不是所有的社会矛盾都是社会问题。在社会中，到处充满了矛盾，有主要矛盾也有次要矛盾，各种事物的差异，各种事物的变化，人们活动所遇到的种种困难，接连不断的自然灾害，都不能一概称为社会问题。只有当社会矛盾不能正常解决、被人为阻隔而发生意外突变，并以具体事件、冲突和变异的形式表现出来，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到处议论不休，才构成真正的社会问题。社会问题迫使社会管理部门不得不重视，不得不着手解决它。社会矛盾虽然存在，但在发展、解决中也未遇到障碍，就不会引起人们的特别注目，这就不可能成为

① 《社会学简论》，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384页。

什么社会问题。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所长郑杭生教授等人编写的《社会学概论新编》一书认为，“社会问题就是社会关系或社会环境失调，影响社会全体成员或部分成员的共同生活，破坏社会正常运行，妨碍社会协调发展的社会现象”。①

以上研究至少揭示出，社会问题具备四个要素：一是，社会事务受阻，陷入非正常发展状态；二是，这种受阻是以具体事件、冲突和异变形式表现出来的，因此它是有形的矛盾纠葛，而不是一般矛盾的平缓状态；三是，这种矛盾纠葛引起人们的关切和议论，不断有人发出要求解决这些纠葛的呼声；四是，这种纠葛和呼声不仅发生在社会局部，甚至成为社会的普遍要求，波及到整个社会。社会问题的这四种要素已经表明，社会问题必然要引起舆论，并呈现出“议论纷纷”的社会意识状态。

在社会主义社会，社会制度的自我调解和自我完善功能使许多社会矛盾可以避开尖锐的冲突而找到合理解决的途径。但是由于物质生产发展水平和不同群体认识能力的限制，并不是一切矛盾都能得到完善、彻底的解决，这就要产生社会问题。比如，滥砍盗伐问题、人口问题、乱占耕地问题、物价问题、文盲问题、犯罪问题等，由于法规不健全、官僚主义作祟，措施不得力或部分群众目无法纪，使涉及这些问题的矛盾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些不正常现象在一定时期内发展到严重地步，就成为人民群众意见很大的社会问题，由此引发的许多具体事件和冲突经常激起人们的议论，成为上下层舆论的重要内容。

社会问题必然产生舆论，重要舆论是重大社会问题的反映，二者的一致性制约着客观辩证法和主观辩证法的统一。总括来说，在我国引起普遍舆论的社会问题一共有四类，人们议论的重要事件、冲突与变异，都来自这四类矛盾的曲折复杂和解决过程中的波折。

---

① 《社会学概论新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62页。

第一，日益增长的社会生活需要和生产力不发达的矛盾，在解决过程中必然遇到各种障碍，产生许多供求矛盾问题。在当代中国，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经济各领域很难保持协调发展，协调总是暂时的，相对的，这就要出现生产、分配、消费的各种不平衡，使供求关系发生失调。这种不平衡在初级阶段是不可避免的，我国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很快满足人民的各方面需要，这是引起各种舆论的主要原因。在初级阶段，人们议论较多的物价问题，市场供不应求问题，知识分子和干部的工资报酬问题，原材料短缺问题，能源不足问题，将长期成为全国舆论的主要内容。在80年代，生产虽然有很大的发展，但人们的收入和消费水平差别悬殊，使许多人有一种失落感。有时对发展生产强调得不够，而把商品流通抬到比生产更重要的地位，使少量产品在市场上多次倒手加价流通，少数人大获其利，而国家与广大消费者只有支付更多的钱才能提高生活水平。这种矛盾"障碍"使经济改革出现一些社会问题，引起人们的广泛议论，由此，在群众中形成各种截然不同的舆论。比如：

在工人中流传的顺口溜是：

老大靠了边，老二分了田，

老九上了天，不三不四赚了钱。

在知识分子中流传的顺口溜是：

工人乐，农民笑，

知识分子光着屁股坐花轿。

在农民中流传的顺口溜是：

经商住洋楼，

菜农嘴流油，

粮农吃饱肚子不发愁。

这些偏执的舆论从不同角度反映了生产发展和需要之间的矛盾变化所遇到的坎坷，但有一点是大家公认的，改革的成功使人

们均有受益。不管舆论如何，大体上反映了各方面利益关系和分配关系正在发生良性的变化，新的合理的利益结构正在趋于形成。这些深层次的变动不会一帆风顺，自然要酿成许多社会问题，引起人们的关切和议论。

第二，由于社会主义社会民主水平不高，政治体制不完善，旧制度的恶劣影响还很难在国家机构中完全消除，人民群众的社会权利时时受到侵害。压制民主、打击迫害善良的公民、少数人的破坏活动有时致使发生某些局部混乱，产生一些社会政治问题。尽管这类事件不是大量的发生，但它的社会影响很大，往往由此引起强烈的舆论波。

我们把生产力不发展和人民需要之间的矛盾纠葛看作是造成主要社会问题的根本原因，即经济原因，但并不排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会发生政治问题和政治舆论。恰恰相反，由于落后的经济基础和封建残余思想的束缚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可能在局部泛滥，使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活中存在的不健康倾向在短时期内不能很好解决，社会政治生活在某些方面处于非正常状态，由此产生的政治问题必然引起各界人士的议论，形成广泛的舆论。直接寻找政治问题的根源，要穿过许多曲折的小径才能看出它和经济现象的联系，但最终能够确认，政治问题和政治舆论既是独立的上层建筑问题，又都源于经济状况。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繁荣、政治气氛也就安定和谐，政治舆论就更趋于平稳。反之，政治局势就走向动荡与恶化。当然，人类的社会生存不仅表现为经济需要和政治需要，还表现为各种安全需要。当犯罪活动猖獗、生态平衡遭到破坏，犯罪率增加、环境污染也要成为社会问题，引起舆论的重视。安全需要得不到保障所产生的社会问题和舆论，既可能来源于经济因素，也可能来自政治因素。

第三，社会风尚的状况，是形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问题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和表现，出现社会风气问题。由风气好坏产生

的事件、冲突与异变也经常引起人们的广泛议论。党风是社会风气的核心，党风的污洁决定着社会风气的优劣，那么党风更是社会舆论注目的中心。

社会风气又称民风，早在古代就引起政治家们的高度重视。一个国家或一个时代，歪风盛行，陋习泛滥，是社会安定的大疾。据《礼记、王制》中记载，古代帝王经常“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通过民歌“观风俗，知得失”，用以保持政治清明，净化社会。任何社会风气都不是个人行为，而是社会普遍传承的风尚和喜好，它和社会制度、社会道德、社会理想紧密联系在一起。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的确立，能够不断清除没落腐朽的生活方式和精神信仰对人们的毒化，但旧制度遗留下来的陈风陋习，依然在某些人身上顽强地表现出来。党风和社会风气的病态不是社会主义本身的产物，而是背离社会主义思想原则的污垢。因此，社会风气、党风不良出现的各种事件、冲突，必然激起人们的愤满，演变成强烈的舆论。正如十三大报告中所说：“现在广大群众议论多，意见大的，是少数党员特别是某些领导干部以权谋私，损害群众利益，干扰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败坏党的声誉。这是特别需要高度重视和认真解决的严重问题。”

败坏民风、党风的事件被揭露，不仅在它发生的地方，而且要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激起社会公愤。贵州某县政法委员会书记年满60周岁时，竟向县政法系统、县级机关干部和街道群众告知“大摆祝寿宴”的活动，本人还向县委、县政府的领导干部发出邀请。祝寿这天热闹非凡，大街上鞭炮骤起，簇拥着“光明磊落”、“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的大幅寿匾的队伍和捧着寿礼的人群，朝县公安局大门涌入。公安局干部忙着为书记收礼、登记、保管钱物。鞭炮从中午响到傍晚，摆席90多桌，送礼赴宴的达700多人。这位书记受到群众如此拥戴，莫非为群众做了大好事？其实不然，他全家有三人在公安局负责管理

户口、边境通行证、消防和法纪工作，谁敢不来捧场！事情发生后，当地群众愤然写信告发，报纸登后，又成为各地群众的谈资话柄。当记者询问这位书记时，他竟然出人意料地反问：究竟是民愤大，还是风俗习惯大？

风气沦丧、道德堕落是旧思想残余在民风、党风中的反映；历代君王及其富豪之辈“好酒淫乐，嬖于妇人”，“钱到公事办，火到猪头烂”，往往激起民怨。助人为乐，四有五爱，是社会主义好民风、好党风的规范，群众对为人民鞠躬尽瘁的好干部、好公民无不歌颂赞扬，夸口不绝。焦裕禄为民沥尽肝胆，他的逝讯使全县农民为之悲恸，他的事迹受到全国人民的赞佩。这种舆论，歌颂了崇高的理想，赞美了纯洁的心灵和忠于人民的品德，促进了社会主义两个文明的建设。

在落后、愚昧、没有文化的社会环境中，谣言中伤，流言诽谤，大惊小怪、尖嘴薄舌也成为一种不良风气。兴风作浪胜过息事宁人，危言耸听、巧舌如簧压倒言必有据、言必有中，舆论较多地呈现出流风涌动状态。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盲、科盲大量存在，精神文明素质不高，落后意识占据一定市场。在某些局部环境正气常常遭到抨击、毁誉，邪气却时而受到捧场喝彩，这是社会舆论不稳态的重要根源之一。列宁深刻指出：“文盲是站在政治之外的，必须先教他们识字。不识字就不能有政治，不识字只能有流言蜚语、传闻偏见，而没有政治。”① 文盲较多、缺少现代意识的群体，总是对流言蜚语、小道消息产生浓厚的兴趣，由于缺少对政治的充分了解，他们扭曲着视线观察一切，把对趣闻隐私的议论当作精神生活的重要作料。这种风气一旦在某个单位盛行，也就愈加助长歪风，涣散人们的意志。

第四，重大自然灾害或人为造成的灾害也构成严重的社会发展障碍，成为社会灾害问题。这种灾害一多，又不能有效地防止

① 《列宁全集》第33卷，第59页。

或战胜它，就要引起舆论大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前期和中期，科学技术和物质力量积蓄的能力尚不能完全抵御自然灾害的侵袭，重大灾害一旦降临，就要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灾祸施暴，蒙难遇险，或搏击汪洋泽国，或清理车祸现场，人们在抢险救灾中形成各种舆论。

当人为原因造成灾害，玩忽职守的官僚主义立刻成为众矢之地。天怒人怨，公论是非，纷纷扬扬。刍荛之言，迂阔之论，夹杂相出，形成人谈物议的舆论势态。领导失误造成灾害激起更多的是义愤，舆论总是向社会管理机构发出警告：不能用“付学费”以谢天下。

第二章　舆论、权力、民主——上层建筑的三个轴心

权力是社会运转的中心，因为权力能驱使一切，调动一切，指挥一切。自古以来，人们都在社会权力的制约下从事社会活动，只不过在不同历史时代权力的性质和表现形式不同罢了。

西方学者惊奇地发现，权力在当代往往失去威严的效力，因为庞大的新技术群、信息量的膨胀、管理工作的庞杂，使那些权力集中于一人或少数高贵人物的地方出现了混乱。“污染、腐化、通货膨胀、疏远，孤独、官僚主义、离婚、愚蠢的消费者第一，都凶猛地袭来”①，财政体制可能崩溃，价值观念和市场结构产生裂变，能源体系和家庭制度动摇。阿尔温·托夫勒发出警告：“自动化不仅不会拉紧官僚体制套在文明上的绳索，以致比以前更紧地束缚文明的发展，恰恰相反，自动化会导致官僚体制的崩溃。”②权力在西方面临着危机。

任何社会都需要权力，但权力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和西方的命运截然不同，虽然它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权力的过分集中，现代化决策的矩阵式结构，使社会权力需要新的组合，新的运行方式。

---

① 《第三次浪潮》，三联书店出版，1984年版第434页。

② 《未来的震荡》，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4页。

只有它更接近群众，更接近实际，人民才能以丰富的经验、强大的舆论审评、制约权力的方向与作为，权力在日趋复杂的社会活动中也才能应付自如。列宁说："自从全部权力——这一次不仅是政治权力，即涉及人们日常生活最深基础的权力——转归新阶级，转归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领导大多数人民、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的阶级以后，我们的任务就要变得复杂起来了。……用劳动者集体的、共同的经验，而主要是工作结果的经验来审查它们。"① 社会主义的权力机构，担负着解决复杂的经济与政治任务，权力一旦脱离舆论与民主的支撑，权力机制就要僵化、凝固，变成一架锈坏的机器。民主依赖舆论生命而生存，没有舆论的繁荣，社会民主也形同一棵枯树，不会呈现枝壮叶茂的生机。因此，正确处理舆论、权力和民主的关系，是增强社会活力的横向中枢系统，那么，舆论、权力和民主无疑要成为社会主义全部上层建筑活动的三大轴心。

第一节　舆论对权力的社会功能

在阶级对抗的社会中，权力是一种统治力量，是被许多人视为炙手可热的追逐目标。希腊当代马克思主义者波朗查斯赞成"权力标志着一个社会阶级实现其特殊的客观利益的能力"的定义；而马克斯·维贝尔却认为，权力是"某个既定集团的人们遵从含有即定特殊内容的命令的概然性"；美国的帕森斯完全持一种理想主义的态度，把权力视为"坚持某些职责以造福于整个社会制度的能力"。上述列举的几个权力定义都不无道理，但没有一个能把社会主义制度下权力的实质概括出来，我们不得不从头进行研究。

当仅有几岁的末代皇帝溥仪出现在老态胧肿的太监与群臣面

① 《列宁全集》第27卷，第383页。

前，他们急忙跪俯在地，权力的威严在这里玲珑剔透地表现出来。可是不管多么专断独权的人，却不能下令立即改变国家的通货膨胀，消除人民的贫困，制止人们的内心愤懑。权力并不按掌权人的意志随意运转，它总有自己的天文轨道。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无疑掌权人也是人民意志的体现者。只有立足于舆论一人民意志的根基上，社会权力才享有它特殊的品格：人民信赖、尊崇它，它为人民实现美好的追求发挥权威作用。所以，我给社会主义社会中权力下的定义是：权力是体现一定社会组织的群众意志、并执行这种意志而对群众施加管理与控制的力量。这种权力的三个层次——中央领导权、地方领导权和部门领导权都是人民或群众意志的化身，同时又对人民或群众施加支配，那么，体现人民或群众意志的舆论便成为权力的基础和权力的武器。当权力正确表达社会舆论、获得社会舆论支持时，权力就有力量驾驭一切，把握一切，舆论便成为权力“实力”的无限“能源”。当权力违背民意，它的运转能量也就枯竭了。舆论对权力的社会功能，正在于它是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掌权人物把握社会趋势的动力资源，给权力机构提供预见社会变革、从事社会管理的大思路。

一、民意是权力决策的尺度

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庞大社会权力，无论在哪个层次都肩负着制定决策、执行更上一级决策的使命。权力是决策的主体，决策是权力运行的重要产品，拉斯维尔和卡普兰就把权力当作“参与决策这个事实”。① 当然，这里所说的决策是指各层权力机构作出的关于社会、政治、处理分配关系、经济活动等问题的重要决定，而不是由专家或专家群体制定的科学技术问题的决

① 拉斯威尔·卡普兰：《权力社会：一个社会调查体制》纽约，1950年，第70页。

断、鉴定或方案。

舆论为权力决策提供一种什么力量？这个问题虽被古代和西方近、现代哲学家们多次探讨，但并没有引起权力阶层的重视。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重新思索、探讨舆论和权力决策的关系，把民意置于社会"太阳"的地位，才有巨大的现实意义。我们的结论是：民意是判断权力决策正确与否的价值尺度，是预言真理的第一标准，尊重民意将保证权力驾驭社会达到无往不宜的境界。

正如前述，民意是全体人民的共同意志和一致意见，它的主体是人民的整体，在一国之内最大的舆论就是民意，人民始终以主人的姿态参与并决定权力的方向。卢梭早在18世纪就指出，人民是政权的结合者，"他们集体地成为人民"①。人民积极参与一种政权，支持这种政权，是这种政权的天然享有者。既然如此，"如果人民单纯地诺诺服从，那么，人民本身就会由于这一行为而解体，就会丧失其作为人民的品质"②。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是社会权力体现者的集合体，几乎占有99%的群众，当然它的品质同样不是唯唯诺诺，而是积极地把握政权的全部活动，充分体现出结合为这一政权主体的活动意向。

民意是来自全体人民的切身利益要求，是广大人民群众广泛历史活动的智慧结晶。民意永远不会发生谬误，如果出现谬误，是错把一部分人的意见当作民意。人民创造历史，占第一位因素的不是他们用勤劳的双手创造万里长城、大运河、大庆油田、葛州坝水电站这种能力，而是能够提出改造社会的真知灼见、通过舆论表达推动历史前进的精神创造力。如果只把人民的创造力局限在改造物质世界领域里，就陷入了"民可出力，不可用智"的"群氓"论。社会主义建设的每一步，只有从民意中汲取力量，寻找决策的标准，确定行动的指南，才能获取现代化建设的智能

① 《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2页。

② 同上书，第33页。

源泉。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主义者并不妄称他们知道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一切细节，这个过程在实践中怎样具体进行，在哪些条件下和通过什么形式进行，他们在革命前是不可能知道的，这只有当千百万人都行动起来时，他们的集体的经验才会向他们指示出来①。

民意赞成、支持的事业必然是正义的，也必然取得成功，"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②。宋人苏辙提出的"事之当否、众口必公"③，所以成为千古绝唱，正因为只有合民心，顺民意的事业，才能合乎真理，卒底于成。在社会领域，人心的向背决定事物的真理性、正义性，民意始终能为权力运行提供强大的后盾。邓小平同志指出："在延安时候，生产运动是怎么搞起来的。为什么提倡生产运动呢？原因之一就是当时征粮征多了，群众有怨言。"④把征粮过多变为大搞生产运动，正是"从群众这样的议论当中，发现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方针和政策"⑤，这一尊重民意的伟大决策，人心所向，无坚不摧，保证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

人心所向是人民创造历史的精神活动方向。社会机体是物质运动与广大群众创造力的结合，无数人在和物质世界进行能量交换中总是保持相对平衡并达到真实境地，任何虚假、冲突的主客观运动都会通过人民的整体活动不断受到检验。这样，人民群众的意向以全社会普遍、整体的认识，就能准确揭示周围环境的内在本质，稳定、全面地反映客观世界的发展趋势。而个别人物，哪怕那些最伟大的人物有时也会由于思绪迷蒙、性情冲动而对真实世界产生幻觉和曲解。人民群众是物质生产活动的主体，能够

---

① 参看《列宁全集》第27卷，第384页。

② 《管子·牧民》。

③ 《论衙前及诸役人不便札子》。

④⑤ 《邓小平文选》第42—43页。

直接、迅速地认识解决某项社会任务的条件和途径能否体现自己的利益，并及时通过各种舆论活动表达出来，民心所向便表现为历史与现实的大势所趋。由此为起点，人心的向背又影响人们的行动，甚至影响事态的发展，最终决定重大社会事务的历史结局。社会主义制度制定各项政策在任何时候都要考察民意，顺应民心，正是为了适应社会趋势。

过去，研究认识论只是沿着"主—客"两极运动，过分强调单个人对实践认识的结晶。而把认识主体相互交流结成的群体认识关系忽略了。单一认识动力学将人们的认识发生和发展归结为个体认识的内部因素（直觉、感性、理性等），而无视广大人民相互作用的认识能动性，这是人们以往不能从认识论上高度评价舆论对权力功能的主要原因。

人民的整体认识，是客观的、直接的、多角度的，包括"主—客"与"主—主"的双重关系。作为人民认识结晶的舆论，恰恰是反映双重认识关系最生动、最深厚的形式，体现出丰富感性经验和理性火花的完美结合。

权力决策者不可能用很多时间从事具体生产和其他实际工作，特别是高层领导者深入工厂农村、街头巷尾的活动时空是极其有限的。他们的整个思维是改造、提炼作为思想原料的来自下层的情况，上层机关就成为思想加工厂。领导机关不尊重民意，不了解下情，没有原料，就不能制造产品或制造坏的产品①。上层决策人员长期从事思想加工工作，他们的思维趋向理性化和典型概括的特点，对具体问题的感受能力减弱，对某些政策不符合实际引起的混乱也相应缺少灵敏的感悟。正象人对地震的预感不如动物对地震的预感那么灵敏一样，当鸡飞狗跳大难临头之际，人却高枕无忧，大惑不解：是不是动物出了毛病？！在现实生活

① 参见毛泽东同志在1953年8月24日作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中，当群众对某项决策议论纷纷、表示强烈的异议时，某些决策者不仅意识不到自己决策的失误，反而责怪群众的头脑是不是处于热昏状态？！

上层掌权人士如果不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感觉能力就要降低，使他们单独作出的决策很难符合丰富的感性世界。民意的优势恰恰在于通过每个人“主一客”的认识路线，又经过“主一主”的交流与整体融合，使认识客观世界的广度与深度超过任何一个大智大勇的人。人民群众既然是社会中绝大多数人的庞大整体，人民的意志必然是浩翰群体智能的整合，构成整个社会的冷静、合理、沉着的智慧。“就多数而论，其中每一个别的人常常是无善足述，但当他们合为一个集体时，却往往可能超过少数贤良的智能”，“在许多事例上，群众比任何个人可能做较好的裁断。单独一个人容易因愤懑或其任何相似的感情而失去平衡，终致损伤了他们的判断力；但全体人民不会同时发怒，同时错断”①。民意永远胜于个人意志。亚里士多德写道：

> 如果许多人〔共同议事，〕
> 人人贡献一分意见和一分思虑；
> 集合于一个会场的群众就好象一
> 个具有许多手足、许多耳目的异
> 人一样，他还具有许多性格、许
> 多聪明。群众（多数）对于音乐
> 和诗人的作品的批评，常常较
> 〔少数专家〕更为正确，情况就是
> 这样：有人欣赏着这一节，另些
> 人则被另一节所感动，全体汇合
> 起来，就完全领略了整篇的得失。
> 品德高尚的好人所以异于众人

---

①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43页、163页。

中的任何个人，就在于他一身集
合了许多人的素质；美人所以
异于平常的容貌，艺术作品所
以异于俗制的事物，原因也是这
样，——在人的相貌上或作品上，
一样一样原来是分散的众美，
集合成了一个整体。①……

当然，民意远不是系统的理性认识，“多人议事”并不能提供完整的方针政策和决策方案，它仅仅提供一种大势所趋的方向，使权力活动的大厦立于坚实的基础。而结构严整、造型雄浑的建筑物，最终要由权力机构以理性思维描绘出来，把民意变成系统的理论、路线、方案。但如果没有民意，权力的一切理性指导活动都要建立在沙滩上。

在当今信息激增的时代，决策越是不顾舆论反响、局限在少数人的圈子里，也就越要发生故障。在现代实践中，个体认识只有在群体认识网络中“集合组装”，才能获得最佳的认识成果。民意调查、大众传播媒介发出的集束信息、群体决策系统、微电子专家系统、新兴学科创造者群、各种科学共同体从不同领域代表民意首先逼近决策权力层，这些来自各方的民意动向就象认识的“软件系统”，预制出由各种微观认识汇合为宏观认识的“切入”机制，使权力决策层很容易把握某项决策所应当包含的全部合理因素。

自古迄今，各种制度的权力决策，无一不沿着我们揭示的规律运动。没有哪项决策违背民意而获得成功，也没有哪个权力人物软弱无力而建功立业。无产阶级革命所以在二十世纪连连取得胜利，因为她的政党—共产党制定了符合广大劳动人民意志的决策。正如毛泽东同志在论述人民解放军必然战胜在军事上占有

① 《政治学》第143页。

优势的蒋介石军事力量时所指出的，蒋介石战争的反人民的性质，人心的向背，则是经常起作用的因素；而在这方面，人民解放军则占着优势，必然能最后以排山倒海之势战胜庞大的蒋介石军事力量。

民意是预示真理的第一标准，并不排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十分明确，前者是预示真理，后者是检验真理，一个是超前思维，一个是从后思维；一个是由历史的创造者判断自身创造意志的方向，一个是由历史创造者的活动证实创造意志的结果。如果"真理"代表民意，两个标准必然统一起来，如果"真理"违背民意，二者就不可能统一，那时，"真理"不过是谬误的伪装。两个标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都是权力机构判断一切社会问题的认识尺度，但超前思维的准确性比从后思维的正确性具有更高的价值。如果仅仅依据实践检验真理的标准衡量贯彻决策的得失，就可能付出无法估量的代价来补偿认识的重大失误。这种实践检验无法挽回重大损失，只可能避免下一次的损失。

从后思维，对人类生活的形式与后果的思索，从而对它进行科学分析，总是从事后开始的。它把事实的结果作为思维对象，通过事物发展成熟形态的典型系统确定事物发展的真理性。从后思维也包括预见性，但它预见的是以后可能发生的事实，而不是预见思维对象的先验正确性。显然，从后思维是研究已经成为历史现象的普遍使用的一种方法。在权力决策过程中，这种"从后思维"就显得力不从心，十分脆弱。因此人们在确定目标、制定方案、分析评估时，不得不采用哥顿法、对演法、树形决策法来预防"从后思维"的不足。超前思维能预示行为的目的、效果，给决策人提供行为选择的对象。人们在计划决策的时候，往往在头脑中浮现出未来图景，意识的能动性便用可能发生的后果对现实进行弹性指导。超前思维的主体如果是少数人，就具有可能性、调整性、多样性，因为不同个人、不同小群体对决策的设想不可

能都具有现实性、准确性、稳固性和一致性。当全体人民进行超前思维，虽然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对一种决策作出广泛的反应，但只要形成统一意志或共同意见，就具有无与伦比的准确性、稳固性和一致性，必然成为预言真理的标准。

在当代中国，中国共产党的一切正确纲领都是民意的体现，也只有这个拥有4700多万党员的先进政党才更有资格代表民意，反映民意，因为“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①。正因为如此，共产党能够根据人民的呼声制定正确的政策，也能尊重人民的呼声纠正自己的错误。当然，党不仅仅是备动地反映民意，更重要地是通过宣传、组织工作使人民群众认识自己的根本利益，提高改造社会的自觉性，并团结人民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我们知道，个人是微弱的，但是，我们也知道，整体就是力量。人民的整体就是民心所向的结晶体，各级领导干部只有尊重它，才能看清它，并从民意中获得无穷无尽的力量。

二、舆论是社会管理的杠杆

在突如其来的大经济时代，当代中国各级权力机构的主要任务是实施管理，组织广大群众高效率地投入现代化建设，那么，统一群众的意志和行动，按照最优化的方式实现社会生活的最大利益，是社会权力实施现代化管理的中心任务。

权力对社会管理要运用多种手段。只有多种管理方式的综合运用，才能使权力的管理职能达到和谐完美、效果显著。通常为人们所熟悉的管理手段包括：行政手段、法制手段、经济手段和舆论手段。群体动力学揭示出，管理是对群体意识的导向活动，无疑，社会权力运用社会舆论就能把群众的意识引到一个方向，从而使人们的思想行为高度集中在一个共同目标上，那么，舆论对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第767页。

权力就产生一种不可低估的组织管理功能。这种功能就象一根杠杆，花费力气不大，但产生的效果特别明显。

当权力层从民意中寻求到决策的尺度，便由掌权人通过“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认识路线提出完整的新思想、新理论、新政治观点，即新的上层舆论。用这种深刻性、完整性高于民意的舆论教育、动员、组织群众，是实现舆论管理职能的过程。适应社会需要的新的社会思想和理论已经产生，通过新闻报道和各种社会宣传，就能运用它去作组织工作、动员工作和改造工作，解决社会发展中急需解决的任务。新的社会思想和理论经过舆论宣传活动的推广，不断为自己开拓道路，运员、组织人民群众去反对社会上衰颓的势力，就能消除一切阻碍社会物质生产发展的障碍。由此看来，舆论管理功能主要表现为用宣传说服的力量，把群众分散的意志统一到国家方针政策上来，指导群众克服各种消极因素，造成安定和谐的建设环境。

（一）扩大上层舆论的影响，让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深入人脑

国家权力机构的上层舆论，在初级阶段要集中一切精力宣传四化建设的历史任务和道路，让人们理解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说服人民学会管理国家，在各级权力机构的领导下勤奋工作，刻苦学习，积极进取，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发奋图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列宁向布尔什维克党的干部和舆论工作者提出的首要任务就是：“现在，我们应当管理俄国。目前时局的全部特点，全部困难，就是要了解从说服人民用武力镇压剥削者的主要任务过渡到管理这一主要任务的特征。”①

管理活动总是表现为一定的方针、政策、方案、计划、措施的实施，国家各级权力机构要充分运用舆论力量让人们领会管理活动的指导思想，国家建设的总目标，以及党在新时期路线的实

① 《列宁选集》第3卷，第496页。

质，使党的方针政策在人民群众中产生巨大的凝聚力。只有党的方针政策深入人脑，人民群众才能深刻地理解它，一致赞同它，正确地执行它；只有当人民群众真正掌握了现代化建设的一系列重大原则，吃透方针政策的精髓，才能自觉地贯彻。经常进行方针政策的舆论宣传，最大限度地把人民组织起来，舆论就能发挥重要的杠杆作用。

各级权力机构充分利用报刊、广播电视和一切宣传手段，不断扩大现代化建设成就的宣传，向广大人民群众介绍建设经验、模范人物，批评各种不良倾向，在人民群众中形成健康的舆论，社会中的积极因素就能广泛地受到人民的肯定，而消极、落后因素则受到人民的鄙视和谴责。正确的舆论一旦形成，就能不断把现代化建设的成果在全国传播、推广，扩大社会主义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广泛影响。

党和各级政权还要广泛组织舆论，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四化建设上来，消除各种不安定情绪，最大限度地统一人民的意志。列宁说："任何大机器工业——即社会主义的物质的、生产的源泉和基础——都要求无条件和最严格的统一意志，以指导几百人、几千人、以至几万人的共同工作。这一必要性无论从技术上、经济上或历史上看来，都是很明显的，一切想实现社会主义的人，始终承认这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可是怎样才能保证意志有最严格的统一呢？这就只有使成百成千人的意志服从一个人的意志。"①国家和各级权力机构的重大决策在制定时，要遵照民意，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当方针政策、决策一旦完备，群众就要服从一个意志，强化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步调一致地贯彻、落实这一方针政策，因为"这个意志"已不是个人意志，而是民意的代表、"公意"的代言人。从总理负责制到省长、市长、厂长、校长负责制，首长指挥的权威必须有舆论的保

① 《列宁选集》第3卷，第521页。

证。要创造一种舆论环境，使群众服从合法的权力，拥护代表民意行使职权的使命。无条件服从统一意志，是在任何环境下实施管理的前提。

（二）运用民心反射力，消除管理的“盲区”

权力的管理活动总是出现一些“盲区”，即具体计划、方案在贯彻实施时，可能在一些地区、单位产生不良效果，而掌权人尤如失去视力或听力的人无法立即察觉管理中的局部失利。这种对下边出现漏洞、差错、乱子全然不知的现象，叫管理的盲区。无论管理盲区多么偏远、狭小，只要肯听取群众的反应，善于捕捉群众闲谈透露出来的各种问题，就能及时纠正盲区中的偏差。“盲区”是管理中固有的缺陷，很难防止，如果重视舆论反馈，就能弥补或减少盲区现象造成的损失。

捕捉民心的反射力，是消除管理盲区的重要途径。管理活动要随时考察各种舆论，对反馈强烈的问题进行认真调查，及时修正出现的差错。即使一项来自民意的正确决策，也要经受各种条件的考验，在局部实施的环境中经过多次舆论验证，才能逐步完善。广泛听取各种反响，及时发现管理活动中的阴错阳差，就能不断调整管理决策中的不合理成分、指导管理活动走向良性循环。

管理的盲区往往出现在落后、边远和矛盾重重的地区与单位，这样的盲区，也是群众情绪不稳、意见较多的地方。比如，东北铁路某偏远站区的工作环境、生活条件异常艰苦，工人们编成这样的顺口溜：吃水用麻袋（背冰化水），开门用脚踹，一年四季吃干菜。这里困难成堆，就医难，孩子上学难，小伙子找对象难。干部不正之风严重，工人一片怨声。铁路总局的统一管理措施在这个小站区不可能收到和城填站区同样的效果。总局局长带领工作组来到这里，听到群众的强烈反响，不觉为之一惊，他掂出了舆论的份量，决心整顿站区的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制定具体的管理措施。为解决职工生活困难，拨款建起塑料

大棚和生活区，加速建设住宅，不久，这个站区的舆论也开始转变。

舆论反射是群众普遍参与管理的特殊方式，是一种卓有成效的间接管理。群众随时表达对社会问题的态度，评价管理工作中的得失，是时代赋予人民群众的参与意识。人民自觉表达舆论，对工作与生活不断提出建议和批评，整个社会管理就会生机勃勃，充满朝气。运用舆论参与管理是群众的权利，各种宣传工具充分反应人民群众对管理工作提出的合理化建议，必然是上层权力实施管理的基础。它不断激发和垂炼人民的参与能力，使社会主义管理活动带有全民性的色彩，“因而是空前第一次使真正的全体人民都学习管理国家，并且开始管理国家”①。

（三）用舆论“消毒”，抑制落后群体的阴暗活动

在现实生活中，有些落后群体在某些地方成为独来独往的“天马”，它们似乎在真空中肆虐，受不到任何约束，权力机构对这些现象显得软弱无力。舆论对于非法律领域、非行政干予领域有一种强大的消毒作用，权力不能施加影响的地方，舆论也就越有独特的威力。可是人们却往往忽视这种舆论功能。

有一篇《丐帮漂流记》的报告文学为我们观察落后群体的活动提供了一束令人寒酸的模特儿。在一些城市糜集着一伙伙乞丐向人讨要，他们并不是没有工作做，没有田种，而是专门以行乞和小拿小摸聚敛财富的人。乞丐们谨慎地在法律的悬崖陡壁上踉踉跄跄走着，他们用小计谋骗人，却不搞大的诈骗；小偷小摸，却不抢劫，时常戏谑女人，但不强奸女人；动拳头而不动刀子。乞丐是一种松散型群体，但有时结帮成伙可以在同一天到达某个城市的指定广场上集合，然后分散活动。他们的突如其来给一个城市罩上一层阴影。他们在乞讨中散布一种舆论：农村承包，老弱病残无人管，请可怜可怜；工厂倒闭，不发工资，请救济救

①《列宁选集》第3卷，第524页。

济。人们也就怀有怜悯之心议论起来，倾诉满腔的同情，向对方双手投去人民币一角、两角、一元、两元；或粮票一斤、两斤，……

这仅是一隅。诸如此类的落后群体虽不多见，但在某些地方它们却以独特的方式大显神通。倒爷横行市场，赌徒浪迹乡里；对先进者讪笑讥讽，对严格纪律满腹牢骚；拉票"争选"，官隐为患；活人纷纷为自己抢建坟墓……。而舆论对这一切不是给予沉默，就是发出无可奈何的费解。由于舆论的宽容，这些落后群体也就更加有恃无恐地活动，污染、滋扰局部的社会环境。

群众从旧中国和十年内乱的恣意疯狂、浑浑噩噩的岁月中挣脱出来，从沉重的分散主义镣铐中摆脱出来，难免在他们中间出现一些冒险家、骗子、吹牛和拍马的人。投机钻营、贪图钱财、破坏商品经济秩序的官商官倒不断干些糊涂事。在还不老练的革新者中混杂着企图百废俱兴、但却时常空忙而一事无成者。一部分缺乏社会主义道德和常识的人，在初级阶段大转变时机不能不浮出水面、崭露头角，贿赂、送礼（通常称"纪念品"）、聚敛公款、大吃大喝等各种坏念头、坏行为在冠冕堂皇的迎来送往中侵吞大量国家资金。这一切使社会管理变得更加困难。权力机构运用各种宣传方式，组织社会舆论谴责这些落后、阴暗、消极现象，警告人们的堕落，用舆论威力引导人们按照法律、规章、制度、条例从事活动，舆论就转化为人的自我意识控制，人的行为就被强大的舆论所操纵。显然，对消除社会污浊现象，舆论手段是法治和行政手段的有力补充。正如列宁所说，克服群众守旧、无知和不信任等用旧的办法是不能取胜的；如果用我们自己学会的宣传、鼓动和有组织地诱导的办法，我们就能取得胜利，我们就能不只是通过法令，设置机关，草拟公文——发布命令是不够的①。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389页。

（四）发挥舆论的粘合作用，促进微观环境中人际关系的相容

微观社会环境的安定状态，是各种微观社会活动的基本条件。一个学校要进行正常的教学与学习，人与人之间必须和谐相处，共融一体；一个机关要搞好日常工作，大家必须团结一致，同心协力，这一切都构成微观社会环境的安定因素，并取决于人际关系的相容性。人际关系相容在很大程度上是舆论活动促成的，同时又表现为舆论的一致。

人在社会活动中，总是愿意和那些与自己意见相同的人一道工作、一道生活；人世间的合作互助行为，乃致一切共同行为只有在意见一致的基础上才能实现，这是舆论粘合作用的表现。部门领导者要顺利实施各种管理措施，就要运用舆论克服人际间各种磨擦，形成团结一致的工作局面。

在当代中国的大变革时代，人们的价值观念、社会贡献的标准、收入差别、生活条件不断发生变化，随即就要在人际关系中产生各种内耗。中国传统的中庸思想使许多人习惯于一成不变，千篇一律，囿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处事哲学。一旦这种安于一色的生活秩序被打破，在同一群体圈子里发生某些变动，比如脱颖而出一个才华出众、敢闯敢干的人，就使一些人的内心平衡受到威胁，产生厌恶、反感，接着便流言蜚语横行，破坏了正常的人际关系。在某些单位，上下左右存在一种无形的关系网，如若触动处于网结上的任何一个人的胡作非为，就要遭到关系网的围剿或孤立。这些内耗牵扯许多精力，使人们相互掣肘，各个工作环节运转不灵。

某些单位还盛行一种污浊的负向舆论，把别人的隐私作为兴致勃勃的谈资加以传布。这往往是对卓有成就、占据领导岗位、有时也对无名之辈的个人生活琐事大加议论。对别人的隐私善于窥探，巧于戏言，不是凑在一起窃窃私语，就是在公开场合发布“独家新闻”，成为一些人的嗜好。除了超凡脱俗的圣人，恐怕

人人都有自己的私生活，随心所欲地猎取、传播他人的隐私，向单位内外兜售批发，使一些单位的人际关系剑拔弩张。多少志在邦国的好汉在讥讽中壮志难酬，多少俊眉纯洁的少女在恶语面前了寻短见，多少和睦相处的同事在无端的挑拨下产生隔膜……

微观环境中人际关系的破碎，大都起于恶言秽语之风。恶作剧的坏念头，不详的煽动，有意挑唆他人的矛盾，使群众中形成一帮一伙，在这种人际环境中就很难实行有效的管理。人心涣散，生产、工作、学习经常陷入纷乱状态。管理者要消除人际间这些障碍，首先要消除小群体各种负向舆论作祟，用一个大家能够接受的一致意见把人们的思想统一起来。“当两个互相喜欢，同时又都喜欢同样的事情，这当然是一致的——因为意见一致，他们的关系也就是和谐的了。”① 在管理工作中寻求人们一致的价值观和一致的目标，用舆论扩大这些一致性对个体的影响，就能逐渐把人们的心理粘合在一起，人际关系的裂痕也就逐渐弥合。

价值观是人们互相理解的基础，人们只有对周围事件的估价一致，对外部世界的看法大体相同，彼此才能产生志趣与意向的相互认同。部门管理者经常引导大家对周围事物的评价取得一致，形成共同意见，同时也就取得了相互信赖的关系。同时，舆论经常向人们指示相同的生活目标，进一步促进价值观的相容，人们的其他差异性就会退居次要地位。当大家认识到，群体有共同目标，舆论便产生克服排他性的力量，成为创造和谐人际关系的动力。

三、舆论监督是铲除官僚主义的利器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某些权力机构严重存在着官僚主义现象，

---

① 〔美〕弗里德曼等：《社会心理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02页。

个别干部的"官僚病"深入膏肓，人民深感困惑。邓小平同志以简短的表述，全面概括了党与国家政治生活中官僚主义的表现：

> 官僚主义现象是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一个大问题。它的主要表现和危害是：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成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诿，以至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等。这无论在我们的内部事务中，或是在国际交往中，都已达到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①

在现代化建设中，人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烈地意识到官僚主义的巨大危害，党与国家多次发出反对官僚主义的号召，各级权力机构都肩负着防止官僚作风侵蚀的历史重任。但光靠行政处理、法治惩办并不能有效地抑制官僚主义。患官僚病的人"足智多谋"、"幻影迷离"，行动起来总是充满神机妙算。他们的许多违法乱纪行为不动声色，藏而不露。只有全体人民诉诸社会舆论，众目睽睽，千夫所指，才能彻底扫荡官僚主义的藏身之处，舆论监督也就成为铲锄官僚主义的利器。正象列宁告诫的那样，"真正的革命家的组织是会用一切办法来清除其中的不良分子的。而且我们还拥有在俄国（以及国际）革命运动中由来已久的颇为发达的舆论，这种舆论对一切离开同志（……）的义务的行为，都要予以严厉的制裁"②。舆论不是一般的监督手段，而是"另一个法庭—社会舆论的法庭"③，表现为广泛的社会审判。

舆论监督在社会进步中曾发出过熠熠的光辉。原始的法律就

---

① 《邓小平文选》第287页。

② 《列宁全集》第5卷，第45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463页。

是原始的舆论，在部落里对不良行为的判处正是通过一致意见的表决作出的，先民们把舆论监督作为社会治理的朴素手段。所谓"治，谓监督其事"①，是指治和监督是同一件事。氏族社会，运用监督方式制约人的恶德、恶行，就达到了天下大治。北美独立战争的伟大思想家、宣传家潘恩还给我们描绘了一幅进行舆论监督的浪漫画卷：

某一棵地点适中的大树将供给他们一座大礼堂，全体移民区的人可以在树荫下聚会，讨论公共问题。很可能，他们的第一批的法律只是称为条例，在推行的时候至多以公众的鄙视作为违犯条例的惩罚。在第一次的会议中，人人自然都有权力占据一个席位②。

重视舆论监督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党把它提高到捍卫自身和国家领导机构纯洁的高度来认识，提出"进一步防止党内官僚主义的滋生，使党成为同官僚主义作斗争的坚强力量"。在中国当代社会，舆论监督被视作国家机关建设的重要环节，对严重官僚主义者公开揭露，严肃查处，使党风逐渐走向好转。山西的一位高干干预司法公务，蛮横无理，在他的包庇下犯罪的儿子被释放。对这个案子，太原市群众盯了几年，舆论咬住不放，终于在人民日报上揭露出来，这位践踏法律尊严的共产党员被开除党籍③。在舆论面前，特权受到党纪的审查，贪赃枉法逃不脱法律的制裁，玩忽职守遭到严肃查办，关系网可能失去效力；舆论捍卫了党的原则，维护了党的形象，也挽救了一大批犯错误的干部。

阿法纳西耶夫在《社会管理中的人》一书中写道："社会舆论在准备和实施决定中，在实现监督职能等等之中，起着巨大的

① 《周礼·地官注》。

② 《潘恩选集》第5页。

③ 见《人民日报》1987年10月14日第5版。

作用。”① 舆论发挥这种作用有两种方式，一是群众舆论监督，二是新闻舆论监督。群众通过街头巷议、连名上告，揭露、抨击官僚主义者，批评的声浪引爆而发，不绝于耳。由于群众分布的广延性和文化素质的差异，群众舆论监督不仅具有深厚的社会层次性，从干部到群众都可能成为舆论主体，而且产生不稳定、不严谨的舆论活动方式。表现为舆论呼声忽高忽低，时起时落，甚至包含谴责、怒斥、攻击、挖苦、谩骂等多种情感。群众舆论监督是群体自发的意识活动，所反映、揭露的问题往往细节含糊，仅仅提出大概情况，有时内容还可能不完全真实。群众舆论监督具有自发性、分散性和任意发展的趋势，其监督的范围取决于监督对象不良行为涉及的广度，因而总是带有一定的局部性。新闻舆论监督借助传播媒介的报道和评论功能，迅速地把监督的意见传至广阔的空间，甚至传遍全国。就这一点而言，新闻舆论监督可以把局部的群众舆论监督转化全局性的监督，把监督力量放大几百倍、几千倍，新闻舆论监督的威力也就远远超过群众舆论监督。正因为如此，新闻舆论监督要求记者一定要实事求是披露事件，按照法律及其社会道德准则对事例作出恰当的分析，旗帜鲜明、态度果断、分清是非、抓住要害，使全社会正确认识官僚主义现象的危害和本质。新闻舆论监督是编辑部集体通过认真调查研究，进行多层次、多侧面的揭露性报道，不仅要坚持是非标准，而且应当注意法治标准，对腐败现象和不良倾向的批评严格坚持准确性和真实性。因此，新闻舆论监督具有高度的科学性、广泛性与严肃性。

舆论监督的威力来自于对人的心灵的制裁，这种制裁诚然不同行政、法律制裁那样严酷，但却往往使监督对象陷于精神崩溃。“制裁按其性质可以分为正式和非正式两类。例如法律机构的制裁属于第一类，社会舆论机构的作用和道德作用则属于第二

① 《社会管理中的人》，知识出版社，1983年版第196页。

类”[1]。舆论这种非正式制裁方式，靠社会心理作用使被制裁者进入自惭形秽的内省活动，在心灵的痛苦中接受群众的宣判。同时，舆论监督的非正式制裁还要导致正式制裁的出现，一旦坏事、丑事触犯党纪国法，舆论的最终目标是要求行政或执法部门作出严肃处理，人民的倾诉被法纪机关所接受，第二类制裁就转化为第一类制裁。在“舆论——法纪机关”的链条中，非正式制裁逐渐向正式制裁过渡，使非正式制裁的舆论具有双重力量。

法国18世纪启蒙思想家霍尔巴赫深刻分析过舆论制裁的动因，迄今仍具有深刻的理论价值，他写道：“没有人会不怕世人的裁判，而更害怕上帝的裁判，因为他亲身直接感受到世人裁判的后果，——希望受人欢迎，忠于传统，惧怕惹人讥笑和担心人们议论是非——这就是比宗教观念更强大得多的种种动因。”[2]

舆论给监督对象造成冷酷、无情的社会环境，各种冷言风语不断向他的心灵轰击，个体与群体温情脉脉的融合关系被割断，个体生命形式脱离了社会的共同生命活动，使思绪陷入极端孤独与苦闷。

人的社会心理不仅赋于他某种思想和情感，而且使他的生命过程对社会环境产生一定依赖性。官僚主义的出现，既是思想堕落的结果，又是依赖社会环境造成的谬误心理状态。人类的“占有欲”、“权力欲”、“支配欲”旺盛是构成官僚主义的三个基本要素，这些心理倾向是人类社会的产物。如果世界上仅仅有官僚主义者一人生存，没有分享财富的第二个人，也就没有占有欲；没有受支配、听从指挥的第二个人，也就没有权力欲和支配欲。人需要在人群中生活，渴望自己处于优越地位，有更多的财富、荣耀和权威，这些欲望一旦膨胀，手中的权力就会把自己摆

---

① 《社会学手册》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4页。

② 《健全的思想》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43页。

在凌驾一切的位置上，不择手段地运用权力去满足超越环境支付限度的要求。而在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下，这种官僚主义的欲望又往往得不到有效地抑制。当社会舆论纷纷揭露官僚主义者时，他们所依存的人际环境塌陷了。他要占有的将要失去，他要炫耀的，却引来蔑视；他要随心所欲地支配一切，却遭到人们的白眼，无人听从他的支配。舆论监督对象陷入鄙夷、声讨的深渊，一见到群众，后背开始发凉，渗出冷汗，脸色惨白或胀红，甚至连手足的动作也笨拙起来。舆论的监督造成的精神压力在破坏个体与社会心理协调的机制中，采取了严峻的心理制裁形式。

当心理制裁不断高涨导致法纪制裁时，就使官僚主义者彻底身败名裂，因此，它的威力无穷。各级权力机构运用舆论不仅能够有效地揭露、处理那些危害国家、贻误工作、从而造成重大损失的新时代的"官僚们"，而且使全党敲起防止官僚主义作风泛滥的警钟。舆论监督是焚毁官僚主义栖身场所的烈焰，哪里有官僚主义，哪里就有烈焰在燃烧，轻视或拒绝运用舆论力量，就无异于给官僚主义开通一条"防火地带"。在某些地区或单位，有些官僚主义之所以能逃脱制裁，并不是舆论失去效力，而是舆论的力量发挥得不够，尚未引起法纪部门的注意。当舆论仅限于少数人一般议论的状态，它的心理制裁作用也很难显现出来。正如列宁所说，只有工农群众怀着满腔的革命热情自觉自愿和诚诚恳恳地实行合作，共同实行统计和监督，才能消除资本主义社会这些万恶的残余，清除人类的这些渣滓，清除这些无可救药的、腐烂的、坏死的部分①。

马克思在预言共产主义"幽灵"在欧洲游荡时，并没预料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会有官僚主义幽灵附体。而列宁却在实践中清醒地向人们警告："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

① 参看《列宁全集》第26卷，第384页。

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①“我们将同官僚主义作长时期的斗争，谁要不是这么想，他就是欺骗，就是煽动，因为克服官僚主义要有千百个措施，需要每个人都识字，每个人都有文化，每个人都参加工农检查院。”②人民群众都识字，有文化，就能更科学、更冷静、更准确地运用舆论力量揭穿官僚主义的错误，社会权力机构的官僚病也就得到神医良药。不断运用舆论反对、消除官僚主义的危害，使权力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才能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日千里地飞速向前。

第二节　社会权力运行的舆论机制

权力的意志以民意为基础，上层舆论必须力求体现民意。在一定意义上，人民大都运用下层舆论表现自己的民主权利，对权力实行广泛的制约，从而使整个上层建筑活动在舆论的支撑下生机勃勃地运行。正由于这一原因，重视下层舆论对权力的反射作用，是保证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发展的关键。

资产阶级政治家，哪怕是激进的民主派，当他们获得权力时急需群众的舆论支持，一旦大权在握，便无视群众的意见。法国大革命胜利后，罗伯斯庇尔曾一度遭到舆论的攻击，他出于无奈请身为司法部长的丹东帮忙，丹东断然拒绝：“这与我有何相干，公众舆论是个婊子，而她的后代则是一群傻瓜。”丹东依靠舆论获得权力，由于他践踏公众舆论，又失去了权力。

封建专制统治者奉行“君为贵、民为贱”的信条，把“权机多门，是纷乱之源”视为经典，将一切大权集中在一人之手，言出法随，岂能把老百姓的意见放在眼里！？

社会主义国家的权力属于人民，各级干部授托于人民，权力

① 《列宁全集》第35卷，第552页。

② 《列宁全集》第32卷，第52页。

越大，责任越重，也就越应当是民意的最高体现者。在当代中国，只有在舆论的约束、协调下，掌权人才能完成人民的重托，成为人民的公仆。违背、无视社会舆论的制约，必然出现滥用权力，使整个上层建筑活动陷入紊乱，最终导致社会生产力的衰退。

一、舆论是上层建筑运行的中介

上层建筑是权力系统、权力部门和各种思想观念的集合体，它的运行在于实施一定政治和法律制度，为巩固和发展经济基础从事各种富有生机的组织活动和思想影响。政治上层建筑的核心是行政主体，即国家行政权力的承担者和实施者。行政机关行使国家政权，既具有相对独立性，又有绝对的统一性，整个上层建筑在协调一致实施权力的过程中运行。思想上层建筑作为权力影响社会的软性工具，无疑也是为权力服务的，并受权力的支配。

社会舆论对权力并不仅仅具有功能作用，在上层建筑中，它还表现为一种不可缺少的中介因素，虽然这种中介也是一种功能的体现，但它在协调上层建筑的变革中能把整个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联系起来，把上层建筑中各个部分结合在一起，成为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

政治上层建筑基本属于思想的社会关系，它按照人们的意愿建立起来，并按照人民的意愿不断变革，正如列宁所说，政治上层建筑是人们根据经济基础的要求，并“通过人们的意识而形成的”①。经济生活的变化，引起人们的思想变化，人们就首先通过舆论这种动态意识表达各种见解，支持来自上层建筑合理的指令，反对上层建筑不合理的行为，要求改革或完善各种政治设施及其活动。如果没有舆论的中介作用，上层建筑的权力运行对经济基础的反映就要变得迟顿、落后、谬误，甚至严重破坏人们的

① 参见《列宁全集》第1卷，第8页。

正常生产活动，成为经济发展的阻力。

两位身居贫瘠乡村的山东农民给报社投书，向上级机关大声疾呼："请听听我们农民的意见！"两位农民列举了1987年地方政府向每个农民征收教育费、建校费、干部补贴费、河工费、广播费、粮食补差费、防疫费、水利费、耕地费等14项费用41.1元，已超过国家规定的提留农民总收入的5%的二倍。这两名农民的呼吁在报上刊出，立即引起许多农民的同声呼应，要求"上级领导到农村走一走，看一看"，"希望有关部门说清楚"，"想办法尽快解决"。一股强烈的呼声传到各级政府机关。

上层建筑的权力部门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因为他们觉得农民已经富裕起来了，而这个地区每个农民的年均收入刚达到200元。将每人收入的四分之一交到县财政，除去生活费用，农民已没有资金进行扩大再生产。农民的舆论通过报纸反应到县政府及一切对农民进行高征税地区的领导部门，如果他们尊重舆论，调整自己的决策，就使上层建筑的活动适应人们的经济生活规律，也就促进了经济基础的发展。

不管何种制度，它的意识形态部门——思想上层建筑必然反映并维护其经济关系和政治主张，"一个特定的经济基础要能够存在、巩固和发展，不仅需要强制性的政治、法律制度和设施来规范人们的行动，把人们的行为限制在一定秩序之内；而且还要有意识形态来论证经济制度和政治、法律的合理性，使人们'自愿'（不管能否做到）地遵守制度，维护秩序"①。这些思想上层建筑总是强烈地肯定、维护经济基础的的各种政策和措施；当经济关系严重束缚生产力发展、经济政策濒临坏死的边缘，思想上层建筑也要极力宣扬它的优越性、正确性。正因为如此，马克思特别指出："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

① 肖前等：《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37页。

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①。这里所说的意识，是指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社会主义社会的思想上层建筑同样要维护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在刚刚实现公有制一段时期，这种“维护”曾和过去一切历史时代一样在某些方面抱有“主观主义和武断态度”，盲目肯定那些错误的经济模式和经济政策。这样，判断该时代同样也不能完全以“它的意识为根据”了。50年代，在短短三年内用“互助组—合作社—高级社—人民公社”急于推进生产关系的“变革”，严重破坏了生产力，而意识形态部门却竭力宣传这种“不断革命论”解放了生产力，使几亿农民扬眉吐气。这种歪曲现实的舆论宣传，扭曲了经济运动的客观规律，加深了权力机构对现实作出的错误判断，造成一连串更大的失误。

现实的理论不断论证，社会主义制度能够自我调解、自我完善，是在付出沉痛代价以后才出现的。而这种自我调节与完善，正是借助下层舆论的中介来完成的。黑格尔说：“公众舆论是人民表达他们意志和意见的无机方式。”“在国家中现实地肯定自己的东西当然须用有机的方式表现出来，国家制度中的各个部分就是这样的……公众舆论不仅包含着现实世界的真正需要和正确趋向，而且包含着永恒的实体性的正义原则，以及整个国家制度、立法和国家普遍情况的真实内容和结果。”②正确舆论比国家制度中各种机构，其中包括意识形态部门能更真实地、普遍地再现国家的实际需要和真正趋势。千百万人对现实生活的体验、观察，随时对合理或不合理的政策、计划作出评价，人民的舆论也就成为判断、评价事务的动力和标准，这样，借助这种舆论可以认识包括上层建筑在内的整个社会生活的真实图景。我们判断一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3页。

② 《法哲学原理》第332页。

个时代，只有用人民群众天然生成的表层意识——舆论，才能确切地把握时代的真相，发现上层建筑反映经济基础的误差。

毛泽东同志似乎洞察到舆论的中介作用，他认为"上层建筑（其中包括思想、舆论）要是保护人民不喜欢的那种生产关系，人民就要改革它。……工具要改革，它会通过人来讲话，通过劳动者来讲话，破坏旧的生产关系。"① 劳动人民的议论不断对经济活动的性质、状态作出真实的说明，使上层建筑中的权力人物了解生产关系及生产力正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权力运行应当根据这种变化相应地作出哪些调整。没有舆论这种中介作用，上层建筑的活动就要在许多方面脱离社会实际，产生阻碍社会进步的惰性。各种意识形态部门牢牢在权力机构的控制下，围绕权力意志从事精神生产，按着权力人物的主导思想决定宣传什么，怎样宣传。而人民的舆论活动在亿万人的心里，它有空间，但没有生产部门，也无须权力支付经费。权力不仅不能随心所欲地支配它，而且始终受到舆论的监督与约束。社会权力通过舆论中介，看到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真实情况，就能全面把握经济、政治和思想动态所出现的新趋势、新变化，最大限度地提高权力运行的社会效率。不容忽视的是，舆论中介能有效地提示各个意识形态部门背离基础、与政治设施形影相随而造成的错误宣传，从而促进思想上层建筑各部门的不断完善。

意识形态部门对经济基础产生积极的反作用，只有在它适应生产力的性质和需要时才能发挥。可是，意识落后于现实，意识形态部门落后于经济基础是认识运动的内在矛盾，那么，只有借助舆论的中介不断调整各类意识形态对经济活动的不适应，并把这种落后差距缩小到最低限度，才能使各个意识形态部门积极地反作用于经济基础。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一旦成了对社会的独立力量，马上就

① 见《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第二次全集会议上的讲话》

产生了新的意识形态。国家制度指导、要求、规化着意识形态部门的创立和发展，主要依据经济基础的需要，而这种需要又是通过人民群众的一致意见反映出来的。没有舆论，其他意识形态就不会有新的发展。我们可以用无数事例来论证舆论对意识形态形成的促进作用。社会学在1980年以前由于人为的原因在我国已经中断30多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社会科学界从各种角度、以各种方式纷纷发出重建这门科学的呼声，舆论已经形成，社会学的禁令便被解除。在北京和武汉先后创办了"社会学研究班"，由来自32个省市的大学教师、科研人员和社会工作者参加，经过几年的研究，这一学科不仅初具规模、而且列入大学的重要课程，诞生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

在社会主义改革中，理论界非常活跃，理论工作者和广大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纷纷提出新的论点。人们通过讨论、争辩、探索的舆论活动，提出许多新的见解，使人们从假马克思主义的迷信中醒悟过来，推动了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研究，并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推向前进。

人们广泛的舆论活动，不断为深层意识形态的发展提供严峻的现实要求和丰富的观念材料。恩格斯指出："任何意识形态已经产生，就是同现有的观念材料相结合而发展起来，并对这些材料作进一步的加工；不然，它就不是意识形态了，就是说，它就不是把思想当做独立地发展的、仅仅服从自身规律的独立存在的东西来对待了。"①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种思潮蓬勃兴起，巨变的时代必将使各门科学出现更大的飞跃。舆论便以中介作用成为推进深层社会意识变革的起点和宝库。认真考察群众普遍提出、赞成的重大意见，就能推动社会主义的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文学艺术等意识形态的发展。如果研究现实的理论脱离现实的思想动态，这种理论必然是脱离实际的理论。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50页。

生活不断创新，前人的理论距离现实越来越远，正如歌德所说，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是常青的。以往的一切科学在当代中国都需要有新的发展，紧迫的社会骤变必须有同步发展的意识形态为指导。舆论这种表层意识是同步反映现实的直接意识形式，它能随时为人们认识四化建设规律提供一面镜子，它的中介作用所开辟的科学认识之路总是铺设在其他意识形态之前。

二、舆论对权力的制约体系

19世纪英国的约翰·阿克顿勋爵说："权力使人败坏。"这一论断无疑过于绝对化了。对于封建专制主义者，权力使他们凌驾一切，荒淫无度，虐杀无辜，难以摆脱腐败的结局，因为封建君王居苍天之下，位万民之上。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分析，世界上没有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现实生活决定人有现实的痕迹，人的各种欲望可能使权力成为人走向腐败的因素，但也只有在缺乏制约力量的社会里，这种腐败才会大量发生并走向肆虐。

在社会主义社会，权力是否走向腐败，有两种可能。权力受到社会舆论和法律的制约，就将避免任何沉沦、怠惰和腐化，成为真正的人民的权力。不受舆论和法律制约，权力就化为谋取私利、独断专行的魔杖。权力的败坏在多数情况下并不触犯现有法律，高高在上，滥用民力，飞扬拔扈，玩忽职守，办事拖拉等等，并不涉及法律，因此，舆论对权力的制约范围与深度远远超过法律。

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上层建筑既要实行集权，又要实行分权，只有两者相济共用，才能使11亿多人口的大国有统一的政策、统一的意志和统一的行动，同时又能发挥各地区、各部门的主动性、责任感，提高工作效率。但旧的体制从封建专制主义那里沿袭了一些陈腐的习惯，恰恰权力过分集中。名谓集体领导，实则权力集中于一人，往往一把手裁决一切，而且不受任何约

束。由此引起上层建筑活动的迂阔、死板、落后、低效。在鼓吹"专政是镇压之权"的时期，一把手可以把二把手打成修正主义分子，领导可以把不听话的群众打成反革命，发表不同意见被视为异端，列为内控分子或送进监牢。在调工资、分房子、提职提干、吃穿住行等一系列社会活动中，权力可以决定它所统辖下的任何人的命运。十年动乱，专权独断，生杀予夺，不受制约的权力任意草菅人命。在这种集权制、家长制的统治下，干部队伍中侧身一批投机取巧，巴结进身的宦徒，他们往往滥用权柄，"宁左勿右"，"欺下悦上"、"火上加油"。你说苏联的明天是我们的今天，他就要在后天进入共产主义。你号召学大寨，他驱赶男女劳力在平地上造梯田。你说大炼钢铁有潜力可挖，他要群众把铁锅、门鼻儿也交上来炼铁。发现一个反革命让他定案，他就捕风捉影，把几十、几百人打成反革命。你叫他开放搞活，他放得沧海横流，活得无法收拾。你叫他收缩，他就不让人们喘出一点气来。你让各地提高十几种产品价格，就会有数百种产品盲目涨价。你让他为居民修建住宅，他就会大量修建高标准的会堂馆所。由于缺乏得力的措施对权力加以限制，滥用权力的家族也就越加兴旺。为避免权力的蛮横、腐化和胡闹，运用舆论制约体系对权力实行多方面的限制，是捍卫社会主义纯洁性、保证权力按照人民意志运行的基点。

在通常情况下，施展权力依据的是职务、主张和威望，其权力内容表现为决策权、任命权、命令权、奖惩权和分配权。任何一级权力人物正是从这五个方面支配下属，施展自己的意志，权力的滥用也都是在这五个方面超过应有限度的结果。舆论的制约体系不仅从这五个方面约束权力服从民意，而且要求权力人物实行社会权利的平等原则。正如潘恩所说："在一切看法问题上，社会契约即社会赖以团结的原则，要求多数人的意见成为大家的准则，少数必须切实遵守。这完全符合权利平等的原

则……。”① 就是说，每个人都有发表意见的权利，多数人的一致意见应当受到权力人物的尊重。权力人物如果享有特权，在物质、政治待遇上不受任何限制，为所欲为地凌驾群众头上，就要受到舆论的严厉抨击。如果权力人物拒绝舆论的制约，和广大群众对立，权力人物就要失去稳固的地位，最终被人民所唾弃。意大利早期资产阶级政治家、思想家尼科洛·马基雅弗利曾经给封建帝王开了一副药方："君王与敌对的民众相对立，永远不能保证自己的安全，因为人民是众而且多；……从敌对的民众那里，君王所能得到的最坏的事情是被人民所弃……他们所担心的不仅是被弃，而是他们的积极反对——。”②

舆论对权力的制约决定权力的命运和社会价值，社会主义国家的权力机构一旦真正建立在人民意志的基础上，充分认识舆论制约的伟大力量，就会积极接受或预先采取各种制约方式，形成一套完整的舆论制约体系。

（一）"预诊"制约方式

权力在运行之前，或在整个运行过程中，毫无保留地向人民公开一切内容，随时听取人民层见叠出的建议，用舆论事先"诊断"权力运行的方向与目标，就构成预诊式的制约机能。

列宁指出："这个政权对大家是公开的，它当群众的面办理一切事情，群众很容易接近它，它是直接在群众中产生的，是直接代表人民群众的意志和机关。"③ 权力人物实施决策权、任命权、命令权、奖惩权和分配权之前，听取人民的宿见，按绝大多数人的要求制订目标、方案、措施，避免权力的各种武断、荒谬。在80年代，各级政府创立的"面向社会办公"，开辟的"市

① 《潘恩全集》第2卷，纽约，1945年版，第584页。

② 《君王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1页。

③ 《列宁全集》第10卷，第215页。

长电话”，设立的“来访接待日”制度，都具有“预诊式”制约方式的特点。人民群众通过权力的公开办公活动，提出各种建议、批评，使权力人物在决策之前就把握了民意动向。公开办公成为沟通民情与权力的直接渠道，给权力运行提供了群众的强大意向。来自民间的许多“浅言、拙见”，便铸成权力人物的远见卓识，有效地防止上层机构的专断独行。

四川达县市政府曾在门前大街的一排梧桐树下，挂起了引人注目的“市长办公”的横幅，这个市在一年内连续七次实行公开办公。每次都遵照老百姓的申诉或建议立即拍板解决几十个问题，群众把过去的“衙门难进，市长难见”的议论改为“明镜高悬，是非分明”的称赞。达县市政府的许多英明决策在这里产生，许多重大的权机危殆得以避免，市政府的权威也就在群众中树立起来。

许多市、县权力机构在80年代先后设立的“市长、县长电话”、群众有要求、建议、意见可以直接向权力人物反映，直接制约着基层权力机构的运行。这样，直达地方最高权力中枢的电话成为群众舆论的通道，人们的声音在这条通道里穿行，人民群众不时向权力的“歪斜状态”提出预报，凡是群众呼声高、要求强烈的意见，也就成为市长、县长所关心的问题，需要及时采取紧急措施着手解决。毫无疑问，每天收到的几百次电话把人民意志凝聚成的巨大力量，注入到权力运行的机体，将使权力机构获得源源不断的免疫力。

预诊制约方式反映出民意预见性对权力运行的倡导和监测，人民群众主动向权力人物建议、申诉，也就增强了权力人物的遥感能力和预测力量。面临广大群众的建议、督促，掌权者耳聪目明，广闻博取，配合对实际的缜密调查，就能正确地把握客观事物的规律。民心所向，即是权力所向；民之所求，就是权力所求。权力接受舆论的合理指向，权力运行的目标就会更加符合

真理。

（二）评议制约方式

从某种意义上说，舆论就是亿万人民的评议，这是对权力活动的好坏、优劣做出评价。这种评议声浪一高，对权力的恶性运行就产生强有力的遏制力量，而对其良性运行则产生鼓励作用。

评议制，显然是在权力实施某项活动之后或对权力人物素质操行作出评价的一种制约方式。权力的运行不可能脱离群众，任何权力人物的一言一行都躲不过群众的眼睛。人民群众面对权力人物的作为随时作出评价，相互交流各自的观点并取得一致，就要产生一股巨大的舆论流，它以一种自发决议的形式约束权力。这是人民群众的自行决议，违背这种决议，权力就要站到人民的对立面，无异于把自己置于社会审判的地位。所以列宁强调："我们既是民主政府，就不能漠视下层人民群众的决议，即使这个决议我们并不同意。……我们应当跟随着生活前进，我们应当让人民群众享有发挥创造精神的充分自由。"①

评议制约方式，具有社会自发性评议和权力机构组织性评议两种。当权力运行产生失误或权力人物发生腐化，人民群众就要唇枪舌剑，议论不休，出现自发评议。群众的自发评议表现为分散性和普遍性，参与评议的人越多，舆论也就越高涨，对权力的约束力也就越大。评议的问题长久得不到解决，群众的情绪就会激怒，转化为抗议行为，直接向权力提出挑战。这时，舆论的力量就要冲毁权力的阵脚，发生权力转移或更迭现象。

在反动统治阶级的压迫下，舆论的评议常常发展到抗议地步，致使一届政府或某个官员垮台。菲律宾原总统马科斯的腐败与黑暗统治，多年来受到国内人民的非议，这种评议式舆论制约一日比一日高涨，一天比一天显示出不可抗拒的力量，终于在大

---

① 《列宁全集》第26卷，第239页。

选中形成全国抗议浪潮，逼迫他不得不交出权力，流亡国外。我国明朝万历年间，由于宦官向工商业者敲诈勒索，引起群众公愤，人们纷纷斥责贪官污吏的横征暴敛。当湖广矿监陈奉到荆州收税、沿途骚扰、抢劫商人、侮辱妇女时，评议便转化为市民的抗议。几万市民把他的16个爪牙捆绑起来扔到江里，放火烧掉了巡抚公署，明王朝不得不在群众盛怒之下作出让步，把陈奉撤回北京治罪，并罢免了湖广总督支可大的官职。

在社会主义社会，评议制约方式对腐败、无能的权力同样产生巨大的约束力。只要权力对抗民意，评议方式就会随时形成，敦促权力调整运行机制，屈从于民意的要求。权力如果无视这种制约，不立即满足人民的正当要求，同样要遇到巨大的冲击力，使权力人物陷入舆论困境。1987年5月山东省苍山县发生的令人瞪目的"蒜薹事件"①，是建国后我国农民第一次由公开评议的舆论制约活动发展到大规模的抗议活动。苍山是传统的大蒜之乡，这几年农民靠种蒜增加了收入，有十几个乡的农民已经靠蒜薹发家致富。他们对县级权力的理解就是支持他们种蒜，帮助他们卖蒜薹，这个县的权力运行无疑应当满足农民这一要求。1987年全县蒜苔长势喜人，预计产量可达1亿多斤，每亩就可收入1000多元。蒜薹上市季节一到，来自许多省、市、县的采购员、各种车辆接踵而至。可是，苍山县政府各机关想借此大捞一把。交通部门到处设岗查车，随意罚款，工商部门大收摊子费，哄抬物价，稍不如意摘去称砣，强行收取各种管理费。外地客户在这是非之地饱受难言之苦，纷纷退掉意向合同，空车返回。买的买不成，卖的卖不了，县里冷库有限又收购不多，几天之内几千万斤蒜薹发热霉烂，农民半年的辛苦和希望一齐破灭了。人心如焚，有的开始骂大街，有的痛哭。而县政府在那里漫不经心地召开了49个销售蒜薹会议，相互扯皮，贻误时机。农民终于象洪水一样

① 参见《光明日报》1988年2月23日第3版《沙净天》一文。

涌进县冷库办公室，打碎玻璃、暖水瓶。一个蒜农将一车蒜薹拉进县府大院，一边骂，一边抛撒。人们冲进办公楼，把前来劝阻的警察团团围住，打掉了干部的帽子，一层楼玻璃全被砸坏，向二、三层投掷石块。人们冲进劳动局、物价局、税务局办公室，砸坏了桌椅。一位法院干部掏出枪威吓群众，群众下了他的枪，雨点般的唾沫向他脸上飞去。整个县城喊声震天，人声鼎沸。城内外的公路上人群东奔西突，拦截车辆，小车被砸烂掀翻在地，一位年青的蒜农抓一把蒜薹往一辆小车里干部模样的人嘴里边塞边气恼地骂："日你娘，你不收，给我吃了！"

权力的横行霸道加上农民的愚昧酿成了蒜薹事件。本文所以冗长地记述这一事件，在于说明舆论制约体系能够造成骇人听闻的后果。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这类事件虽然是罕见的，但权力人物如果不关心群众的疾苦，无视群众利益而一意孤行，也可能激起群众的抗议事件。在上述事件中，权力的肆虐是它的导索，农民的粗暴又践踏了法律，最后县长被撤职，县委书记被停职检查，有17个违法分子被逮捕，舆论的制约终于对滥用权力和一切违法行为作出严厉的裁决。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权力机构能够作到有组织的自我评议，即自觉组织广大人民群众评议政府的工作和干部的政绩。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办法，多层次、多渠道地广泛搜集群众意见，进行集体"会诊"。同时根据群众提出的意见制定改进措施，及时向群众通报。权力机构组织自我评议，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调解、自我完善的机能。权力人物只有主动地、有组织地、经常听取人民的呼声，才能使权力按照人民的意志运转。

有组织的评议通过各种媒介让人民群众充分发表意见，设立各种机构按时召开咨询会、座谈会、调查会、信访会、听证会及各种接待活动，使"群众的要求和呼声，有渠道经常顺畅地反映上来，建议有地方提，委屈有地方说"。报纸、广播电视开

辟读者和听、观众来信专栏或专题，让人民的希望与追求能登大雅之堂。通过这些方式搜集到的群众反应最强烈的问题，都是权力行使的故障或隐患，只有认真调查研究，及时发现、纠正暴露出来的疏漏、劣迹，才能保证权力机器的正常运行。

民主评议干部能够发挥舆论监督的威力，突破封闭式考察干部的方法，造成优秀人物脱颖而出的良性竞争环境。群众评议权力人物的素质、能力、政绩，公论是非，使一批德才兼备的栋梁之才被推选到领导岗位，而一些无所用心、无功受禄的干部再也无法混下去。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尽管我们强调干部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但是选拔的方法不大对，没有真正走群众路线，而是靠后台势力任命，这样官僚主义、干部特权等社会问题都难以真正解决"①。运用舆论评议方式，按民意选拔干部是社会主义区别封建主义的重要原则。一切专制制度都实行终身制、接班制和指定制来转移权力，这种权力私有、权力专有的腐臭，始终引起人民群众的严重不满。在当代中国逐步通过评议方式对权力更迭进行制约，直至实行真正的民选制，必将促进舆论的平稳，强化权力运行的健全机制。

（三）控告制约方式

人民不可侮，民意不可欺，人民意志的神圣与威严不能忍受任何凌辱。当权力超越法律、践踏人民的基本权利，而人民的评议方式又不能发挥制约作用时，人民将采用控告的舆论方式，把他们的遭遇、不幸与悲哀反映到上级或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由于社会最高权力机构是人民的靠山、后盾，人民在下层遇到的不幸无法解决，只能从上层权力机构寻求保护。社会主义消灭了"官官相护"、"上梁不正下梁歪"的官僚政治体系，但并没有彻底清除这种现象。在一般情况下，人民的正当申诉通常得到国家最高

① 高放：《社会学与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年版，第48页。

权力人物的同情与支持，人民采取控告形式就成为制约各级权力违法乱纪的有力手段。

一些权力人物由于私欲膨胀、专断蛮横，常常把民意视为儿戏，有时连资产阶级启蒙主义者提出的原始民主观念都毫无所知，在他们的臀部就难免不带有封建阶级的印记。英国近代启蒙思想家哥德文说："如果要把政权限制在实际可行的最狭窄的范围之内，我们就必须当心怎样让它在民意的领域中能够自由行动。民意是人类本性的堡垒，或者更不如说是人类本性的庙堂；如果它遭受污损，世界上任何神圣和崇高的东西也就都不存在了。"① 权力使民意遭受污损，人民不会忍受屈辱、欺压和愚弄，就将运用一切控告手段申诉自己的不平，揭露强力的丑恶、放荡、贪婪与胡作非为。

国营某工厂扣发一女工产期工资，当女工向厂长询问时，厂长说："现在是厂长责任制，我有这个权……"全厂职工不能容忍这种霸道，纷纷上告，为女工鸣不平；某人当选厂长以后，竟然把没有投他票的6名工人开除。工人连名上告，以权逞狂的新厂长被撤职；某工商局长在办公大楼竣工时祭鬼拜神，带领全局干部举行"谢土大典"。局长与副局长衣冠楚楚，在摆满供品八仙桌前双手合十，跪拜上香，祈祷明神保佑。祭典持续3天3夜，挥霍1万多元，摆了30桌酒席。正当这位局长念念有辞，自明得意之时，全市人民测目而视，疾首蹙额，一封封检举信飞到市纪检委，舆论终于把玩神弄鬼、挥霍国家财产的权力人物哄下台去。

控告制约方式有多种多样的形式，人们广泛利用这些形式表达愤慨的斗争精神，形成一股无法抵御的精神力量。集体上访，连名写上诉信，纷纷寄送揭发材料，结队请愿，设立"意见箱"、"密告箱"等等，都是控告制约的强有力手段。控告的巨

---

① 《政治正义论》，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52页。

大约束力在于使更高一级的权力机构为民申冤，对下级权力人物的违法乱纪行为作出处理，这样，舆论制约很快由非正式制裁转化为正式制裁。众怒难，犯众志成城，人们接连不断的控告就可能使任何无法无天的权力人物陷于群众愤怒的深渊。

以上，是就一般情况而论。由于在社会权力结构中，仍然局部存在一片片相互包庇的关系网，控告并非都能很快产生制约作用。某些遭受打击迫害的人告状几年，才能申张正义，这就需要一定时间、一定规模的舆论声势引起国家最高权力人物的注意。舆论力量同其他力量一样，有时同样要经历曲折漫长的道路，才能显示出自身的强大威力。

（四）“全民合议”的制约方式

全民合议是通过公民投票的数量或讨论裁定权力机构决策和权力人物当选的方式，显然，这是民意制约权力的程序最简单、效果最容易鉴别的一种手段。

全民合议是群众民主政治的重要形式。人民直接或通过代表参与国家重大提案和人选的表决，是体现人民意志的最有效的办法。一张张票面，就是无数人意志的象征，它们汇集在一起，体现出人们完整、坚定的意见。“每个人在投票时都说出了自己的意见，于是从票数的计算里就可以显示公意。”① 近代运用公民投票决定公众事务发源于瑞士，几百年来，这个国家一直运用这种方式决定国家的重大问题。在当代西方发达国家中，全民投票成为解脱政党纷争的最好办法，但有时投票者也要利用公决开开玩笑，使民主政治大爆冷门，让那些并非有益于国家的提案或无名之辈获得通过。

全民合议是社会主义民主制的目标。从人民民主的机器上拆掉全民合议，民主仅仅成为一个美妙的名称。马克思、恩格斯早在论述巴黎公社时就指出，人民有权通过投票选举或罢免无产阶

① 卢梭：《社会契约论》第132页。

级政权中的"公职人员"，"国民代表的选举会不再是总揽一切大权的政府玩弄手腕的事情，而是组织起来的各公社的意志的自觉表现"①。通过全民合议，决定社会重大事项，又是社会主义发扬民主、制约权力的重要途径。

历史的复杂因素使人们往往脱离宽阔的大道而走上崎岖、乱石嶙峋的危途。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在建立以后，盲目地推行一切由上边决定，由国家包办一切的制度。抛弃全民合议的途径决定国家大事，就很难避免由于脱离人民的智慧而限于少数人专断空忙，轻诺寡信。实行全民合议，是人民自己决定国家大事，也就是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它不仅能制约权力的恣意横行，而且激发人民以主人翁的姿态认识自己的社会责任，努力参与国家管理。所以，全民合议是社会主义权力运行的基础与前提，合议将裁定权力机构如何管理国家或采取什么方式管理国家。

波兰在80年代中期举行了一次全国规模的关于国家改革方案的公民投票。投票情况表明，多数公民赞成以民主形式就有关民族生存的重大问题作出决定。这次民主尝试虽然投赞成票的人没有超过总公民人数的半数，但政府看到了人民对改革的真诚希望和迫切要求，在依靠人民决定国家命运的道路上迈出坚实的一步。

公民合议在推选权力人物的选举中，具有巨大的制约力，因为公民以投票或讨论的方式确定社会各级管理者的人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才能在公民中享有真正的权威。列宁说：苏维埃是新式国家机关，"这个机关的成员不是经过官僚手续而是经过民意发生更换的，所以它比以前的机关民主多得多"②。"任何由选举产生的机关或代表会议，只有承认和实行选举人对代表会议的罢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15页。

② 《列宁全集》第26卷，第84—85页。

免权，才能被认为是真正民主制的基本原则”①。人民用选票表达共同意见，筛选社会公仆，是制约权力最深刻、最有效的形式。人民通过公决投票把权力赋于最优秀的人，也就从根本上保证权力不会走向败坏。由人民投票推举出来的权力人物总是把人民举在自己的头上，鞠躬尽粹；由任命制指定的权力人物就可能把任命者举在头上，而把人民置于脑后。前者为众人埋头苦干，尽职尽责，而后者可能只为一人、为获得提拔他的那个人的赞赏小心翼翼地作着应景文章。

三、舆论生态及权力对舆论的控制系统

当代中国社会舆论的不稳态包含着大量错误的舆论，不稳态有时呈现出舆论的无序运动，随时都可能影响人际关系和各种利益集团的和谐，从而破坏人们协调的社会生活，使社会秩序陷入混乱。社会权力机构不只是处于受舆论制约的被动状态，所谓受舆论制约，是指受正确舆论的监督、约束，使权力不致走向败坏。而在整个社会生活管理中，权力始终肩负着控制舆论，促进各种舆论向有利于四化建设方面转化的重任，使舆论生态不断趋于平衡。

舆论生态，是指舆论形成的人际环境和促进舆论有序发展的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状态。如果这种状态趋于平稳、和谐，人们就容易在一个共同体内相安无事地生活、工作。舆论生态失调，各种意见尖锐对峙，互相讨伐，安定的社会环境就要遭到破坏。“生态”一词源于希腊文“OICOS”，寓意是“环境”、“区所”，一些生物学家首先用这个词解释生物体居住条件、物种构成与周围环境的关系，创立了生态学。不久人们把生态学的原理扩展到其他科学领域出现了“人口生态学”、“城市生态学”、“社会生态学”、“文化生态学”等等。由于人不能脱离环境而

① 《列宁全集》第26卷，第314页。

生存，任何社会制度不仅被容纳在一定自然环境中，而且不断滋生、形成各种社会环境。环境决定着人的活动，人又不断适应、改造环境，这种相互作用揭示了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

舆论不仅借助一定的“场”才能形成，而且它的传播、壮大与消失都受一定社会环境的制约。一定社区中人们的文化素养、相互交往方式、生活方式以及生活传统、习俗和浪漫主义的热望，都促进某种意见转化为强大的舆论或使之消失。在我国当代社会中，由于四化建设的突飞猛进、一些地区物质与精神生活的巨变，加上电子通讯工具、新技术和高技术在某些生产、生活领域的应用，使舆论的产生与传播在不同空间发生不同的效应，具有不同的速度和方向，同一种事物在不同环境下就可能引起不同的反响，造成舆论生态的反差。

海盐衬衫厂厂长步鑫生被免职在不同环境中引起不同强烈反响，婉如“一石击水，突如其来，舆论哗然，议论纷纷”。一位副市长曾题诗再现了由步鑫生遇到的波折所引起的舆论生态失调的景况，诗中说：“一马不行万马喑，一马奋蹄万马奔。人有功时莫乱捧，人有过时莫胡评。拔苗助长固可恨，恶言冷语更可憎。非佛非仙是凡人，超越自我休沉沦。”一事出现，各地胡捧胡评，莫衷一是，尤如晴天霹雳，平地风波，使人不知，所然舆论生态也就遭到破坏。

在改革中，一批深得观众、艺术家、客商好感与赞美的女模特儿享有艺术的自豪感与优越感，他们的心情是喜悦的。但不同文化水平的人对模特儿有截然不同的舆论。江苏省六合县19岁的农家姑娘陈素华1985年被南京艺术学院招聘为模特儿。她因病回家休养，农村人却把模特儿当作娼妓，天天有人在背后斥责她，甚至当面羞辱。陈素华由往日的荣耀到今日的“受辱”，评说突变，人言可畏，被逼得精神失常。这位艺术庙堂的雅秀，在几天之内被舆论折磨成神情恍惚的疯姑。不同环境中舆论的迥然变

化，使人突然陷入判若天渊的舆论生态，使其无法承受反差的刺激，而造成神经紊乱。

舆论生态失调的后果，对整个社会的刺激也是如此。如果大家非常熟悉、非常赞同的意见突然在几天之内被另外一种相反的意见所冲击，就要人心浮动，议论不休。同样，如果若干省、市广大群众对某一事务所持的观点大相径庭，作为全国或一省的舆论生态平衡就被破坏了，人们面对各种相反的议论懵懵懂懂，无所适，从随之也就要出现风潮变幻，动荡不安。

要维持人心稳定、社会安定，社会权力机构必须对错误的舆论采取控制措施，使初级阶段多样态、不稳态的舆论在社会这个大容器里保持相对平稳。控制舆论，正是指把那些错误的、无序的、容易引起哄然喧豗、四方鼎沸的意见转化为有序、平稳的状态，尽量减少舆论不稳态的冲击力。

恩格斯说："社会力量完全象自然力量一样，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和考虑到它们的时候，起着盲目的、强制的和破坏的作用。但是一旦我们认识了它们，理解了它们的活动、方向和影响，那末，要使它们愈来愈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这就完全取决于我们了。"① 舆论生态平衡的规律支配着多样态和不稳态的舆论，如果运用一定方式把舆论的多样态与不稳态纳入平衡态的轨道，就能使社会舆论出现有序、平缓的发展趋势。社会舆论保持平衡，是社会信息流动的方向与比重趋于合理的结果，反映正确意见的信息流动得越充分、广泛，并占据社会的主导地位，错误舆论就能受到有效的控制。由于信息源、信息传播、媒介的把关等各种因素都对舆论的形成、发展起重大作用，那么，舆论控制的方法也必然是多种多样的。

（一）黑箱控制方法——耗散结构的自控效果

一般控制论运用的是"黑箱"控制方法，再没有把舆论的兴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04页。

起、演变比作“黑箱”更为恰当的了。人们简直无法搞清楚，为什么会在某一地区突然流行一种意见，究竟是由哪些人首先持一种观点而被大家所接受。如果让我们精确地把握一种舆论是在哪个房间，由哪个人、哪个直接线索造成的，这就成为十分困难的课题。实际上，舆论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由社会情绪蓄之过久、同时一哄而起的，人们接受某种见解也是从许多人那里断断续续收到同一种信息逐渐生成的。我们很难对舆论内部的详情直接观察，搞不清楚它的许多具体细节，权力也就无法制止某个舆论从众发表意见。但是，权力可以针对它的信息输出和输入行为采取针锋相对的措施，输出或输入相反或相应的信息，以抵消错误舆论的影响，这就是一种“黑箱”的控制方法。

正如控制论研究者所阐明的那样，“‘黑箱’意味着，在现有的知识水平上，不可能深入到规定系统（子系统）的内部之中去探索其奥秘，或者不可能搞清楚改变系统的输入与输出的内部规律性是怎样的。只能研究这些输入与输出的行为，即研究输出的变化对输入变化的依赖性。”① 控制错误舆论，要针对舆论活动的方向、力度向舆论主体群输入与之相反的舆论信息，即正确的舆论信息。正确舆论信息量输入越多、越大，就能有效地使抱有错误意见的人改变态度或使错误意见限制在狭小范围内。错误舆论主体和权力人物所代表的正确舆论主体如果都是开放系统，相互间就会不断进行信息交换，而交换的典型形式则是耗散结构。当社会内部出现多种、混乱的信息交换系统，如果权力机构从四面八方大量输出信息，并占据压倒一切的优势，舆论生态就产生突变，由无序走向有序，形成耗散结构，舆论生态的平衡便趋向完成。权力面临各种错误舆论的冲击，应当加强正确舆论的发散力，向错误舆论的主体不断输入正确意见，使之在耗散结构的信息交换

① 〔苏〕A·M·奥马罗夫：《社会管理》，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2页。

中产生自控能量。这种自控连续加深，社会舆论活动就会逐渐趋于稳定性和有序性。

如果权力驾驭的正确舆论系统是封闭的、孤立的、死板的，错误舆论也就越加活跃，越能对社会施加影响。耗散结构理论证明，有高度组织性的系统必须是开放的，任何有机体 其 中 包 括人、动植物和社会都是具有耗散结构的开放系统，因为，只有通过不断与外界交流能量与物质，才能生存与发展。在耗散信息交换中，哪种舆论主体发散的信息量大，占据压倒优势，哪种舆论就占主导地位，其他舆论就处于被控制状态。1986年末我国兴起一股学潮，一时蔓延十多个城市，外国报纸、广播电台进行了大量报道，其中有许多内容具有煽惑性，刺激了国内部分青年学生中负向舆论的增长，舆论范围不断扩大。而我国的所有宣传工具却保持沉默，这种封闭系统采取非耗散方式封锁自己的信息，而让外国新闻媒介的信息畅行无阻。来自国外的对舆论黑箱输入的信息，支配了一些青年学生的舆论方向，左右了我国一部分人的意见。后来虽然我国新闻媒介作了报道和舆论疏导，但先声夺人的优势已经失去。控制论的创始人维纳对于发出自己的信息和阻塞"敌方"的信息的重要性作过精湛的论述，他指出，"保密、消息干扰和虚张声势的整个技术，它所关心的就是保证自己一方比另一方更能有效地利用通讯的力量和手段。在斗争中使用信息的时候，保持自己一方的消息通道畅通无阻和使敌方的可用通道受到阻塞，是同样重要的。"① 如果颠倒了这 一 原 理，让"敌方"的信息通道畅通无阻，却把自己的信息通道严密封锁起来，无疑是一种舆论控制的"束手待毙"的策略。

权力机构不断运用耗散结构规律输出正确意见、抑制错误意见，能使每个接受信息的人"超出身边的事 物 而 看 得 更 远 一些……不致于陷入自满自足的'客观性'。这种'客观性'不能

① 《维纳著作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117页。

看得比自己的鼻子更远，因此恰恰是最狭隘的主观性，虽然它是成千的这种人都具有的”①。正确意见不断输出大量信息，使个人能够突破原来接受的少量信息所获得的“客观性”，群众的主观认识活动也就能自动靠拢权力机构发出的强大信息，逐渐接受社会主导舆论指示的方向，使错误舆论陷入自控状态。很明显，这种自控效果来自信息的耗散结构功能。

（二）意见领袖控制——分享新鲜意见

在众多的舆论主体上耸立着舆论领袖集团，每个社会、每个政党、每个大型社会团体都有自己的意见领袖，他们系统、深刻、尖锐地表达某种意见，获得多数人的赞同，成为舆论的旗手和先锋。在社会主义社会，舆论领袖必然是忠于人民的思想家。

意见领袖没有身份限制，只要在社会中享有一定权威，他们的意见就能支配一些群众。这些人往往具有显赫的社会地位，渊博的学识，或为人民建立过一定功勋，深受人们的敬仰。他们通常是由那些高级领导人、学者、民主党派人士、社会团体负责人、劳动模范、各类名人等组成的。当然，并不是所有上述人员都能称得上意见领袖。意见领袖还必须具备深邃、缜密的思维能力，善于对时事政治、社会思潮、世态炎凉、人生价值及时作出深刻的分析，富有笔底波澜、谈锋犀利、诤言留训的表达力。先进人物、学者、社会贤达发表的意见常常能够征服群众，指导群众，从而能够扭转群众原来的态度和意见倾向。

舆论领袖发表意见，所以能有效地控制错误舆论，不仅在于他们在群众中享有权威，而且由于他们的言谈能够提供许多新的见解，开阔群众的视野，把群众吸引过去。在人们的相互交往中，意见往往是分享的，只有新鲜而有价值的意见才能受到群众的欢迎，产生分享的心理追求。意见领袖的言辞闪耀真理的光焰，征服人们的信念，统一人们的意向，舆论生态也就很快趋于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256页。

整体匀衡。相反，如果意见领袖总是重复陈辞滥调，就不能激发群众，产生明显的舆论控制效果。舆论领袖重复过时的意见，旧观念的灌输和现实的矛盾在代际的情感需求中引起公众的强烈反感，这不仅不能遏制错误舆论的蔓延，而且要产生大量的逆反性的下层舆论。维纳提出："陈辞滥调的流行并不是偶然的，而是由信息的固有特性决定的。信息的所有权必须忍受这样的不利情况：一些信息要能够对社会的信息有所贡献，就必须讲出某些同社会已储存的公共信息具有实质性差异的东西。"①维纳举例说，即使伟大的古典文艺作品，也已失去了许多明显的信息价值，其原因仅仅在于公众已熟知其中的内容。意见领袖如果给公众指出一些新鲜意见，使他们发现了新的真理，原来的谬误态度就要发生转变，使错误舆论受到遏制。意见领袖正是用他们在群众中建立起来的威望和有价值的新鲜意见，对人们发生影响，控制群众的态度。

（三）组织控制——协调意见

社会中各种意见交叉有时会发生尖锐的对立和冲突，在必要时，权力机构要采取措施从组织上协调意见，使某些群体消除错误的观点，放弃错误的态度。

协调意见是一种有组织的活动，由具体领导者和群体或团体建立密切联系，通过协商或说服达到观点一致。政治工作人员、辅导员及各种思想工作者都担负着统一某个团体成员思想的工作。由众多的这样的工作者统辖几百、几千个社会组织就能在更大范围内引导人们形成一致意见。当社会出现错误思潮，对社会问题议论纷纭的时刻，社会权力机构发动社区单位、厂矿企业、学校街道等具体部门就某一问题开展讨论，由大家对错误意见进行分析，引导群众对错误意见进行批评，就能使某种错误舆论的主体在群众广泛一致态度的制约下改变原来的意见倾向。

---

① 《维纳著作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第107页。

协调意见必须沿着一定取向进行，也就是说，把人们的意见往哪个方向协调，协调的基点是什么。无庸争辩，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种意见都要协调到有利于现代化建设、社会安定，促进社会民主与精神文明的发展方面来。如果把意见协调到个人专断、让先进服从落后、让多数人利益服从少数人利益，这就颠倒了协调目标，这不仅不能控制错误舆论的发展，促成舆论生态平衡，反而要造成新的舆论不稳态，加深舆论生态的失调。意见协调的组织活动只有立足于社会进步和时代要求，才能把不同意见逐渐统一起来。协调不能以新的失调为代价。

（四）法律控制——防止负向行为舆论的侵害

就一般而论，对舆论不能诉诸法律手段，因为用强硬手段压制人们说话，不仅办不到，反而要激起尖锐的舆论。这里所说的法律控制，是指对绝食、静坐、怠工、罢工、游行示威等错误行为舆论的范围、影响加以限制，使这类激化的舆论方式在法律范围内活动，防止造成严重的破坏后果。

西方社会学家把法律控制称作"正确的社会控制方法"。戴维·波普诺认为："现代社会创造了专门从事社会控制的组织和职业。这类职业包括警察、法官、监狱看守和律师。立法者、社会工作者、教师、牧师、精神病医生和医生，因为他们责任的一部分也在实施社会控制。在现代社会控制中，这种正式职业网已经超越了非正式社会控制过程。社会控制从而已变得更加非个人化了。"① 破坏性的行为舆论往往使其主体的情感失去控制，在激怒中发生暴力行为，冲击国家机关，破坏国家财产，引起社会秩序混乱，侵害公民的安全和正常的社会生活。国家公安机关必须依法干预这种破坏性的舆论举动，维护社会秩序，对严重的肇事者依法惩办。在这类行为舆论刚一发生，就要出动警察严加防范，并劝导舆论遵从者注意法规约束。限制、制裁超越法规的舆

① 《社会学》上册，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65页。

论活动，是整个社会控制的组成部分，不仅治安人员、而且一切社会成员都有义务动员起来说服采取过激舆论举动的人按着法律表达意见，否则就要践踏民主，给国家、人民和自己带来灾难。

1970年12月，波兰几个城市的工人举行一次规模浩大的抗议活动。“这种抗议长期以来随着生活条件的恶化，无视工人的意见，处理社会重大问题独断专行的作风，领导和群众（包括党员群众）缺乏对话等等情况而日益高涨起来”。“罢工和示威的直接原因是工人阶级不赞成大幅度提高肉价这样一个经济性的决定”，而且由于“错误的判断导致了‘匆忙地大规模动用军队，而且几乎从事件一开始就下令使用武器’①。事件的严重后果使每个波兰公民深感惊骇与痛悔。在这次事件中死亡45人，伤1165人，治安机关在沿海地区抓了2 980人，其中2 843人后来被释放，其余是涉嫌抢劫者118人，袭击犯13人，纵火犯8人，非法持有武器者4人，犯有其他罪刑者3人。物质损失约为4.05亿兹罗提，烧毁公共建筑物19座，包括两个城市的省委大楼；毁坏民用车辆47部，军用和警车几十部；烧毁和捣毁商店220家。

行为舆论放任自流，不受法律约束，必然使社会公共生活受到破坏，生命财产遭受损失，权力机构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制止。世界各国、没有任何一个郑重的政府允许游行示威、罢工罢课可以横行无阻。美国宪法规定“没有引发危害公共秩序导致暴乱的自由”、“没有扰乱学校安静上课的自由”。法国有关法律规定，在公路上一切游行都要事先申报，申报中要写明游行的主要组织者，家庭住址及游行的目的、日期、小时、参加的组织和经过的路线，省长和市长认为游行的性质能扰乱社会，秩序有权予以禁止。但申请者可向行政法庭提出关于越权的起诉。在法律上被视为非法的游行或聚集，可用武力驱散。英国政府制订法

① 〔波兰〕沃依切赫·盖乌任斯基、莱赫·斯泰凡斯基：《波兰团结工会成立记》，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2年版，第2—3页。

规；要求和平游行不能阻塞街道、无视别人的权利；警察首脑根据游行的时间、地点、路线，认为有可能引起严重的社会扰乱时，可以向游行队伍发出指令，规定要走的路线和禁止进入的公共场所；对于违反禁令或煽动参加这种游行的人，可以判罪。

我国宪法明文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但同时又规定，国家维护社会秩序，禁止任何人利用任何手段扰乱社会秩序。聚众扰乱车站、码头、民运航空站、商场、公园、影剧院、展览会、运动场及其他公共场所，聚众堵塞交通或者破坏交通秩序，抗拒、阻碍国家治安管理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聚众打砸抢，以暴力或其他方法、包括用“大字报”、“小字报”公然侮辱他人或捏造事实诽谤他人，以反革命标语、传单或者其他方法宣传、煽动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都是触犯刑律的犯罪行为。司法机关对这种破坏法律的极端行为舆论要追究责任。在初级阶段，制定有关示威游行的具体法规，按照法律疏导、限制人们的极端舆论活动，是控制错误行为舆论的必需手段。

社会权力对社会错误舆论的上述四种控制方法和要素，构成了一个完整系统，其整体功能的实现必须依赖各种方法、要素的互相补充与配合。当一种方法在自己活动的领域和对象发挥作用时，同时对其他领域或对象也能产生一定的良性影响。所以，这四种方法是要素齐备、功能相互衔接的整体控制系统。面临错综复杂的舆论多样态和不稳态，仅仅用一种控制方法就很难达到理想效果，只有多种控制要素和方法相互配合使用，才能使社会舆论从无序走向有序，从舆论生态失调走向协调。

由此可见，每个控制方法和要素单独使用，其功能都是有限的，这样，就不能任意夸大其中某种方法的应用范围和目标期望。如果人为地扩大某一要素或方法的特定功能，不是失去应有的控制作用，就是要造成无法挽回的负效应。

第三节　舆论畅通——架设民主的桥梁

古希腊文“δηнklzazia”一词的演化，简单而深刻地再现了民主与舆论的关系，二者除去表达角度的差别，当时实际指的是同一个事物。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一切享有充分权利的公民，都可以直接参加或通过自由选出的代表去讨论和决定关系到该共和国命运的重大措施”①，这种舆论活动被称作“δηчk aziα”（民主），这是民主一词的来历。社会主义民主是指人民有参与、决定国家大事的权利，而舆论畅通，即鼓励群众自由讨论国家事务，无疑是架设民主的桥梁。如果人民连说话的权利和机会都没有，奢谈美妙的民主制不过是画饼充饥。因此，“社会舆论形成和表达的特点是与社会主义民主制的发挥作用联系在一起的。代表制民主和直接民主这两种形式和谐统一，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特点。这些形式可以当作形成和反映社会舆论的方式，同时也可以作为旨在表达劳动人民意志的各种（政治的和行政的）方法的总和”②。

邓小平同志在批判极左路线时曾指出：“一听到群众有一点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要追查所谓‘政治背景’、‘所谓政治谣言’，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这种恶劣作风必须坚决制止。”③限制人民的发言权，不准发表不同意见，实行舆论禁忌，所谓的民主，不过是虚有其表而已。

当然，社会主义民主绝不能走西方“三权分立”、“议会选举”的老路。西方民主制是资产阶级多党制的产物，民主权也就

---

① 〔苏〕罗伊·麦德维杰夫：《论社会主义民主》，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8页。

② 《社会学手册》第120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135页。

是财产占有权。任何民主，就像一般的任何政治的上层建筑一样，归根结底是由该社会中的生产关系决定的①。发展中国家由于进步的政治势力缺乏经济实力，物质基础薄弱，生产方式落后，实行西方的"民主实验"无一不发生夭折。从60年代初期到70年代中期，第三世界接连发生的104次武装政变，彻底粉碎了这些国家追求英美式民主的狂想，民主实验纷纷导致军人专制。在古希腊，民主是贵族和平民共同参政的形式，成为奴隶主民主制的标本；在近代，资产阶级用"议会民主"限制王权、贵族势力，确保了资本家的共同统治，但却堕入金钱操纵政治的畏途。这两种民主制都是人民群众无法涉足的"彼岸世界"，社会大多数人不能对少数执政者实行根本、有效的监督与制约。

社会主义民主是人民群众广泛参政的权利，但这种民主又处于不断发展、不断完备的过程。在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民主主要表现为人民管理的参与权和在宪法范围内的言论自由权，用列宁的话说，国家是"大多数人统治"，"全体公民可以自由发表一切意见"。大多数人统治并不是每个人都直接掌握权力，而是通过他们选举出来的优秀人物和提出的各项建议对国家实行管理，那么，只有允许"自由发表一切意见"，人们才能推选出大家拥护的管理者，提出各种合理建议，真正实行"大多数人统治"。无庸置疑，放手让群众讲话——使社会舆论畅通，必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民主的桥梁、形式与保证。

一、赋于人民知情权

知情是形成正向舆论的前提。只有让人民知道国家管理中的重要情况，人民才有可能形成正确舆论，维护国家的意志，使下层舆论与上层舆论趋于统一。党的十三大文献中特别强调，要

① 参看《列宁全集》第32卷，第69页。

"提高领导机关活动的开放程度，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让人民讨论……。"

赋于人民知情权既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内容，又是形成社会舆论的起点，因为只有让人民知道情况，人民才能称得上真正的主人，才有可能发表意见。对人民封锁消息，实行密秘政治，民主和舆论都要失去基石，人民必然处于被愚弄、被蒙蔽的地位。

封建专制统治者历来主张，"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任何秘密政治都是见不得人的政治，对广大人民群众封锁消息，欺罔诓骗，是阴谋政治的历史逻辑。当历代独裁者实行罪恶剥削、榨取人民血汗、从事暗无天日的政治统治时，他们的一切勾当对人民都守口如瓶。人民不知情，就无所论，他们那种岌岌可危的统治才可能苟延岁月。让人民知情还是不让人民知情，是社会主义民主区别其他民主的根本原则之一。列宁在谈到社会主义报刊应当把劳动实践中提出的各种问题公开报道时，对这一区别作过十分鲜明的对比，他指出：

报刊应当成为劳动公社的报刊，也就是说，要公开报道资本主义企业的领导人曾经竭力不让群众知道的东西。在资本家看来，他们企业的内部组织是一种不能让局外人知道的商业秘密，在那里他们想作总揽一切、独断独行的人物，他们不仅不准外人批评，不准外人干涉，而且也不许外人看见企业内部的组织。在苏维埃政权看来，恰恰相反，各大企业和农村公社的劳动组织，正是整个社会生活中最主要、最根本、最迫切的问题。报刊应当成为我们加强劳动者的自我纪律、改变资本主义社会陈旧的、完全无用的工作方法或偷懒的首要工具，通过报刊来揭露各个劳动公社经济生活中

的缺点，无情地评击这些缺点，公开揭露我国经济生活中的一切毛病，从而呼吁劳动者的舆论来根治这些毛病①。

让人民知道国家机构中权力运行的内部或外部情况，实行政治、经济及全部社会管理的公开化，是推行民主与舆论开放的两个不可分离的侧面。不公开，人民就无法知情，公开化也就成为一切清明政治的基本要素。公开化，是指公开、坦率地向人民说出一切情况，当然把任何国家事务毫无保留地向人民开放是做不到的，也没有这种必要，但是，涉及全民切身利害的"重大情况"就应当让人们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在发表《共产党宣言》这一不朽著作时就公然申明，共产党人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列宁早在1902年在阐明"广泛民主原则"时提出，广泛民主原则"要包含两个必要条件：第一，完全的公开性；第二，一切职务经过选举"。他认为，"没有公开性而来谈民主制是很可笑的，并且这种公开性还要不只限于对本组织的成员公开。……然而一个对所有非组织以内的人严守秘密的组织，谁也不会称之为民主的组织"②。根据列宁的上述观点，我们很容易了解，公开化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内涵。各级政府的活动只有面向群众，真正开放，人民才能由知情转化为意见，在民主气氛中对权力进行舆论监督。这样，人民的知情权、发言权和监督权便成为社会主义民主的三项重要内容。

舆论活动本身，基本是由"知、言、意"三个环节构成的。不知就不能言，只有言，人民才能表达统一的意志。我国先秦墨家的意识观，就把"知"作为意识活动的基础，并将"知"划分为"闻知"、"说知"和"亲知"，以"知而不以五路，说在久"作为意识活动的准则。没有"知"，人的一切行为都谈不

① 《列宁全集》第27卷，第186页。

② 《列宁全集》第18卷，第347页。

上，既不会产生共同的意识——舆论，也不会形成对国家活动的参与。

列宁说："一个国家的力量在于群众的觉悟。只有当群众知道一切，能判断一切，并自觉地从事一切的时候，国家才有力量。"① 人民群众能够自觉地理解权力机构下达的指令，才能以一致的行动响应国家号召，而这一切都建立在"知道一切"与"判断一切"的基础上。知道一切是判断一切的前提与对象，而判断转化为众人的言语行为也就是舆论。国家把重大情况定期向人民报告，允许人民了解党的大政方针及其贯彻情况，甚至及时向人民实事求是地介绍国情、省情、县情以及各条战线的情况，不仅报喜，也要报忧，让人们进行共同判断，切实提出批评建议，国家的强大也就从人民群众的普遍关心与热情建议中显示出来。正如古人所说："有谔谔争臣者，其国昌；有默默谀臣者，其国亡。"② 在今天，更何况谔谔直言者已经扩大到全体人民呢！

用"塞情"取代知情，常常成为上下不协调、左右不和谐的重要因素。上之为政，得之下情则治；下之为民，得之上情则顺乎也。群众不知上情，往往议论四起，蜂言飞散，闹得人心惶惶。当领导机关把国家各种矛盾、处境、现状真实向人民说明，人民深知内情，就能从实际出发对权力人物的领导活动作出客观评价，并对权力人物给予积极的支持与协助。权力运行一旦失误，人民深知失误造成的主客观原因，负向舆论产生的机遇性就大大减少。某些权力人物或权力机关常常把应该告诉群众的事情束之高阁，严密封锁，这种封闭的工作方式不仅割断了与外界的信息交换，而且严重脱离群众，使上下级之间、领导与群众之间产生

① 《列宁全集》第26卷，第234页。

② 汉·韩婴：《韩诗外传》卷十。

隔阂、磨擦，引起大量负向舆论。

保证群众的知情权，不仅是上下信息的对流问题，人们对左右邻舍情况的了解也是知情权的重要方面。意见与观念的横向流动有助于眼界开阔，触类旁通，顾全大局，促进社会各部门的意见和行动的协调。因此，人民的知情一旦做到全面、深入、真实可靠，全社会对许多问题就能取得一致的态度，形成一致的舆论目标。在学潮中，许多青年学生由于对国家改革现状、人民的生活变化了解不深刻、不具体，产生偏激情绪。他们参加了丰富的社会实践，看到农村、城市、乡镇的巨大变化，了解了农民群众的人生价值，看到广大群众对中央方针政策的热烈拥护，以及劳动人民务实、耐劳、吃苦的精神，开始对自己上街游行的行动进行认真反思。自认为独立思考的一代，才开始真正地独立思考；一度迷惘的大学生清醒了，恢复了对党的信任。

保证人民的知情权，实行公开政治，就要破除"个人迷信"、"包办代替"、"高高在上"的官僚主义作风，使中央的声音直接传达到人民那里。人们从正当渠道了解国家大事，小道消息、小广播、谣言与出口转内销的歪曲信息就会失去存身之处，社会舆论也就趋于正确、稳定。权力运行的公开程度越高，人民也就越能知情、知政、知人，越要郑重地对待自己的主人翁地位，理智地判断一切，从而诉诸正向舆论。那些小道舆论盛行的地方，正是权力机关封锁消息、不相信群众、无视群众知情权的部门。大道不畅，小道四通八达，意见泄露也就要采取变态形式，各种风言风语，汹汹浇浇，扰乱人心，酿成多事之秋。邓小平同志曾尖锐地指出，这种情形往往是缺少民主的表现，他说："现在党内外小道消息很多，真真假假，这是对长期缺乏政治民主的一种惩罚"①。这种负向舆论扰乱群众的思想，分散人们的

① 《邓小平文选》第134页。

注意力，有时，即使权力人物讲了真话，群众也不再相信。扭转这种舆论趋势，关键在于公开政务，充分利用各种现代化舆论工具增加国务与政务活动的报道，凡是人民群众应当知道、愿意知道的情况都要告诉人民群众，活跃"大道"舆论，为开创社会主义的广泛民主奠定第一块基石。

二、释放"群众议政"的能量

群众获得知情权，随之就要出现群众议政的万马奔腾的热烈气氛。议政，便成为下层群众参与国家管理的普遍形式，这是一切民主政体的特有现象。在当代中国，广大人民群众，既是国家大政方针的执行者，又是各项方针政策的间接或直接的制订者，群众议政的广度、深度和能量应当远远超过以往的一切民主政体。

相传我国远古"唐虞盛世"时代，氏族民主制就奉行"群众议政"的习惯，除了在朝庭设立史官、谏官自由评议政治，还十分重视来自民间的各种意见，曾一度出现"士传言谏过，庶人谤于道，商旅议于市"的议政盛况。由于人民议政情绪高昂，纷纷献计献策，尧舜才有可能广泛采纳药石之言，成为德才兼备、大智大勇的贤君，唐虞时代也就出现路不拾遗，国泰民康，老有所终，壮有所用的盛世。

凡奉行群众议政的权力，无不获得治世有道、建国有方的顺境，民得其福，国事昌明。日本明治维新运动开辟了日本近代史的经济繁荣时代，明治天皇的重大措施之一就是开放舆论，允许人民广泛议政。他颁发的五条改革"誓文"中有四条是有关群众议政、采纳舆论的规定，堪为打破封建皇室的祖宗家法，令朝野人士为之振奋。"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上下一心，盛行经纶，文武一途以主庶民，各遂其志，人心不倦；破旧有之陋习，基于天地之公道"等这些"誓文"内容，"足使日本获得独立的最

大国家所必须的措施”①。更为令人惊讶的是，日本天皇圣德太子早在公元604年颁布宪法时，就对群众议政奠定了法律基础，宪法第10条与第17条中规定，“废除专政、实现社会的一致，各级官吏应该和公众共商重要事务，民主作出决定”。圣德太子对群众议政还作出如下的理论说明：

人人有自己的意志。一个人可以不赞成另一个人所赞同的事物。的确，我们会有不同的见解。我不是圣人，他不是愚人。我们都是普通的人，即使一个人认为，只有他是正确的，他也应该接受多数人的决定。②

圣德太子这些民主思想在专制时代没有真正实行，但对后来的明治维新和日本资产阶级民主政体的建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此形成的“一主全民”的观念，成为日本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的思想基础。

我国近代思想家郑观应曾有《论议政》一文，缅怀三代“君卿大夫相议于殿廷，士民缙绅相议于学校”的盛举。他提出，凡有国事应效三代议政之遗风，仿泰西议院之良策，博采众议是国家长治久安之道。这种全民议政的理想，是中国近代民主思想的先驱，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应当使它放射出奇光异彩。

群众议政使整个社会成为“议院”，通过议政表达舆论，同时也就深化了人民的民主权利。群众广开言路不仅局限在身边事务，而且敢议大政，即对国家重大问题发表见解，这是动员群众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盛大进军。列宁指出：“数量的优

① 〔日〕吉田茂：《激荡的百年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81年版，第8页。

② 〔日〕森岛通夫：《日本成功之路》，经济日报出版社1986年版，第23、24页。

势，群众的力量是属于他们的，一切奋不顾身的、有思想的、诚实的、勇往直前的、正在觉醒过来的、建设新事物的、蕴藏着无穷的精力和天才的所谓‘老百姓’，即工人和农民的那种取之不尽的力量是属于他们的。”① 群众议政的能量就在于人民占据社会数量的绝对优势，无数个头脑总要胜过一个或几个人的头脑，智力的加减法简单地揭示出群众的集体智能远远超过少数领导者的智能。在各种范围内的群众中都有一批熟悉某种行业，精通某些技术的能人，其中还有一些熟悉社会、深刻把握社会动向的群众政治家。这些富有聪明才干的人和广大群众工作、生活在一起，不断从广大群众那里汲取智慧的营养，他们发表的一些见解虽然不见经传，却往往能一语道破事物的本质，堪为难得的真知灼见。

群众议政的能量不仅表现为群众发表意见给上层权力机构输送智慧、经验，而且能激发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群众学会如何参与国家管理。群众议论国家大事尤如风吹浪起，是一种社会天然现象。民无隐情，万事终有公议。权力机构启发、鼓励、重视、支持人民的议政行为，群众的首创精神就要日益高涨，创造活动的规模也会日益扩大，这样，人民群众和国家的命运就紧紧连在一起。位卑未敢忘忧国，每依北斗望京华。议政将激发群众不断涌现大批仁人志士，以身许国，那些“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的谋夫策士也会相继而出。当群众议政的热忱达到高潮，人民的建议被广泛采纳，这种精神活动就要促进生产力的高速发展，舆论力量也就转化为物质能量。

群众议政是民主与舆论的统一，这三者都是人民维护自己利益的手段，运用这些手段的具体方式并不需要整齐划一，因而，议政的舆论活动也必然根据不同问题、不同社会环境表现为灵活

① 《列宁全集》第26卷，第377页。

多变的形式。一般民主形态有卢梭式和孟德斯鸠式两种。卢梭强调一哄而起，公众具有绝对言论自由、绝对参与的天赋人权。他甚至主张真正民主无异于抽签选举，因为人人在才能和道德、品行与财富方面都是平等、一样的①。卢梭抛弃一切体制、规则、程序，主张“大民主”，这种幼稚的幻想，直到今天仍有深远的影响。孟德斯鸠主张在人民主权的前提下，重视民主与法治的统一，提倡理性美德在平等、自由言行中的主导作用。他那不朽的格言在任何时代都闪烁着不灭的光辉：“民主制原则的败坏，不仅发生在人们丧失平等精神的时候，而且发生在人们采取极端平等的精神，人人都想与自己选出来发号施令的人平等的时候”；“在自然状态中，人们生下来是平等的；但是他们不能停留在这状态中。社会使他们失去了平等，他们只有靠法律才重新变成平等的”②。

社会主义的群众议政遵循一定程序，通过少数服从多数，直接制与代表制、专业化和社会化相结合的途径形成井然有序的舆论，最大限度地释放出议政的全部能量。

人民群众通常按照一定组织范围和预定目的议政，有规则、有秩序地采取良性舆论方式表达意见。比如，由社会基层单位负责人组织讨论会；由新闻单位发起征询意见的活动；由政府主管部门深入基层听取群众的呼声，等等。这些议政形式都在法律约束下以对社会有益的方式表达人民的意志，防止对社会和他人产生危害行为。非程序化的议政活动缺乏组织管理，有可能践踏法律、侵害他人利益，其中运用“四大”方式大造舆论就是最有害的一种。所谓“四大”，就是随心所欲、不受任何约束地发表意见，用攻击、诬陷的语言或行为蛊惑人心，侵犯人权，煽动骚

① 《社会契约论》第135页。

② 《18世纪法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5、36页。

乱，破坏社会秩序。实践证明，"四大"搅乱一个单位、扰乱一个地区的效力非常显著，是一种恶性的议政方式。

议政必须坚持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群众中有的意见是绝大多数人的愿望，有些则是一小部分人的偏见、浅见，权力人物采纳建议要遵重绝大多数的意志，顺从真正的民意，扬弃舆论中的糟粕而取其精华。少数人的意见在议政中出现是正常的舆论现象，只有多种意见的交叉和比较，才能最终形成多数人的意见。少数人应当服从多数人的正确意见，放弃片面、狭隘、偏执的见解，使议政活动逐渐过渡到有序的统一状态。

议政有两种不同的表达群众意见方式，一是直接制，二是代表制。直接制是指广大群众直接向上层领导机构表达意见，提出建议，这通常通过电话、信件、口头上访或领导干部深入基层和群众座谈、对话等活动进行的。代表制表现为间接的议政方式，群众推选出代表向权力机关表达自己的呼声和建议。群众委托代表表达全体意志，各地代表集中在一起就能集合地表达人民整体的意志。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党的代表大会都具有代表制议政活动的性质，这是群众议政的最高形态。

由代表间接议政，关键在于作为代表的人是否是由人民自己选举出来的，能否真正代表人民说话。如果代表不是选民直接选举的，或代表不了解他所代表的那个地区人民的生产、生活状况和要求，由这些人议政纯粹是一种装饰。这种议政不可能释放出什么能量。为了确保代表真正敢于代表人民说话，不受刁难、打击，人民代表的工作、职务、待遇和他的代表资格一样，应由选举他的那个地区的人民决定。正如高放教授所建议的："人民代表既然要独立代表人民发表意见，就难免要得罪某些领导者，因此有必要规定切实保障人民代表的言论自由和人身自由，这样才能使人民代表放心大胆、无所顾忌地工作。……世界各国比较民主的宪法

一般都有类似的规定，作为最高类型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理应规定得更加明确、更加具体。”[1]

议政的专业性和社会性，是指有关科学技术性很强的方针政策提交人民群众讨论，要贯彻专业性和社会性相结合的原则。现代科技与管理科学的发展，使许多生产社会活动的科学模式不可能被多数人所了解，有关科学技术问题的重大决策也必然要有少数专家、智囊团来制订由领导人物把关决定。科学真理与人数多寡无关，这类问题的解决方案，不可能由广大群众提出，单独由群众讨论或投票作出一揽子决定。但某些科学技术决策所产生的利益却和人数多少有直接关系。因此，在现代化建设中，科学技术决策自然要由少数人作出，而方案可能有几个，在考察利害方面可提交代表或广大群众讨论，以便全面听取意见，选择最佳方案。这种议政的择优机制，必然是专业性和社会性舆论价值的相互弥补、相互递增。

还要强调一点的是，议政不能流于清谈。不着边际，不顾实际，抄袭外国的高调，文饰世俗，不能解决中国的四化建设。某些年经书生大骂祖宗，侈谈现代文化，自视见解高深，却不重视利国利民的实际问题。以清谈议政，必然流祸误国，神洲荡覆。

三、盛世不忘危言——兴纳谏、根除文字狱

河北省衡水市53岁的城市管理大队队长李云超，在1987年1月拿着一盒点心找市委书记提意见：“这种点心硬得象石头，根本没法吃，现在市面上净是劣质点心，坑害消费者，你们管不管？”过了几天，市场上的点心质量明显提高。年终，李云超因为提这条意见而受奖，和他同时领到奖品的还有其他向市级领导提过意见的34个人。

---

① 高放：《社会主义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第211页。

李云超在1957年也给领导的工作提出过批评，但30年前那一次他被打成右派。权力对群众的尖锐批评是打击还是给予鼓励，是衡量领导干部尊重群众民主权利的试金石。我国在80年代各项事业一派兴旺，人民安居乐业，可称为"盛世"，人民群众给领导干部提出的尖锐批评又可称为"危言"。因为批评往往尖刻刺耳，有时竟大放厥词，确有"危言耸听"的味道。权力人物应当"盛世不忘危言"，好话坏话都要听，放手让人们讲出不同意见，促进四化建设的繁荣。任何社会都不断出现和权力人物的观点截然对立的意见，这种"危言"是一种特殊的舆论现象。

在封建专制和法西斯白色恐怖下，虚弱、腐朽的权力都害怕"危言"，因为在一片尖锐的批评中尤如在风雨飘摇中一样，这种权力就可能在剧烈的社会舆论震荡中垮下去。腐朽势力企图挽回灭亡命运的唯一出路是对"危言"采取高压政策，大搞"文字狱"，窒息舆论。

当代，人民的觉悟以舆论的启迪为先锋。舆论畅通必然使专制与黑暗、谄佞与欺骗消蚀，使真理与智慧净化人的灵魂。

那么，我们所说的危言，是指出于巩固、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动机，而用口头或各种文字形式表达的旨在破除领导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和急切反映实情的尖锐意见。这本来和文字狱毫不相干。但如果政治生活不正常，持这种危言的人就可能受到无辜的打击。

文字狱发明的专利权无疑属于我国的秦始皇，而把它发展到登峰造极地步，则是十年内乱的林彪、"四人帮"一伙。历史阴魂在每个时代都有它独特的表现形式，文字狱在我国历史上各个专制时代也不断以新的方式镇压民间的"危言"。宋朝秦桧当权，文字罹祸层出迭起；明朝朱元璋作了皇帝，"恩威不测"，疑神疑鬼，甚至对亚圣孟子的文章也疾恨如仇，大动干戈，删改《孟子》；清朝的文字狱案更加猖獗，许多才气横溢、笔墨不慎的知识分子死于刀下。文字狱的中国古董也被外国专制主义者所

“进口”，希特勒于1933年在德国发动一次大规模的焚书运动，成千上万名学生举着火炬焚烧了几万册进步书籍，戈培尔欢呼：在这火光中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而与此同时，家家户户的桌上都放有一本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否则就会感到不安全。

十年动乱中文字狱的规模与恶果超过以往任何专制时代，文网之罪，花样翻新，防不胜防。与极左路线持不同观点的人，以散布“反革命谣言”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具有独立见解的文章、文艺作品被斥为“反党黑文”、“大毒草”。在林彪狂叫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煽动下，1966年8月几乎在全国所有城镇的大中学校，在几天之内就把几亿册书籍付之一焚。邓拓、吴含、张志新、遇罗克等持有独道见解的干部、知识分子、青年学生被置于死地。不仅如此，舆论禁忌的大刀还砍向工人、农民、一字不识的老太太。大庆一职工在报上无意乱写，办案人将之拼成“反革命标语”，判处二十年徒刑。内蒙一社员的羊被充公，在羊圈上贴出对联：“大羊小羊都赶光，留下羊圈空朗朗”、“今年还比去年强，羊圈又有两只羊”，被判刑十年。还有许多记者，因为实事求是反映情况被打成反革命，关进监牢。

十年动乱与现代文字狱所以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出现，有其历史与社会根源。长期封建专制思想在政治方面的遗毒没有肃清，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缺乏制度化、法律化；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任何权威，人治取代法治。由于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受不到任何制约，领导人的话，就是圣旨，不容提出任何疑义，必然导致谁有权，谁就主宰舆论，弹压舆论，毫无顾忌的打击、镇压不同意见。

林彪、“四人帮”一伙害怕真理，必然大肆扼杀“危言”。他们的荒谬意见得不到多数人的支持，就采用高压政策来征服群众意识。但意识在每个人的头脑里，任何力量也不可能把它夺走，

幻想以消灭持有"危言"的人的肉体或把他关进监牢和外界隔绝，来消灭不同意见，反而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第一，舆论是流动的，它会从一些人的头脑流入其他人的头脑，正确的认识一旦出现并发生流动，就无法将它彻底消灭。越是压制它，越要引起人们的兴趣，加速这种意见的暗地流动。第二，相当一些人由于害怕镇压，失去独立思考的愿望和兴趣，而变得愚钝，人们对任何重大事务不愿发表意见，人们的工作热忱和社会责任感逐渐销蚀殆尽。第三，一部分人迎合暴力而成了阿谀奉承的伪君子，用种种谗言谲词取悦这些当权者，于是在他们周围集结了一批善于玩弄两面手法、巧言取信、口蜜腹剑的人。正如杰弗逊所说："真理是能够自立的。你要用强制手段来控制意见，可是你叫谁来当裁判者呢？……而且，为什么要对意见施行强制呢？为达到一致。但意见的一致是不是好事呢？这并不比面容和身材的一致更好……。（意见）强制的结果是什么呢？使世界上一半人成了傻子，一半成了伪君子。"①压制不同意见，最终使英才消沉，把真理弃之一旁，刘少奇同志指出，不少负责人杜绝言路，使一些有经验、有知识的人，不敢说话，"这种不民主的作风，只能把自己封锁在真理的门外"②。

社会主义要解放全人类，就要使人们获得独立思考的权利。解放全人类不仅是政治解放与经济解放，而且还必须坚持思想解放。人民群众的思维方式只有从守旧僵化、盲目崇拜中解脱出来，善于发现和认识真理，才能成为真正解放自己的人。当每个人充分独立思考，纷纷提出改造社会的见解，并在意识交流中通过互补形成舆论，人类也就实现了改造社会的自由。国家各级的权力机构推动群众的思想解放，允许人们大胆思考，自由地提

---

① 《杰弗逊全书》纽约，1943年版，第675—676页。

② 参见《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35年版，第376页。

出独创而有益的见解，这是群众获得解放的重要条件，也是社会主义言论自由的属性。但任何自由都是相对的，都要受法律制约。危言是具有建设性的尖锐意见，而不是放肆地攻击政府，恶意煽动混乱。因此，还必须划清危言和反动宣传的界限。

“危言”必须遵循“四项基本原则”，它只是在探讨如何管理国家的具体问题上具有反向思维的性质，也就是说，它从正常思维的相反方向思考问题，有可能打开社会矛盾的新境界，拓宽解决矛盾的新道路。任何一种正确意见，只能适用于一定时空领域，当它延续到一定时间，超出一定空间，就由真理走向谬误。各种相反意见大都要打破原有意见的疆界，具有突破意识的趋向，其中许多新意见往往包含着对旧事物的否定和对新事物的发现。领导机构推行正确的方针决策，一方面按社会发展规律实践真理，另一方面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又逐渐接近谬误，当谬误成分越来越多地暴露出来，就丧失了原有的真理性，“危言”也就开始在群众中酝酿并被提出来。在大多数情况下，“危言”出自少数人之口，是个别专门家或普通群众提出的尖锐意见。如果它代表真理而又得不到采纳，坚持这种意见的人就会逐渐增多，形成一致呼声，这标志危言反对的方针、决策已经完成它的历史使命，需要制定新的方针政策来代替。显而易见，“危言”频频出现，在群众情绪的增长状态中不断高涨，是产生正确舆论的先兆。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危言”都是正确舆论的萌芽。衡量“危言”能否促进社会进步的标准主要看它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和坚持社会主义原则；把它纳入群众中讨论，是否受到群众的普遍赞成；同时还需要验证，“危言”是否在宪法的范围内发表意见，维护社会主义制度和各民族的团结。违背这三条原则的反对意见，也就违背了全体人民的意志，是一种有害的“危言”，对这种“危言”必须加以引导或制止。

为了发挥正确“危言”的建设性作用，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权力机构要大兴纳谏之风，虚心听取各方面的建议，使纳谏渠道畅通无阻，杜绝封建社会中“忠言有雍而未达，言路当塞而不当开”的敝政。

梁漱溟在1953年提出农民生活没有改善，乡村问题应当引起重视，被斥为“完全彻底的反动思想”。由于拒谏，农村建设被忽视，在将近30年中，广大农村贫穷落后，许多老解放区的农民生活还不如革命战争年代。

知名人口学家马寅初1957年提出“新人口论”，警告：“我国人口增殖太快”，“非控制人口不可”，他的建议不仅没有被接受，反而受到迫害。在一片“人多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的盲目自大的狂热中，我国人口迅速膨胀，使后人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十几代人都要承受拒谏产生的重负。

由此看来，权力人物要获得治国的金玉良言，必须广泛听取各种反对意见，通过比较鉴别，发现真理，掌握真理。那么，倡导“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直言进谏风气，应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内容，而大兴纳谏之风，又必将赋于这种民主制无限的生命力。

善于听谏、纳谏是社会主义权力人物的重要活动。“谏言”多来自下层，听谏、纳谏就成为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的重要方式。有些“谏言”来自专家、学者，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一项建议就能创造几千万、几个亿的财富，纳谏也就解放了精神生产力和物质生产力。当某些领导干部固步自封，陷入旧思想、旧计划的窠臼不能自拔，“谏言”提供了新思维、新视野，使权力人物的思想获得新的动力，顿时从僵化思想困境中解脱出来。由此可见，广直言之路，启进善之门，从谏如流，是首脑人物必备的政治品格。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只有广泛听取反对意见，才能避免“甘言美语”的蒙骗，使领导者耳聪目明，是非清楚。“乐闻

过，罔不兴；拒谏，罔不乱”[1]，这一个古老哲理应当在当代中国发出熠熠的光辉。

谏与危言是下层舆论中个别人物最初违背权力意志的舆论现象，谏与危言都是逆耳之言。“士不忘身不为忠，言不逆耳不为谏”，无疑这是一对矛盾冲突，无论进谏或纳谏都需要一股勇气。公仆与人民只有敢于相互批评，促进双方采纳正确的意见，民主空气才能蔚为壮观，使盛世之下真正形成畅所欲言、群策群力的治国景象。

中国共产党人一向提倡“好话、坏话都要听”，甚至把极其尖刻的意见也视作好话，认真接受群众和民主党派的监督。随着政治体制的发展，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会议成为发表各种意见的讲坛，随时都可能有危言出现。在本世纪末，我国将不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使之成为表达社会舆论的主要机构，并通过它逐步强化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和舆论畅通的渠道。借助人代会和政协会上的辩论，区分危言、建议是否有益，能否采纳，这必将促成国家管理活动中的舆论生机。

---

① 《新唐书·宋务光传》。

第三章　当代中国社会的舆论活动方式

舆论活动是由多数人的具体言行体现出来的，所谓共同意见，并不是抽象的、静态的意识现象，而是通过各种活动方式发表见解，统一意见。探索当代中国的舆论形态，还必须进一步研究它的活动方式，探讨舆论活动的各种特点。

说话是人的重要活动。表达意见既离不开人的心理活动，又要通过发音器官和手势等复杂微妙的意动。瑞士心理学家让·皮亚杰所著的《发生认识论》中指出："语言从根本上说是一种行为活动；语言交往只是社会交往的一种特殊情况；我们日常的思维中的逻辑根源于我们的行为活动。"① 人类的舆论活动表现为言语或行为，各种各样的舆论活动都体现着舆论结构和舆论的规律，同时一定的舆论又再现一定的思想内容。那么，毫不奇怪，任何舆论活动都是通过有声有色、表达强烈动机的言行呈现在人们的眼前。

舆论活动是利益一致或相近的人们在一定舆论场的刺激、诱发下交互作用的产物，表现为诉诸人们感官的意识表达方式。从广义上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舆论活动包括人们潜意识和显意识的全部活动。从狭意上看，这种舆论活动主要又表现为社会讨

① 《发生认识论》，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8页。

论、会议动员、协商对话和新闻宣传四种方式，其中影响最广、威力最大的舆论活动是新闻宣传。

第一节 社会讨论

社会主义民主应当保障自由讨论在人民群众中随时随地进行，这种讨论是公民享有民主权力的象征和传统，又是社会舆论活动常见的一种方式。正如苏联社会学家所说："对重要文件、草案等进行全民讨论已经成为传统，这是活跃社会舆论的强有力的手段。……千百万人在大会上、报刊上、广播和电视里参加了讨论。"① 全体人民通过讨论交流意见，最终形成一种或几种意见，使群众议政具有广泛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实际上，群众议政大都是通过社会讨论的方式进行的。

即使在西方国家，以议会或其他党派形式进行的讨论活动，也通常被认为是一种舆论畅达的手段，美国大法官史多来在20年代就提出过："在一个自由的政府中，没有人能够怀疑讨论公共行动及公共意向、勇敢地监督统治者的行为、精密考察政府的政策及计划这些权利的重要性。这种权利是自由政府最大的安全保障。一定要让舆论得以畅达，政治警觉心得以灌输，并鼓励自由而不放肆的讨论。"② 讨论所以成为一种舆论手段或活动，就在于它的进行过程是多数人凑在一起发表意见，显露着公共意向，成为发挥群众监督、检查公众事物的重要方式。

一、讨论——净化意见、发现真理的途径

舆论在最初形成过程中，一般是由少数人首先提出一种见

---

① 《社会学手册》第121页。

② 约斯特：《新闻学原理》中译本，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译，1960年版，第90页。

解，引起人们的相互议论，这是一种无序的自然讨论形态。各级政权机构为了提炼或贯彻某种意见，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广大群众进行有秩序的讨论，这是自上而下的有序讨论状态。不管哪种讨论行为都是舆论形成早期的必经阶段。这就揭示出，讨论这种舆论活动即是表达意见的一种方式，又是形成舆论的重要途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重视、运用人民群众的讨论来形成统一意志，是坚持正确舆论方向不可缺少的手段。

少数人提出的意见，尽管是有实际经验的人，也不可能完全精确地反映客观实际，排除谬误成分。人们认识客观世界只能经过多数人的反复实践、反复总结，不断由感性到理性，再由理性到感性的集体认识过程才能完成。当人们集中到一起，把亲身的感受和深刻的理性认识通过讨论在一起交流，就会使少数人意见中包含的谬误成分被剔除。经过多次广泛的社会讨论，少数人的意见才能更加纯正、成熟，变成多数人的意见。约翰·密尔认为："凡持有一种坚强意见的人，不论怎样不甘承认其意见有谬误的可能，只要想一想，他的意见不论怎样真确，若不时常经受充分的和无所畏惧的讨论，那么它虽得到主张也只是作为死的教条而不是作为活的真理——他只要想到这一点，就应该为它所动了。"①

讨论正如沙中淘金。如果个人或少数人意见包含真理和谬误成分，只有把它放到群众中进行多次讨论，错误的东西才能被多数人的见解所摈弃，这好象源源不断的流水把那些无用的沙粒淘汰掉，沙金才渐渐显露出光耀夺目的本色。讨论是多种个人意见的交叉，每一种见解面对面地争辩、替补、融合，使多数人认为错误的意见被剔除，只剩下那些被人们一致公认的正确意见，这就把舆论建立在真理的坚固基石上。舆论这种表层意识活动，

① 《论自由》，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36页。

没有不经过广泛社会讨论就会显露出它的生动性和真理性，同样，任何一种舆论也都是通过讨论行为实现的，不是呈现出无序的自然讨论过程，就是表现为有序的，有组织的讨论状态。讨论尤如净化意见的过滤容器，通过层层众议的筛淋，不断把意见中许多“泥沙”涤荡洁净，使意见变得越来越具有真理性。同样，如果少数人或个人提出的意见根本是错误的，通过广泛的社会讨论就能把它彻底否定，并在讨论中产生新的正确意见。每一种意见一旦受到讨论的措洗，它只能越来越净化、越来越纯真，成为真正强大的舆论。所以，只有采取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才能真正发展正确的意见，克服错误的意见，真正坚持真理。而在“缺乏讨论的情况下，不仅意见的根据被忘掉了，就是意见的意义本身也常常被忘掉了。在这种情况下，表达意见的字句就不复提示什么观念，或者只提示它们原来所用来表达的观念的一小部分。鲜明的概念和活生生的信仰是没有了，代之而存在的只有一些陈套中保留下来的词句，或者假如说意义还有什么部分被保留下来，那也只是意见的外壳和表皮，其精华已经失去了。”[1] 人民群众对任何社会问题的讨论，不仅使人民群众加深对这一问题的印象，获得深刻的理解，而且在深思熟虑和相互启发下，所形成的意见提示新的观念，群众也就掌握了意见的全部精髓。社会各个领域为了推销一种意见，都不断组织人们讨论而造成广泛的社会舆论，这样，意见——这种精神力量就能真正掌握群众，而群众又能深刻地把握意见。人们在讨论中，诉说统一意见的坚强意志能在更大社会范围内取得一致，也就更容易贯彻这种意见。

比如，“劝导家庭妇女多饮牛奶的工作证明，由小组讨论和

---

① 《论自由》第41页。

集体决定、要远比通过演讲向个人呼吁成功”[①]。在社会生活中，个体参与群体共同作出的决定，比向个体提出的任何要求能产生更显著的效果；反之，个体容易接受由群众共同讨论决定的任何问题，而不愿接受由一人或少数人强加给他的意见。群体动力学原理表明，社会讨论是社会主义社会决定重大问题、形成一致意见唯一可行的重要措施。因而，列宁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指出，“苏维埃机关中的一切管理问题应该通过集体讨论来决定”[②]，“请你们在所有的农民集会上，在所有的农民团体中展开讨论，并且当场作出坚决的决定。因为我们祖国的命运主要取决于你们的决定，大多数人民的决定，农民自己的决定”[③]。1987年，中国共产党把“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第一次写进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同年山东省泰安市开展了一次“新时期共产党员如何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大讨论，全市有90%的党员参加了这种舆论活动，形成了党员自我教育、自我提高的气候。开展讨论不久，全市党员做各种好事16 000多件，调解民事纠纷500多起，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舆论在全市迅速形成。

讨论不仅是一般社会舆论的举动和手段，而且在科学史上，一切伟大发现往往和讨论活动密不可分，讨论同时也是学术舆论的普遍活动方式。科学家们或聚在一块儿，交相叙谈、商榷切磋，求得灼见真知；或者利用报刊学术版、科学杂志和学术会议发表对立或相似观点的论文展开学术讨论或论争；浓厚的学术舆论便把科学发现不断向纵深推进。20年代物理学界的哥本哈根学派常常在一个餐厅里饭前饭后讨论物理学问题，一批杰出的人才由这里脱颖而出，其中有10名获得了诺贝尔奖金。由此，“餐厅

---

① 《社会心理学的大师们》，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8页。

② 《列宁全集》第28卷，第329页。

③ 《列宁全集》第26卷，第345页。

就是最大的实验室”的格言引起人们无限的兴趣，纷纷效法用讨论方式，形成小群体学术舆论，推动了学术研究的进步。科学家在咖啡馆内交流学术问题，在饭桌子上写画公式，在科学会堂进行唇枪舌剑的论战……，成为现代科学研究的一种特殊方式。科学泰斗维纳创造控制论的宏伟设想正是在生理学家罗森勃吕特领导的餐桌讨论会上完成的。

任何真理都需要在讨论中经受锤炼，在讨论中发展。社会主义社会每天都涌现出无穷无尽的新事物，新意见，不断进行观念更新，只有经过社会讨论，寻求大家公认的真理，形成真正的舆论，新的观念才能被人们所认识、所接受。任何压制讨论，压制各种意见的相互争论，也就必然堵塞发现真理的道路，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同旧社会比较起来，社会主义社会中，新生事物的成长条件，和过去根本不同了，好得多了。但是压抑新生力量，压抑合理的意见，仍然是常有的事。不是由于有意压抑，只是由于鉴别不清，也会妨碍新生事物的成长。因此，对于科学上、艺术上的是非，应当保持慎重的态度，提倡自由讨论，不要轻率地作出结论。”① 对一切意见，要在自由讨论的气氛中鉴别是非，才能给人们提供认识真理的基本条件，这是舆论活动转化为现实普遍意识和现实生活推动力的必备因素。在当代中国任何社会决策中，领导意见和群众意见相结合都必须通过讨论这种舆论活动才能实现，领导广泛听取群众在讨论中发表的见解，并认真采纳合理的意见，就形成了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工作方法，并成为决策科学化的途径。

二、讨论的实效性、广泛性与集中方式

讨论是群众议政的普遍形式，但它同时也带有致命的弱点。由于它具有舆论萌芽阶段的特征，必然呈现出意见的分散性和纷

① 见《关于正确处理民内人部矛盾的问题》一文。

争状态。当意见还没有统一或还没有完全统一时，各种意见的对立、分歧需要经过相当的讨论过程才能趋于一致。即使最完美的讨论，在一定范围内也不可能只有一种意见，因此，如果对讨论不进行有力的引导，势必使这种舆论活动失去应有的实效。

不言而喻，并不是一切讨论都属于良性的舆论方式，不讲究实效的讨论恰恰是一种惰性的舆论活动方式。中共中央在十三大报告中强调："没有探索，没有创新，没有不同经验的比较和不同意见的讨论，我们的事业就没有生气。"讨论的实效性就是要增强这种生气，使精神力量尽快转化为物质力量。有些权力机构，在一定范围内不断就一些细小的问题进行无谓、繁琐的讨论，用讨论代替行动，用空谈代替切实可行的步骤，使整个讨论陷入空话连篇的"议不决"状态。名为统一意见，实则用冗长的讨论浪费时间，使意见纷争无休无止地持续下去，讨论也就丧失了它应有的效用。

从事舆论活动是普遍意识转化物质力量的实际行动，讨论的目的在于促成精神力量的形成，为实际生产活动与工作寻求解决困难的正确意见。无用、繁琐、冗长的讨论和讨论的目的背道而驰，必然是对群众舆论活动的滥用。列宁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懈怠、大意、马虎、草率、急燥；喜欢用讨论代替行动，用空谈代替工作，……而是由他们的全部生活习惯、他们的劳动环境、疲劳过度、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反常分离等等造成的。"①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往往给一些权力人物造成错觉，一切都依靠人民群众的决议，而他自己却没有任何主张和果敢的决定，于是他总是在讨论中度过黄金时间：接二连三地座谈，逐一发言表态，用讨论得又深又透代替拍板定案……。权力人物由于脱离劳动实践，不知哪些是急需研究急需解决的问题，因而容易用空洞的讨论代替实际工作。这种讨论固然也是舆论活动，表面

① 《列宁全集》第26卷，第386页。

上闪耀着信任群众、尊重舆论的金光，但却用无限制的拖拉作风贻误良机，涣散群众的意志。列宁对苏维埃政权的领导人曾强调指出："必须实行合议制。但是任何夸大和歪曲合议制因而造成办事拖拉和无人负责的现象，把合议机关变成空谈场所，这是极大的祸害，这种祸害无论如何要不顾一切地尽量迅速地予以根除。"[①] 有些权力人物要么不尊重舆论，不提倡把重大问题提交群众或集体讨论，要么用讨论代替一切，不负责任，让讨论漫无边际地延续下去，把社会工作变成荒诞不经的扯皮、抬杠和踢皮球。

西方理论家们在研究讨论时，同样注意到不讲究实效的讨论所产生的巨大危害，并把这种讨论称作"放肆的讨论"，"特权的妄用"，因为它"足以降低讨论的标准，削弱讨论的影响，并威胁讨论的安宁。这种放肆的讨论决不会有什么良好的动机或公正的目的"[②]。用扯皮式的讨论占用大量时间，表明讨论的主持者已经丧失管理职责，在社会舆论面前失去引导的能力。

能够产生实效的讨论必须在相对时间内集中人们的注意力，就重要议题展开热烈的意见交换，而且一定要把自然无序状态的议论引向有组织的有序讨论。当大量分散意见经过几次交叉形成几种主要意见时，广泛的社会讨论就已接近尾声，讨论发展到这种地步，已经表现出它的实效性。当讨论已经找到一种大家基本赞同、"合用的"意见，讨论行为也就完成了它的舆论使命，达到了它的目的，确定了人们公认的某种正确的意见。

讨论的广泛性是讨论产生实效性的重要条件，当然，这种广泛性只能是相对的概念。任何问题提交人们讨论都要有相应的范围，就一般规律而论，问题涉及的面有多大，就要在多大范围内

---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24页。文中"集体领导"应译成"合议制"。

② 约斯特《新闻学原理》第90页。

引起自然无序的议论，当权力人物组织人们进行有序讨论时，也要在这个相应的范围内进行。比如，一个涉及全国性的问题，能不能找来几十个人开个讨论会，把形成的一致意见作为认识标准呢？显然这种有意压缩讨论意见范围的错误作法很容易歪曲、践踏民意，必然大大减缩发现真理的智慧源流，讨论的结果很难反映全体人民的要求和愿望。1954年讨论宪法草案，在北京500多人和全国有代表性的8000多人中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共收集5900多条意见。1987年中国共产党对十三大报告进行了全国范围的讨论，报告的第四稿发到党内约5 000人的范围征求意见。参加讨论的有全体十三大代表，中央三个委员会全体成员，中央机关、中央国家机关的主要负责同志，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负责同志，军队系统的负责同志，还吸收了部分地、县党委负责同志，还请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爱国人士数百人进行了讨论，得到数以千计的修改意见和数百本修改稿。正是由于上述全国性的广泛讨论，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最后形成的“报告”才反映出多数人的一致意见，这种意见必然是全国人民智慧的结晶，体现出社会客观进程的真理性。

涉及团体和群体利益问题，讨论如果能反映出团体与群众内各方面的意见，就不会陷入片面性和局部性。广泛性的讨论是产生正确意见的基本要素。广泛的适度性，以囊括利益相关和知情范围相近为界限，这就把讨论的广度推进到意识时空场的最后边界，它必然不会遗漏任何冷僻、边远或习惯沉默的角落与盲区，社会中任何微小的积极因素都可能对讨论——净化意见有所贡献。

广泛性的讨论行为所形成的舆论能在更大的范围内发挥它的影响作用，激发人们为实现这种舆论目标而奋斗。十月革命后，列宁在反击白匪军叛乱和外国武装干涉的紧要关头，曾号召全俄工农群众展开全国讨论，“运用自己人数的全部威力和自己的毅

力来唤醒沉睡的人”，“并在国内每个角落、各个村庄、大城市的每个街区、公开发表自己有分量的、决定性的言论”①。这种言论无疑由于它的广泛性而产生难以估价的力量，动员人民投入捍卫新生政权的战斗。由此可见，组织讨论的广度，扩大了舆论影响的空间，自然成为发挥舆论实效性的重要因素。

把问题提交广大群众讨论，了解群众的普遍态度，不是舆论活动的最终目的。任何一位公众、特别是舆论主体决不会把讨论看作高于一切，而最终目的是要达到见解的集中，通过讨论活动实现意见的统一。

毛泽东同志在1962年7000人大会上指出，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因为大家意见分歧，没有统一的认识，集中制就建立不起来。什么叫集中？首先是要集中正确的意见。在集中正确意见的基础上，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叫作集中统一。十分明显，讨论是各种分歧意见的相互交流、反射和渗透，它为形成集中统一的意见提供了丰富的认识原料。没有讨论也就不可能有集中。集中高于任何形式的讨论。因为集中的意见已经消除了分散杂糅、荒诞无稽的各种谬见，提炼出来的是一尘不沾的正确见解。讨论的目的在于实行意见集中，寻找意识的“光明点”，发现解决问题的最优见解。这样，任何讨论都具有两种最根本的实际效用，一是寻求正确意见，二是在最大范围内求得一致意见，二者只有通过集中的途径才能获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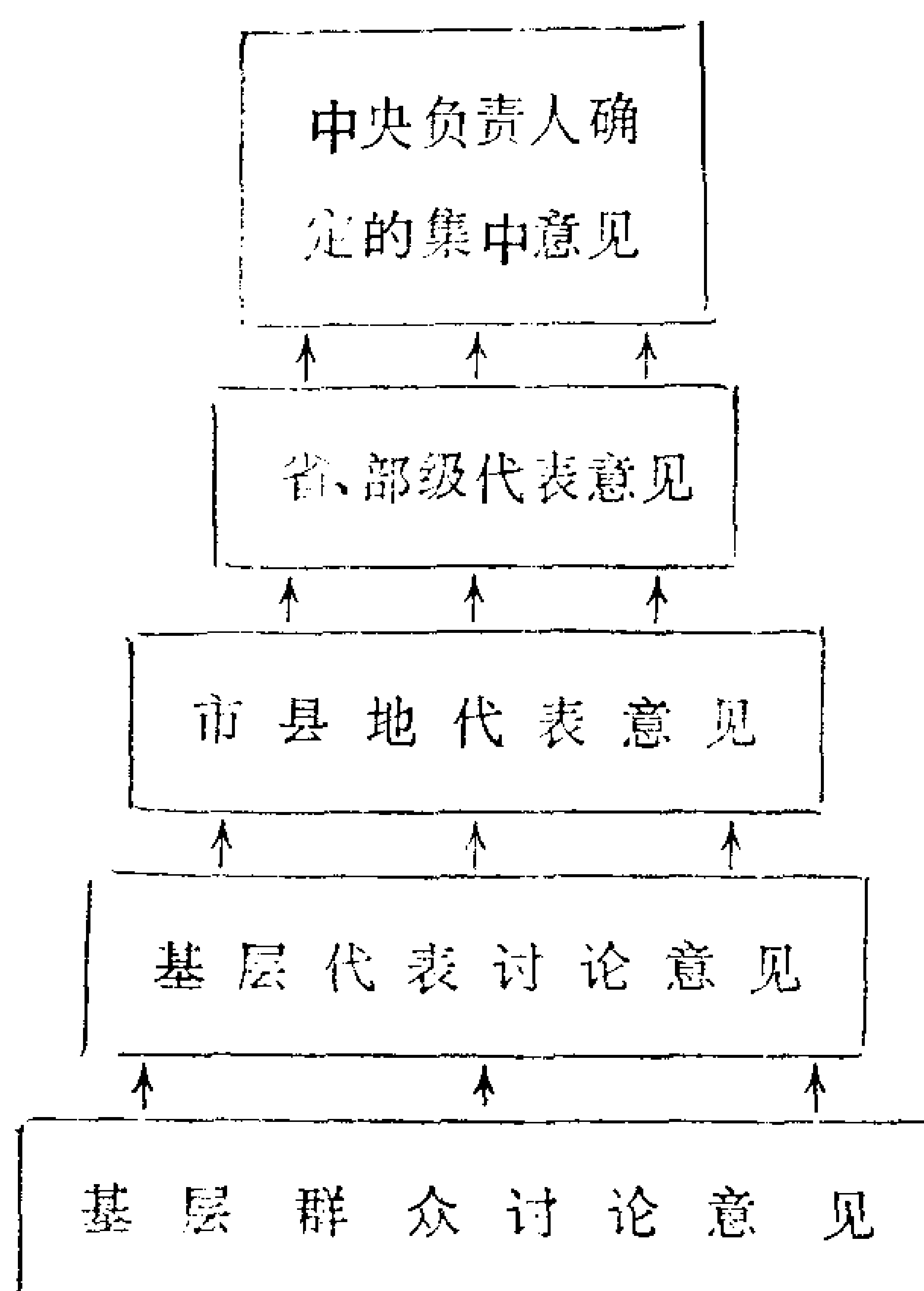
集中意见是政治生活及整个社会生活中的普遍舆论现象。阶级的意见不可能由全体阶级成员同时表达，总要由几百、几十个领袖人物概括他们的意志从事历史活动；一个国家对内对外的重大国策也都是群众普遍意见的集中，即民意的最高凝结；一个团

---

① 《列宁全集》第26卷，第345页。

体成员的意见也通常是由几个领导人物在一定场合表达的。集中群众的意见是领袖人物表达舆论的前提。而集中的方式，通常是由意见领袖或群众代表层层集中分散的见解，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提炼最初的一致意见并把它反映到更高层次进行再度集中。经过若干阶梯的这种集中活动，最后由少数高级领袖人物概括出最正确的意见，把人民的意志化为精粹的纲领性的语言。在当代中国，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政府的领导人，是群众意见的高层集中者。他们应当重视社会讨论中个体意见的共同价值，善于把代表人民利益的分散意见理性化、系统化，提高下层舆论的质量。同时又要充分重视少数人意见，认真研究以备存考。这些集中方式，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原则之一。

集中面向的社会讨论是个多向、广袤的纷繁意识世界。由于人们文化程度的差别，地域遥远和交通工具的障碍以及会议场所、发言机会的狭小，使大规模的讨论必然遍布全国城乡各个角落，即使小型讨论也要在一个地区或若干单位内进行，集中必然呈现出在大面积舆论活动中层层删除杂沓意见的阶梯过程。凡是经过一级过程的集中，叫一个阶梯集中，有几个层次的集中也就构成几个阶梯集中。讨论问题范围广泛、超过多次阶梯的集中，必然汇集更加正确的意见。第一阶梯集中是从村庄、厂矿、学校等基层单位搜集意见；第二阶梯集中是从基层代表那里汇总意见；第三阶梯集中是由市县级代表集中的意见；第四阶梯集中是从省、部级代表集中的意见；第五阶梯集中是中央机构重要领导人对省部，级代表意见的提炼与升华。这种层层集中方式把群众中分散的正确意见筛选出来，化为各级政权制定各种决策的思想依据，以至形成中央的正确路线、方针与政策。我们可以用下图表示五阶梯集中的方式：



阶梯式意见集中示意图。

在阶梯集中意见过程中，一级比一级意见更正确，讨论活动的质量更高。第四阶梯的讨论，已列入隆重的国务活动，极端错误的意见已经基本消除，为形成全国的统一意见奠定了基础。乡、县、市、省级权力机构组织讨论，在管辖的相应范围内分别采取二、三或四个阶梯的集中方式，就可以把分散的意见汇集成较为一致的意见。

第二节 协商对话

人们需要相互了解，也就需要真诚的对话，中国80年代中期出现的对话热激荡着每个人的心，在赤诚的协商气氛中，许多部门的权力人物和群众融为一体，共商四化大业。

1987年11月22日，天津市长李瑞环和人民代表出现在电视屏幕上，他们就天津市改革中的难点、疑点、热点各抒己见，谈笑

风生，侃侃而论。其间有问有答，既有相同的意见，也有不同的观点。天津近百万居民通过新闻传播目睹了热烈的对话场面，激起浓厚的兴趣，对李瑞环的解答报以满意的微笑。

同年5月，北京师范学院礼堂1200个座位已挤得满满的，随着战斗英雄徐良深情的歌声，《血染的风采》的激越旋律与唱词荡漾在整个会场，大学生的心潮顿时起伏澎湃。接着，几位全国闻名的思想政治工作者以精湛的语言、深邃的思想，相继与青年学生展开对话。

问：青年犯了错误，自有法律管束，用得着一帮人喋喋不休吗？

答：不对，犯错误要用纪律教育，犯法才由法律制裁。犯错误的同志需要别人的帮助和引导。

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学生的目光闪耀着喜悦的神情。

问：师院几乎没有一个学生去闹学潮，可喜还是可悲？为什么？

答：可喜。因为你们将是老师，你们要为人师表。

答音一落，再次爆发的掌声更加热烈，尤如雷鸣在大厅里回荡。

岳阳市举行干部讲评会，一位家庭主妇当着2 000多人的面问市长："你知道蔬菜的价格吗？市长，你上街买菜吗？"市长和一位副市长说，他们都上街买菜，站长排，有时还挨骂。

类似上述的对话，成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热门话题，人们把它传为美谈，因为对话展现了公仆接受人民监督、向人民群众质询、向群众述职工作的民主作风，同时也引导群众如何认识初级阶段的一些社会现象和自己的责任，使公仆和人民亲如手足。协商对话一经出现，就给社会主义的舆论活动拉开了有声有色的一幕，注入了生机和活力。

一、对话的起源和时代的现实性

协商对话，又简称对话，是领导与群众、老师与学生、政治家与公众、各社会组织协商政治经济和各项社会事宜的舆论活动。对话的目的在于说服对方接受自己的见解，同时也接受对方意见中的精华，扩展社会合理意见的边界。在当代，古老的“对话”意识与命题构成了世界舆论活动的特殊网络。

“对话”起源于奴隶制社会，无疑是由于当时缺少传播工具，人们只能用口头表达思想的产物。我国先秦时代的诸子百家以对话的方式周游列国，高言伪仪，从事谈说。一部《论语》就是孔子与学生的对话集，微言大义，不吝指教。古希腊也是世界“对话”的发源地，希腊文“dialogo”（对话）一词成为西方多种文字表示“对话”的词汇。公元前六世纪以后，古希腊的民主政治初露端倪，为了维持社会秩序，协调复杂的阶级关系，政治家和平民、学者和弟子展开了千姿百态的对话活动。伟大的哲学家苏格拉底常常出现在公共场所，以他智睿的哲理和人们对话，阐述世道的不平、人的美德和治理国家的政治艺术，他的学生从他那里接受渊博的知识和对雅典政局的精深见地。苏格拉底一生不著一字，他的对话完全是由学生纪录下来的。柏拉图继承苏格拉底的大业，不仅师承“对话”的传统，而且写出25篇“对话”著述，成为人类意识交流的圣典。

从古至今，许多群众交往、多人议政、外交活动以至某些文艺创作都是在对话中进行的。马克思和女儿关于理想的对话成为人间佳话，各国总理、总统、首相常用娴熟的对话推行谋略，在联合国和整个世界舞台上每年都要进行多次大型对话——“南北对话”、“中东对话”、“苏美对话”等等。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更需要对话，但这不是给人们提供抽象的哲理，也不是给人们奉献艺术享受，而是以双向的意识交流探讨当代中国的重大问

题。对话已经象征一种时代精神，演变成当代社会的普遍风俗。中国共产党十三大提出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反映了当代人类意识的潮流，赋于对话以更深刻的政治含义。

人类历史每一次重大变革都出现一个神奇的思辩时代，人们需要新思想，迫切了解时代的每一个变化，介入政治的兴趣也就不断高涨。从20世纪70年代起，信息革命使人类出现新的抗争、组合和新的机遇，世界又迎来了崭新的时代。各国以及整个国际社会，通过对话寻求和平、合作与交流；中国在改革的大潮中，神速的变化和瑰玮的思辩交织在一起，每个人都在追求超越自身的感受，急切地寻求新的信息与价值观；权力人物面临改革开放的错综复杂的民情、国情，更需要把握人民每时每刻的思虑和忧喜。这样，伟大灿烂的时代必然需要上下左右的协商对话，用平等双向的思想交往方式解决共同面临的问题。

协商对话把民意反映到上层来，上层的意见又通过各种渠道顺畅地送到群众那里，创造了良好的直接民主形式。群众直接向领导者表示意见，消除隔热层，增强透明度，使领导深切了解群众的愿望和要求。领导接受了群众的批评建议，群众也就实现了直接参政的权利。当代世界各种政治势力都在寻求对话渠道，我们终于找到了这个建立健康而活跃的民主生活的原点，把社会民主推进到新的创制。任何对话，领导只能和少量群众交换意见，大多数人则作为观众了解对话的现场和内容，因此，对话这种民主形式又包含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的双重意义与作用。作为对话的当事人，获得自然代表的身份和领导干部直接交流思想，行使了直接参与权；而绝大多数人则是间接的对话者，其民主权利是通过直接少数对话者兑现的。协商对话制度的双重含义与作用把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有机地契合在一起，扩大了群众参政的范围和深度。

协商对话的广大听众，或坐在现场或坐在电视机旁，认真斟

酌、鉴别对话的内容，面临提问者和回答者思索哪种见解更具有真理性。谁道出了真理谁就受到公平的尊重和欢迎，领导干部在协商对话中接受群众的庄严考试，人民群众深感享有了民主权利。如果群众提出的问题从根本上是荒谬的，领导干部用精思妙想和出口不凡的言辞说服了他们，帮助群众解脱谬见的束缚，群众又深感获得了聆听真理的权利，领导的权威也随之在群众舆论中树立起来。由此可见，协商对话是在公平的位置上，领导与群众以语言交锋撞击出来的智慧火花，这不仅是领导诱导、说服群众，也蕴含着群众启发、激励领导。批评、鼓励与谅解都是双方的，对话的基点立足于共同服从真理。不断坚持领导和群众的对话活动，在沟通、融合上下层舆论中，领导的意志将转化为群众的意志，群众的理智将使领导能有更大的远见。

协商对话不仅发展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形式，而且扩大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容量。历来的民主都无法超越"官民关系"的隔阂、生冷与佶屈聱牙。社会主义民主要驱散"官民"关系中的"冷却"气团，使群众和领导干部直接在融洽的气氛中叙谈交流，消除彼此间的生疏、贵溅、雅俗的沟壑。协商对话不但缩短了领导和群众的意向差距，而且使人身关系摆脱依附状态，平等相待。在那些没有举行协商对话的单位，许多领导干部往往被群众看作陌生人，即使经常和他打着照面，熟悉他的身材和面容，却不了解他的思想、他对群众的态度，群众就把当作超越自己感受区域的"特殊人"，对他缺乏起码的热情。干群关系的密切，不是交往的密切，这是很难做到的，因为领导无暇同千万人交往，也没有这种交往的必要。关键在于权力人物和群众有一致的思想，二者在生产与工作中相互理解、相互支持、密切合作，协商对话正是给管理工作创造了这样一种融洽的"官民"关系。

协商对话在我国四化建设中一旦形成制度，这种双向的舆论方式便强有力地维系社会组织的内在机制，增强各个团体、机构

的活力。舆论是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的纽带，领导和群众定期对话将不断强化意志和行为的一致性。双方通过语言与思想艺术建立和谐关系，使所生活的组织更加巩固。日本心理学家坡川山辉夫透彻地道破了这一奥秘，他写道："善于说话，个人站得住脚，组织也能存在。"①善于说话的人，往往也是善于听话的人。"说一及十"，"听一知十"。对话有商量，有探讨，有争论、有批评，平等团结的气氛把整个组织成员粘合在一起。对话把上级的意图准确无误地传达给部下，激发部下的积极性和尽职尽责的欲望；群众通过对话评价领导的能力，"确认领导的存在的价值"②。干群在一致意见的基础上形成相同的价值观，上下团结一致的组织结构也就越加稳固。

每一个组织都存在酿成松散结构的不良因素，在当代中国，这些因素主要是大量存在的人民内部矛盾。领导与群众的摩擦与意见对立，各个不同群体利益的冲突，生产与分配领域所出现的某些不公平、机会不均等，时时刻刻都在危及社会组织的安定。消除这些矛盾，必须坚持多层次、多渠道的协商对话制度，定期就突出的社会（或本单位）问题和群众交换意见，使群众的愿望、怨气、疾苦能够诉说出来，得到解决或受到重视，这等于给社会（或本单位）设置一个安全的"排气阀"，用意见协商增强社会自身的调解机能。有些单位为什么总是议论纷纷？群众总是怀有不满情绪？不断发牢骚？他们的意见并非攻击社会主义或无稽之谈，而是提出一些令人深思的问题。因为在这些单位，群众没有和领导对话的机会，满肚子的怨气、难耐的疾苦无处诉说，在"侧身西望长咨嗟"之余便拾起发牢骚这类劣性舆论武器。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内部矛盾的纵横交错，是我国现时代的重要特点，协商对话为解决、处理这些矛盾提供了最佳的意见

①② 《说话的艺术》，科学普及出版社1987年版，第3页。

疏导网络，人们从对话中寻找各种积极因素，挖掘解决现实困难的智能潜力，这就为推动时代前进，寻求到卓有成效的意识力量。

二、协商对话是一种政治活动和政治艺术

协商对话在社会实践中正在探索自已的规律，在80年代一度闯出了一条发扬民主的切实可行的路子。一批党政干部、大学校长、政治工作者、厂长、经理拓开一条条和群众对话的热线，使群众广泛参与国家事务，赢得了群众的信赖与欢迎。列宁指出："政治就是参与国家事务，给国家定方向、确定国家活动的形式、任务和内容。"① 对话一但涉及社会问题，实际涉及的是有关国家管理的政治问题，它必然是一种政治对话和政治艺术。

对话以口头语言驾驭人的思想，提高领导机关政治的透明度，从而有效地解决社会矛盾或冲突，它的全部活动不能不是一种政治行为。但是，任何政治一旦缺乏艺术，也就成为鲁莽的政治，而鲁莽的政治最终导致失败的结局。许多对话没有成功，陷入不欢而散，俗不可耐，也正由于没有把它视作一种政治艺术，使对话流于形式。赶时髦，临场作戏，冷场尴尬，纠缠小事，耍花架子，甚至把对话变成"对口词"。

协商对话在我国仅有几年的历史，从制度到形式都在摸索。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早在五、六十年代就开始和群众开展对话活动，起初也往往捉襟见肘，词不答义，弄巧成拙。1963年捷克斯洛伐克电视台设立第一次国家领导人和公民的对话节目，题目是"公民和部长"。起先是记者随意提出问题，后来是预先提交问题。这些部长们平时"习惯于幕后发号施令，不向人民汇报工作，他们不会即兴讲话，因为他们在会议上宣读报告都是由助手们代笔的"。结果，部长们在对话时眼睛离不开讲稿，不会回答问题，

① 《列宁文稿》第2卷，第407页。

引起一场轩然大波。"部长竭力为自己开脱，说这是电视台的人的过错，他们想让他上圈套"，"企图出他们的洋相"。虽然对话播出效果很差，但观众感到十分高兴，因为他们"见到了——往往是第一次——他们的部长"①。

发扬民主，日益完善民主，是社会主义政治的核心内容。协商对话使人民获得了参政权，有助于培养、引导广大群众在真诚的气氛中交换政治观点，这不仅提高了他们的政治素养和政治品质，而且得到在大庭广众下从事政治演说的训练，锤炼一套政治活动的本领。领导者在对话中逐渐具备影响群众思想倾向的能力，使自己成为真正的政治家和活动家，而不是只知照抄照转上边精神的"收发员"。由于群众运用对话启发公仆为人民谋取切身利益寻找正确的道路，这使政治这一人类永久性的社会现象真正回归到它的真正主人——人民群众那里，形成真正的政治文化和政治社会化。政治文化与政治社会化，是人民群众和权力人物普遍具有参政的文化素养的总和，表现为得体地表达对国家政治问题的态度，政治成为人们得心应手的艺术。美国某些政治学家憧憬这种政治文化和政治社会化的功能，他们写道："每个政治体系都有某些执行政治社会化功能的结构，他们影响政治态度，灌输政治价值观念，把政治技能传授给公民和精英人物。在一些社会中，政治社会化功能周期性地由担当社会角色的家庭、教士和头人执行，这些社会角色有时进入政治领域。"②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通过协商对话进入政治领域的将是那些工人、农民、学生、教师、校长、企业负责人、地方或中央政府和党的领导人物，他们借助协商对话这种政治功能，影响人们的政治态度，灌输政治

① 〔捷〕伊日·贝利康《永无尽头的春天》，北京出版社1983年版，第164页。

② 〔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等：《比较政治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91页。

价值观念。第一次使政治文化和政治社会化有可能变为现实。

由此，我们把协商对话视作一种政治功能结构的综合体，而要充分发挥这一综合体的作用，就需要有一套完整的原则与艺术技巧。

（一）协商对话要成为一种制度

任何制度都具有严格的规定性，不是任意可以更改、甚至随意取缔的。对话要持久地开展下去，需要一定制度来保障；同样，对话不能泛滥成灾，大轰大嗡，一拥而上，把它变成徒有虚名的形式主义，这也需要制度加以限制。协商对话制度根据不同社区、单位的规模必须就对话的时间、内容、方式和参加人员的名额及范围作出明确的规定，作到定向、定题、定期开展对话，使对话程序化、制度化。

任何制度都可能导致僵化，随着社会事件与机遇的突变，制度就可能被打破，因此，对话在遵循一般制度的同时，还要具有一定灵活性，以随机对话作为补充。当社会就某一问题突然出现不安情绪或偶然发生了重大事件需要向人民说清楚，就无需按制度规定的时间如期举行。机械地执行制度，不及时解决刚刚发生的问题，必然养痈成患，积重难返，而抓住社会情绪波动的火候，适时举行对话，许多矛盾纠葛可能迎刃而解。对话的内容也要根据彼时彼地的具体情况而定。在一般制度中应当明确规定哪些方面的问题必须向群众公开，有些属于机密问题还应规定公开到什么程度，群众提问的方式与程序是什么，等等。建立协商对话制度不仅使这种民主形式程序化、经常化，而且使领导与群众都明确自己的权利以及如何正当地行使自己的权利。

（二）对话必须说真话，交实底

人民群众渴望听到真实情况，领导者只有把政务的真相告诉群众，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引起他们的严肃思考。领导回答问题襟怀坦白，开诚布公，实事求是；群众提出问题也要从现实可

能出发，晓理明义，真诚合作。领导在对话中躲躲闪闪，言不由衷，不愿敞开思想，就不能赢得人心；群众在对话中不从大局出发，固执己见，偏离要害，也很难受到多数人的击节称赞。一切对话都要圆满直率地交流问题的真相，坦率地发表见解，否则就要步步陷入被动，甚至出现僵局。只有成功、圆满的对话，才能有效地增进相互理解，消除各种矛盾，使议论纷纷的舆论状态转化为一致意见。

（三）要放手让群众讲话

如果说领导是交响乐队的指挥的话，群众则是乐队中各种各样的主角——主角的群体。没有这些人，交响乐演不成。对话失去对象，孤掌难鸣，自然也"对"不起来。为了把对话搞活、搞深，真正解决点问题，首先要使对话渠道畅通，引导群众活跃思想，开拓思路，启发他们广泛提出各种批评、建议。在这里，领导干部的雅量将决定它的成功。有时，群众捅了领导疮疤，当面揭丑，领导是稳坐泰山、心悦诚服地聆听，还是愠怒色变、火气发作，这对领导的民主作风是严峻的考验。领导有雅量，群众就有热情，协商对话就会在融洽的气氛中不断出现高潮。

（四）对话不放空炮，言必信，行必果，空话大话一概不讲，实事、难事一件不拖。

在对话中，群众提出要解决的问题，必须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结果。凡答应解决的问题，必须立即请有关部门制定方案，尽快安排人员落实。如果把对话看作缓冲矛盾的一种"故作姿态"，乱开空头支票，就玩弄了民意，这种对话还没有结束就孕育着失败的结局。

（五）理论、实际经验和语言艺术熔于一炉

在几尺见方的讲桌前坐定，众目睽睽，每一句话都在向群众公开自己的德才风范，展示自己的理论休养和语言表达艺术。人

们一度揶揄的"接下页"①的大老粗干部，在对话中必然笨腮拙舌，再也不能胜任新时代的公仆重担了。

对话要求领导者具有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休养和丰富的实际经验，对任何问题都能随时从头脑储存的信息编码中理出头绪，作出深刻、有条理的说明。这种理论阐述不能长篇大套，成为抽象、枯燥的说教，而是用简要的理性语言抓到问题的实质，揭示问题的本质，概括现实问题的内在联系与发展趋势。在对话中闪耀其辞，言不及义，虽然道出实况，但对问题的焦点不能加以论证，使对话限于交流情况的水平，也就失去了对话的深刻意义。具有卓越理论修养和丰富实际工作经验的领导在对话中往往唱出"警言佳句"，使人在迷蒙中忽然目睹真理的耀眼光芒，发现由信息和理论凝结的艺术瑰宝，让人耳目一新，举座尽倾。

回答群众的问题，必须讲究表达的艺术，用准确、形象、生动、流畅、清晰的语言阐明自己的思想。这种艺术不是巧舌如簧，便口捷捷，一时奇发，众妙毕备。表达的艺术在于熟悉群众的疾苦，摸透群众的心理，减其所虑，大意无忤，言辞无犯。措辞始终婉顺如水，情谊充沛，而绝不用生硬的词令给人当头棒喝。

如果你善于演说，你举办的对话将座无虚席——有欣赏你的谈吐而来听讲的人，有仰慕你的名声而来观看的人，有想知道你讲话的主旨而来搞清问题的人，有想了解你作的结论来澄清思想的人，有钦佩你的高深学问而来求知的人。——总之，人们由于你的吸引纷纷而来，静静地聆听你的指教，在侃侃如流的言语中，兴趣盎然，意境豁达，不断获取深刻的教诲。因此，领导者的话语要深入人脑不仅是语言问题，更重要的是要有深邃的思想，具有说服力的论证，每一个词与句子都有以一当十的功效。回答问

① 某地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某领导在会上作报告，照本宣科，结结巴巴读着秘书写的讲话稿，其中一页最后一行有"接下页"的字句，这位领导也随口读出，引起与会者哄堂大笑。

题不急于多说，快说。聆听尽善而后发，如雄鸡司晨，一唱天下皆动。居高临下，官腔十足，套话连篇，即使你说得对，群众也不接受你的“训导”。

（六）每次对话要集中解决一两个问题。对话不要议题过多，内容庞杂，企图通过一次对话解决几年遗留下来的问题

问题过分集中，影响对每个问题的深入探讨，最终由“面面俱到”导致“一面也不到”的一无所获的结局。好的对话，应当就一两个当前紧迫的问题谈深谈透，使群众把话说完，领导把理讲透。当群众和领导在基本问题上达到一致意见时，也就达到了协商的预期目的，这种舆论方式便成为干群共同解惑、释疑、互勉的社会意识活动。

三、协商对话的多层次性

我国社会组织纵横交错，层次重叠，构成了一个个社会子系统。整个社会结构就是一张布满各种团体、企业、机关、学校、街道、住户的网。在这张大网中有九个政党、四个全国性群众团体、9.7万个全民企业、18.1万多个集体企业和33万多个乡镇企业①，还有数以万计的国家机关、学校和各种协会单位。这些社会组织一方面具有从上至下的纵向联系，又有左右贯通的横向交流，这就决定了社会协商对话的舆论活动必然是多层次、多侧面、多方位的意见交往，构成纵横交错的社会舆论网络。

有效地促进意识交流，加强舆论宣传力量，光靠单一层次的对话不能迅速奏效。透过各个网眼使下情上达，上情下达，才能很快在全国范围铸成统一意志，形成信息高速周转的社会。就我国当代社会组织的状况，多层次的协商对话主要表现为领导与群众对话、党派协商，社会名流和群众对话、各种社会实体之间的协商对话等四个层次，它们交互穿插覆盖整个社会，发挥着消除

① 参见《中国统计年鉴》1988年第301页。

社会混乱、滞障及个性游离倾向的作用，使社会控制产生明显的效果。

（一）领导与群众对话

领导与群众对话简称干群对话，是社会主义社会中普遍的一种对话活动。这种对话广泛应用于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治安等各个领域，内容广泛，不拘一格，群众可以向领导提出各种问题。领导和群众对话是一种有来有往、相互批评、相互促进的思想交流，同时又不断分享、交换信息，使大家面对共同信息作出判断。通过对话增进上下层的了解与友谊，加深对国家事务及大政方针的理解，解除对社会现状的各种疑虑。干部与群众在协商中观点的相互融合，将产生巨大的社会凝聚力。

干群对话还可划分为高层次对话和低层次对话两种类型。所谓高层次对话，是指市级以上领导人和群众代表的对话，通常就一个市、省以及全国性的政治、经济问题交换观点。这种高层次对话是一种议大政的对话形式，由政府部门主持，邀请群众代表对政府工作“会诊”。涉及到的问题大都是有关方针政策、经济建设的成败问题进行共同探索。低层次对话是指某个具体单位或县以下的领导干部和群众交换意见的活动，对话的内容多半涉及的是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具体问题，寻找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这种对话一般要比高层次对话参加的人数较多，有时整个单位的全体成员都可出席，而高层次对话往往是由少数代表和领导者的对话。但层次高低并没有绝对的界限，有时中央、省、市级领导也可能深入基层或通过电视，和普通群众直接对话，把高层次与低层次的对话结合起来，使意见反馈超越许多中间环节达到最高执政机关。

（二）党派协商对话

党派协商对话是我国现阶段最高级的对话形式，是由中国共产党中央或省市级领导人与其他民主党派领导人就当前的重大政

治、法律、经济问题进行协商，共同研究国家大事。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决定了民主党派存在的长期性，各民主党派在发扬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光荣传统中不断增强政党意识和自主意识，真正具备参与国家管理的能力和行使民主监督的权力。我国的各民主党派构成的成分略有不同，但没有一个是资产阶级政党，而是带有阶级联盟与统一战线的性质，有的甚至是特殊劳动阶层先进分子的组织。在四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各民主党派都联系一部分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成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联盟，它们的存在与发展不仅能增强全国各阶层的团结，而且适合“一国两制”的方针，有助于促进国家的安定、统一与繁荣。

既然各民主党派是一支拥护社会主义的政治力量，也就必然在政治协商方面发挥它的特殊作用。这些党派聚集了一大批宝贵的人才，在知识结构上具有多学科智囊团的特点，同时，他们又具有高度的政治热情和爱国热忱。中国共产党加强和民主党派的政治协商对话，大量吸收民主党派提出来的关于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方面的合理建议，形成多党议政、共商四化大业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和舆论活动。党派对话，主要是政治协商，就有关国家重大内政外交及领导人任免问题进行平等磋商，进一步发挥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这种对话在广阔的范围内形成庄严的政治舆论，反映出全国人民政治主张逐步趋于统一的过程。党派协商对话是我国现阶段政治民主的重要内容，也是我国国务活动的特点之一。

任何一个政党都难免犯错误，实行多党协商对话、相互监督，就可以听到各种不同声音，制定国家大政方针就可能避免许多失误。这种监督和协商是相互的，各自都接受来自对方的正确批评，进行真诚的合作，把各个党派的声音作为执政的一面镜子。毛泽东同志指出，为什么要让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呢？这是因为

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这些不同的声音主要通过协商对话的舆论活动反映出来，为国家制订各种决策、反对官僚主义和不正之风、促进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发挥各自的政治影响。党派协商制度的形成，使我国的民主党派既不是"在野党"，也不是"反对党"，而是国家事务的"参政党"，协商对话的过程，是各政党平等行使参政权的过程。

（三）社会名人和群众对话

人民团体的负责人、战斗英雄、优秀企业家、劳动模范、优秀的演说家、学术团体的著名学者在初级阶段也定期和群众举行对话活动。他们是以社会名流的身份赐教群众的，那么对话活动和对话内容往往涉及的是人生价值、社会发展趋势、科学技术发展前景、如何认识突发的社会事件，等等。这种对话具有传播先进思想，发扬高尚情操、传授学术观点的任务。我们可以把这种对话称作思想对话。

当代中国经济、政治与社会生活的日新月异的变化，使人们的价值观不断更新，各种思潮和追求时髦的兴趣变幻莫测。满足个人利益与个体化原则，在特定环境下是万恶之源，而在社会进步中又是必备的条件。当代世界的荣誉与腐败、享受与受难、纯洁与狡诈往往鱼目混珠。专断并非都臭不可闻，放任却可能酿成大祸；享受当代物质文明不是腐化堕落，穿草鞋、打补钉的衣着很难说是革命的象征；今天腰缠万贯的人，也有雇工剥削者，尽管他被人们誉为致富能手；十多年前迪斯科被斥为摇摆舞加以无情鞭挞，80年代就连60岁的老太婆也扭得蝶飞凤舞，自感美若天仙……。今天，世界范围迅速缩小，生活的广度与厚度日益加大，人们的社会心理、思维方式、道德观念、知识量、竞争意识、效率观念，以至吃、穿、住、行、文化娱乐、交际择友、恋爱家庭不断发生变化，构成一幅幅斑驳陆离的图景。于是，新的观念涌现了，某些是非界限模糊了，现实的美与丑被某些人颠

倒了。有的口誇，有的腹非。年轻一代以他们的单纯、直率发表着各种见解，观念的更新与更新的观念总是角逐并进，相互对立的批评、指责和嘲笑再也无法平息下来。新时代创造出一代新人，新一代人饥不择食地追随新的思潮，个个如饮狂泉，良莠难分；老一代人中的许多个体还没来得及调整自己的思维，新时代的畅想又萌发出密密层层的幼芽。思想方位的变换使许多人发生分野，陷入晕眩的迷阵。观念混沌了，舆论杂乱了，纯真的信仰可能面临崩溃的危险。在时代荡起强烈回声的思想领域急需知名人士、学者和群众不断交换意见，正确区分陈腐与精华，确认崇高与纯洁，引导人们，特别是青年人不断认识共产主义理想和高尚的人生价值。这种对话既是哲学殿堂的教化，又是迎接时代挑战的排练场，它的意义在于指导人们如何确立思想方位，放眼未来，振奋斗志，施展才华，实现远大抱负。

这种思想对话把科学性、哲理性和知识性溶于一樽。一场谈话尤如一杯美酒使听众乐不思蜀，钟然若醉；人们在对话中受到智慧的启迪，警言的鞭策，似乎感到天高地远，洗心革面，进入一个全新的境界，周身的血液顷刻沸腾。

我国春秋时代和古希腊的哲人，以智慧的对话教诲庶人名君，用要言大义划破黑暗长夜，留下道道金光。这些对话曾推出新的时代，加速了历史车轮的奔驰。当代中国需要一批新的哲人，向万众播种崇高思想的火花，以灵性盖世的对话开拓四化建设的理性蓝图，启迪人们奉献祖国的心扉。

（四）各社会组织实体间的对话

具体社会组织是为实现特定目标而建立的社会共同体，这是指从事一定共同活动、维持自己生存与发展的一切社会部门，其中包括国家、省、市、县、机关、团体、企业、学校、村镇。这些社会组织不断在全国（全球）从事交往活动，同时也就在交往中不间断地进行协商对话，力争就一定问题达成一致意见。

这种社会组织之间的协商对话，通常以谈判的形式进行。双方把各自观点摆在桌面上，寻求相同点，消除差异点。对那些分歧的意见，双方运用辩才表达关键性的歧义，寻找严谨的措辞尽量减少差异的显见性，把自己的利益渲染成共同利益，或争取获得一种折衷意见。但也有另外一种情况，人们各持己见，对分歧毫不让步，希望对方赞成自己的意见。不难预料，这种对话的结果往往是不欢而散。

科学团体、企业之间的协商对话以业务交往为主要内容，对话目标无非是在社会活动中谐调行动，促进学术、技术、或经济合作。对话内容只有给双方带来实际利益，才能相互博得信任，出现热烈气氛。为配合协商对话顺利进行，还要举行必要的招待会、工作便餐和其他交往方式，做到热情自重而不失立场，亲切友好而不恭维，为谈判取得成功创造基本条件。

国际协商对话，在礼仪与内容严谨方面具有更高的要求。无论国家机构之间，还是贸易公司、企业家和金融机构的对话，无非要争取对方赞成自己的意见，取得双方能够同时接受的一种见解国际对话在实力雄厚的智囊团、参谋部的辅助下要透彻了解对话另一方的全部底数，其中包括他们的习惯、信仰、需求、策略（经营或外交）。“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根据具体情形，制造某种对话气氛也是十分必要的，这通常在对话之前掀起一定规模的宣传，造成新闻舆论或人际舆论。在宣传中星星点点透露自己的原则和立场，暗示在哪些问题上毫不退让，哪些问题是可以作出某些妥协。这种宣传所造成的舆论一方面在全世界引起反响，提高自己的知名度，为进入正式协商对话提供顺利条件，另一方面向对方发出信息，暗示对方按照自己的需要调整意见步入谈判大厅。

国际协商对话，要求用语准确，表达周到、恰当。漏洞百出，言语杂乱，议论随便，就会产生一系列语误使对方有懈可

击，这样的对话不仅不能达成一致意见，而且使对方失去对话的信心。因为低水平的谈话使谈判对方感到己方并没有作过严肃认真的准备，不过派出一个头脑糊涂、语无伦次的平庸之辈来应付。举行国际对话，对话者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立场，维护国家尊严，通晓外事知识，对本行业务了如指掌，信息灵通，具有谈判的娴熟艺术与技巧。在对外开放、打入国际经济大循环的历史时期，一切涉外工作人员必须具备这样的舆论活动素养。

四、对话的多种渠道

协商对话如果及时、顺畅、准确地使下情上达、上情下达，促进上下层舆论的快速融合，就能有效地解决群众普遍关心的各种不同利益的矛盾。这是一项庞杂的社会工程，因为不同利益的纠葛涉及整个社会的变量，那么，协商对话的边界也必须囊括全社会，这就要以多种渠道、多种形式沟通来自各方面的意见。

多渠道，是指协商对话的传播方式的种类繁多，借助许多媒体都能灵活自如地表达各自的意见。在对话交流中，新闻媒介发挥主渠道的作用，是第一种对话渠道。新闻媒介通过报刊、广播电视可以使权力机构和全国、全省、全市人民对话。借助这种渠道无限扩大对话的范围，把领导与少数人的对话场面、内容再现在版面、广播声响和屏幕上，通过信息传播延伸了对话的空间。作为各级政府负责人和人民群众的对话，只有借助新闻媒介才能取得更为理想的效果。

在农村，大多数县还没有建立电视台和无线广播电台，县乡级负责人和群众对话可以利用有线广播和录音设备进行。1987年，安徽省嘉山县委书记王昌太，每次下乡都随身携带小型录音机，每月一日把上个月下乡和农民群众的对话实况的录音带交给县广播站向全县播出，使全县群众耳闻对话的“现场”情状。运用现代化传播手段和广大群众对话，一方面扩大民主生活

的广度，另一方面又推动了现代新闻事业的建设，这反映了民主政治和先进传播技术相结合，是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第二种渠道，是各种规模的口头对话协商会。口头对话协商会，不是一般的报告会，而是指那些以对话为内容的平等交换意见的会晤。这种会晤有两种，一是大会对话，二是恳谈对话。

大会对话参加的人数较多，多者数以千计，少者几百人。在这种大规模的对话会上，实际参与对话的是少数人，而大多数人处于旁听的位置。当然，由谁和领导对话不是事先指定的，而是出自个人自愿。大会对话具有较大的声势，旁听者虽然是间接对话者，但他们的思想情绪每时每刻也都受到感染，常常出现热烈的场面。当领导者或提问题的人阐明一个精采、深刻的观点，当场作出决断或提出正当的要求时，立刻就会引起全场雷动；同时，当对话者阐述问题十分弊脚，言谈怪诞，群众也随之哗然骚动。在大会对话中，每个旁听者并不是毫无表情的局外人，实际是用眼神、举止和领导进行情感的直接交流。领导者坐在台前，不能忽视群众表情的每个细节，要根据群众的情绪波动随时调整话题与内容。

恳谈对话规模比较小，是领导运用座谈的形式和群众代表对话。在一般情况下，这种恳谈对话有5—15人，每个人都有和领导对话的机会，人人都是对话对象，没有听众，因而也不会产生激烈的情绪。即使对话出现高潮，也仅是微弱、轻松的笑声和暂短的交头接耳。恳谈对话一般应用较广、没有严格的内容限制，但要求参加对话的人大都熟悉有关对话内容的理论知识或实际情况。由于参与的人数少，有充分的机会交换意见，对话题目的转换与衔接十分灵活，就使这种对话具有很强的机动性。

对话的第三个渠道是“领导接待”。80年代，许多单位设立了领导接待日制度，轮流指定有关干部接见来访群众，回答来访者

提出的问题。对所提出的重大问题要作出详细记录，经过领导集体研究决定后，再把答复以及解决的办法通知本人。

接待群众来访是社会主义政权诞生后被领导人物经常运用的一种对话方式，通过接待来访者掌握社会动向、群众情绪，了解许多在公开场合无法了解到的情况。在列宁一生中，接待来访者占去他很多时间，但他总是兴致勃勃地听取来访人的讲话，并一一作出令人满意的回答。列宁在1922年10月2日至12月16日两个半月中，共接待了171人、125次，平均每天接待2—3人。美国进步记者艾尔伯特·里斯·威廉斯把列宁的办公室称为“世界上最大的接待室”。列宁接待来访者，“惊奇地听着，他好象是在把向他所讲的一切都吸收进去，但他也不是光听不说。他十分生动地作出反应，好象是帮助对方理出谈话的头绪，并鼓励对方讲下去。他不时插入问题，发表意见”①。

接待对话是一对一的双向交流，领导者不是面向众人，而是只面向一个人或几个人讲话，回答问题，解决来访者提出的要求。领导人除了耐心听取来访者的意见，而且需要态度温和地与来访者交谈，启发、诱导他们介绍详细情况，深入了解基层的动态。如果发现问题确实要解决，只有对那些复杂的事件交付职能部门调查后再作肯定答复外，对提出的明显疑难问题应当立即给予解决，不能使来访者大失所望。1922年1月，一位农民找到列宁要求帮助解决粮食和种子，列宁立即打电话给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说：“请你们予以协助。我本人熟悉这个村，所以我认为不使农民空手而归，在政治上是有利的。请尽力办好此事，并将结果报告我。”②这种对话虽然在领导狭小的接待室里进行，如果解决了群众的疾苦或要求，就可能被人们广泛传诵，赢得广泛的社会舆论。

---

① 《列宁的国务活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518页。

② 同上书，第523页。

协商对话的第四种渠道，是建立各种专门性的对话机构，使对话成为一项日常的舆论工作。这样，人民群众有意见可以随时向政府部门倾诉。

建国以后，我们常设的对话机构，有各级纪检部门和“信访处”，在几十年的工作中，信访战线的干部和数以千万的来访者就各种切身遭遇问题进行了对话，解决很多长期没有解决的群众疾苦。信访工作者积累了丰富经验，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对话活动奠定了基础。在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下，各级政府和企事业单位还成立了其他对话咨询机构，组织精干的对话参谋班子，开辟新的对话渠道。比如有的学校建立的校长咨询组，经济领导机构成立的专家咨询委员会，中央和地方的各种政策研究室、以及各种民意调查机构，等等。这些对话机构是专门听取群众意见、了解舆情的组织系统，他们和群众随时保持密切的接触，不断收集群众意见和各种信息，把群众的要求和思想动态及时反映到上层权力机关，以便领导部门迅速地作出反应。

对话多种渠道的出现，反映了社会对信息的广泛需求，构成当代中国的社会对话网络。这几种渠道相互交叉，相互借助，使对话活动由点到面，由局部到整个社会，形成纵横交错的舆论流向，为消除领导与群众、上层与下层关系的“肠梗阻”现象，发挥着清障疏通作用。

第三节　会议动员

在当代中国，一度出现一种迷惘现象令人费解，这就是：各级机构对举行连绵不断的会议入迷，甚至把开会列为日常的主要工作。尽管中央三令五申发出压缩会议的文件，各级权力人物总是不屑一顾。

人们为什么要开会？这个问题也许提得古怪，然而，热衷在

会议上消磨时光的人永远不能正确地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他们不知道开会的真正价值是什么。在许多机关，会议泛滥成灾，人们在烟雾缭绕中度过一天又一天，耗掉了无穷的精力、时间、资金，坐失莫大的良机。“会海”销蚀了干部的智慧与创造力。

凡是科学没有涉足的领域，必然是野蛮的勃兴、文明的衰败。“会海”泛滥正是不开化、惰性十足、昏庸无为的表现。因为沉湎会议的人，往往缺少决断能力，又不愿深入实际，把热衷开会误认为聪明能干，甚至夸口：“我一周召集了五个会，解决了全部问题！”

大多数会议是一种舆论活动，因为开会的目的是为了形成一致意见。因而，会议通常被看作“是社会舆论表达的渠道和国家与社会机构对社会舆论的反应”①。然而，会议迷们却把会议当作展示口技游戏的场所，在津津有味的扯皮中拼命突出自己的意志，而不愿努力形成共同的意志，尽管开了一连串会议，分歧仍然不能消除，耗费日复一日的宝贵光阴。“这次思想没有统一，下次再议”——许多会都是用这样一句话告终的。当权力人物在没有认识到会议是一种舆论活动之前，既不可能减少会议，又无法开好每一次会议。

我们研究会议舆论活动的特点与规律，正是让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大量会议迷们少开会，开高质量的会，如何用最少的时间把人们的意见统一起来。

一、舆论“曝光”和斯米尔塞“加值论”

重大舆论是客观存在的普遍意见，当然不是由哪一次会议就能确立的，但应当看到，许多舆论处于潜意识状态或分散状态时，召开一次会议，就可能掀起一次舆论高潮，把潜意识舆论升华为显意识舆论，把分散的舆论化为集中的、大规模的、目标明

① 《社会学手册》，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28页。

确的舆论。这样，会议便成为不折不扣的舆论曝光，激扬舆论热潮的高涨。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使四个现代化的号角响彻全国，振兴中华的舆论势如破竹，遍及华夏大地。

十三大的召开，中央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人民群众获得新的理论武器和思想武器，各行各业纷纷发表意见探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点与规律，出现了新的舆论热潮。

一次省长会、市长会、厂长会，群众大会……都可能把一种意见转化为统一意志，使许多人茅塞顿开、洞达事理、热望凝聚。

重要会议概括的纲领、路线、方针、措施，以系统的意见体系使人们获得完整的舆论观念，引起人们热烈的舆论反应；各级会议向与会成员传达上级意见，也势必要引起各种反响，形成若干意见，或最终形成一致意见；即使基层单位召集的工作会议，由主讲人报告、总结前段工作，提出新任务，也需要求得一致立场，才能贯彻执行。所以，许多会议都是一种舆论活动，是和统一意见紧密相关的。

会议的一般过程是，首先提出重大思想、表现为一定的议题、报告、纲领、计划，然后由与会成员进行座谈统一认识，最后作出决议。决议的形成和会后的贯彻执行，很可能形成一股强大的舆论流。社会主义国家重大舆论往往是通过会议掀起高潮，转化为群众性的普遍意见，这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影响方式。列宁指出："劳动群众举行群众大会的这种民主精神，有如春潮泛滥，冲破一切堤岸，汹涌澎湃。"① 社会主义国家经常举行的这种群众大会，使人民群众在统一思想指导下，促成空前未有的一致态度，从而铸成人民群众的钢铁意志，转化为全民的统一行

① 《列宁全集》第27卷，第249页。

动。

具有舆论曝光性能的会议可划分为几种不同类型。从总体看，各党派、团体的代表大会、群众集会、选举会、表彰会、新闻发布会、工作会、学术讨论会、座谈会等都是在动员人们赞成某种意见，形成明显的支持或反对意向，会议的每一环节都具有舆论特点。诚然，人们要举行的会议不胜枚举，并不是所有的会议都具有舆论性质，比如有关某项工作的碰头会、情报交流会、情况汇报会、法律或纪检定案工作会，就不具备舆论活动的特点。

在那些以统一意见为宗旨的会议上，主持人和全体与会成员构成会议舆论场的主体，其中报告人、主讲人是意见领袖，赞成会议提出的主张的人是从众人员。意见领袖在会上提出的问题、见解或理论观点，在众人聚集的场合以宏亮、激昂的演说发表，由于面对面的情绪、手势和声音的烘托作用，注入人们脑海的声音符号就具有鼓动性。会议能对舆论“曝光”，正是会议主持人的意见在视觉、听觉的共同作用下给与会人员提供了丰富感受性，从而提高了知觉的完整性与深刻性，孕育着舆论的突发情绪。并由此引起人们的普遍议论，出现众心归一的思想热情，而这一切却来自隆重会场上振奋人心的报告或演说。在这里，知觉对象“程式”的异常清楚和鲜明起着决定作用。

感受性的一切形态的记述围绕着最明显地表现出知觉的对象的那种程式的材料而组织起来。

在装有扩音器的大厅里，当听者看不见说话者时，声音被定位于邻近的扩音器中。一旦说话者出现在听者的视野中的时候，这声音就立刻转到说话者身上去。这个事实的含义并不在于，听知觉服从于视知觉，而是在于，任何知觉，也包括听知觉在内，都是根据在某种感受性中表现得最清楚的对

象来发生定向作用的①。

在会场上，正是听知觉与视知觉完整揭示出讲话人表达意见的清晰特征，才使听众的意识产生一定的方向而出现强烈的反应。报告或讲演提出问题的重大程度，讲话声音和姿态的生动性、鲜明性的差别，将给听众带来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感受。由此，形成的各种心理影响就会使与会人员产生强烈的舆论倾向，显示出各种意向动态。无疑，会场是聚合群体意志的特殊舆论场，在高密度的人群中显露出来的各种情绪指向，直接促成会议舆论的不同效果因素，这些因素一般表现为下列诸种情况：

1.对报告人（讲话人）的意见表示赞成的插话、笑声、欢呼声、掌声和专心听讲的宁静程度。

2.对报告人（主讲人）表示不赞成的插话、议论、喊声。

3.会议秩序状况。是否遵守议事规程，人们是否闲扯，谈论与会无关的各种话题，做与会议无关的事情，比如某些单位开会总有些人在下面阅读书报、织毛衣、打瞌睡。

4.会上、会后或专门举行座谈时，发表大量拥护报告人意见的言论，对意见领袖的主张纷纷表示完全赞同，或者人们纷纷抱有不同意见，用各种问题质问报告人②。

以上会场上两种截然相反的情形，在现实生活中经常遇到。所以，会议舆论表现为两种相反的"曝光"效果。主持会议的人要采用各种程序、方式或仪式，打动与会人员的情感与思想，运用"斯米尔塞的价值累加理论"控制、操纵人的态度，以便形成和自己意见一致的舆论。

斯米尔塞在《集体行为理论》一书③中提出价值累加率的理

① 〔苏〕谢·列·鲁宾斯坦：《存在与意识》，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101页。

② 参看《社会学手册》第431—432页。

③ 《集体行为理论》1962年于纽约出版。

论，认为人的集体行为都以前一次行为所创造的价值作基础，按照递进演变的方式确立、强化自已的方向。用简单的例子说，把铝矿石变成一架银色的飞机包括许多道加工、制造程序，每道工序都以前一道工序创造的价值为基础。斯米尔塞把这一简单的道理应用于人的集体行为规律的研究，提出集体行为形成的决定因素都是一种"价值累加"的过程。通过会议，形成人们的一致态度也受这种"价值累加"规律的制约。这种制约性主要表现为四种会议行为因律。

第一，普遍要求律。会议所提出的主要意见——报告、讲话内容是否反映人们的普遍心愿。没有群众的普遍愿望、要求作基础，就不要召集会议提出这种意见。缺少满足群众愿望的会议和报告内容，就不可能创造普遍接受的价值，受到多数人的赞成和拥护。是否需要召开会议，要以群众或有关人员的普遍要求为依据，群众或有关人员不愿意参加的会议，尽可能不要召开。

第二，结构紧张律。会议的程序、会议时间、地点、人员数量的安排，构成会议结构。根据会议内容确定参加人员、会场的大小、举行的时间和会议日程。会议的时间与活动安排，只有适度、紧凑、严谨、处于紧张状态，报告或讲话内容简短扼要、以说明问题为宜，才容易把与会人员的情绪调动起来，使其精力集中，兴趣盎然，为形成一致意见创造顺畅接受的价值。如果会议进程拖拉、松散，参加会议的人就要无精打采，注意力分散，必然削弱这种价值。由此，会议的主要意见就很难引起积极的响应。

第三，概念、信念增长律。报告、讲话内容的概念明确，信念突出，论理具有说服力与感染力，就能加速与会人员的思想发生深刻变化，立刻接受全新的观念，为形成一致意见奠定信任价值。

第四，催发律。会议通过会场布置、报告人的激昂声调、讲演才能、呼喊口号、张帖标语、献词或其他各种彩排的仪式施放

催化剂，使会议气氛受到渲染，人们的情绪就会高昂。欢呼、掌声、歌声迭荡起伏，又能加速一致意见的形成，增加舆论活动的速率值。

斯米尔塞价值累加论的四种因律叠合在一起，使会议产生显著的动员效应。领导机构为了贯彻重大决策，动员人们形成统一意志，按照价值累加论的规律，举行代表大会、群众集会等舆论活动，就能有效地产生组织动员群众的作用。对于由十几人或近百人参加的小型会议，也应当运用斯米尔塞价值累加论的原理决定会议是否召开、何时召开以及召开的程序。如果会议按照上述四种因律进行，既不会出现“会议泛滥”，也不会有人在会场上看书报、打毛衣、打瞌睡了，开会迷的雅号也不复存在。

二、会议舆论场的两个契机
——裁断发言、主持表决

会场是由各种意识倾向力构成的舆论场。几百甚至几千人、大的集会则有数万人聚集在一个场所内；环境布置和会议内容相协调，洋溢着浓郁的气氛；长期甚至多年没见面的老同事、老朋友坐在一起，谈天说地、议论不休；会议主持人的中心报告（讲话）在人群高密度的会场上引起许多人的兴趣，同时也产生某些不同反应，会前会后总有些人高谈阔论；人们在座谈会上，言谈的相互启发，更激起人们的兴致；会议舆论场以它特有的魔力使一些人口若悬河，直抒己见。

从舆论活动规律考察，会议主持人处于会议舆论场的中心，其重要职责不仅提交报告、表达自己的意见，而且采取各种方式让人们接受报告的意见。这就要时刻注意全体与会者的发言，及时给予准确的裁断，引导与会者赞成报告人意见。

参加会议的人员来自不同岗位和生活环境，他们的思想风貌和思维个性千差万别，对主持人、报告人的意见不可能产生同等的反应。一个会，一种意见，被与会者赞成、不完全赞同或反对

同时出现，是正常现象，关键在于会议的主持人要最大限度地控制与会者的思想，争取绝大多数人站到自己的立场上来。

即使在会议报告的每一刹那，主持人都要注意会场的情绪变化，洞察人们的反应，了解会议主导意见被人们接受的程度。会议在公布纲领、路线、政策之后，要举行座谈会引导人们发表各种议论。主持人深入会议舆论场各个角落——各分组会议、休息室、下塌住所，倾听人们的发言，或和与会人员攀谈，搜集与会人员的思想动态和意见误差。对不同意见，主持人必须进行归纳整理、提炼，作出精确地裁决，巧妙地否定错误的意见。这种裁断如果做得科学、精巧，可以把肯定的意见扩大到不赞成这种意见的人，说服那些持有相反意见的人重新赞成会议报告的意见。

裁决不仅需要高深的思想水平和认识能力，而且要具备高度的语言艺术，只有深刻、准确的语言才能表达精密严谨的思想，从这一意义说，语言的妙用成为会议裁断行为的最有效的手段。至理名言，点凡成圣；巧舌胜于百万雄师。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人将美钞、原子弹、舌头称为三大战略武器；60年代后，他们又把舌头、美元和电脑作为三种战略武器，而舌头竟冠三大武器之首。有些会议，意见分歧很大，争论不休，如果有一位年高德望的主持人发表一通善于词令、热情洋溢的演讲，阐明正确的见解，就会使人们轻松愉快地放弃自己的意见，心悦诚服地赞成会议提出的主导意见。其中的奥妙在于，会议主持人善于分析、评价、裁决每一种意见，使持有分歧意见的人都能接受。

会议主持人以会议一般成员的资格平等待人，讲道理决不居高临下、强词夺理；他虽然身为会议主席、会议主讲人或负责人，但却以谦恭的姿态分析各种意见的利弊；对待反面意见除非必要，决不轻易一概否定，尽力寻找其中包括的哪怕是仅有一点的合理成分，给予肯定。日本大公司、政府机关举行工作会议的规则对我们也许是富有启发的。他们要求与会者“积极发表自己

的意见，认真地听别人的发言，对结论的赞成或反对，要心平气和地说出；即使反对或持相反意见，如有赞成的地方，也要说出赞成之处，关于反对的理由，要冷静地发言；论点、证明、要更好地让大家了解、明确。”①会议负责人裁断不同意见，要充满冷静、热情、爱护的情感，避免伤害与会者的自尊心，与会者才能对裁决为之倾心，与之共鸣。

马雅可夫斯基说，“语言是人的力量的统帅”。宣传家不是敲击铜铃，而是敲击人的心“铃”。会议主持者把不同意见疏导到一个共同渠道，必须运用情感的力量振奋、感化、慰藉每个听会的人，打动他们的心绪，用无可辩驳的事实和激越的语汇调动人们的情绪。人们一旦受到强烈感染，会场上立刻就能活跃起来，以严肃欢快的思索赞同会议主持者的裁决。情感的核心是一种充满爱抚的真诚，这是评论他人意见的第一乐章，这一旋律一旦奏起，就会把分歧的意见首先纳入一个共同节奏，慢慢消除内容的杂乱与不协调。一个鼓动家要善于对群众讲话，善于用自己的热情之火点燃群众的激情，善于抓住突出的、说明问题的事实鼓舞群众。

重大会议的一切决议并不是由个人裁决的，所谓会议主持人对不同意见的裁决，是指用启发、诱导性的发言分析各种不同意见，在分歧点中寻求相同点，引导人们形成一致意见。但许多会议决议，只能以民主表决的方式实现意见的统一。主持人坚持“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原则，是维持统一意志的最有效的办法。有些决议没有被通过，对主持人来说并不是坏事，如果运用主持会议的权力强行通过，形成的是虚假的意志统一，而会后人们却仍然各持己见，并没有真正形成一致的立场，这样的决议不可能得到认真贯彻。

---

① 〔日〕坂川山辉夫：《说话的艺术》，科学普及出版社1987年版，108页。

会议决议是会议舆论活动的结晶，它的产生不应当在会议之前，特别是它的“最后定稿”无法在会议之前由少数人完全确定。会议决议是在裁决不同意见基础上，吸收了各种意见的长处，又基本符合会议宗旨的产物。那么，毫不奇怪，决议草案和最后定稿都要符合法律或效能两种因素的要求，这样的决议才能最大限度地体现全体与会人员的意志以至全体人民的意志。

作为重要会议的决议，为了更好地反映全体人民的要求，它的草案可以事先由领导人物、少数专家、重要组织的代表共同拟订，然后提交广大群众进行讨论，使会议的舆论活动根植于社会讨论的广泛基础上，这是社会主义舆论活动的普遍原则。苏联社会学家们提出，“在研究关于文件草案的社会舆论时，最普遍的方法就是在劳动集体的集会上和在居民住地的群众集会上事先对草案进行讨论。对最重要的决定草案还在报刊上公布，或在当地广播电台广播。”① 经过民意充分讨论的决议，提交大会表决时已经具有广泛的社会舆论基础，为全体代表通过决议提供了最重要的依据。

基层一些会议通过的决议，应当是全体群众或与会人员意志的直接体现。当会议主持者提出的初步意见，被群众或会议参加者提出重大修改，补充了新的内容，在这一基础上形成的决议就能反映广泛的群众意志，必然在表决中获得通过。

会议表决的舆论活动，在任何一级会议上都受到人们的推崇和赞赏。领导者运用表决的办法作出重大决定，总是受到群众的拥护，并为顺利贯彻决议精神创造了前提。独断专行不需要任何会议，也不需要表决；尽管这种权力活动也常常举行隆重的会议展示舆论活跃的外在形式，但由于与会人员只有按照主持人意见的口径发言，个人的自主愿望受到压抑，那么在会议舆论场上每个

① 《苏维埃建设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74页。

人就要失去热情和主动性，心头凝固着死寂般的冷气，被迫“一致通过”的场面也毫无生气。

当然，行政首长对许多问题必须独立负责，迅速作出决断。在现代化管理中，恰恰要提倡首长负责制，敢于大胆决策，不能把一切问题都提交会议表决。关键在于是哪些问题。会议迷们正由于缺乏这种区别能力而把开会当成了日常工作，事无巨细地投身到喋喋不休的讨论。布署日常具体工作、发布工作指令、沟通上下情况、了解社会现状，不仅不需要开会，而且会议成为这类管理活动的严重障碍。在现代化电子媒介发达的时代，传播意见更需要的是充分利用各种信息系统，诸如有线广播、闭路电视、电话、多种文字电脑传输、广播电视台和报刊。任何会议都是低效的传播信息方式，而且耗资大、浪费惊人，使许多领导干部把时间与精力投入到无效劳动之中。因此，会议多、报告多恰恰是现代化建设的大疾。只有在需要统一意见、动员人民群众形成统一意志的重大问题上，才需要运用会议组织舆论、形成舆论，忽视这一点，也就忘记了会议舆论活动的直接目的。

第四节 新闻宣传

在全部舆论活动中，影响力最大、最能使群众形成广泛一致意见的是新闻宣传。新闻宣传本身就代表一种舆论，它不仅发表有形的意见，而且运用大量事实暗示普遍的思想倾向。因此，新闻宣传通常被人们称作新闻舆论。

在现实生活中，新闻舆论成为满足人们高层次认识的参照系数，新闻报道和评论通常被社会视为“标准”意见。新闻宣传活动以特有的集束式信息冲击，使某种意见高密度地充填人们的生活空间，人们很容易受这种意见的左右而成为舆论的积极介入者。

社会保持活力与安定需要一种时续性的意识凝固力量，随时对现实生活和异常事件作出社会评价，以巩固人们的思维定势，这种意识凝固力就是新闻舆论。新闻宣传用经久不息的舆论活动，给人们提供源源不断的意见，使人们的思想时刻受到熏陶，从而对社会事务保持相对稳固的观念。

一、新闻舆论行为的"基质"

新闻舆论是一种集体报道活动，从记者发现新闻线索、采访、确立新闻影响舆论的指导方位，到编辑人员修订、把关、完善信息与确立意见的表达方式，其间需要经历相当复杂的过程。

显然，新闻舆论是有机的集体意识倾向，它对现实的反映也受到集体有机活动规律的制约，这和一般社会舆论活动是不同的。按照黑格尔的说法，公共舆论是人民表达他们意见和意志的无机方式，在国家中现实地肯定自己的东西必须用有机的方式表现出来，国家制度中的各个部分就是这样的。这里所说的公共舆论是指群众中自发的、缺乏组织形式的意见，并以高度分散和自然融合的无机方式渐渐形成的。新闻舆论由于它反映一定的国家意志，并不是自发地、分散地，而是有组织地反映舆论、代表舆论、指导舆论、影响舆论的系统活动，这就需要新闻报道人员遵循某种传播规则才能产生良好的舆论效应。我们把新闻舆论行为的规则、规范看作是新闻报道决定社会舆论效果的"基质"。

美国科学哲学家托玛斯·库恩把科学性的符号概括、模型、范例等有条理的因素称为"基质"①。它反映着事物运动的法则、规律、标准、范式等多种本质基因。新闻舆论能否发挥它应有的社会功能，必须遵循它的"基质"规定性。违背新闻影响舆论"基质"的法式，新闻宣传活动不仅不能产生良好的社会舆论

① 《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丛刊》1984年，第1期。

效应，而且要破坏社会舆论的恒常机制，造成社会舆论功能的紊乱。

新闻媒介不是中性的传播工具，它每时每刻都为一定阶级、一定政治集团服务。任何一个国家、阶级、政党都借助新闻媒介扩大和强化有利于自己的舆论，反对、抨击敌对的舆论。从总体上看，新闻舆论始终贯穿着阶级性和政治性，这是新闻舆论“基质”的内核。在阶级社会中，一切政治实体都把新闻工具作为社会控制的手段，因为它集中输出同一方向的信息流，大都能在极短时间内强烈影响人们的思想，改变人们的立场和观点。同样，如果报纸、广播电视一旦被用来宣传错误的思想，就会把许多人引入歧途，甚至造成社会混乱。因此，新闻工具掌握在不同阶级、不同思想倾向的人手里，新闻报道的内容则大不相同，它们所诱发的舆论也必然大不一样，甚至完全相反。这样，同一种新闻工具被不同政治派别所掌握，它的性质就要发生变化。在当代中国，判断新闻媒介的性质，主要看它所发挥的舆论导向作用是否促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旗帜鲜明地反对精神污染，能否有利于社会进步，维护人民的利益；同时在报道中，是否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用真实的消息、确凿的事实、正确的论断揭示客观世界的真相，引导人民正确认识社会发展趋势。

新闻宣传影响、疏导社会舆论的效果首先取决于它满足社会需要的程度，这是新闻舆论“基质”的生命线。社会需要是一切社会机体及其活动的前提，新闻报道脱离人民的广泛需求，它所宣传的倾向、观点、意见就不会有更多的人接受，这就无法成为支配人们态度的意识力量。

在当代社会，群众对新闻宣传的需要是多方面的。他们需要倾听中央声音，需要了解国内外发生的大事，需要学习各地的先进经验和先进人物事迹，需要观察人们如何同各种官僚主义和社会丑恶现象作斗争，需要通晓在经济发展中如何施展才干，需要

知道世界上每天大量出现的各种人间轶闻趣事，需要了解各种神秘莫测、趣味悠远的各种知识，需要知道各种产品与生活必需品的种类、价格、性能、出售地点，需要通晓如何寻求好的职业和人生的道路，需要有人指导他们如何交友、择偶、有美满的家庭，希望读一些短小的中外历史故事、历史教训和历史悬案……等等。按照一定指导思想，有机地、大量地把群众需要知道的大千世界告诉人们，不仅使他们深刻认识当今这个世界，同时又能支配他们的意识方向，形成正确的舆论。党报如果版面有限，报道内容单一、狭窄，在"严格把关人"的过滤下又使报道的信息和人民需要之间相隔着难以越愈的鸿沟，那么，它的读者群只能寥寥可数了。

不仅党报，几乎一切新闻媒介，其中包括广播电视的新闻节目，倘若在同一个时期都是同一种模式，同一类的肤浅消息，就很难在群众中产生引导舆论的作用。比如：报道国务活动，却删掉了许多重要的细节；报道群众呼声，但许多惊人的事例和申诉不敢发表，不得不求助于内参渠道；报道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则挂一漏万，把某些饶有意义、最能说明国内外动态的情况筛除了。总之，人们需要知道的东西太多，而新闻报道的信息量太小，知识性、趣味性不足，人民声音表达得不充分，就要出现"新闻饥荒"，新闻传播渠道难免要发生"血栓"。信息量的狭小，并不能严密地禁锢人们的头脑，在信息技术发达和对外开放的时代，人们能从其他渠道获得国内外闻而未闻的大量消息及其对这些消息的意见分析，从而对我们自己的声音不愿聆听，甚至发生怀疑，由此往往引发许多错误的舆论。

给人们提供丰富的信息，是新闻舆论"基质"的原动力。人们生活在意见封闭的社会环境中，容易受错误意见的摆布。十年动乱，中国人不了解世界的新变化，不知道某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情况，盲目崇拜"两报一刊"的任何宣传。对"反修防修的

继续革命”、“文化大革命迎来世界一片红”、“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等意见深信不疑，举国上下充斥着“夜郎自大、目不识丁”的舆论。信息封闭掩盖了文革的灾难，造成了令人啼笑皆非的舆论。只有提供全面、丰富的信息，人们在许多见解的鉴别中才能形成正确意见。那么，大幅度地扩充各类信息，必然引起版面的扩大和新闻节目的增加。人民日报为什么仅有八个版？地方的党报只有4个版？几十年的“一贯制”为什么不能打破？广播电视台的新闻节目为什么不增加时间？每天实际发生的国际新闻岂止十几分钟！在一个11亿人口的大国，我们的报刊仅有3000多种，远远低于世界许多国家人口的平均水平。报刊数量、版面与节目时间的有限，压掉了人民需要知道的大量信息，使仅有的少量报刊发行数量大大减少，广播电视新闻的收视收听率不能大幅度提高，而党与国家借助新闻媒介要宣传的方针政策的影响也随之相应缩小。封闭的思想模式最终导致了自我封闭，把大量思想阵地让位于那些小报、非法出版物和外国电台、电视台（边疆地区）。

让我们考察一下几个社会主义国家新闻媒介的情况：仅有我国$\frac{1}{4}$人口的苏联，有报纸8019种，仅市地级的报纸就有3600多种，堪称世界新闻大国。即使具有一两千万人口的国家，报纸的数量也相当可观。南斯拉夫全国共有报刊2000余家，全国最大报纸《战斗报》每天出12—16个版，行销34万份的《新闻晚报》每天出版13次，共有40个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共有报纸1 200家，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机关报每天出8—12版，周末合刊16版。东欧这些国家报纸内容丰富多姿、消息多，信息量大，足以把面临的现实问题反映出来。以南斯拉夫的《政治报》为例，它的篇幅同北京晚报大小一样，每期出40—44个版。前八个版是国外重要新闻，从第九版开始登载5个版来自工厂和农村的各种消息，然后是两个版的文化生活、两个版首都生活集锦，

2—3个版的体育消息，3个版的长篇连载，20个版的广告。广告数量最大的是各企业、团体招聘工作人员、学校招生、启事、私人讣告、租房、家俱用品出让、各种商业广告和旅游、出版、文艺表演，等等。此外，每天还刊登人们日常生活中常用的电话号码、出租汽车、急救站、修理服务等项目。

许多人对西方大报每天出100—200个版迷惑不解，这里的奥秘是，信息繁多、意识的大输出量不仅满足了各类人的需要因而扩大了销量，获得较大利润，而且给受众提供充分的信息选择机遇，为控制人的态度发挥了定向疏导作用。越是信息闭塞的社会，人们越加孤陋寡闻，因循守旧，很难接受新的意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只有打破信息封闭状态，扩大新闻报道的信息量，才能使各类新闻工具传播大量有价值的消息和意见，形成适应社会不断变革而需要的正确舆论。

信息量扩大与新闻报道自由，是同一种机制的两个侧面，没有自由就不可能扩大报道面，而扩大信息则需要更多的自由。新闻自由是新闻舆论"基质"的重要条件。扩大信息量，除了少量的国家机密以外，必须对采访自由、报道自由、评论自由取消不合理的限制，允许记者报道一切有积极意义的消息，并以独有的理解发表短评或社论，用富有社会主义思想的报刊言论指导舆论。记者自由采访与报道，能把社会中各种积极因素和建设性的意见最大限度地挖掘出来，对社会复杂问题各抒己见，展开讨论，从而使人们容易鉴别真理，指导人民群众形成正确的意见。没有这种自由，一切报道都按一个指令进行，就不能打破信息单一化。由于党的声音缺少多样化的表达形式，也就无法开通社会信息的纵横流动，开创社会评价主渠道的繁荣局面；同时，也就不能担负起"通过各种现代化的新闻工具和宣传工具，增加对政务和党务活动的报道，发扬舆论监督作用，支持群众揭露工作

中的缺点错误，反对官僚主义，同各种不正之风作斗争”[1]的历史任务。

但是，从来没有超越阶级、超越法律的自由。任何自由都是有限度的，无限制的自由不仅达不到丰富信息、指导舆论的目的，而且必然要把社会舆论搞乱。新闻自由是思想斗争与政治斗争的有力武器，所有的武器都不能乱杀乱砍，必须遵守它的使用规则，因此，新闻自由在何时何地都不是绝对的，无边界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新闻报道自由实行某些合理的限制是新闻舆论维持其“基质”纯洁性的保证。我们主张新闻采访、报道、评论的自由，但绝不能把西方某些“自由条文”奉为楷模，因为那些条文最终是为“多党制、竞选制和经济垄断制”服务的。这种自由往往引起风波。尽管那里的法律细致而严谨，但个人名誉常常遭到报刊的诽谤，政治家的人格受到污辱，宣传招魂术与占星术不受非议。社会主义的新闻自由有它合理的限制，我们要去掉的是不合理的限制。合理的限制不是要树立“全国一个调，全国一张报”的戒律，而是不准违背社会主义思想原则，危害全体人民的利益。凡是侵害人民利益而散布谎言，蛊惑人心，制造混乱的报道活动，都应受到限制。因为这些行为践踏人民的民主权利，伤害社会的整体利益，恰恰是违背新闻自由原则的。

那么由谁对扰乱社会舆论、对违背报道自由的活动加以限制呢？不是人治，也不是“书报检查机关”。历史证明，“人治”必然导致专断，为所欲为。书报检查机关无法、也没有必要审查一切稿件，新闻报道的高度控制，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是需要的。苏联社会科学工作者麦德维杰夫认真考察了社会主义国家新闻报道的历史经验，大胆然而又非常正确地作出结论：书报检查机关由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清楚地告诉我们，都不可避免地

① 见党的十三大报告《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5页。

要变质，变为不是保卫社会的工具，而是或多或少地隐蔽专横的武器①。我国的“四人帮”控制报刊，就把它变成阴谋夺权的武器。新闻检查制往往被个人的无原则斗争所利用。正如马克思所说：“检查制度没有消灭斗争，它使斗争片面化，把公开的斗争变成秘密的斗争，把原则的斗争变为无力量的原则与无原则的力量间的斗争。……它由于批判能力尚差而错误地把个别人当做普遍智慧的化身，把强力的命令当做理性的命令，把墨渍当做太阳的斑点……。”②如果报道涉及各级党和行政机关的政务、国务活动，或涉及各级领导人的工作、言论和生活，必须事先把稿件提交相应领导部门或当事人审查，经过允许才能见报。这不是新闻检查，而是获准发表权、维护新闻主体正当权宜的严格程序。拒绝这种送审制，不仅是违纪的，也是违法的。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限制新闻自由的滥用主要依靠法律，实行法治。没有新闻法，人民的知情权、监督权和发言权就没有保障。向报社反应问题的人被追查，记者揭露丑类被殴打，党中央的正确声音被堵塞，党的方针政策可以任意歪曲。缺少新闻法，垄断言论与压制言论将超越一切障碍，诬陷肆虐，而不受惩罚，新闻宣传不是积极地影响、指导舆论，而是无视、亵渎舆论，以致黄色新闻和黄色书刊泛滥。马克思深刻洞察检查制与出版法的对立，指出，出版法是治疗检查制造成思想扭曲病的良药。他写道：出版法就是出版自由在立法上的认可……，“如果我被提交法庭受审，我的过失一定是破坏了现行法律，而在法律受到破坏的地方就至少应当存在着法律。既然不存在出版法，也就不可能破坏出版法。检查制度不是控告违反了现行法律。它宣布我的意见有罪是因为这个意见不是检查官和他上司的意

① 参见〔苏〕罗伊·麦德维杰夫：《论社会主义民主》，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9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8页。

见。”① 没有新闻出版法，怎么能判断记者的报道危害了人民与国家利益，人们的批评与指责是合法的呢？在一个提倡法治的社会里，没有新闻出版法，就可能一同放纵思想自由和思想侵害，又可能把真正的自由同时绞杀；最需要法律制衡的思想传播领域，如果受不到法律制衡，精神污染和思想迫害随时都可能泛起祸水。只有在新闻出版法的保护下，人人享有符合人民利益的言论自由与报道自由，群众、记者、权力人物才能处于平等地位。人们用法律公开裁决意见的是非善恶，法庭的公开审理使个人的恶言中伤、诬陷诽谤、煽动混乱受到公正的处罚，民意受到尊重，社会安定得到加强，社会舆论也就呈现出健康的发展。没有新闻出版法的保障，任何个人意见都可能冒充普遍舆论去行骗，而真正的舆论在新闻报道中却被淹没。当人民听不到自己的声音或自己的声音不被重视，新闻传播就失去了人民的信任，党借助它影响、指导社会舆论的功能也就化为乌有。

1987年，中共中央十三大报告首次强调：“必须抓紧制定新闻出版、结社、集会游行等法律，建立人民申诉制度，使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和自由得到保障，同时依法制止滥用权利和自由的行为。”这是建立当代中国社会舆论仲裁制度的重大步骤，必将使我国新闻与其它舆论活动的规范纳入法律范畴。

二、新闻宣传是社会舆论的“放大器”

新闻宣传活动的显著机能，是通过传播放大舆论。任何一种意见经过新闻报道能大幅度地扩大覆盖面，使局部意见转化为全局意见；使少数人意见变成多数人意见，使某种意见的适用度扩充到难以预料的空间。新闻宣传增大意见的倍率等于把某种意见放大一样，造成广阔的波及范围。

从1987年开始，在祖国首都展开一场兴建亚运会工程的热潮。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76页。

中央和北京市的领导人辛苦地筹划建设蓝图，建筑工人英勇奋战，北京市开展募集资金的全民活动，一座座现代化的体育馆、场拔地而起……这些消息通过传播媒介传遍了亚洲和世界，“中国有能力举办大型体育比赛”的意见正在国际舆论中确立。新闻传播手段，特别是广播电视媒介在同一个时间、在几分钟内就把一种观点传播到全国、全球各地，使数亿人很快形成一致态度，这种放大舆论的功能引起人类的广泛注意。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坎特利尔和奥尔波特在《无线电心理学》一书中指出，当千百万人读了或听了同样的叙述、同样的论据、同样的号召、同样的音乐、同样的幽默文章，当千百万人的注意力以同样方式、在同一时间、以同一强度被吸引着，那么从心理上说，这些人不可避免地会在某种程度上产生共同的兴趣、共同的爱好、并持有共同的态度。新闻宣传放大舆论，主要通过扩大传播空间同时出现的共振心理，使舆论主体的人数剧增，从而扩大了舆论影响的社会范围。根据新闻传播方式的立体效果，其放大舆论的模式，一般表现为辐射式放大、跨层次放大和典型意向放大三种类别。新闻舆论活动转化为社会舆论主要是借助这三种放大机能实现的。

（一）辐射放大

这是新闻舆论多向传播方式所形成的全方位的舆论放大。报道某种意见的新闻媒体处于舆论源的地位，随着传播渠道伸向四面八方，这种意见就以辐射的模型向四周扩散，较短时间内就能在多向空间中形成舆论。

新闻传播优于人际传播的特点之一，是多向传播渠道的纵深度大，速度快，由信息源向四周广大地区扩散得极为迅速。一种意见一经报道，就会在方圆数万里引起反响，可能有几亿人同时产生舆论举动。人际传播意见模式虽然也具有辐射的特点，但它的纵深幅度小、速度慢、经过漫长时间才能在一定空间形成一致意见。

据现有不完全的调查对比，同一个重要事件或观点，由中央广播台或电视台报道的新闻或评论在我国东部地区造成反响，只需要几小时，人民日报需要1—2天，而人际传播则需要半月以上。显然，新闻宣传放大舆论的效率取决于传播的时效快、范围大的因素。社会舆论形成的快慢和规模的大小直接受信息传播速度和射程远近的制约，这样，新闻舆论所产生的影响也就比社会讨论、协商对话和会议动员具有速效、广袤的优势。

新闻舆论辐射放大舆论的功能，给人们控制舆论提供了宝贵的价值。如果希望迅速放大一种意见，成为社会中主要的舆论，就要频繁、大量运用新闻宣传媒介重复同类意见。一个机构，一个团体、直至各级政府要想扩大声誉和政治影响，也只有最大限度地运用新闻宣传手段，才能更快、更多地争取赞同者和支持者。在现代社会，打开闭关锁国的铁栅，面向世界开放，消除和外界广泛的交往障碍，只有借助新闻舆论才能实现。进行广泛、科学的国际宣传，就能在国际舆论中产生影响，站稳脚根。

新闻宣传辐射放大舆论的功能，必然使新闻工具成为社会讨论、协商对话和会议动员等其他舆论活动的载体。人们的舆论活动都力图获得最佳效果，尽量扩大正确观念范围，深化人们的信念，争取越来越多的人赞成自己的意见。人们积极推广社会讨论、协商对话和会议动员的活动，都是为了实现这一目的。这样，人们毫不怀疑，只有运用新闻工具及时报道成功的讨论活动、对话现场和重要会议，才能把这些人际舆论行为迅速放大到成千上万倍，在广大空间形成最大的舆论场，使远隔万里的人们坐在电视机旁或浏览版面上的生动描述，就能成为舆论主体，化为舆论从众的一员。

（二）跨层次放大

当上下层舆论相互对流传播，希望有效影响对方的态度时，则要经过若干人际层次才能产生作用，这种意见交往只能是间接

的，缓慢的。上下层舆论的跨度越大，中间经过的层次越多，通过人际关系传播的意见发生的误差也越大，这是“隔热层”、“冷却层”对上下层舆论对流速度与准确性耗损的结果。

打破“隔热层”、“冷却层”，运用新闻宣传使上下层意见直接交流，就能产生跨层次放大舆论的效果。在社会管理活动中，要形成广泛的群众舆论并产生很大的力量，必须有两个相辅相成的过程，一个是群众的议论，经过群众的领导者的赞同而为之广为传播，一个是领导机关的决策，深得群众拥护而为之广为传播。这两种传播往往借助新闻宣传才成为可能。在这两种相辅相成的信息对流中，传播意见的信息量不但不会减少，而且接受意见的人数大幅度激增，使舆论影响的范围和效果极度放大。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不能象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和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设想的那样，生产资料归整个社会所有，人们凭证书进行消费品分配，因此，国家完全实行人民管理，中间协调机构十分简单。我们今天还远没有进入马克思主义的理想时代，不仅国家需要集中领导，而且还需要各种不可缺少的中间管理环节。那么，当国家高层领导机关的声音传达到基层，或群众的呼声传达到高层机关，运用人际方式传播就要经过若干层次才能实现。这种人际传播往往以层层“传达”或“汇报”的形式设置了无数“弯道”横跨其间，形成“～～～”的多弓型信息渠道。仅就一个企业，传达重要意见如果要经过厂级干部会议、中层干部会议、车间负责人会议，车间负责人向群众传达会议四个层次，广大群众才能最后接触到这种意见。用多弓型渠道传达上层意见所产生的“微曲解”现象，使信息发生严重的流失，有时甚至发生错误。当一个观点经过几次传播“弯道”，由于一次比

---

① 甘惜分：《新闻理论基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62页。

一次曲解成分增多，有些观点到达群众那里已经完全走样，而且听众的人数不能保证。意见失真度更大的是下层意见通过多弓型渠道向上反应。很多基层单位的领导人向上级反映本单位群众的意见都进行删除、堵塞，甚至有意无意地曲解。群众许多真正的意见一层层被剔除了若干部分，上一级领导层通过“～～～”型人际传播渠道听到群众的声音已经少得可怜。中间“隔热层”，“冷却层”压缩了大量信息，阻隔人民呼声直接上达社会的上层管理者，把下层舆论压缩为一只“美丽的坷粒”。在日常情况下，某些部门群众的尖锐呼声只有该部门的直接领导人能够听得全面，他们往往封锁群众的反对意见不让上一级领导人知道，这样，就连市、县级领导机关了解社会舆论的广度与深度也被“隔热层”缩小到最低限度。

新闻媒介直接报道上、下层意见，打破了中间层次的“扭曲”，消除了层层压缩意见的损耗，把最高领导的意见毫不走样地和千千万万群众直接见面，也把群众的要求直接上达到高层权力机构的每个领导人物那里。只要人们每天读报、看电视、听广播，就能把上下层意见在最大范围内进行对流，放大上下层舆论的空间，使上下舆论在交流中始终保持“纯度”的影响力。

在西方国家政治生活中，政府首脑和许多铁腕人物深刻认识到新闻传播放大上下层舆论的作用，常常利用“跨层次放大”的原理，直接和公众对话。1952年美国年轻的参议员尼克松竞选美国总统，他的竞选班子和高级顾问构成了他和选民的“隔热层”。当他们得知《纽约时报》登出他在竞选中受贿的文章，竟然劝他退出竞选。消息不胫而走，舆论大哗。但尼克松决定在电台发表半小时讲话，直接和选民见面。这天，全国64家电视台、754家电台将镜头与话筒对准了尼克松，有6000万人听、看了他的演说，整个美国都安静了。尼克松向全国公开了自己的收支、家产和债务，一一作了详细、真诚地介绍。他最后说：“这次竞选提

名之后，确实收到一件礼物，这就是得克萨斯州有人送给我孩子的一只小狗。”他的讲话一完，聚集在播音间外面的人向他欢呼，有100万人给他打来电话、电报、或写来信件，几乎每个有名望的共和党人都给他发了赞扬的电函，从邮局汇来的小额捐款达6万美元，继续支持他的竞选。尼克松易如反掌，越过这次政治低谷，不能不归功于传播媒介跨层次放大舆论的机能，使他的形象和语言直接激发了美国选民们对他的支持。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各级领导人和群众的对话，各种重要会议，运用新闻工具直接和全国人民见面就能获得扩大舆论影响的最佳效果。广播电视和报刊所显示出的延伸空间的巨大神通，能消除一切曲解的障碍，把正确的见解真实、生动地传输给全社会，使之迅速转化为普遍的社会意见。

（三）典型意向适用度放大

新闻报道离不开典型化，特别是在出现大量同类事物的社会环境中，记者只能选择具有一定典型意义的真实事件，才能深刻地概括普遍的同类事物的特征。任何一家新闻单位，不可能把每天发生的成千上万个事件都付诸报道，更没有必要把所有相类似的事件都兼收并储在版面上或节目里，这就要在采访中有选择，有概括，把那些最有典型意义的事件介绍给公众。典型化必然也是新闻记者的一种思维方式。但这种典型化以真实的事实为本体，和文学艺术的典型性是不同的。

典型化的最早称指是“类型说”。亚里斯多德在《修辞学》一书中认为类型是普遍性在数量上的总和。后来，贺拉斯把“类型说”引深为“定型说”，是把普遍的事物用一个具体的事物来“定型”它的情况和意义。法国近代思想启蒙运动的领袖孟德斯鸠提出“典型”的概念，并把它视作“最普通”、“最常见”、“最有代表性”的事物。显然，他把典型性凝化为同类事物的常态和“像形”，并没有完全超出古希腊时代的“类型说”。直到

18世纪末，康德在《崇高的分析》一文中才全部揭示了典型化的含义，他认为典型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暗示性，是"最充满的形象显现"。新闻传播所以需要典型报道既不在于时代需要树立什么"样板"的皮相之谈，也不是出于学习典型经验的一隅之论，而是人类感知世界、把握世界必须经历概括"典型"的认识道路。人类只能通过个别认识一般，通过个性感悟共性，通过了解个别事例的性质与特征对同一类事物形成大体一致的意见。这正是新闻报道引导舆论的奥秘。

记者报道重要消息，不仅仅是为了反映事实本身，而且是帮助、指导人们如何去认识、判断这一类事实，这就要通过选择、概括那些最能表达这种判断的事实去引导人们形成一种意见：爱什么，恨什么，赞扬什么、反对什么、学习什么、模仿什么。在这里，典型报道就不能不蕴含着扩大报道主体意向的动机，使这种意向适用于更大的范围，以便在公众中形成赞成这种意向的态度。任何典型报道都是通过少量事实显示大量同类事实，实现以一当十的扩大典型适用度的效果，从而也就放大了对同类事物的普遍意见。新闻报道的深刻典型化，扩大舆论的普遍化，是新闻用事实说话、用事实暗示、用事实诱导意见来实现的。约斯特指出："新闻本身就是一个重要而基本的创造舆论的因素，一切对时事的意见实质都是以新闻为基础。"①

对深圳特区的典型报道所形成的舆论，不仅是对深圳这个城市对外开放的意见，而且是对特区政策、特区经济模式这一类事物的意见；对兴安岭森林大火中造成失误而撤掉林业部长的报道所形成的舆论，不仅是对这一官僚主义现象形成的批评意见，而且是激起全国人民对所有官僚主义问题的普遍议论。典型报道的普遍意义，正是由于它引导人们对一个事件的认识而形成对大量同类事物的正确意见，从而激发人们去赞扬、支持一切先进人物

① 《新闻学原理》第83页。

的正义事业，批评、消灭一切丑类和非正义的事业。这种放大舆论指向的机能只有通过报道典型化才能奏效，才容易憾动广大群众的意向、情感，引起人们的共鸣，扩大典型意向的适用范围。新闻指导舆论，一刻也离不开典型报道，即用典型事例暗示一种意见的正确性，引导人们在大范围内对同类事例形成广泛的共性认识。

三、新闻引导舆论的价值取向

新闻宣传对舆论影响的巨大威力，表现为改变人们对世界的态度，那么，不同的新闻舆论价值取向就要形成不同的社会舆论效应。新闻舆论的价值取向，是指新闻宣传按照什么价值标准指导报道、影响舆论的方向，又简称为新闻的舆论导向。用有利于人民利益、推动社会进步的意见影响舆论，是良性价值取向，而以侵害人民利益、阻碍社会进步的意见蛊惑舆论，就形成了新闻舆论的劣性价值取向。

有条消息报道我国烟草行业预计在1988年实现税利达170亿元，跃居全国上交利税的第一大户。170亿确实是个令人瞩目的数字。但这则报道在国内外引起的舆论却和记者的喜悦心情恰成鲜明对照。只要看看下列数字就一目了然了：

全国每年火灾造成的巨额损失有50%—60%与吸烟有关；

烟草种植占去的耕地使粮食产量减少几十亿斤；

由吸烟导致的各种疾病据估计占发病率的20%；

现在世界上有95%的国家严格禁烟，把刊登推销香烟的广告视作不道德行为。

而我们的记者却把烟草行业的高额利润视为一件皆大欢喜的好事加以捧场。读了这条消息，有些同志脱口而出：“这无异于图财害命！”这条信息在国内外所引起的舆论，是可想而知的。

新闻宣传违背社会利益就失去任何价值，它所造成的舆论也

必然是反其自身的舆论，即引起人们对新闻报道的不满。

初级阶段的新闻舆论要维护社会安定，推动四化建设的顺利进行，是确立其价值取向的基点，由此我们把新闻宣传概括为三种舆论价值。

第一，正面报道的肯定价值。

正面报道是反映社会主义建设活动中积极因素和先进事物的主要舆论活动，它以乐观、热情、鼓舞性的情感与意向，颂扬生活中涌现出来的先进人物、成功的经验和新鲜事物，证明社会主义具有优越性，使人们对正面事物形成肯定性的意见，这是扩大社会正向舆论所必需的普遍意识。没有正面报道，人们就无法充分认识社会的光明面，对社会主义事业形成坚定的一致意见。无疑，正面报道所形成的舆论能增强人们从事现代化建设的坚强信念，具有重大的价值。

用现代化建设的成就、经验、先进人物鼓舞人民，使人民始终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是产生良性舆论价值的重要报道指向。列宁指出："请看看资产阶级。他们是多么宣扬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他们在自己的发行千百万份的报纸上大肆赞扬资本家视为'模范的'企业，把资产阶级的'模范'组织当做民族的骄傲！我们的报刊并不关心或几乎全不关心下述事情，描写最好的食堂或托儿所，用一切办法使他们中间的某些组织变成模范组织，宣扬它们，并详细描述在模范的共产主义工作下能够怎样节省人力、怎样便利消费者，怎样节省产品，怎样把妇女从家庭奴隶境遇中解放出来，怎样改善卫生条件，——这一切都能做到，能推广到全社会，推广到全体劳动群众中去。"① 人民群众成为新生活的主人，渴望迅速改变社会生活面貌，正在迸发出无穷的热情和智慧，创造史无前例的奇迹，这是现实生活的主导方面。新闻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19页。

宣传通过大量正面报道反映社会主义时代蒸蒸日上的风貌，揭示政治与经济生活的发展趋势，就能在人民群众中形成敢于改革、积极进取、勤奋工作的舆论。人民群众从这些舆论中不断获得启示，吸取力量，又能在两个文明建设中产生更大的动力。

为了使正面报道收到预期的舆论效果，新闻宣传必须关注经济建设中的一切根本问题，而不应大轰大嗡，满足于字面上的锣鼓齐鸣的颂扬和夸耀。把着眼点放在宣传具体经验、实际效果和真正的建设成就方面，并作出恰如其分的分析，是新闻舆论指导群众创造活动的巨大精神力量。列宁对此曾提出过非常富有教益的见解："多做一些生产宣传，尤其是对实际经验多做一些实事求是的、巧妙的、适合群众水平的估计。"①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面报道不能忽略抵制资本主义影响，随时粉碎国际反动势力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的宣传。号召人们在对外开放中，既要讲友谊，又要警惕资本主义的意识渗透，以强有力的事实与论断回击西方国家的反动宣传。引导人民坚信，共产党人能够不断克服自身的工作失误，把社会主义事业进行到底；并使人们牢记，公有制比私有制具有无比的优越性，社会主义最终要取代资本主义。

正面报道不能违背社会发展逻辑，变成只报喜不报忧的"一片光明的颂歌"，而应当在肯定正面事物的同时，把存在的错误、不足和阴暗面说够。正如列宁指出的，"我们这里最糟的是，报刊上泛泛的议论和空洞的政治喧嚷太多，而对地方经验的研究却极端缺乏，……他们害怕家丑外扬，害怕赤裸裸的真相"②。把全部社会真相告诉群众，人民决不会因为报道了自己活动的缺陷与病态而否定自己，也绝不因为把一切都说得锦上添花就齐诵赞美诗。只有实事求是地评价现实生活，引导人们冷

① 《列宁全集》第32卷，第120页。

② 《列宁文稿》第10卷，第184页。

静地思索周围的变故，才能形成持续稳固的肯定性舆论。

第二，反面报道的否定价值

反面报道又称批评报道，是暴露社会主义时代中陈腐、死亡、消极的各种社会现象，动员人民识别反面事物的丑恶性，形成人人谴责、人人批评的社会舆论。由于这种舆论否定了对社会具有破坏因素的旧势力、旧思想、旧习惯，其否定价值本身必然具有进步意义。

就新闻传播工具的社会作用而言，反面报道是新闻舆论的重要侧面，因为批评性内容渗透在许多新闻报道和新闻评论中。新闻单位对应当否定的事物不进行批评，也就丧失了教育人民、引导人民的作用，同时也就失去了引导舆论的功能。马克思指出：报纸“把它在希望与忧患之中从生活那里倾听来的东西，公开地报道出来，它尖锐地、激情地、片面地（象当时激动的感情和思想所要求的那样）对这些东西作出自己的判决。”① 在社会主义时代，没有批评的报刊，或没有报刊的批评都是不可思议的。不是下层人民的批评，就是“官方”的批评；不是对反动势力的激烈批判，就是一个领域、一个团体内部的善言忠告。批评腐朽、落后事物是新闻报道的永恒主题。在一切反面报道中，以通讯员为核心的人民群众，对反社会主义活动、官僚主义及一切不良现象的揭露和抨击，是批评报导产生否定价值的舆论主体。广大通讯员生活在社会基层，时时刻刻都能感受到人民群众的幸福欢乐、忧患苦难，也常常目睹各种丑类给人们带来的不幸。只有他们才能大量揭露坏人坏事，充分表达人们的呼声。

反面报道面向整个社会，选择典型的假、丑、恶的东西作为批评对象，其中，反对官僚主义作风，“同官僚主义斗争的问题是第一位的”②。各类新闻工具、各家新闻单位共同向败坏党和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87页。

② 《列宁文稿》第3卷，第393页。

人民事业的腐败分子作斗争，引导人民憎恶、抵制、声讨一切不正之风，就能造成声势浩大的社会批评气氛，形成广泛的舆论监督。新闻批评使犯错误的人置于成千上万群众的耳目之下，在群众纷纷议论中出现一种"社会鄙视"和"社会精神警戒"，因此成为全民性的"生动有力、时刻警惕的精神监督"①。

反面报道还包括群众的自我批评、自我教育，从而形成群众自我评价的舆论。群众也能犯各种错误，产生各种悲剧，新闻宣传要在群众中不断造成一种自我克服不良思想倾向和不良行为的舆论，对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道德和社会主义民主生活的训练，使新闻宣传成为"鞭策落后者的工具，成为教育人们去积极工作、遵守劳动纪律、加强组织的工具"②。

在当代中国社会中，某些群众在思想、心理、行动上时而暴露出非现代化的惰性或目无法纪的倾向。例如，无政府状态、无秩序、投机钻营、散漫肮脏，少出力而赚大钱，这些颓废现象对远离文明历史陶冶的某些群众更有吸引力；盲目崇拜新名词，追求时髦，哄闹围观，崇尚清谈，往往在某些群体中形成狂热心理；对社会曲折然而是正常的发展抱怨不休，牢骚满腹，甚至出现不应有的过火行动；等等。群众不会因为社会主义革命而成为圣人，他们世世代代受压迫、受愚弄，处于贫穷、落后、愚昧的地位，社会主义不会迅速消除旧制度带给他们的种种缺憾。新闻宣传要以满腔热忱披露群众自身的病态，呼吁人民群众以强大的舆论共同根治这些毛病。新闻舆论这种否定价值，比任何行政力量更有效、更广泛地帮助群众抵制旧制度的恶劣影响，成为人民群众最好的教科书。

第三，理论宣传树立新观念的价值

---

① 《布尔什维克报刊文集》，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314页。

② 《列宁全集》第30卷，第120页。

理论往往是苍白的，但理论如果来自实践，紧密结合实际，指导实际，它又是强大有力的。新闻媒介的理论宣传应当属于后者。

新闻报道还包括学术报道、理论报道的内容。报刊开辟专栏大量刊载有关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文章，许多重要消息也往往带有理论色彩，这些理论宣传用最新的观点给人们注入新的观念，对现实紧迫的问题给予科学回答，引导人们形成一致深刻的认识。这是一种不可低估的舆论价值。随着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深入发展，新事物层出不穷，新闻媒介越加需要用理论宣传指导人们正确认识这些新事物的本质，加速实现观念更新。

翻开我们的报纸，大量出现经济学原理新论、经济形势的预测、政治民主的探讨、人口学的新发现、高能物理的最新成果、考古学的长足进步、服装研究的新突破、特区经济的深化认识、社会心理学的新观点、消费心理的新态势等报道和精干短小的理论阐述。这些文章在读者面前展开一幅幅思想世界的新颖画面，是理性思维与实际生活精灵化的探索。人们从这里不仅把握大量深层化的信息，而且对世界发展形成新的深刻概念，使自己逐渐成为现代人。在理论宣传中，占第一位的是向群众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把发展马克思主义建立在遵循马克思主义原则基础上，严防借口批判封建主义反对社会主义。

理论宣传，关键在于确立新的观念，这是一种特殊的舆论效应。1978年以后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今天已成为习以为常的农业经营模式，这一伟大方针被11亿人口所接受，新闻媒介的集中宣传起了一定作用。全国各级报刊、杂志、广播电视发表了10万多篇有关这方面的报道、理论文章、评论、杂感、见闻、图片，那种“辛辛苦苦30年，一夜回到解放前”的舆论渐渐消失，出现了“责任田，翻几番，农民进入温饱线”、“‘包’字

开路，农民致富”的新舆论。

新思想、新观念，是变革现实与现实变革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现代化建设需要一大批新的思考者，只有新闻宣传才能肩负起把最新理论成果迅速传播给每一个人的使命，培养一大批拥有新观念的强人。当社会多数人接受同一种观念，形成新的舆论时，一种伟大的思想就成为时代的呼唤，武装人们披荆折棘地开辟新的世界。新闻界的理论宣传通过形成广泛社会舆论培植新观念的价值，是当代改革浪潮中最宝贵的精神动力。

四、党与国家对新闻舆论活动的领导与管理

在当代中国，新闻报道是规模最大，影响最深刻的舆论活动，它运用三种价值取向发挥广泛的宣传作用，从而产生引导群众舆论的效果。无庸置疑，党与国家对新闻媒介进行有效地指导和管理，必然是科学驾驭社会舆论的关键。

（一）新闻舆论工具的喉舌使命

一切意识形式，都受社会组织的控制，有的受党派的政治控制，有的受经济实体的财务控制，有的仅仅受国家的法律控制（诸如西方的私人媒介），但三者的控制目的却是共同的，即要求传播媒介服务于一定组织系统的社会活动目标，给全社会或一部分人带来效益。自新闻媒介的最早样式——印刷报纸问世以来，无一不是在一定社会组织的控制下从事引导舆论的活动。早期的封建宫廷、行会和近、现代的政府、党派、团体、企业，都曾先后控制着他们需要控制的新闻工具。企图在世界上找到不受一定组织控制和指导、具有绝对自由的大众媒介，是无法如愿以偿的。不仅马克思主义理论反复阐明这一点，而且就连当代外国的新闻理论家也肯定这一点，日本19名新闻学教授和知名人士所著的《新闻学概论》一书明确提出：“报纸只能是代表制作者和发行

者的集合体，不管这个集合体是公司、政党或思想集团。”①

社会组织指导新闻舆论的主要目的，是把它变成自己的喉舌，用新闻报道表达自己的意志、愿望、要求，引导群众形成和自己一致的舆论。这是对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都适用的普遍原理。

即使现代的美国人，对发生在1895年把报刊变为政党喉舌的事例，仍然坦率地给予肯定。那一年，威廉·艾伦·怀特购买了堪萨斯一张小报《商场报》，他毫不犹豫地把“报纸变成开明的共和党人、人道主义思想和敏感性议论的一张全国性的喉舌”②。时过近百年，新闻媒介的喉舌作用在西方不仅没有削弱，反而日益强化。总统操纵全国性传播工具推销主张，抑制不同意见，成为西方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普遍现象。美国前副总统瓦尔特·蒙代尔道出了美国领导人始终把传播工具当作喉舌的传统，他写道：“总统用无线电广播和电视广播作为表达他的观点的全国性讲台，总统举行记者招待会，白宫和行政部门利用它们所设立的公共关系机构。这些工具都已经过改革，能适应各个总统的需要和爱好；它们都有助于宣传总统的主张，压抑那些表示异议并要对总统的行动加以约束的呼声。”③西方大财团控制的报刊是否也具有喉舌性质呢？不用多言，这些报刊的消息和言论更是直接代表财阀们的意志，表达他们自己的声音，而不允许发表有损于本财团的任何意见。

---

① 〔日〕和田祥一编著《新闻学概论》，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年版，第190页。

② 〔美〕本·巴格迪坎：《传播媒介的垄断》，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80页。

③ 瓦尔特·蒙代尔：《掌权者的责任》，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61页。

在今天，美国几乎没有一种行业不拥有一家重要的传播媒介，也很少有哪家规模可观的主要传播媒介不在一个大产业中拥有一家公司的。这些传播媒介报道关于产业的新闻，而在这些产业中，它们或者是业主，或者兼任董事并奉行共同的方针。

……

一些公司的业主直接干涉以控制传播媒介公司的产品；有时……这种干涉是蛮横的。大多数业主并不直接插手。但他们都对那些控制新闻和其他公众信息的人拥有雇用和解雇的权力①。

这就是说，西方大公司控制的新闻媒介对那些不愿作其喉舌的负责人、编辑、记者，只好对不起——解雇回家。

新闻媒介作为最重要的舆论工具，决定着各种社会组织的命运，它可以使一个党派光环四射，在群众中享有伟大的号召力，也可以使一个社会组织臭名远扬，一败涂地。没有新闻媒介作为喉舌的社会组织，不可能自立于社会，更不能发展、壮大自己。任何一个党派或政府，特别是手握重权的执政党，会自动放弃这种喉舌，如果放弃，就等于堵住自己的嘴巴，窒息自己的思想，失去统帅群众的武器。

掌握了新闻喉舌，也就有可能控制社会舆论（暂时的或长期的），失去新闻喉舌，也就失去了把握社会舆论的机会，从而也就失去了群众。在当代中国，从占有新闻喉舌到控制社会舆论，是历史赋于党和国家的光辉使命，党和国家最有效地完成这一使命，也就能把自己的路线付之实现，带领公众创造理想的未来。

在当代的社会主义中国，一切新闻媒介都发挥着喉舌作用。党和政府担负着带领全国人民建设四化的重任，同时又肩负着建设民主生活、推动人们观念更新的崇高历史责任。党和政府只有

① 参见〔美〕本•巴格迪坎《传播媒介的垄断》第5～6页。

充分运用新闻喉舌宣传人民、组织人民，不断进行自我认识，才能完成这一伟大的历史任务。丝毫不容怀疑，党和政府必须接受利用喉舌工具指导舆论的伟大使命，才能生活在人民心中，使人们随时听到她的声音，完成她所提出的宏伟纲领。

那些直属各级党委统辖的党报，更不可能改变它的喉舌性质。不仅如此，它还是党的一个直属部门，是党委精神的"发声器"，从人员构成到财务支出它都是党组织支撑的。它是党的另一支大军，宣传大军。党用它表明自己的态度，反映人民的要求，监督自己的所作所为，指导人民群众沿着正确的方向从事社会活动。党和政府对新闻媒介的控制，不是对精神世界的垄断，而是对人民群众进行思想教育，反映人民的呼唤，成为正确意见的表达机构。自近代资产阶级政党的机关报诞生以来，所有政党无不把报纸自诩为"民意表达机关"，高歌"新闻纸者，国民之喉舌也"①的美好理想，这种崇高追求应当而且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才有可能大放异彩。

（二）对新闻舆论工具的领导方式

各种新闻舆论工具在当代中国，都担负着引导全国舆论的日常报道活动，它发表的绝大多数消息都具有双重意义，即不仅要传播信息，报告新发生的事件，而且要发表带有指导性的意见，在广阔范围内指导人们形成正确的观念。当然，也有一种纯事实的报道，这大都是不涉及重大问题的次要事件的传播，这类报道往往不会引发舆论。

凡是引起社会公众关注的报道，编辑部就不能回避引导舆论的责任，单纯地去传播信息。对重要事件作出解释，正确地反映人民的意志，把社会舆论引向正确的轨道，是当代中国新闻媒介的主要职能。这一过程，自始至终把报纸、广播电视和社会舆论

① 徐宝璜《新闻学》，载《新闻文存》中国新闻出版社，1987年版，第285页。

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传播媒介成为舆论的天然载体，正如马克思所说，“报纸是作为社会舆论的纸币流通的”①。

新闻媒介传播哪种倾向的舆论？发表什么意见来指导舆论？这对任何一家新闻机构都是至关紧要的问题。毫无疑问，新闻媒介只有按照全国人民的意愿，正确地解释现实事件和社会生活，才能充当党和国家的喉舌作用，因而党和国家对新闻报道的控制也只能是政治指导，为报刊、广播电视把握政治方向。在日常报道中，党委和政府不可能具体审查、了解每一篇稿件的细节，只要善于驾驭总体报道的政治倾向，也就能保证新闻媒介对社会舆论进行良性的引导。

政治是个外延广泛的概念，涉及到国家管理、人民利益、社会安定、中央方针决策的一切领域。新闻媒介引导舆论始终离不开政治。但政治又有别于一般的具体事务，它是带有定方向、定政策的根本性问题，党委对新闻媒介的领导不能放弃这些根本问题而去抓技节问题。

在政治控制方面，西方某些开明的研究者大都注重实际效果，因为他们渴望新闻界灵活地表现政治，能够被视作代表公众利益。例如，美国社会学家戴维·波普诺认为：“作为社会压力和舆论机构，新闻界在政治决策过程中也起着重要作用。在其所有者的政治控制下，报刊也常常变成某种特殊观点的喉舌。不过，为争取读者的竞争和多样化的管理形式，使新闻机构在它的意识形态方面也不能太死板。”②

这一结论对我国的新闻报道活动也有借鉴意义，因为，党和政府对新闻活动的政治领导，在“管理形式”方面同样不能太死板，既要牢固地占领新闻宣传阵地，又要给总编辑、记者更多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117页。

② 戴维·波普诺：《社会学》下册，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38页。

创造机会。政治领导的全部内涵应当体现为采取一系列有效的控制手段，在坚持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的政治方向的前提下，把新闻活动纳入专业化、功能化、法律化或竞争化的轨道。

所谓专业化，要承认新闻是一门科学，新闻报道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同时又是一种高超的技艺。一种思想，一个事件如何报道都要依据一定的科学法则。要从科学的角度研究、指导报道，首先要从政治上着眼新闻业务活动，但又不能把新闻和政治报告等同起来。为此，必须把提高新闻工作者的思想素质和业务素质作为新闻事业建设的头等大事，特别要把那些政治强、知识渊博、笔力雄浑、热爱人民、忠于党的事业、对生活充满热忱的人推到总编辑的岗位。

即使普通新闻工作者的素质，也要比其他领域专业人员的标准要高。他们应当是通才，但对某一门类又是专才，一般应当是双专业人才。搞经济报道的不仅要懂新闻学，而且要具有经济学和经济管理的知识。政法记者、科教记者、农业记者、工商记者、军事记者等等，都应谙熟新闻学和本行业的专门知识。除此而外，任何一个记者还必须懂得政治、了解社会，具有政治工作能力，这样的新闻工作者无疑具有高瞻远瞩的见地和灵敏的嗅觉。他们视野开阔，心胸博大，观察问题善于超出自我，跨跃一时一隅的狭小天地，不易被各种假象和一孔之得所迷惑。凡是报道经常发生谬误的新闻单位，那里的人才素质大都是很低下的。

政治品质是新闻人才素质的核心，是从事新闻工作的基本条件。政治品质的要点应当是："凡是真理要求我们说，要求我们写的，就不顾一切的说，不顾一切的写，人民心里所想说，所认为应当写的，就决不放弃，决不迟疑的给说出来，写出来。另一方面，凡不合真理和违背民意的东西，就不管有多大的强力在后面紧迫着或在前面诱惑着，我们也必须有勇气，有毅力把它抛弃，决不轻着一字。……有是有，无是无，白是白，黑是黑，不

容有丝毫假借，也不容有丝毫含糊。”①记者坚持这一政治立场，才能真正坚持党的立场，反映国家的意志，使新闻媒介形成人民的舆论。各种宣传工具的主持者必须是品德高尚、是非分明的政治家、社会活动家，而不是风派、毫无主见的人云亦云者，更不是主观武断、昏头昏脑的蛮干家。党和国家控制新闻舆论活动，首先要把好人才关，让正派、稳健的舆论专家从事舆论工作。同时要关心新闻工作者的物质待遇，为他们呕心沥血的工作创造充裕的生活条件。

所谓功能化，是指加强新闻引导舆论的社会功能，以新闻报道的社会效果检验新闻舆论活动是否成功。一项重要的报道，一个时期的新闻舆论活动要受社会实践的检验，由稳固的社会效果作出裁决。宣传工作主管部门，要对新闻报道的功能经常进行调查研究，把调查研究的结果通报给新闻媒介的负责人，并针对新闻宣传的社会效益，要求新闻单位及时改进工作，不断提高新闻媒介的功能作用。报道活动的优化，体现为引导舆论的功能是否显著，新闻传播不能正确地引导舆论，它的全部社会价值就变得十分微小。

所谓法治化，是指国家用法律武器指导新闻报道活动，贯彻法制原则，制订新闻法来确立新闻舆论规范，而不是用人治代替法治。要在法律范围内给新闻活动以充分的自由，并用法律限制、制裁新闻自由可能出现的劣性倾向。对党报引导舆论的活动不仅用法治，而且还要贯彻党性原则，即用党性化的方式进行指导。党报不仅要守法，而且要服从党性，接受党委的正确监督与领导。列宁认为，党性的意义就在于“表达党的观点”。新闻媒介是否用党的思想对现实生活作出解释，是党性的核心。

---

① 见重庆新华日报社论：《记者节谈记者》，转引自《新华论丛》第二辑（下），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59—60页。

离开党的思想，把党性变成个人意志对新闻舆论瞎指挥，恰恰是违背党性。党的报刊必须无条件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政治观点，党员不准在报刊广播的公开宣传中发表同中央的决定相反的言论。这是党的宣传纪律之一。

所谓竞争化，是指要用竞争的观点指导不同类型的新闻媒介，看看哪家新闻单位善于发现、提出重大问题，并给予深刻而正确的解释，从而激发人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创造热情和献身精神；看看哪家新闻单位的消息准确可靠、时效强、表达生动；看看哪家新闻单位经常发表振聋发聩的重要言论，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把公众的意见引向正确的轨道。党和国家经常运用民意测验的方式组织评比，每年进行一次表彰“权威报纸”、“权威广播电视”和优秀记者的活动，为此，国家要设立各种新闻奖。

各新闻媒介要以竞争意识参与社会生活，在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求声誉，自觉克服、调整新闻舆论工作出现的失误。

提倡竞争，就要增强各种新闻媒介舆论活动的自主权，除了国家重大方针和主要国事的宣传外，报道什么以及如何报道都应当最大限度地发挥每个新闻工作者的创造精神和主动性。新闻引导舆论的自主性充满高度的责任感，在新闻人才的政治与业务素质达到一定水平的基础上，自主权必将提高引导舆论活动的真理效益，使每一项报道都是在科学化、定量化研究之后作出的稳妥反应，而不是盲目地照抄、照转来自领导机关的指令。事实证明，对新闻舆论实行有效地控制，可以避免新闻报道大幅度超前或滞后的倾向，使新闻引导舆论的功能更加适应实际生活，促进社会的进步。

（三）新闻舆论管理体制的分流与党报体系的双重领导

人们经常提到舆论界这个概念，似乎它是代表公众声音的实

体而受到社会尊重。在中国当代，舆论界主要是指新闻界，这是传播意见、加大舆论功率的大本营。只要我们看一看1987年新闻界的规模，就会确信，加强新闻舆论管理的科学性是国家领导整个新闻事业的关键。

1987年我国有报纸2 337家，新闻性杂志200多家，广播电视发射、转播台3 500多家。仅以内蒙古为例，1987年拥有报纸64种，广播发射台49座、调频发射台69座、广播站100余座，电视发射台、转播台、小功率差转台251座。全国报纸数量的增长也令人惊讶，从1980年1月1日至1985年3月1日的1885天中新创办的报纸有1 080家，平均不到两天就有一家新的报纸问世。所有报纸每期发行数量已近2.7亿份，而全国拥有的电视观众竟达6亿多人。上述这个庞大数目说明，尽管我国的新闻传播事业还不发达，但它每天发出的信息量相当可观，任何一种意见经过新闻传播工具的宣传，短期内就在全国造成强烈的反响，形成强大的舆论冲击波，而某些错误意见所造成的舆论动荡则更难收拾。在六、七十年代，两报一刊社论和中央台早晨联播的新闻往往把大江南北搅得不得安宁，制造了种种混乱。因此，对新闻媒介的科学管理，确保新闻舆论健康地引导全国人民的思想，是形成社会舆论良性增长的重要环节。

显然，这样庞大的新闻传播体系必须由党的领导机构来直接管理，实行卓有成效地控制，才能有利于新闻媒介发挥各自的特殊功能。无疑，党和国家从政治上必须领导各种新闻媒介的舆论活动，但对具体报道的管理却不宜高度集中、过分统一。只有采取分流管理的方法，才能有助于舆论开放，舆论监督。

分流管理，是指把全国新闻媒介划分为若干类型，归属于不同党政部门加以统辖，实现各自的职能，担负不同的舆论引导任务。其管理部门和新闻报道的分工大致可划分以下几个方面。

1.党委机关报系统。这是党委的喉舌，由党委领导，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党的重要活动，报道党的领导人的言论和活动，监督党的工作作风、思想作风和遵纪守法情况。对全国施加政治与思想影响。

2.政府机关报系统。这是由上自国务院的报刊和广播电视台到省、市、县级政府的新闻宣传机关组成的综合性宣传媒介体系。政府新闻机构应当是当代新闻媒介的主体，无论从数量还是规模上占据全国新闻机构的大部分。它们受各级政府的直接领导，以宣传政府各部门的政令、决策、经济和文化教育工作为主要内容，定期预测和发布经济情况，正确引导人们在经济生活中的舆论活动，监督政府各级官员、公务员的工作。

3.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报刊系统。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应当创办自己的机关报，一般应为周刊或周二刊，直接受各级人大常委会的领导。这种机关报除了报道人大委员和代表的活动外，用大量篇幅代表人民对同届政府的工作和政府官员的表现，实施舆论监督。这种机关报是人民代表大会的直接喉舌，以各种栏目充分反映人民的疾苦和建议。

4.军队系统的报纸。这是人民军队的舆论阵地，作为中央军委的喉舌，反映部队的生活、军事训练和战事方面的动态。

5.各类企业报、专业报和娱乐性报纸系统。在其主办部门的领导下，接受各地区、各部门宣传部和出版机关的监督与指导，同时要以党的思想为指南，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新闻媒介的分流管理，使党和国家对新闻活动的政治指导通过不同领域贯彻到各种新闻媒介，形成多侧面的协同领导。根据不同新闻工具的对象和功能区别，分流管理将增强指导新闻舆论的针对性和专业化，提高新闻工具引导舆论、实行舆论监督的实际效益。

各级党的机关报是中国当代新闻传播媒介阵容的主力军，它的宣传方向决定全国的宣传方向，具有引导整个国家宣传工作的任务，因而，优化对党委机关报的领导方式，是80年代新闻改革的重大课题。多年新闻工作实践证明，党委机关报不仅要接受同级党委的领导，同时还要接受上级党委的指挥才能有效地进行舆论监督。因为，同级党委一旦发生工作错误，机关报往往不能发表文章制止，而且还要听从指令把这种错误在党委领导的范围内加以扩大，而事后又不能及时纠正。如果党委机关报实行双重领导，将有效地加强同级党委对报纸的正确指导。

双重领导是一种包含越权因素的领导方式，它能迅速把党的新精神全面地渗透到办报活动中。除党中央机关报归中央政治局直接领导外，每一级党委的新闻机构在接受同级党委领导的同时，又在业务上归属上一级党委宣传部的统辖，也就是，宣传部代表党委对下一级的新闻媒介实行业务管理。这种领导体制使省、市、县级新闻媒介的记者获得更多的自主性，能够根据中央精神或上一级党委的工作布署宣传同级党委的党务、政务活动和具体工作，增强党报发挥宣传、监督、沟通作用的活力。

双重领导有助于上级党委掌握全局的宣传动态，便于指导大面积的新闻舆论活动；新闻单位有可能摆脱同级党委的不正当的限制，充分发挥新闻媒介依照中央精神引导舆论的功能。

各级党报负责人的选拔方式，是能否发现、使用高素质的新闻决策人才的关键。广泛的选举制，有助于把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新闻舆论内行推举到新闻工作的领导岗位。新闻机构的总编辑除了同级党委任命外，还可由同级党委提名、通过党代会投票选举产生（人大机关报的总编辑可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这种挑选新闻领导人才的方式可以使总编辑在本地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了解同级党委管辖区域的经济、政治、社会状况和党务情况。更重要的是，通过党代会推选，由全党同志鉴别一个总编辑

能否代表党的利益，是否具有党的宣传家的政治品质，只能有助于更全面、更准确地挑选杰出的新闻领导干部。

一方面对党报实行双重领导，另一方面总编辑又由同级党代会选举产生，这两种制约力的结合，能够保证党的舆论阵地不变成个人专断的工具，而是不折不扣地按照党的精神从事宣传报道活动。如果党的路线正确，就不会产生“黑西哥”①那样的总编辑，新闻机构的喉舌性质也不会改变，并始终和党与人民保持休戚与共的联系。

① “四人帮”控制新闻工具时期的人民日报总编辑只知道按“四人帮”意志行事，极力宣传极左路线，由于文化水平低，“黑”“墨”不分，把“墨西哥”叫作“黑西哥”。

第四章　当代中国的民意测验

社会管理者把握社会动向，要以把握人心为基准，不了解人民的意向，也就不能根本了解社会发展的曲线。在当代中国，引进西方民意测验的方法测量群众的思想动态，把国家或部门的管理建立在民意的基础上，是正确制定、实施一切方针政策的重要环节。

1988年3月3日，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在春节前进行的“首都知名人士龙年展望”的民意测验揭晓。这次对200知名人士的民意调查具有一般民意测验的全部特征，生动再现了民意测验的活动规律。测验进一步表明，中央提出的深化改革、搞活经济的总方针受到人民的拥护，几年来对改革的良性舆论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

亿万人民在某一特定时刻想什么、追求什么，支配着社会每个细小的变化。而要获得这种意向数据，必须运用一种特殊方法、依赖一种具有高速运算性能的机器才能做到。40年前，法国迪巴尔神父预言：“例如舆论的发展这种人类活动现象，为什么不能设想一种机器可以收集这类或那类信息（例如关于生产和市场的信息），然后将它作为普通人心理的函数和能够在一定情况下测量的那些函数，来决定情况发展的最可能方向是什么？”①。

30年代兴起的美国盖洛普民意测验活动还没有广泛应用这种机器——电子计算机，因此，民意预测的准确性常常受到严峻的挑战，每一次搏弈都胆战心惊，唯恐公布的数据和实际相去甚远

① 转引自《维纳著作选》第166页。

而受到公众的嘲弄。在当代，这种机器已经引进我国的宣传活动，民意测验借助电子计算机开始显示出它的神奇功力，使把握大面积民意的动向成为可能。前边提到的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对200位高层人士的舆论测量，就经过微机处理，获得上万个数据，可靠地揭示出当前的民意倾向。

第一节　民意测验的功用与指标

民意测验是一种特殊的调查研究，它的广泛运用，表明人类对社会意识运动认识的手段走向完善化、系统化和科学化。由于舆论状态风行或消失的不定性和广延性，使人们很难捕捉社会普遍态度的事实资料，那么，对民意调查就必须采取特殊的方法。

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历来都重视民意调查，因为共产党人正是按着民意推进它的全部革命运动，其中包括制定路线、方针、政策。马克思在1880年写的“工人调查表”涉及了极为详尽、周密的有关工人对社会现状的意见。恩格斯为了深入了解工人的生活与思想情绪，不满足于现有文字材料提供的静态认识，而来到工人家里和工人彻夜交谈，获取工人阶级的疾苦和对生活态度的第一手材料，直接研究了他们的要求，他们的痛苦和快乐①。这种直接的民意测验方式为洞察工人运动高涨的程度提供了丰富深刻的感性认识。通过民意测验把握人心所向，是无产阶级革命活动的光荣传统，在社会主义时代，它必然是了解社会舆情的最佳科学方法。

一、民意测验与社会动向

政治活动有个突出特征，即各种权力人物都雄心勃勃地自称发现了民意、代表民意并坚决诉诸民意，在没有运用有效手段把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73页。

握民意的量度时，谁又能肯定他们代表民意还是背离民意？这确实是个无法说清楚的社会两难问题。

政治家都无不声言“我们站在广大人民群众一边”，民意便成为政治旋涡中的“王牌”，但它又常常被出卖、被利用。各类权力人物为什么都自诩是民意的代表呢？因为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人民的意志决定社会的发展方向。在人类历史上，凡违背民意的人，注定逆潮流而动，遭到彻底失败；而凡顺乎民意的人，也就顺应社会发展方向建功立业，受到人民的欢迎，为人民所歌颂。那么，准确地把握民意的量度和方向就具有重大意义了。社会主义社会正是人民政治家驰骋自如的时代，但他们同样要受这一规律支配，即只有遵从民意，他们的驰骋才能鹏程万里，受万众爱戴。而要遵从民意，又必须善于把握民意。

除民意测验外，任何一种调查方法都无法真实地显示民意。其它调查方法虽然在几百年中倍受人们的推崇，但都存在着“有懈可击”的疵点，甚至为诡辩术提供溢美的机会。例如调查会就有许多埋伏隐蔽其中：为了使主见得以通过，有意寻找赞成的人座谈，自然毫不费劲地获得这些人的支持而达到目的。有的调查以个别谈话进行，调查者回避他要回避的人，调查过程自始自终充满诱导性的发问，使调查的结果真真假假，虚实兼有，这种调查所获得的材料很难谈得上有什么价值。某些管理人员利用社会主义在群众心目中的权威，对不同意见施加有形或无形的压力，最后使主见获得表面上的一致“赞成”或“通过”，接着开始渲染受到舆论广泛支持的气氛，以群众的代言人而自居。由此通过的决定、决议、计划、预见、指示、当选人，由于违背真正的民意，在一两年之后就暴露出种种破绽而陷入困境。社会动向的不可逆转来自民心的不可抗拒，用科学的方法把握民心，是适应历史发展规律的需要，忽视这种因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将周而复始地处于正误交错的波折中。

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民意测验是在1923年12月16日——17日由北京大学举办的。当时，北大平民讲演团在1 007人中测试了“国内或世界大人物有哪几位”的问题，测验结果表明，列宁排在世界大人物之首，孙中山、陈独秀在国内大人物之中居第一、第二位。这次民意测验真实地反映了民意。建国后28年的漫长历史时期，中国再没有举行过（真正的）民意测验。

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了中国历史上宏伟的篇章，中华民族由全政治时代进入大经济时代，一个由人民意志决定社会命运的历史阶段开始了。而这一新的历史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纷繁复杂，党政机关、社会团体制定决策，急需把自己的立足点转向探索人民的整体意志。人们开始承认，对社会现象的认识也必须象对自然现象的认识一样，需要建立一套严格的数理测量体系，彻底否定全政治时代“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谁权大谁有理”那种衡量社会事务的是非标准。由于个人总是或多或少地以自我为中心来观察世界，那么多数人对社会事务形成的一致观点就能消除各自的“自我“的狭隘性与陋见，成为全面、真实地反映客观世界的正确意见。如果人们用一套座标参照系统在更高的层次上把握这种意见，这就成为真正的民意测验活动。

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民意测验活动在中华大地逐步铺开，成为中国当代无数改革事务中具有奠基意义的新事物。北京日报开创了当代中国民意测验的先河，对该报受读者欢迎的程度进行了调查。接着，北京新闻学会、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中国社会调查所、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和中宣部新闻局、中央电视台、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等单位，先后多次进行了民意测验，就新闻宣传的社会效果、中国公民的政治意识、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进行了可行性研究，为推进四化建设制订相应决策提供了可靠的数据。

民意测验把握社会动向的科学性在于它调查民意的准确性。测验不是对民意进行估计和简单的定性，而是以统计、验算的方式显示人们集合意识的方向、分布、比例与强度。数学计算引进对人们意识的测量，从数量的观察入手确定人们意向的质量，使把握民意纳入由量变到质变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几乎所有社会科学只有运用自然科学，特别是数学的研究成果，才能走上精确无误的轨道，否则就很难避免“玩弄实例”的陷阱。列宁指出：“大家知道，从自然科学奔向社会科学的强大潮流，不仅在配弟时代存在，在马克思时代也是存在的。在20世纪，这个潮流是同样强大，甚至可能说更加强大了。”① 马克思也指出过，“将来自然科学在一定程度上包括人的科学、而人的科学又在一定程度上会包括自然科学，这将成为一门科学”②，“科学只有当它利用了数学的时候，它才能达到完善的程度”③。舆论是几百万、甚至几千万、几亿人的意识运动，把握它的整体浮动性和趋向性，只有在民意测验中获得几万乃至几十万个数据，才能真实地描述它，正确地认识它。大至一个国家，小至一个具体单位或新闻媒介要想了解全体人民、或全体工作人员对某项政策、观点、立场所持的态度，运用民意测验获得大量精确的数据，就能最大限度地把握民心的动向。

民意测验是获得广泛社会评价的过程。它选择各领域、各阶层、各种职业、年龄区的人对同一事物的态度进行测定，构成全方位的意向调查。各种社会事务的优劣、适时与否、公益的大小都是以绝大多数人的满意或不满意为标准的，群众的态度倾向就显示出强烈的评价方向。如果要测定某项政策、决策是否正确，唯一的方法要看人民群众对它的态度，民意测验清晰地显示出绝

---

① 《列宁全集》第20卷，第18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选》，莫斯科1965年版第596页。

③ 拉法格：《回忆马克思》，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7页。

大多数人的判断，对这种政策或决策的估价也就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有一些政策、措施从理论上推断，严丝合缝，势在必行，但人民群众却持反对意见，其原因是“理论”脱离了实际，脱离人民具体活动的盖然性，这样，人民就不会产生自觉贯彻的动力，如果强制推行，就要遭到失败。民意的评价是意志自测功能的外化，无数人的态度倾向汇成一个总的评价倾向，就产生一股强大的肯定或否定意识的力量，它必然成为能否执行这种政策与措施的潜能。在确立、贯彻、推行各种方针政策和决策时，如果事先进行一次广泛的民意测验，了解群众的意愿，就会获得最公正的社会评价标准，避免可能发生的许多失误。

民意测验的评价功能和舆论评价功能不是等同的概念。舆论包括民意，也包括上层意见和微观社会环境下的群体意见，民意是指全体人民群众的意见，它的评价功能在任何情况下都再现真理，而其他范围的舆论却未必都是再现客观实在性的反映。例如，群体舆论的主体从少数人的切身利益出发，意识倾向可能和更大范围内社会群体意向的总和相对抗，形成错误、荒谬的评价。在小社会环境中，即使绝大多数人一致的意见有时也并非能显示出社会整体的动向。由此，民意测验对社会问题的认识通常是在成千上万人的大范围内进行的，而不是对几百、几十个人意向的测定，它所获得的评价意见必然代表全体人民，或体现一定范围中人们的最大公意。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入80年代，人民群众的参与意识跃升到历史最高水平。一次民意测验显示，有80.35％的公民表示，“有价值的政治学习或讨论，我很愿意参加”，有53.89％的公民对“即使对社会有利，我也不会做政治上的冒险”的观点持否定态度。人民关心国家和民族命运，一定要反射出时代的最强音，那么，国家各项事业的推进无时无刻不是人民意志的再现。而那些充当政治角色的人更加活跃地表现自己的社会责任感，有时则

代表他所属的社会组织直接参与国家大事。人民自主作用的加强，使社会动向更加带有民意的功效色彩。凡人民支持、欢迎的事务，就能在社会中顽强地生长、发展，最终出现声势浩大的社会发展趋势；而人民反对、批评的事务，不管怎么维护它，最终要受到人民的抵制，以至最后被否定。毫不夸张，民意测验运用的深度和广度决定着当代中国社会管理者洞察社会方向的精确程度。在"左"倾路线盛行时期，我们同样一再重申信任群众、支持群众的首创精神，但却在很长时间内没有找到听取群众意见、了解群众情况的真正渠道。领导者的主观意见往往被当成民意，强制地推行，社会趋势常常被"一声号令"所扭曲，使许多社会活动由于背离真正的民意而陷入泥潭。这一切已成为痛悔的历史悲剧。种种历史教训使我们找到了民意测验这一把握社会整体意识的途径，取得了观察社会动向的中枢，这是我们党群众路线在新的历史时期更加成熟的标志。

民意测验能真实地反映人民群众的历史要求和聪明才智，社会管理机构运用它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获得真正的价值，无疑，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民意测验是坚持群众路线的一种特殊方式。信任群众、依靠群众的口号，只有借助民意测验才能转化为有效的实际步骤，那么可以预言，民意测验的广泛应用将不断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兴旺发达。

二、利凯尔特测量法与民意测验的指标体系

民意测验对人的意向测量，是以特定级差显示人们态度的量度与强度，构成完整的民意测验指标体系。测量态度的指标首先是由利凯尔特提出的，在我国的民意测验中已经广泛使用。这种指标在显示人们态度的强弱、众寡中表现出高度的灵活性和适用性。

利凯尔特于1932年发表了《意向的测量技术》一文①，提出测量意向的等级法，通常被各国社会学界称作利凯尔特测量法。他十分简明地把人的态度划分为5个等级，每一个等级表明对测验的事务所具有的倾向程度，这就是：

5.完全同意

4.同意

3.中立

2.不同意

1.完全不同意

当把某一问题向不同的人提出，人们按着这五级态度差域表明自己的立场，也就获得了人们的各种意见倾向。当我们把这一问题向100、1 000、1万、5万个人提出，就会得到同样多的指数。这时我们就可以把相同态度的数目累加起来，获得舆论的社会指标。比如：我们把“你是否同意王市长在七届市人代会上的报告”这一问题向5 000人提出，假如得到的答案是：“完全同意——3 000人”、“大部分内容同意——1 000人”、“中立、不置可否——500人”、“不同意——300人”、“完全不同意——200人”。那么，这项舆论的测定指标分别是：

完全同意：	3000人	占60%
不完全同意：	1000人	占20%
不置可否：	500人	占10%
不同意：	300人	占6%
完全不同意	200人	占4%

由此可见，舆论的指标体系是由指数构成的态度“量度”与态度“强度”的相关数据。舆论指数是按利凯尔特测量法制订的某种意向占有民意测定人数和强度等级的“量”，它包括测定出来的具有某种态度的人数和在整体中所占的百分比两项。“利凯

① 载《心理学》1932年版，第7卷。

尔特的主要功绩在于他提出了判断各项见解之间独立性的标准，按此标准可以排除一切不列入研究计划里的见解，确定某项见解的等级与某个人的总等级之间的相互关系”[①]。上例的数字和百分比就是某一类态度的占有人数和总测验人数的相互关系，这是民意测验最终要获得的两个指数，这两个指数的统一构成了一定舆论的指标。

舆论指标体系中量度指数和强度指数的有机结合，相辅相成，构成舆论态势的综合形体，显示出民意倾向的范围和力度。

量度指标是指某些态度的从众人数及其相关量——在总人数中的百分比。民意测验从狭意上说，不是一般的舆论测量，而要在一个市、一个省乃至全国确立测量对象的范围和人数，一般选择的人数不应少于5 000人。量度指标狭小就要失去真实度，改变意向选择的全局性，使社会一隅的特殊性、局部性被歪曲为全局意识的普遍性。比如，当我们要测验人们对物价这一全国性问题的态度时，只在某一单位，某一区、某个街道选择几百个人或十几个人测试，必然有很大的片面性。量度指标还要受职业、年龄、社会地位、生活富裕程度、职务等因素的制约，为了取得公允的量度指数，必须在各个地区、行业、年龄区、文化程度和不同收入的人群中按着实际拥有数量的比例选择测定对象。由此得到的量度指数不仅均匀合理，而且能够测出各类人的总体倾向。选择从众量的合理分布决定着相关量的准确性，同时又制约着摄取测验对象的均匀度和广泛性。

从广义上说，局部性的舆论测量也可以称作民意测验，但它已经失去民意的本来含义，无论从众量或相关量的确定都不可能具有广泛性。但它仍可在年龄、分工、文化程度等方面尽力扩大均匀度。比如，在一个具有1000人的工厂对选举厂长进行民意测验，只能在这1000人中确定量度指数，虽然无法涉及行业、地区

① 《社会学手册》第257页。

问题，这时要按分工、年龄、文化程度等方面考虑选取测验对象，或者把1千人都作为测定对象，从而获得全部实有人数的量度指标。局部的舆论测量，只要允许，尽可能把全体成员作为民意测验对象，囊括的人数越接近实有人数的整体，舆论测验的结果也就越有真实性。

舆论指标体系的纵向系统是由一系列强度指数构成的，所谓强度指数，是指人们态度、观点的强烈程度。由于人们的社会地位和切身利益不同，不同的人对同一事物就具有不同的态度。利凯尔特提出的五级态度差给我们揭示的正是舆论强度指标。但是，在我们进行具体民意测验、确定态度级差时，可以根据问题的需要，不只是确立五级，还可以确定更多一些级差的强度。根据汉语的表达特点，大致有以下几种强度指标等列：

1.

完全同意	同意	基本同意	不完全同意	无所谓	基本不同意	不同意	完全不同意

2.

非常满意	满意	基本满意	不完全满意	无所谓	基本不满意	不满意	特别不满意

3.

完全支持	支持	基本支持	不完全支持	无所谓	基本不支持	不支持	坚决反对

4.

特别希望	希望	比较希望	基本希望	无所谓	基本不希望	不希望	极不希望

舆论强度级差除了上述四种表示"意愿"的模式以外，还直接把测试的问题加上肯定或否定的词语让人们判断，由此测定人们意识的强弱尺度、承受能力和追求的紧迫感。比如列出一串问题让人们选择、判断，填写自己的态度。请看下边测定人们对改革的态度所提出的几个问题：

1.最好维持现状　（　　）
2.暂时先不改革　（　　）
3.一定不能改革　（　　）
4.谨慎地进行改革　（　　）
5.立即全面地进行改革　（　　）

舆论强度指数是民意测验中的主导数据，它揭示出人们意识的目标指向，因而成为舆论指标体系中的"主峰"，而量度指数则是它的庞大"山基"。舆论强度与量度指数是一种概率指数，仅仅是由抽测样本提供的典型数据，但把这一典型数据放大到全部对

象空间，给人们揭示的社会整体意向基本是可靠的。这种概率，能使我们从浓缩的舆论动态推断全局的舆论态势，由部分人的意向判断多数人的意向，得到的虽然是一种相似值，但却能再现整个社会的舆论趋势。我们平时所说的舆论力量的概念，正是舆论量度与强度的有机统一，它表明持某种强硬态度人数的众多与百分比，显示出舆论巨大的感召力和冲击力所占有的社会空间和集合意向的浓度。这种以数值标示的舆论态势，给人们展示出人心所向的大势所趋。当我们寻求对民意的深刻认识时，只要描述它的量度和强度波及的范围和深度，就能作出准确、科学的说明。

民意测验的量度与强度指标体系，包括多项内容的考察指数，从被测量对象的分布、现状的评价到各种态度的从众人数都要作出详细记录，同时要分成若干项清晰地排列出来。下边，是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在1988年对新闻单位所作的一次关于新闻改革的民意测验所得到的调查数据，它大体可以反映出舆论指标体系的一般描述格式，可供本书读者参考。

关于新闻改革民意测验的基本数据

一、被调查者的基本情况：

A、性别：男占81.6%；女占18.4%。

B、年龄：25岁以下占8%；　26～35岁占29.8%；36～45岁占28.6%；　46～55岁占25.2%；56岁以上占8.4%。

C、学历：小学毕业者占0.7%；初中毕业者占4.3%；高中或中专毕业占17.7%；大专毕业占38.5%；大学本科毕业占38.3%，研究生毕业占0.5%；

D、在大专以上的学历中新闻专业占26.6%；非新闻专业占73.4%。

E、从事新闻工作的时间：1—2年占7.1%；3—5年占23.5%；6—10年占18.9%；11—15年占11.5%；16—20年占12.1%；20年以上占26.9%。

F、专业技术职称分别为：高级职称占19.3%；中级职称占37.1%；初

级职称占20.8%；尚无职称者占22.8%。

G、现在担任的行政职务（或相当于）：社长、副社长（台长、副台长）占4.2%；总编辑、副总编辑占9.3%；部主任、副部主任占32.0%；组长、副组长占11.3%；一般编辑、记者占43.2%。

H、所在新闻单位的类别：报社占61.0%；广播电台占22.0%；电视台占16.9%。

I、所在新闻单位的规格（或相当于）：中央级新闻单位占9.3%；省（自治区、直辖市）级新闻单位占44.7%。地（市）级新闻单位占40.6%；县级新闻单位占5.5%。

二、对个人现状满意度的评价：

	不满意	不太满意	比较满意	满意
A、生活水平：	19.5%	43.6%	33.6%	3.3%
B、社会地位：	10.3%	30.4%	52.8%	6.5%
C、工作条件：	25.0%	42.8%	28.3%	3.9%
D、能力与专长的发挥：	15.8%	39.5%	39.6%	5.2%

三、对我国新闻工作现状的评价：

A、关于我国新闻宣传效果的评价：

认为“宣传效果很好”和“宣传效果较好”的分别为0.5%、和20.9%，共占21.4%；

认为“宣传效果一般”的占55.1%；

认为“宣传效果较差”和“宣传效果很差”的分别占20.4%、3.2%，共占23.6%。

B、关于我国新闻宣传报道受群众欢迎程度的评价：

认为“非常受欢迎”和“比较受欢迎”的分别占0.3%和23.4%，共占23.7%；

认为“一般”的占50.2%；

认为“不太受欢迎”和“非常不受欢迎”的分别占24.7%和1.4%，共占26.1%。

C、关于我国新闻宣传报道在群众中信誉的评价：

认为“信誉很高”和“信誉较高者”分别占1.1%和20.2%，共占

21.3%；

认为“信誉一般”占54.3%；

认为“信誉较低”和“信誉很低”的分别占22.4%和2.0%，共占24.4%。

D、关于我国新闻宣传工作的领导方式的评价：

认为“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的分别占0.4%和12.0%，共占12.4%；

认为“不太满意”和“很不满意”的分别占66.5%和21.2%，共占87.7%。

E、关于我国新闻改革进展情况的评价：

认为“进展太快”的占0.2%；

认为“进展太慢”的占87.3%；

认为“正合适”的占5.8%；

认为“毫无进展”的占6.6%。

四、中共十三大前后，新闻工作者对新闻改革前景的看法：

	非常乐观	比较乐观	不太乐观	很不乐观	说不准
A、十三大前	1.3%	17.5%	42.5%	17.7%	21.0%
B、十三大期间	8.0%	66.6%	13.7%	1.6%	10.2%
C、现在	4.1%	46.2%	26.7%	3.2%	19.8%

五、对新闻改革可能给个人生活和工作带来变化的基本态度：

表示“毫不担心”的占28.8%；

表示“不担心”的占55.3%；

表示“有点担心”的占15.1%；

表示“非常担心”的占0.9%。

六、认为当前新闻宣传报道存在的突出问题是：

1.批评报道的禁区和限制太多（占78.8%）；

2.在某些敏感性问题上不说真话（占67.6%）；

3.对政务与决策情况报道的透明度低（占50.3%）；

4.反映群众的呼声太少（占45.4%）；

5.会议报道过多（占43.2%）；

6、时效性差（占36.1%）。

七、在新闻改革中，理论与实践的先后关系问题：

主张“先进行实践摸索，后进行理论总结”的占13.3%；

主张“先进行理论探讨，后进行相应的实践”的占3.3%；

主张“边实践摸索，边理论探讨”的占83.4%。

八、对新闻改革方针的选择：

认为“大胆推进，不要怕犯错误”的占34.9%；

认为“要特别谨慎，避免犯错误”的占0.3%；

认为“既要积极，又要慎重”者占64.8%。

九、在调查列举的20张不同性质的报纸中，新闻工作者认为属于“党报”范畴的报纸按百分比排列如下：

人民日报占97.5%；辽宁日报占72.2%；太原日报占56.4%；

赤城县报占43.3%；中国日报占17.9%；光明日报占14.9%；

经济日报占12.7%；法制日报占12.2%；工人日报占10.8%；

参考消息占6.8%；羊城晚报占5.7%；中国广播报占5.0%；

首钢报占3.3%；人民铁道报占2.5%；中国科技报占2.2%；

华声报占1.9%；华东政法学院院报占1.4%；

体育报占1.4%；文摘报占1.3%；

现代人报占0.4%。

十、在新闻法公布后，对党报和非党报的要求是：

20.4%的新闻工作者认为：“两者都要服从新闻法和党的宣传纪律”。

79.6%的新闻工作者认为：“党报既要服从新闻法，又要服从党的宣传纪律；非党报只须对新闻法负责”。

十一、新闻单位迫切需要扩大的权限。

调查要求被调查者在列举的六项权限中选择三项，结果如下：

1.报道权（占70.1%）；　2.批评权（占71.5%）；

3.人事权（占46.5%）；　4.经营权（占27.7%）；

5.发行权（占5.8%）；　6.财务权（占24.8%）。

十二、关于新闻单位开展多种经营问题：

48.5%的新闻工作者认为，“在政策许可的范围内，新闻单位可以开展任何形式的经营活动”。

47.1%的新闻工作者认为，“在政策许可的范围内，新闻单位可以开展与新闻业务有关的经营活动”。

3.6%的新闻工作者认为，“新闻单位不要进行任何形式的经营活动”。

持有其它意见者占0.8%。

十三、对新闻单位开展多种经营利弊的认识：

认为“有利无弊”的占9.8%；

认为“利多弊少”的占67.9%；

认为“利弊相等”的占6.4%；

认为“弊多利少”的占6.5%；

认为“有弊无利”的占1.6%；

认为“说不准”的占7.8%。

十四、总编辑、社长（台长）的产生方式：

认为由“上级党委或政府部门直接任命”的占1.2%；

认为由“民主选举产生”的占25.8%；

认为应“公开招聘”的占31.7%；

认为应由“上级任命与民意测验相结合”的占39.8%；

认为应由其它方式产生者占1.5%。

十五、上级领导部门或主管领导人是否经常就贵报（台）新闻的选择处理作出具体指示？

有39.8%的被调查者的回答是“经常”；

有55.0%的被调查者的回答是“偶尔”；

有5.2%的被调查者的回答是“无”。

十六、新闻工作者对于各种新闻观点的态度和认识：

	同意	基本同意	不太同意	不同意
1.报纸必须尊重人民的知情权、发言权和监督权。	84.8%	14.6%	0.4%	0.2%

2.报纸（电台、电视台）应进一步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全面反映各方面的舆论和意见。	83.8%	13.0%	2.0%	1.2%
3.政治上对党和政府不利的事件不能报道，否则就会引起人们的思想混乱和社会的不安定。	22.9%	23.8%	31.8%	21.6%
	同意	基本同意	不太同意	不同意
4.报纸上发表不同意见不能仅限于学术问题和社会问题。还应包括政治问题。	49.6%	36.0%	9.6%	4.8%
5.只要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任何真实的新闻都可以报道。	46.1%	27.0%	18.6%	8.1%
6.报纸有权对政府的具体政策和工作提出批评，有权对党和国家各级领导人生活和工作的失误提出批评。	61.0%	30.2%	7.0%	1.8%
7.应当允许报纸犯错误，想办一张没有错误的报纸是不可能的。	70.8%	22.1%	4.8%	2.2%
8.报纸上就政策性问题展开自由讨论，势必会引起人们思想混乱，带来严重后果。	3.9%	6.9%	40.3%	49.0%
	同意	基本同意	不太同意	不同意

9.言论自由指的是口头

发表看法的自由，不包括通过报刊（电台、电视台）发表看法的自由。	7.4%	9.1%	25.3%	58.2%
10.报纸（电台、电视台）不能向党和政府要求任何形式的独立性。	13.1%	13.8%	33.8%	39.4%
11.以党报为核心的报业体系是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适应的。	53.6%	34.7%	7.0%	4.8%
12.报纸（电台、电视台）上的言论都必须与中央保持一致。	35.8%	29.7%	22.9%	11.6%
13.任何新闻报道都应起到宣传鼓动作用。	19.1%	16.5%	31.3%	33.1%
14.在社会主义社会，新闻单位都应是党和政府的一个部门，新闻工作者都应是国家干部。	22.7%	19.3%	31.7%	26.3%
	同意	基本同意	不太同意	不同意
15.新闻自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是与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根本对立的。	13.6%	11.4%	32.1%	43.0%
16.只要报道内容观点正确，就不必过多考虑读者是否爱读。	3.7%	5.1%	34.8%	56.4%
17.新闻工作的首要职能是沟通信息。	28.5%	39.6%	22.2%	9.7%

第二节　民意测验的技术原理

如何获得民意测验的指标体系，不是个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掌握民意测验的技术手段是实施民意测验的关键，因为只有正确掌握、运用民意测验的技能与技巧，才能获得准确的各种舆论指数，并对舆论态势作出科学分析。

一、增强民意测验的信度

民意测验的全部过程包括确定测量方式、选取样本（简称取样）、分析样本指标趋势、阐明指标数据、制定舆论模型图等①。其中，民意测验的方式，构成了民意测验活动的主体部分。

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民意测验的主要方式有街头访问、投放问卷和投票表决三种。不管用哪种方式获得舆论动态数据，都要以数据的可信性为最高标准，这就形成了民意测验信度的概念。“信度就是可靠性，指测量结果的一致性和稳定性”②。民意测验有很高的信度，才能反映真实的民意，使测验所获得的指数产生价值。维护上述三种测验方式的科学性，是增强测定数据信度的前提。

（一）增强街头访问的信度

由舆论调查机构或新闻记者担任访员，走上街头，随机选择

① 详见《基础舆论学》第11章第2节，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② 何维凌、黄晓京：《通往社会科学的前沿》第101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访问对象了解民意，是一种灵活、快速的民意测验方式。这种街头访问是通过面晤进行的，因而属于面晤式舆论测量的一种。

当发生重大事件或举行重要会议时，急需了解民意的反应，常常派出记者及其他访员走上街头，以自然流动的人群作为调查对象。街头访问节省时间，速度快，在当天就可获得民意动向的数据。1987年举行中共十三大会议期间，中央电视台、中国社会调查所都派出记者、访员在北京街头选择行人进行了民意测验。

为了保证街头访问获得民意的信度，必须科学地确定访问对象。街头访问在人流茫茫、人头攒动中选取样本，容易产生片面性，比如较多地询问了一种职业、一种年龄的人，使样本的分布失去均匀。街头访问选取样本的一般原则是，要凭借直观选取不同职业、年龄的人。根据行人的穿着、肤色、举止大致可以确认他是干部、知识分子、工人、农民还是学生，从每一种职业和年龄的人中选择若干相应的人数加以询问。询问的第一句话应当使被访者产生兴趣，接着要寻问该人从事什么工作，然后正面提出问题，这就使选择的人愿意回答各种问题。

街头访问提出的问题要简短、通俗、恳切、口语化，使被访对象准确地作出回答，一下子把真实的意向谈出来，这是确保信度的重要因素。当对方对所提出的问题表示不懂或抱有疑虑时，应当追加必要的重复和解释。对回答的内容，访员和被访对象也可相互交流观点，把对方的谈话引向深入，但访员始终只能作启发性的谈话，而不能代替访问对象发表意见。在访问中，访员手握钢笔，根据访员回答的态度倾向，不断在拟定问题的卡片上填写肯定（✓）或否定（×）符号，或者填写各种表示其他态度级差的符号，而无须记录访问对象回答的全部内容。有时，被访问

对象提出意想不到的新问题，拓宽了民意测验的思路，使测量的题目得到补充或完善，这就要把新提出的问题记录下来，并向其他选择的行人询问，以便为新增加的测验问题搜集数据。

街头访问所提的问题必须有两种相反答案的可能，并在卡片上表明两组对立的意见及其级差，让被访问对象在"是——否"的两极倾向中确立一种态度，作出回答。

比如：

你对王市长的报告是满意还是不满意？

1）满意	（　　）	1）不满意	（　　）
2）基本满意	（　　）	2）稍不满意	（　　）
3）完全满意	（　　）	3）完全不满意	（　　）

询问的表述采取二者择一方式，可以使人们说出真实的想法，如果只提出一种意识倾向的问题就要使许多人沿着访员的动机方向移动，所获得的民意数据必然含有虚假成份。人们在街头上回答问题并不负有义务，许多人的随意性很大，常常出现"你喜欢什么我就说什么"的倾向。如果把"是——否"两种意向都提出来让被访问者选择，就可能引起人们的独立思索。因此"对……你是满意还是不满意"的提问比单独问"对……你满意吗？"降低了暗示性的影响，使被询问者在选择中容易吐露内心真实的想法。但还没有根据断言，这个影响就完全消失①，但无论如何，从两个方面提问增加了回答问题的选择机会，能够提高所获民意数据的可信度。

（二）增强投放问卷的信度

对社会重要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的民意测量，通常用"投放问卷"的方式。问卷是由多项问题有机组合的卷面。接到问卷的

① 参见《社会学手册》第456页，这个影响有时还由周围环境、社会局势的压力等因素所产生。

人可根据个人的体验、认识、判断，独立填写规定的态度符号。为确保填写问卷的信度，必须科学地拟订选题、设计卷面。

在问卷设计中首先要确定、拟制选题。选题是由主题与分题构成的，形成问卷的主体与核心。拟定选题是设计问卷的中心工作。每一个问卷都有一个中心问题，其他选题要围绕这一中心问题展开。在卷面上提出的问题必须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亲身感受，让人一目了然。每个问题不仅仅只被某一领域、某一地区或部门的群众所了解，而且适用于多层次、多社区群众的认识水平。因此，拟定选题必须考虑问卷投放的广泛性，提出人们普遍关心、普遍熟悉的问题，并适合千千万万人的理解力。问卷选题使用的语言要准确、鲜明、易懂，使问卷填写者一下子就能把握问题的真正含义。容易造成误解的问题必然使填写人不能确切表达自己的意图，这种问卷就很难获得民意的真实倾向。

设计问卷的重要环节是排列选题，设置态度级差，确定填写符号，最后把所有的问题按着主次、轻重程度系统地展示出来。组合问题的系统性，对构成选题的内在联系具有启发性，这是指把所有问题按照内容的直接相关或重要程度归入一个大题目，再把若干大题目按着顺序整齐地排列。问题排列的系统性要服从人们认识能力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渐进性，最后突出实质性、要害性的问题。

问卷的设计者要求填写人运用制订的符号回答问题，这些符号简明易懂，便于统计，成为问卷语言。这类符号一般有“√”、“Δ”、“0”、“×”四种。“√”表示赞成、肯定意见，“Δ”表示中立、无所谓的意见，“0”表示完全赞同、肯定的意见，“×”表示不同意或完全否定的态度。当所提出的问题本身已经显示出明确的肯定和否定倾向，这四种符号就失去了上述意义，运用其中一个符号填写在问题后的括弧里，或用“0”圈掉题码、重点词语，就完全能够表达填写者的态度倾向。填写

问卷运用符号不仅节省时间，而且可以不暴露填写人的字迹，使填写人大胆、坦率地表达自己的意念，摆脱许多不必要的思想负担，敢于说真话。

投放问卷方向和广度的合理性是保证民意测验信度的重要条件。如果把问卷毫无计划地胡乱投放，而且投放面十分狭窄，都会使问卷失去广揽民意的效力。投放方向的基本要求是，分布地区、职业和年龄区域要均匀，兼顾各种不同社会地位的人。投放问卷的广度是指在多大范围内发放问卷，一般的原则是，测验的问题波及多大范围就要在多大面积投放问卷。如果把问卷只投放到一个地区、一个单位、同一类群体中，那么所获取的意向指数必然无法反映全局情况。为了统计各类自然条件的人意向的差别，在问卷设计中必须附有备考栏，要求填写调查对象的居住地区、职业、文化程度、年龄、职务、经济收入等等。

在这里，我们列举一份《政治体制改革与新闻宣传》的民意测验问卷①，来考察一般问卷的设计结构与列题方式：

《政治体制改革与新闻宣传》调查问卷

（前言）

同志：

您好！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将召开，这次大会将研究和制定我国四化建设的大政方针，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重要议程。为了充分反映人民群众对十三大的希望，我们这个专门从事民意调查的研究机构开展了这次调查。

这次调查可以为公民提供一个民主参政的机会，增进社会成员的思想交流。调查结果将提供给领导部门参考。

我们诚恳地希望得到您的支持与合作，请将您的真实想法提供给我们。这份调查问卷不记单位、姓名，您所填写的内容也无所谓对错，对您的回答我们将负责保密，请您不必有任何顾虑。

---

① 这是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在1987年7月拟订的问卷。

占用了您的宝贵时间，向您致以诚挚的谢意！

①平时，您是否经常读报纸、听广播、看电视？（各选一项，在相应的（　）中打“√”）

	天天	经常	偶尔	不读/不听/不看
A.读报纸	4（　）	3（　）	2（　）	1（　）
B.听广播	4（　）	3（　）	2（　）	1（　）
C.看电视	4（　）	3（　）	2（　）	1（　）

②请您对我国新闻媒介（报纸、广播、电视）的宣传报道进行评价：

A.是否真实地反映了社会的实际情况？（只选一项）

1（　）真实

2（　）比较真实

3（　）不太真实

4（　）不真实

5（　）说不清

B.是否较好地传达和解释了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只选一项）

1（　）好

2（　）比较好

3（　）不太好

4（　）不好

5（　）说不清

C.是否充分地反映了群众的情绪和意见？（只选一项）

1（　）充分

2（　）比较充分

3（　）不太充分

4（　）不充分

5（　）说不清

D.是否积极地回答了社会生活中的迫切问题？（只选一项）

1（　）积极

2（　）比较积极

3（　）不太积极

4（　）不积极

5（　　）说不清

③您认为改革人民代表选举制度应该首先解决什么问题？（最多选三项）

1（　　）代表应有参政议政能力

2（　　）实行差额选举

3（　　）充分保证选民权利，不由上级圈定候选人

4（　　）充分介绍候选人情况

5（　　）制定人民代表向选民负责的必要制度（如人民代表定期向人民汇报）

6（　　）其它（请注明）＿＿＿＿＿＿＿＿

7（　　）说不清

④如果目前我国采取直接选举产生各级行政首长（区长、县长、市长、省长、国家主席），您认为从哪一级实行直接选举最合适？（只选一项）

1（　　）公民直接选举区长、县长

2（　　）公民直接选举市长、省长

3（　　）公民直接选举国家主席

4（　　）哪一级也不适合直接选举

5（　　）说不清

⑤您认为本单位本系统的群众团体（如工会、共青团、学生会、妇联）是否能够充分代表群众利益？（只选一项）

1（　　）充分

2（　　）比较充分

3（　　）不太充分

4（　　）不充分

5（　　）说不清

⑥您认为本单位本系统领导部门的工作效率如何？（只选一项）

1（　　）效率高

2（　　）效率较高

3（　　）效率不太高

4（　　）效率低

5（　　）说不清

⑦您是否同意以下看法？（请逐句回答）

	同意	比较同意	不太同意	不同意
1.政府工作情况应完全向人民公开，否则人民的民主权利就难以实现。	1（ ）	2（ ）	3（ ）	4（ ）
2.强调民主，必然削弱党的领导。	1（ ）	2（ ）	3（ ）	4（ ）
3.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一项长期的任务。	1（ ）	2（ ）	3（ ）	4（ ）
4.“文革”搞得那么乱，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民主搞过头了。	1（ ）	2（ ）	3（ ）	4（ ）
5.我国当前政治生活中的主要危险仍然是左的倾向。	1（ ）	2（ ）	3（ ）	4（ ）
6.报纸围绕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展开讨论很有必要。	1（ ）	2（ ）	3（ ）	4（ ）
7.公民对国家的方针政策有不同意见，就应该通过一定方式（如写信、写文章、开会发言等）表达出来。	1（ ）	2（ ）	3（ ）	4（ ）
8.一个国家搞得好不好，关键在领导，普通老百姓起不了什么作用。	1（ ）	2（ ）	3（ ）	4（ ）
9.即使中央领导也要接受群众监督。	1（ ）	2（ ）	3（ ）	4（ ）
10.凡属政治问题都很复杂，公开讨论没有什么好处，容易引起思想混乱。	1（ ）	2（ ）	3（ ）	4（ ）
11.公民不应该只关心个人问题，更应该关心国家大事。	1（ ）	2（ ）	3（ ）	4（ ）
12.每个公民都可以公开发表政治见解。	1（ ）	2（ ）	3（ ）	4（ ）
13.我对政府的工作情况并不感兴趣，只要个人生活得好就行了。	1（ ）	2（ ）	3（ ）	4（ ）
14.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民主权利已经得到了充分保障。	1（ ）	2（ ）	3（ ）	4（ ）

15.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领导干部，
比上边点名提拔的更值得信任。1（　）2（　）3（　）4（　）

16.我国政治方面的主要问题是发
扬民主不够。1（　）2（　）3（　）4（　）

17.大政方针由上面定，不必去议
论，即使议论也没什么用。1（　）2（　）3（　）4（　）

18.如果不实行政治民主，即使经
济建设搞上去也不算真正的现
代化。1（　）2（　）3（　）4（　）

19.不要迷信选举这种形式，干部
人选还是由上级决定更稳妥。1（　）2（　）3（　）4（　）

20.只有经济高度发达之后，才有
条件进行政治民主建设。1（　）2（　）3（　）4（　）

⑧您认为目前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有没有阻力？（只选一项）

1（　）有阻力
2（　）没有阻力
3（　）说不清

⑨如果有阻力，您认为阻力来自哪些方面？（最多选三项）

1（　）资产阶级自由化影响
2（　）个别领导人思想保守
3（　）封建主义残余
4（　）经济发展水平低
5（　）民族文化素质差
6（　）传统的习惯势力
7（　）群众民主观念淡薄
8（　）其它（请注明）＿＿＿＿＿＿

⑩您认为目前政治体制改革应该首先解决哪些问题？（最多选五项）

01（　）实行党政分工
02（　）精简机构，提高工作效率
03（　）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增强党和国家领导机构的活力
04（　）克服互相推诿，不负责任等官僚主义现象

05（　　）加强法制建设
06（　　）切实保障公民的民主自由权利
07（　　）充分发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职能
08（　　）充分发挥政协和民主党派的作用
09（　　）保障社会主义新闻自由，加强舆论监督
10（　　）下放权力，充分调动基层单位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
11（　　）活跃基层单位的民主生活
12（　　）改革选举制度
13（　　）沟通和完善领导与群众的对话渠道
14（　　）其它（请注明）＿＿＿＿＿＿

⑪您认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可能在多长时间内取得明显成效？（只选一项）

1（　　）2年之内
2（　　）3～5年
3（　　）6～9年
4（　　）10年以上
5（　　）说不清

⑫在我国宪法规定的公民享有的基本自由权利中，您认为哪些最迫切需要制定具体法律进一步加以实施？（最多选三项）

1（　　）言论自由　4（　　）结社自由　7（　　）宗教信仰自由
2（　　）出版自由　5（　　）游行自由　8（　　）人身自由
3（　　）集会自由　6（　　）示威自由　9（　　）通信自由

⑬您认为哪个部门（或渠道）能够最有效地表达公民的意愿和解决公民的实际问题？（最多选三项）

01（　　）政府信访部门
02（　　）法律部门
03（　　）报社、电台、电视台
04（　　）工会、共青团、学生会、妇联等群众组织
05（　　）人民代表大会
06（　　）纪律检查部门
07（　　）通过本单位逐级向上反映

08（　　）与上级领导人直接对话

09（　　）托熟人找有关领导

10（　　）各级党的组织

11（　　）哪个部门都不行

12（　　）说不清

⑭总的来说，您对我国新闻媒介的宣传报道是否满意？（只选一项）

1（　　）满意

2（　　）比较满意

3（　　）不太满意

4（　　）不满意

5（　　）说不清

⑮在现实生活中，您对以下各方面是否满意？（各选一项）

	满　意	比较满意	不太满意	不满意
A.个人生活	4（　　）	3（　　）	2（　　）	1（　　）
B.工作(学习)条件	4（　　）	3（　　）	2（　　）	1（　　）
C.国家经济形势	4（　　）	3（　　）	2（　　）	1（　　）
D.国家政治生活	4（　　）	3（　　）	2（　　）	1（　　）

⑯您认为我国目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最多选五项）

01（　　）社会治安

02（　　）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建设

03（　　）祖国统一

04（　　）对外关系

05（　　）人口问题

06（　　）环境保护

07（　　）政治体制改革

08（　　）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

09（　　）党风和社会风气

10（　　）民族与宗教

11（　　）市场供应与物价

12（　　）文教卫生事业

13（　　）科学技术

14（　　）健全法制
15（　　）其它（请注明）＿＿＿＿＿＿＿＿

⑰您认为我国精神污染最严重的领域有哪些？
1（　　）报纸
2（　　）出版界
3（　　）杂志
4（　　）影视界
5（　　）文艺界
6（　　）业余文娱活动
7（　　）说不清

⑱您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是否关心？（只选一项）
1（　　）关心
2（　　）比较关心
3（　　）不太关心
4（　　）不关心
5（　　）说不清

⑲您是否经常与亲友同事议论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只选一项）
1（　　）从不谈
2（　　）偶尔谈
3（　　）有时谈
4（　　）经常谈
5（　　）说不清

⑳您认为目前我国实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时机是否成熟？（只选一项）
1（　　）成熟
2（　　）比较成熟
3（　　）不太成熟
4（　　）不成熟
5（　　）说不清

㉑您认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应该如何进行？（只选一项）
1（　　）大胆改革，不要怕犯错误
2（　　）既要积极，又要慎重

3（　　）谨慎稳妥，避免犯错误

4（　　）无所谓

（备考栏）

⑳您的基本情况

A.您的职业：

1（　　）工人　　6（　　）大学生

2（　　）党政干部　　7（　　）中学生

3（　　）经济管理人员　　8（　　）个体劳动者

4（　　）教科文卫人员　　9（　　）离退人员

5（　　）商业服务人员　　10（　　）其它（请注明）______

B.您的性别：

1（　　）男　　2（　　）女

C.您的年龄：______周岁

D.您的文化程度：

1（　　）不识字　　2（　　）初识字　　3（　　）小学

4（　　）初中　　5（　　）高中或中专　　6（　　）大专以上

E.您的婚姻状况：

1（　　）未婚　2（　　）已婚　3（　　）离婚　4（　　）丧偶

F.您的政治面貌：

1（　　）群众　　2（　　）共青团员

3（　　）民主党派　　4（　　）中共党员

G.您家的人均月收入是：

1（　　）29元以下　2（　　）30～49元　3（　　）50～69元

4（　　）70～89元　5（　　）90～109元　6（　　）110元以上

㉑如果您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有什么意见和建议，可写在下面：

（三）增强民意投票的信度

民意投票是表达舆论的特殊方式，一张小小的纸片凝结着每个人的意志，而千万个这样的纸片的集合就能深刻地表达民意。卢梭认为："每个人在投票时都说出了自己的意见，于是从票数

的计算里就可以显示出公意。”①投票适用于民意表决的一切事项，特别是适用于对人物的评价和对重要社会提案、议题、决议的裁决。票数的增多或减少也就意味着民意高涨或降低，“一票之差可以破坏双方相等，一票反对也可以破坏全体一致”②。在民意测验中，凡是代表人民心声的人选和各种提案，必然拥有绝大多数的选票，表现出人民的强烈选择。

在确定社会管理决策和领导者上任是否符合人民意愿的判断方面，最准确、最有说服力的是投票方式，它就象体育竞赛场上判断谁跑在最前边那样不容置疑。判断一个人能否当选代表或胜任某一职务，任何说明和辩解都没有公民投票那样更能说服人；评选最佳运动员、电影明星、优秀歌手、好市长、好厂长的唯一办法是发放数万张选票，让人民来用投票方式表达他们的选择。对那些重要的社会决策的表决，票数的高度集中等于领到了民意批准书而获得民意支持。

运用投票测验民意，在初级阶段尚未被人们普遍认识，有些人怀疑投票的准确性，信奉少数人或个人的决定胜过群众智能的准则。据报载，有人著文说：“在一些风气不正的单位，往往因此使不少坚持原则的好干部失去‘选票’，而那些工作平平、不坚持原则、谁也不得罪的干部反倒得票最多。”但是，如果人民尊重自己的利益，当“平平的干部”上去以后，管理混乱，生产水平下降，收入减少，群众利益受到损害，在第二次选举中就要把他淘汰，那些思想和能力强的人终究要被群众认识，最终会把他推选上来。投票表决只要形成一定制度，几年一选或随时以投票的方式罢免不合格的干部，人民就能正确表达民意。如果一次投票定终身，或用指定的候选人限制投票的选择性，人民群众将

---

① 《社会契约论》第132页。

② 同上书，第133页。

不会尊重自己的那一票，可能把投票当儿戏，投票方式也就不能真实地表达民意了。

由此可见，运用投票方式测量民意的信度不取决于投票形式本身，只要实行真正的民主，投票的结果一般是可以信赖的。损害投票信度，恰恰来自于把投票作为过场或在投票中营私舞弊的非法行为和专制作风。所以，增强投票的信度首先要尊重民意，保护群众运用无记名投票的神圣权利。

二、全息现象及对测验数据的科学分析

民意测验的最终目的是要把握民意的总体趋势。在一个拥有11亿多人口的大国，就全国性问题的民意测验，则需要把握不少于80%的人的意见倾向。而在实际上，任何民意测验也不可能发放几亿个问卷，那么怎样通过几万张、甚至几千张测验问卷的意见倾向确认民意的整体倾向呢？这就要运用“全息现象”的原理。

1948年出生于匈牙利的科学家加博尔提出“全息摄影”的理论，他设想利用激光不通过镜头而产生特殊的图象，在相位信息内包含有物体各个方面的高度和深度的准确信息。在全息图上，能从不同角度观看到原来的物体，全息照相的底片如果只残留一角，在激光和自然光的照射下，这一角仍然能再现被摄物体的立体全貌，显示出“观一斑而知全豹”的特异功能。这一原理直到60年代初有了高强度激光后，才变成现实。在全息底片上每一点都包含着被摄物体的全部信息。这一道理不仅在自然界，而且在社会现象中经常表现出来。一个城市的生活反映整个时代、整个国家的生活，一部分人的思想动向反映整个人民的思想动向。那么，均匀、合理地选择一部分人，了解他们的态度、就能认识整个社会意识的趋势，正如一滴水映出大海，一颗露珠折射出整个阳光一样。

民意测验正是“全息理论”的运用，即从选择的定量样本中推测出整个民意倾向，为观察几亿人的意向和社会动向提供多方位的视角。

正确地选取样本是保证民意测量数据科学性的前提。在汪洋大海的人群中，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一部分人作为测定对象，是舆论“全息”的基础。运用抽样的方法从不同地区、年龄区、各种职业、文化程度的人中选取少量人作为测定的目标，把民意的总体划分为各个部分，在这些部分中体现着整体的各种意向，样本以“平均值”成为整体群众的总代表。不搞抽样调查，或抽样调查的对象分布不合理，在选择的样本中就不具有全息功能。其他调查方法在了解民意方面所以不具有科学性，恰恰是由于缺乏全息信息功能的缘故。正如捷克斯洛伐克原中央电视台台长伊日·贝科康举例说明的那样，“有一个人在电车里批评了某一次广播节目或电视节目，密探却告密说：‘整辆电车在批评……’。随后，这份情报又由军官送交他的上级，上级根据自己的看法进行若干修改以后再转给写简报的人，而这个人便可以据此左右党的领导，因为他可以写上：‘公众对该节目表示愤怒’”①。通过道听途说，一人耳目所得，就把一部分人的态度夸大为公众意见，正是排斥抽样法的必然结果，民意测验应用抽样法，就能汇集全部的信息元，避免发生意向测定的任何片面性、主观性，彻底消除用有意夸大或缩小的手法来混淆是非。

样本回收后，一系列紧张、繁忙的统计与计算开始在电子计算机上进行，这是横跨感性向理性超越的第一步活动。正如马克思说：“计算是摇摆于感性和思维之间的理智的第一种理论活动。”②根据各种意见指数在舆论量度与强度的相互关联，对整个舆论的态势进行数据分析，就可以统计出抱有各种态度倾向的

① 《永无尽头的春天》第17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6页。

数量总和。电子计算机具有储存信息、逻辑判断、运算迅速、汇总准确的性能，把样本数量和舆论指数程序输入后，立即给人们提供数以万计的数据和各种舆论态势指标。最后，把几种不同舆论指标相比较，就能使我们把握社会舆论的总体指向和趋势。这时，我们将看到，上千或几万个样本经过电子计算机的处理，条理清晰地显示出几亿人民或一个较大群体的态度倾向。少量被测定的人数以"全息元"的因素反映了整体人数的意向，那么二者之间就构成了整体与浓缩点的全息对应关系。

起草民意测验报告，是测定程序的最后一步，这是由数据向科学结论的转化。民意测验报告要概括写明对当前某一问题或事件有几种舆论，它们的分歧点、起因是什么，各种舆论从众的主体都是哪些人(什么职业、收入或年龄等)，各种舆论从众人数的比例有多大。接着，报告要揭示出主导舆论——最能显示民意的态度发展、变化的趋势怎样、舆论在什么样条件下出现高涨或低落，由此判断可能发生的事件，其他次要舆论的变化或有没有上升为主导舆论的可能，等等。这一过程，是对整个社会舆论态势的全息整合，把社会各种动态性意见作为一种立体系统全部反映出来。

民意测验报告自始至终运用统计方法，对舆论指数提供的舆论态势进行综合分析。从事物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和相互转化中研究舆论态势和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区别社会舆情的主流与支流、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民意测验报告的科学性反映在统计运算的过程中，是定量分析的结晶。由于统计与定量分析以确凿的数字能揭穿任何谎言与虚伪，就绝不会把电车里几个人的议论扩大为公众的愤怒。那么统计在一定条件下就具有政治意义，在民意测验中更加反映出"统计是第一门政治科学！"① 在民意测验的统计中，几个就是几个，绝不会怪诞地把几个说成几万、几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6页。

千，也不会把几万、几千当成几个，这就能彻底粉碎一切政治谎言和欺骗。统计需要的是严密、精确的计算，而不是把结论建立在估计、推测与设想的基础上，以数据为基础的民意测验报告就排除了一切良好的愿望和理想，把全部论断建立在尊重客观事实、服从客观事实这一牢固的根基上。

后　记

1987年夏，正值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时刻，我产生了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舆论的兴趣。无疑，这是个十分艰深而又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课题，为此，我不得不付出满腔心血投入这项探索。此时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成立，我有幸成为该所的客座研究人员，深感需要加强舆论学基础理论与分支学科的建设，使舆论学为当代中国的改革事业服务，这部著作，就是这一愿望的结晶。

德国人类学家格罗斯认为："如果我们的解释，竟引起怀疑和驳议，那更是我们学术的大幸；因为哪里有怀疑和驳议，就是那里已经有发展进步的首要条件了。"这本拙作如果引起某些读者的注意或异议，一方面说明它还有许多缺陷，需要进一步深化、修改，另一方面可能启发了人们的思考力，唤起学术思想的萌动，这两种可能对本书作者都是一种鼓舞，敦促我再度努力，继续作深一层的摸索，以便更科学地再现当代中国社会舆论的活动规律。

本书在付梓前，曾广泛征求国内社会科学界和新闻宣传领域专家的意见，希望获得宝贵的指点。后根据他们的指点和建议，局部作了修改，增补了部分内容。这些专家是：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社会学教授郑杭生，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教授高放，北京日报社副社长、高级记者顾行，北京广播学院国际政治学教授许俊基，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新闻系教授甘惜分，武汉大

学新闻研究所所长、新闻学教授何微，复旦大学新闻系教授宁树藩，北京广播学院教授康荫，广播电视部政策研究室副主任赵水福，中国新闻学院教授孙世恺，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原所长商恺、新华社新闻研究所副所长成一，人民政协报总编辑张西洛，光明日报副总编辑王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主任何梓华、教授张隆栋和副教授林珊等，在此，对上述学者深表谢意。

此书定稿后，深感对当代中国社会的特征没有作出系统的论述，由于担心冲淡舆论规律的主线，加上篇幅所限，已无力增加有关这方面的内容。但本书在各章节都无不涉及到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征这一问题，也许这种分散论述的方式更容易突出“舆论”的主题。著者对此书的厚望仅仅在于，它能对当代中国的舆论形态作点有益的说明，以此呼唤其它研究者写出更为宏伟的论著，以弥补此书的不足。

刘建明

1988年3月初稿

1988年5月修改

1988年10月最后定稿

主 要 参 考 书 目

（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4卷）
《列宁全集》
《列宁选集》（1—4卷）
《列宁文稿》
《毛泽东选集》
《邓小平文选》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恩格斯论新闻》 新华出版社
《列宁论报刊与新闻写作》 新华出版社
《斯大林论报刊》 新华出版社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 新华出版社
《布尔什维克报刊文集》 人民出版社
《回忆列宁》（1—5卷） 人民出版社
《回忆马克思》（拉法格） 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传》（弗·梅林） 人民出版社
《恩格斯传》（海因里希·格姆科夫） 人民出版社

中共中央历史文献集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苏联共产党历史》　人民出版社
吴黎平：《社会主义史》　三联出版社
《社会主义思想史》　福建人民出版社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　吉林人民出版社
《科学社会主义概论》　江西人民出版社
《科学社会主义》　辽宁人民出版社
《十年动乱》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　新华出版社
《苏联东欧国家政治体制及改革》　求实出版社
〔苏〕《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　人民出版社
《唯物辩证法大纲》　人民出版社
高放：《社会主义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北京出版社
《政治经济学疑难问题研究》　甘肃人民出版社
《政治学概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
《当代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　经济日报出版社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问题解答与理论探讨》　辽宁人民出版社
《科学社会主义疑难问题研究》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科学社会主义原理》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会主义政治学》　人民出版社
《走向现代国家之路》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　辽宁人民出版社
〔苏〕《社会管理》　浙江人民出版社
〔苏〕《苏维埃建设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美〕《南斯拉夫的实验》　上海译文出版社
《社会主义行为管理学纲要》　湖南人民出版社

《当代中国哲学问题》 湖南人民出版社

〔苏〕《社会管理中的人》 知识出版社

（二）

甘惜分：《新闻理论基础》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新闻文存》 中国新闻出版社

《新闻学论集》（1—12集）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日〕小野秀雄：《新闻学原理》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藏（内）

〔法〕《一种自由的死亡》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藏（内）

〔美〕约斯特《新闻学原理》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藏（内）

〔苏〕《新闻学概论》 新华出版社

《列宁与新闻事业》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法〕《当代新闻学》 新华出版社

〔美〕《传播学概论》 新华出版社

〔美〕《传播学的起源、研究与应用》 福建人民出版社

〔美〕《传媒、信息与人》 中国展望出版社

《信息革命的技术源流》 四川人民出版社

《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浅说》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荷〕汉肯：《控制论与社会》 商务印书馆

〔美〕冯·贝塔朗菲：《一般系统论基础发展和应用》 清华大学出版社

《控制论、信息论、系统科学与哲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三）

《西方政治思想史》	天津人民出版社
《人类的知识》（罗素）	商务印书馆
〔苏〕《政治学说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西方政治思想简史》	北京大学出版社
《当代世界政治思潮》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8世纪法国社会思想的发展》	商务印书馆
《社会契约论》	商务印书馆
《18世纪法国哲学》	商务印书馆
《政治学》（亚里士多德）	商务印书馆
《政府论》（洛克）	商务印书馆
《法哲学原理》（黑格尔）	商务印书馆
《乌托邦》（莫尔）	商务印书馆
《圣西门选集》	商务印书馆
《潘恩选集》	商务印书馆
《培根论说文集》	商务印书馆
《人类理智新论》（莱布尼茨）	商务印书馆
《精神现象学》（黑格尔）	商务印书馆
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四）

李普曼：《舆论学》	林珊译
〔苏〕《社会学手册》	浙江人民出版社
〔德〕《定量社会学》	四川人民出版社
郑杭生等：《社会学概论新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苏〕《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学原理》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维纳著作选》 上海译文出版社
刘建明：《基础舆论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